

意义创造论

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

黄成龙、杨旭 主编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ISSN 2436-6471

意义创造论

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

黄成龙、杨旭 主编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2025

『地理言語学研究』モノグラフシリーズ No. 11

ISSN 2436-6471

黄成龙、杨旭 主编

《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2025

Cover image: Portrait of Randy J. LaPolla © 2025 Yuan Jie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7274638>

© 2025 by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発行日： 2025 年 10 月 6 日

発行者： 日本地理言語学会

ウェブサイト： <https://geolinguistics.sakura.ne.jp/>

所在地： 東京都渋谷区渋谷 4-4-25 青山学院大学 G1305 研究室

罗仁地先生小传

罗仁地（Randy LaPolla）是当代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罗仁地在汉语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同时，他在语用学、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田野语言学、记录语言学、类型学等语言学核心领域也造诣深厚，尤其对汉语、羌语、独龙语、日旺语以及菲律宾塔伽洛语的研究见解独到。自 2005 年担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来，罗仁地持续推动类型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并就类型学方法论、描写与分析范式、比较与分类动因等关键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

罗仁地祖籍意大利那不勒斯市，美国公民，1955 年出生于纽约。他本科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主修亚洲历史、哲学与政治。在本科期间，他通过英译版中国先秦文献对中国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为深入理解文献原意，他决心学好汉语。1976 年春天，罗仁地应中国政府邀请以中美人民友好协会积极分子的身份首次访华，实地了解新中国的发展。这次短暂访问使他萌生长期驻华研究的想法。当时，赴华长期居留的主要途径是从事英语教学，为此他专门攻读英语教学硕士学位。1980 年获得学位后，他立即赴湖南长沙担任暑期英语志愿教师，后转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任教。1981 年，他以进修生身份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学习。北大求学经历为他开启了汉语语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大门，从此与这些领域结下不解之缘。

在北大期间，他不仅系统修读了汉语语法、汉语史、古代汉语、中国通史、《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话调查、中国诗歌等专业课程，更有幸聆听戴庆厦教授、孙宏开教授、陈其光教授等专家学者特别开设的“汉藏语概论”课程。这些启蒙课程和导师的言传身教，激发了他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持久兴趣。

1983 年，罗仁地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师从 James A. Matisoff、王士元、Robert Van Valin 和 Johanna Nichols 等教授，专攻汉藏语系、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法理论。期间他还赴斯坦福大学跟随 Joseph Greenberg 教授研习语言类型学。在伯克利期间，他结识了李方桂教授及其家人。当时李夫人邀请伯克利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为李教授录制口述历史，由罗仁地负责组织工作并担任访谈人。在持续数周的访谈过程中，他得以与李教授深入交流。罗仁地常表示，这段经历不仅让他汲取了李教授渊博的语言学知识，更学习了大师的为人处世之道。1990 年，他以论文《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iderations》(汉语语法关系的共时与历时研究) 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奠定了他对语言结构问题的独特见解的基础,尤其在汉语语法关系和语序研究方面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1990 年博士毕业后,罗仁地先后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1996, 为该所首位非华裔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与翻译学系(1996-2004);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担任语言学讲座教授(2004-2012,负责全校语言学事务,2008-2010 年兼任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语言学与多语言研究系(2010-2021,同时在中文系、哲学系指导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21-2023)。

罗仁地的语言学研究以理解人类行为及其认知功能为核心。他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通过交际行为可以窥见思维方式的差异,因为不同语言反映不同的思维模式。罗仁地高度重视语言多样性,致力于探究不同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主张基于亚洲语言特点修正类型学和语法理论中的印欧语系偏见,从而拓展人类对语言类型的认知。多年来,他秉持以经验主义为核心的语言观,对类型学方法论、语言描写规范、语序表现动因等核心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并系统阐述了解决方案。

(潘露莉博士)

目 录

罗仁地先生小传	iii
1 引言	
黄成龙	1
2 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	
杨旭	20
3 罗仁地先生对汉藏语研究的贡献	
黄成龙、马王储	31
4 专名的一类非专名化历程：从“胡搅蛮缠”说起	
刘丹青、萧泳凯	50
5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With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Chinese 在 <i>zài</i> -phrases in translation ZHU Chunshen	65
6 Abductive inference in Mandarin interactions ZHENG Wuxi	91
7 现代汉语超常规三重否定：形成机制、类型与动因	
李姝姝	120
8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and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 WANG Feng	136
9 类型学框架下的彝语诺苏话关系从句	
胡素华	144
10 知识论视角下语气词“哈”的认识与道义调节	
周士宏、段晓臻	159
11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their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LIU Na and LU Jun	172
12 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	
姜静	199

13 维西县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	
李翔	214
14 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及其特征	
麻秀芝	226
15 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王保锋	239
16 南部羌语名词组特征的比较	
高韬	252

1 引言

黄成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先生是国际知名的语言类型学和汉藏语系研究学家，其学术贡献涵盖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田野语言学（field linguistics）、语用学与语言发展（pragmatics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汉藏语普通语言学（Sino-Tibetan general linguistics）、藏缅语普通语言学（Tibeto-Burman general）以及汉语、羌语、独龙/日旺语、他加禄语（Tagalog）等领域。罗仁地先生几十年的语言学研究，一直秉持经验主义语言学观，运用归纳法分析范畴、构式、语言类型、语用等复杂系统构成的语言系统的模式及其演化趋势。他的研究一方面为语言类型学研究，如独龙语的反身态/中间态、汉语作为话题型语言、原始藏缅语无形态、名词小句修饰名词等提供了重要的类型特征；另一方面，突破了汉藏语研究受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严重束缚，开创了汉藏语系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这里仅举罗仁地先生语言学观的几个方面及其方法论。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灵魂，罗先生认为语言研究方法既要重视自然语料，又要重视归纳法。不应事先预设某个语言有特定范畴，而是应从自然语料里看该语言呈现了什么范畴。该语言中呈现的范畴应予以深入描写，没呈现的范畴则可以不提。当然也可以提自然语料没有呈现出的范畴，如声调、示证、中间态等。最好不要说整个语言没有这些范畴，但可以说所调查的语料没有呈现它们。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每个学者应谨记跨语言的范畴是不存在的，每一门语言的范畴都是独特的，要按照特定语言的事实来确定范畴。所以说，要摆脱印欧语系的影响也很容易，就是按照自己的语言来分析。他认为不光研究汉语要摆脱印欧语系的影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也要摆脱汉语框架的影响。他提及，中国有很多学者学了汉语的那些句法形式，然后当他们在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时，就把汉语的那些范畴，如补语、状语等，硬套在少数民族语言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传统语法认为，所有语言都有主语和宾语。不及物动词只有主语，及物动词有主语和宾语，双及物动词有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这是早期语法研究的共识。但是，随着非印欧语研究和跨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主语和宾语不是语言的共性，世界语言中还有其他的语言类型。罗仁地先生反对把“主语”和“宾语”概念套用到汉语甚至汉藏语。在研究语法关系时，他认为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功能。第一种是语义。语义是一种真实世界的事情，比如说“我打你”，“我”是施事，“你”是受事，这个是不能变的，跟语言的表达方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用被动、施动都是一样的。很多人认为施事是主

语，这个是错误的。第二种是语用。比如，话题指的是你所讨论的那个所指，“我今天饿了”中的“我”就是话题。话题可能是施事（但不一定）。比如“我刚收到一封信”，“我”就不是施事，但还是话题。第三种是句法关系。它是句法的语法化结果，是一种特别的结构。比如说英语所谓的 *subject*，不是一个范畴，是一些构式里所指跟谓语的特别关系，有特别的标志、特别的语序、特别的意思、有格的标志，所以有形态句法的表现，而其功能是 *referent tracking*（跟踪所指），即制约听话者推测哪一个所指做了哪些事情。所以这三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只是有时候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主语会语法化？他认为是因为话题跟施事常常是同一个所指，所以这个所指可以在形式上习俗化、固定化，可是不一定每一种语言或某一种语言的每一个构式都会把这些句法关系语法化。所以这三个概念还是要分清楚，不能混乱。

信息结构决定语序。罗先生觉得汉语对类型学的贡献很大。一方面，汉语没有所谓的主语和宾语，词序完全是由信息结构决定的。另一方面，罗先生也认为很多学者的母语是印欧语系的语言，他们认为任何语言都该有某些范畴，没有的话根本无法沟通。可是汉语或其他一些语言的表达可以非常简单，一个字就可以表达很多，所以他觉得汉藏语系的语言对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有很大贡献。

在罗先生对语用学的界定中，语言是一种交际行为，所谓的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在自然交际活动中是如何使用的。语用学不只包含语言，还包括人在说话的时候用手势等身体语言进行交际的行为。他指出，语言是不同的构式。构式是一种习俗，包括个人习惯和社会习俗。语言形式是为了达到某一个交际目的而形成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语言的形式。

关于构式语法，罗先生认为研究任何语言，使用构式法都最适合。他指出，构式语法可以解决汉语语法中一些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词类问题、句法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在构式语法看来根本不存在，我们只要看某个词在哪一个构式以及构式的哪个位置发挥什么功能就解决了，就像黎锦熙说的“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和“由职显类”（黎锦熙 1924: 24, 1953: 10）。不同的构式有不同特点，罗先生认为句法关系和及物-不及物的范畴也不一定是整个、所有语言的特点。

在罗先生看来，类型学研究不一定是收集很多语言的资料，因为每个人、每个学者对语言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尽管收集了很多语言，但研究者不一定了解那些语言的实际情况。因此，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就是深入地了解某一门语言并发现新的现象，或者弄清楚由别人发现但还没搞清楚的现象。

罗先生认为，如果不了解“人”的历史，那就没办法讨论语言的历史。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汉藏语系的历史演变，就必须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汉藏语的形态句法跟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汉藏语根本没有主语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格”（*case*），就是那些传统的句法关系概念。名词上的标志，主要是语义角色标志，而不是句法关系标志。它也包括一些人称标志，一些语言还有所谓的 *hierarchical*（等级序列）标志，不是标记主语宾语的，而是标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第三人称一般不标。也就是说第一人称处于优先的顶端，比如说“我打他”的动词会呈现第一人称标志，“他打我”的动词还是

会呈现第一人称标志。也可能会有方向标志，就像独龙语和西夏语。我们之所以叫hierarchical（等级序列），就是因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这种概念结构是一种等级。还有示证范畴，世界范围内讨论示证范畴是一定要讨论汉藏语的，主要是藏缅语。应该靠真实语料，看经常呈现什么形式，所呈现的形式在不同语境里有什么功能，进而按照那个语言的情况来定范畴。

语言田野调查或田野语言学是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根基，语言类型比较基于细致入微的描写分析，而充分描写来源于扎实的田野调查。罗先生指出，语言调查的一个国际趋势就是完全用自然的语料记录语言。也就是说，母语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记。这样所做的调查比较可靠，自己也会比较踏实。在调查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翻译的方法，转而采用一些辅助工具，如图片、漫画、视频等引导发音合作人在自然语境中进行表述，同时做好记录和转写工作。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各不相同，在调查中需尽可能多地搜集和了解目标语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文化民俗等知识，以便在描写和解释中可以更加客观。通常对一个目标语的研究应该包括写一部参考语法、一部词典以及长篇语料集，在描写时做到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以功能学派和类型学的视角对目标语进行分析。

总之，罗仁地先生的语言学观是基于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注重形式与意义的关联、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以及交际互动等构成的整体论。在罗仁地先生即将迎来七十华诞之际，其弟子黄成龙和杨旭邀请罗先生的一些好友和弟子以“意义创造论”为主题，撰写一系列论文，编了这本贺寿文集。本文集共收了16篇论文，包括三大内容：罗仁地先生学术思想及其贡献、意义创造论、范畴或构式的微观描写和分析。

第一部分 罗仁地先生学术思想及其贡献

杨旭博士的《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对罗仁地先生提出的“意义创造论”做了导读。“意义创造论”强调语言是一种动态行为，属于交际和整体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其核心观点认为，人类通过溯因推理在解读的环境中创造意义，这一过程主观且不完备，但却是生存本能的体现。罗先生认为，交际行为是示意与推理的格式塔，语言仅是制约推理的工具，而非唯一方式。他还主张语言是一种文化习俗，反映并影响认知与文化，具有动态性和惯性。语言差异源于环境、社区和文化接触，研究应采取整合主义方法，结合跨学科、归纳法和实际语料，避免结构主义框架。

黄成龙研究员和马王储博士的《罗仁地先生对汉藏语研究的贡献》介绍了罗仁地先生对汉藏语研究的贡献。罗仁地先生通过实证研究和跨学科方法，对汉藏语系的溯源、演化和结构特征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必须避免主观臆断，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结合人口迁徙史和语言接触情况，开展汉藏语溯源研究。

第二部分 意义创造论

刘丹青教授、萧泳凯的《专名的一类非专名化历程：从“胡搅蛮缠”说起》通过对“胡”和“蛮”这两个古代区域少数民族泛称的考察，展示了汉语中专有名词非专名化的一种语

义演变历程：“胡”和“蛮”分别为北方或南方的少数民族泛称，在历史上的民族刻板印象、带有评价和感情色彩的话语和语境、特定的搭配关系和句法位置（尤其是定语和状语）等因素影响下，实现了非专名化，成为表示某种属性的形容词并产生方式副词的用法。

朱纯深教授的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With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Chinese 在 zài-phrases in translation*（《动后修饰、信息焦点意义创造——以翻译中汉语“在……”短语为例》）从翻译的角度对“在……”短语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语境凸显了意义创造在塑造意义创造体验中的重要性。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操作，也是一种通过文本重新表述人类经验的解释行为，因此译者应通过管理信息焦点在语法结构和文化期望之间定位，产出与目标语言受众产生共鸣的目标文本。这种解释学意识将语言分析与解释行为联系起来，强调意义创造既是基于文本的，也是基于社会的。

郑武曦博士的 *Abductive inference in Mandarin interactions*（《汉语官话交际互动中的溯因推理》）指出，在普通话互动中，以打断形式出现的投射通常是单一的，不成功的。打断者并不试图阻止被打断者完成发言。相反，打断者的目的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参与了对话。研究表明，被修饰的中心、子类和补语特别有可能在交流中成为投射。投射涉及溯因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事实上，人类交流是通过溯因推理实现的，因为听者推断出言者在执行行为时的意图。

李姝姝博士的《现代汉语超常规三重否定：形成机制、类型与动因》结合其他语言类型学研究成果，并从认知加工、交际互动、言语产出等方面分析了这种超常规否定用法的形成机制与动因，指出这种三重否定构式是两个音、形、义均有高度相似性的双重否定构式的整合。这种“意义完形优先”原则导致三重否定构式在实际交际中被重构为特殊强调手段，其理解过程印证了 LaPolla（2015、2021）的“意义创造论”，即语言交际本质上是语境驱动的动态协商而非形式符号的静态推导。

第三部分 范畴或构式的微观描写和分析

汪锋教授的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and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语音对应与概率评估的经验基础》）认为对应关系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石。确定语音对应关系涉及区分历史分化、语言接触和偶然相似性。从概率的角度来看，辨识语音对应关系必须首先考虑机率相似性的干扰。此文通过回顾前人基于经验对原苗瑶声调构拟的研究，并结合瑶语声调比较的概率计算，构建了一种基于实际分布的概率算法来辅助评估偶然对应，从而加强了语音对应辨识的概率基础。未来，将开发一些数学工具或方便的软件，在历史经验的指导下评估语音对应的相关概率。

胡素华教授的《类型学框架下的彝语诺苏话关系从句》认为彝语的关系化与名物化之间关系密切，核心名词是一个范围（也是一个话题），后置的关系子句是一个名词性结构对范围名词进行限定。后置的关系从句必须有标记，其标记可以是名物化标记 *su*³³，也可以是量词；被限定的核心名词为有指成分，它可以是类指、定指和不定指，由名物化标

记 su³³和量词来标明。

周士宏教授、段晓臻的《知识论视角下语气词“哈”的认识与道义调节》以知识论为理论根基对汉语小词“哈”的知识立场建构和道义立场表达进行分析,聚焦交际双方在言语互动中宣称和争夺知识权威的社交行为及其知识状态与站位表达,从而对“哈”的互动功能做出归一性解释。

刘娜博士、芦璐博士的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their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藏缅语人称代词的敬语形式及其类型学意义》) 考察了藏缅语中 127 种敬语形式的人称代词。通过研究认为,藏缅语中人称代词的敬语系统主要以二元礼貌区分和多重礼貌区分为特征,大多数语言来自藏语支。从形态学上看,主要采用异根和词缀,而屈折手段不太常见。他们认为藏缅语中大多数人称代词的敬语形式都源于现有人称代词形式的扩展,即使用复数形式的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

姜静博士的《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尝试对文荣方言的四种疑问结构进行梳理,探讨疑问结构各类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是) negVP”结构的来源,并从焦点的类型、语义倾向等方面探讨是非问与正反问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李翔博士的《维西县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从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类型、生命度差异的制约、句法结构的制约以及施受标记的多功能性几方面对其进行描写,以揭示塔城傈僳语施受结构的特点。

麻秀芝博士的《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及其特征》根据等比结构的构成方式及语义特征的不同,她把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划分为 3 种不同的结构类型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描写,据此探讨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在类型学上的共性及个性特征,为比较结构的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

王保锋博士的《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类型学考察》对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论元编码方式与策略进行描写,并归纳出“给”字结构的配置类型,进而讨论不同类型的“给”结构 T 和 R 的语序,及其跟名词性论元标记的互动。

高韬博士的《南部羌语名词组特征的比较》描写比较了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名词组的特征,认为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内部差异性。在最常见的普通名词方面,单音节结构的比例一致性比较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读音方面,这些差异的形成,不少是元音系统的自身演变造成的,如元音高化、双元音化等。

罗仁地先生犹如其座右铭“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有着丰富的研究经历,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汉藏语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祝愿罗仁地先生身体健康,学术之树长青,为语言学整体论研究贡献更大力量,继续引领语言类型学和汉藏语的研究。

总之,罗仁地先生的语言学观是基于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注重形式与意义的关联、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以及交际互动等构成的整体论。在罗仁地先生即将迎来七十华诞之际,其弟子黄成龙和杨旭邀请罗先生的一些好友和弟子以“意义创造论”为主题,撰写一系列论文,编了这本贺寿文集。本文集共收了 15 篇论文,包括三大内容:罗仁地先生学术思想及其贡献、意义创造论、范畴或构式的微观描写和分析。涉及到的语言或方言主要隶属

于汉藏语系（如汉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主要分布于东亚地区，具体包括（见图 1）：胶辽官话文荣方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荣成区、乳山区，烟台市牟平区）、彝语诺苏话圣乍土语（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棉桠镇比帝霍村）、萝卜寨羌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南部羌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萝卜寨、龙溪两河口、绵虬）、塔城傈僳语（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大村上组）、苗语松桃话（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芭茅村）等。



图 1：本书涉及的主要语言的地理分布

罗仁地教授著述目录

一、著作及主编论文集

[1994 年]

- Bibliography of the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XXV[M]. Randy J. LaPolla & John B. Low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997 年]

-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M]. Robert Van Valin & Randy J. LaPoll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01 年]

- Rawang Texts (with grammatical analysi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M]. Randy J. LaPolla & Dory Poa. Berlin: Lincom Europa, 2001.
-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Uttar Pradesh[M]. Randy J. LaPolla (ed.),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1.
- New Research on Zhangzhung and Related Himalayan Languages[M]. Randy J. LaPolla & Nagano Yasuhiko.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1.

[2003 年]

-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M]. Randy J. LaPolla with Huang Chenglong.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003.
-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M]. Thurgood, Graham & Randy J. LaPolla (ed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The Tibeto Burman Languages of Uttar Pradesh[M]. Randy J. LaPolla (ed.),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3.
-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M].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ed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2009 年]

- 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M]. 戴庆厦, 罗仁地, 汪锋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011 年]

-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Insights from Language Documentation.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Studies in Language[M]. František Kratochvíl, Alexander R. Coupe & Randy J. LaPolla (ed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1.

[2015 年]

-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M]. Rik de Busser and Randy J. LaPolla (ed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5.

[2017 年]

-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nd Edition)[M].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018 年]

-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M]. Randy J. LaPolla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2024 年]

- ChatGPT 来了——语言科学如何看待 ChatGPT[M]. 杨旭, 罗仁地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4.
- Ethnolinguistic contact across the Indo-Myanmar-Southwest China mountains. Special issue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M]. Alexander R. Coupe, Randy J. LaPolla & Hideo Sawada (ed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24.
- LaPolla, Randy J., David Sangdong. Rawang-English-Burmese Dictionary[Z]. <http://rawang.webonary.org/>

二、单篇文章

[1987 年]

- LaPolla, Randy J. Dulong and Proto-Tibeto-Burm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87, 10(01): 1-42.

[1988 年]

- LaPolla, Randy J. A Computer Application of Matthew Chen's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Mandarin'[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8, 16(02): 339-344.
- LaPolla, Randy J. Topicaliz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lexical passives in Chinese[C]//Marjorie K. M. Chan & Thomas Boyde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8: 1-17.
- LaPolla, Randy J. Subject and referent tracking: Arguments for a discourse-based grammar of Chinese[C]//Joseph Emonds, P.J. Mistry, Vida Samiian & Linda Thornbur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160-173.
- LaPolla, Randy J. The Phonetic Development of Tibetan: A problem set[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88, 11(02): 93-97.
- LaPolla, Randy J. A Computer Application of Matthew Chen's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Mandarin'[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1988, 16 (02): 339-344.

[1989 年]

- LaPolla, Randy J. Verb Agreement, Head-marking vs. Dependent-marking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C]//Kira Hall, Michael Meacham & Richard Shapir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Lexington: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1989: 356-366.

- LaPolla, Randy J. Dulong and Proto-Tibeto-Burm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87, 10(01): 1-42. (中文译文版: 罗仁地著, 乐赛月译. 独龙语和原始藏缅语比较研究[J].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 1989, 11(00): 49-78, 12(00): 19-42.)

[1992 年]

- LaPolla, Randy J.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92, 15(01): 1-9.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Dating and Nature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2, 55(02): 298-315. (中文译文版: 罗仁地著, 罗仁地译. 藏缅语族动词的人称标志: 其性质及起源时代[J]. 民族译丛. 1993(04): 42-52.)

[1993 年]

- LaPolla, Randy J.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993, 63(04): 759-813.
- LaPolla, Randy J. Book Review of *Contributions to Linguistic Research from China*, ed. by Alfred F. Majewicz, Poznan, 1991[J].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993, 7(02): 49-51.

[1994 年]

- LaPolla, Randy J.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Phonetic Symbolism as It Relates to Mandarin Chinese[C]//Leanne Hinton, Johanna Nichols & John Ohala (eds.), *Studies in Sound Symbo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0-147. (中文译文版: 罗仁地著, 杨旭译. 现代汉语的语音象征性[J]. 实验语言学. 2023(02): 12-20.)
- LaPolla, Randy J.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94, 17(01): 61-80.
- LaPolla, Randy J. Variable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994, 65(01): 131-173.
- LaPolla, Randy J. Book Review of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by Stephen V. Beyer, SUNY Press, 1992[J]. *Language* 1994, 70(01): 195-196.

[1995 年]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Change to Verb-medial Word Order in Proto-Chinese: Evidence from Tibeto-Burman[C]//Kitamura Hajime, Nishida Tatsuo & Yasuhiko Nagano (eds.),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95: 98-104.
- LaPolla, Randy J. Book Review of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by Diane Blakemore,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2[J]. *Language*. 1995, 71(01): 173-176.
- LaPolla, Randy J.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C]//Pamela Downing & Michael Noonan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30: 297-329. (中文译文版: 罗仁地著, 詹卫东译. 语用关系与汉语的词序. 载北京大学

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语言学论丛. 2004, 30: 334-368.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LaPolla, Randy J.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C]//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4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95: 189-228.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995, 66(04): 1149-1185.

[1996 年]

- 罗仁地, 杨将领. 独龙语/日旺语动词的返身态和中间态标志[C]//戴庆厦等 编.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13-34.
- LaPolla, Randy J. Book Review of *Advances in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82)*, ed. by Robert D. Van Valin J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Amsterdam[J].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1996, 49: 177-181.
- LaPolla, Randy J. Middle voic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C]//Maria Teresa Lino, Maria Francisca Xavier, Fátima Ferreira, Rute Costa & Raquel Silva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Pan-Asiatic Linguistics*. Lisbon: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 1996, 5: 1-15.

[1997 年]

- LaPolla, Randy J. Book Review of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Pacific Linguistics, Series C, No. 102)*, ed. by S.S. Wurm et al. Hong Kong: Longman Group (Far East) Ltd, 1987[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7, 1(01): 92-100.

[1999 年]

- Word Order Patterns in Sino-Tibeta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ories of Explanation In Typology[C]//潘悟云 编. 东方语言与文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204-237.

[2000 年]

- LaPolla, Randy J. Valency-changing derivations in Dulong/Rawang[C]//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2-311.
- LaPolla, Randy J. Book Review of *A Grammar of Meithei*: Shobhana L. Chelliah, (Mouton Grammar Library, 1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XXV+ 539 pp[J]. *Lingua*. 2000, 110(04): 299-304.

[2001 年]

- LaPolla, Randy J.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C]//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25-254. (中文译文版: 罗仁地著, 沈瑞清译. 民族迁徙和语

言接触在汉藏语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J]. 东方语言学, 2011(01):84-107.)

- LaPolla, Randy J. Dulong Texts: Seven fully analyzed narrative and procedural texts[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01, 24(02): 1-39.

[2002 年]

- 潘露莉, 罗仁地.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J]. *中国语文*. 2002(03): 203-209.

[2003 年]

- LaPolla, Randy J. An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C]//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2-42.
- LaPolla, Randy J. Evidentiality in Qiang[C]//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M.W. Dixon (eds.), *Studies in Evidentiality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63-78. (中文译文版:《羌语的示证》(郑武曦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 LaPolla, Randy J. English-Qiang Glossary by Semantic Field[C]//Ikeda Takumi (ed.), *Basic Materials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series, A03-004)*. Suita: Faculty of Informatics,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2003: 153-181.
- LaPolla, Randy J., Dora Poa. Texts in the Qugu variety of Northern Qiang[C]//Kitano Hiroaki (ed.),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inority Languag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Project Series)*. Suita: Faculty of Informatics,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2003: 77-94.
-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C]//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eds.),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A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113-144.
- LaPolla, Randy J. Qiang[C]//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73-587.
- LaPolla, Randy J. Dulong [C]//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674-682.

[2004 年]

- LaPolla, Randy J., Huang Chenglong. Adjectives in Qiang[C]//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6-322.
- LaPolla, Randy J.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C]//Ying-j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and Dah-an Ho (eds.),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4: 43-74.

[2005 年]

- LaPolla, Randy J. Typology and Complexity[C]//James W. Minett and William S-Y. Wang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Essays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 465-493.
- LaPolla, Randy J., Yang Jiangling. 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 in Dulong/Rawang[J]. *Himalayan Linguistics* 2005, 2: 1-13.
- 罗仁地, 潘露莉. 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C]//徐烈炯, 潘海华 编. *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 上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57-78.
- LaPolla, Randy J.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C]//Elena Filimonova (ed.), *Clusivity: Typ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291-311.
- 罗仁地. 第二语言习得对第一语言的影响[C]//戴庆厦, 贾益民 主编. *第四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50-57.

[2006 年]

- LaPolla, Randy J. Sino-Tibetan Languages[C]//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London: Elsevier, 2006: 393-397.
- LaPolla, Randy J. Copula constructions in Rawang[C]//Ho Dah-an, H. Samuel Cheung, Pan Wuyun & Wu Fuxiang (eds.),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70th Birthda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6: 1059-1076.
- 罗仁地. 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J]. *北京大学学报*. 2006, 43(02): 27-30.
- LaPolla, Randy J., Dora Poa. On Describing word order[C]//Felix Ameka, Alan Dench, & Nicholas Evans (eds.),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6: 269-295.
- LaPolla, Randy J. On grammatical relations as constraints on referent identification[C]//Michael Noonan (ed.), *Voic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honor of Masayoshi Shibatani and Taro Kageyama*, 2006: 139-151.

[2007 年]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Randy J. LaPolla. New Perspectives on Evidentials: A view from Tibeto-Burm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07: 30(02): 1-16.
- Poa, Dora, Randy J. LaPolla.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maintenance[C]//Osahito Miyaoka & Michael E. Krauss (eds.), *The Vanishing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7-354.
- 罗仁地, 杨将领. 通过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J]. *东方语言学*, 2007(01): 11-18. (Translated version in English: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 language by comparing it with relat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ranslation by Nathan Straub), unpublished.)

- 罗仁地.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J]. 语言学论丛, 2007,36: 42-56.
- LaPolla, Randy J., Huang Chenglong. 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J].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07, 1(02): 233-248.

[2008 年]

- LaPolla, Randy J.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08, 31(02): 45-66. (中文译文版:《日旺语的名物化》(郑武曦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 LaPolla, Randy J.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C]//the Academic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Beijing Forum, Peking University (ed.), 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Beijing Forum, Peking University and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Beijing, 2-4 November, 200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4-162.
- LaPolla, Randy J.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the Rawang Languag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8, 9(04): 797-812.
- LaPolla, Randy J. 'Transitivity harmony' in the Rawang language of northern Myanmar[C/E]//Louise de Beuzeville & Pam Peters (eds.), From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Parameters of language variation—E-Proceedings of the 2008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8: 1-9.

[2009 年]

- LaPolla, Randy J. Chinese as a topic-comment (not topic-prominent and not svo) language[C]//Janet Xing (ed.),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pproach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9-22. (中文译文版:《汉语作为话题-述题型(非话题突出型/非 SVO 型)语言》(李姝姝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 LaPolla, Randy J. Causes and effects of substratum, superstratum and adstratum influence, with reference to Tibeto-Burman languages[C]//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9: 227-237. (中文译文版:《底层、表层和附层影响的动因和结果——以藏缅语为例》(郑武曦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 罗仁地, 潘露莉. 菲律宾塔伽洛诺(Tagalog)的词类范畴[J]. 语言学论丛. 2010, 41: 1-14.

[2010 年]

- LaPolla, Randy J. Hierarchical person marking in the Rawang language[C]//戴昭铭 编.

第 40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07-113.

- LaPolla, Randy J.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nitic Languages[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2(05): 6858-6868.

[2011 年]

- LaPolla, Randy J. On Transitivity in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J]. *Studies in Language*. 2011, 35(03): 637-650.
- LaPolla, Randy J., František Kratochvíl & Alexander R. Coupe. On Transitivity[J]. *Studies in Language*. 2011, 35(03): 469-492. (中文译文版:《论及物性》(杨旭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2012 年]

- LaPolla, Randy J. Comments on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2, 13(01): 117-132.

[2013 年]

- LaPolla, Randy J. Eastern Asia: Sino-Tibetan linguistic history[C]//Emmanuel Nes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 Human Migration (Prehistory Volume)*, Chapter 25.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
- LaPolla, Randy J.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C]//Balthasar Bickel, Lenore A. Grenoble, David A. Peterson & Alan Timberlake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In honor of Johanna Nichol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463-474.
- LaPolla, Randy J.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C]//Peng Gang & Shi Feng (eds.), *Eastward Flows the Great River—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80th Birthday*.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3: 127-141.
- LaPolla, Randy J.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 Can an individual-identifying standard be developed? How do w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C]//Balthasar Bickel, Lenore A. Grenoble, David A. Peterson, & Alan Timberlake (eds.), *What's Where Why? Languag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3: 463-474.
- LaPolla, Randy J.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C]//Tseng Chiu-yu (ed.),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wan: Academia Sinica, 2013: 33-57.

[2014 年]

- LaPolla, Randy J. Constituent structure in a Tagalog text[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4, 15(06): 761-774.
- Tournadre, Nicolas, Randy J. LaPolla.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Evidentiality: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4, 37,(02): 240-263.

[2015 年]

- LaPolla, Randy J. Sino-Tibetan Syntax[C]//William S-Y Wang & Chaofen Su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5-57.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connection for the origin of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C]//Rik de Busser and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5: 31-44. (中文译文版:《语言结构与文化、认知的逻辑必然联系》(杨旭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2016 年]

- LaPolla, Randy J. Review of *The Language Myth: Why Language is Not an Instinct*, by Vyvyan Ev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J]. *Studies in Language*. 2016,40(01): 235-252.
- LaPolla, Randy J. On Categorization: Stick to the facts of the languages[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6, 20(02): 365-375.
- LaPolla, Randy J. Once Again on Methodology and Argumentation in linguistics: Problems with the arguments for recasting Sino-Tibetan as ‘Trans-Himalay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6, 39(02): 282-297. (中文译文版: 罗仁地著, 黄成龙, 宋佳译. 再论语言学的方法论与论据——对“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拉雅语系”的质疑[J]. *汉藏语学报*. 2019, 11: 1-14.)
- LaPolla, Randy J. On Scholarship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Review article on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C]//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Newell Ann Van Auken (e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16.

[2017 年]

- LaPolla, Randy J. An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C]//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40-69.
- LaPolla, Randy J. Noun-Modifying Clausal Construction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C]//Yoshiko Matsumoto, Bernard Comrie, & Peter Sells (eds.),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s of Eurasia: Reshaping theoret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7: 91-103. (中文译文版:《汉藏语的子句修饰名词构式》(郑武曦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 LaPolla, Randy J. Causation as a Factor and Goal in Typological Comparisons[J]. *Linguistic Typology*. 2017, 21(03): 547-554.
- 罗仁地. 尊重语言事实 提倡科学方法——21 世纪语言学刍议[N]. *光明日报*, 2017-12-03(12).

[2019 年]

- LaPolla, Randy J.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J]. *Nature*. 2019, 569(7754): 45-47.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in Proto-Sino-Tibeta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Daughter Languages[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019, 29: 122-144.
- LaPolla, Randy J. Arguments for seeing theme-rheme and topic-comment as separate functional structures[C]//J.R. Martin, Y.J. Doran, & G. Figueiredo (eds.), *Systemic Functional Language Description: Making meaning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2019: 162-186.
- LaPolla, Randy J.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Pronomenalisatio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9, 42(01): 143-147.

[2020 年]

- LaPolla, Randy J.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J].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020, 1(01): 146-166. (中文译文版:《追根溯源、鉴古知今——实现语言类型学的现代化》(杨旭译), 未公开出版, 见罗仁地教授个人网站, 郑武曦撰写的长摘要见https://mp.weixin.qq.com/s/VJlrd2708GXGHQGZdb_xfg。)
- 罗仁地. 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J]. *汉藏语学报*, 2020(00): 1-12.

[2022 年]

- 罗仁地. 非结构主义语言学. *实验语言学*. 2022, 11(03): 1-6.
- LaPolla, Randy J. The Chinese expansion and language coexistence in modern China[C]//Salikoko S. Mufwene & Anna María Escobar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Volume 1: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64-83.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Use of Rhymes in Determining the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Old Chinese Texts: The Case of the DàoDé Jīng 《道德經》[J].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2, 15: 1-9.
- 罗仁地, 潘露莉. 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C]//徐烈炯, 潘海华 编. *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增订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2: 38-52.

[2023 年]

- 罗仁地. 以人为中心——交叉研究的必然走向[J]. *语言战略研究*. 2023, 3: 93-96.
- 罗仁地. 汉藏语系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和历史发展——从日旺语(独龙语)说起[J]. *民族语文*. 2023(01): 3-17.
- LaPolla, Randy J. Grammatical Relations[C]//Delia Bentley, Ricardo Mairal Usón, Wataru Nakamura & Robert D. Van Valin Jr.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269 - 291.

- 罗仁地著, 姚洲译. 人工智能要考虑到溯因推理[J]. 长江学术. 2023(04): 109-113.
- LaPolla, Randy J. How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influe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language history: The case of Min Chinese[C]//彭刚, 孔江平, 沈钟伟, 汪锋 编. 高山仰止——王士元先生 90 华诞庆祝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81-92.
- 罗仁地. 赵元任先生的句子和论元结构概念[J]. 实验语言学. 2023, 12(04): 4-7.

[2024 年]

- LaPolla, Randy J., Keita Kurabe. Manifestations of Jinghpaw influence among Rawang speakers [J].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024: 4(02): 273-290.
- LaPolla, Randy J. On the Overlooked Diversity of Clause Structures and Argument Structures in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J]. Languages. 2024, 9(04): 135-143.
- 罗仁地, 卢琳. 21 世纪的田野调查——基于自然语料、归纳法和目的语母语人的认知范畴[J]. 语言学论丛. 2024(04): 14-19.

三、未公开出版的学术会议论文及教学讲义

[1996 年]

- On the Place of Chinese in the Typology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Systems, lecture given at Linguistics Seminar of the Dep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1996.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1997 年]

-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Fossi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singl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ogn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ecture given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minar in Linguistics, 1997.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 Language as Culture: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submitted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s part of a volume on Ethnosyntax edited by Nick Enfield, 1997.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2006 年]

- The How and Why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and keynote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 Chang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7-9 July, 2006.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 Clause linking in Dulong-Rawang, invit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the Semantics of Clause Linking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La Trobe University, 24 May, 2006.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2007 年]

- Word-class-changing Derivations in Rawang, invit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Word-class-changing Derivations,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La Trobe University, 13 June, 2007.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 Hierarchical Person Marking in the Rawang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to 4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Harbin, China, 26-29 Sept., 2007.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2012 年]

- Once again on person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A reply to DeLancey, paper presented to 4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6-28 October, 2012.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2013 年]

- Critique of Bilingualism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to China-ASEAN Symposium on Cross-culture Education and the 10th International Bilingualism Symposium, Guiyang, Guizhou, China, 16-17 September, 2013.

[2014 年]

- Affectedness in Some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st Affectedness Workshop,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7-20 June 2014.
- Variation of Tone in Different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 Rawa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24th Meeting of the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SEALS24), Yangon University, Myanmar, 27-31 May, 2014.
- O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multilingualism,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ICALLE), De Le Salle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16-18 Oct. 2014.

[2015 年]

-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0th SAAL Lecture 2015, 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30th Annual Meeting, Raffles Town Club, 31 October 2015. (Slides from talk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 On the Utility of a Communication-based Empirical Approach in Linguistics, invited keynote address to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15),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7-29 May 2016. (Slides from talk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 The Debate on Comparative Categories (Concepts) in Typology and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rd Bi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 Typolog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4-17 July, 2017. (Materials distributed for discussion at the conference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 keynote presentation to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 Typology, Renmin University, 2019-07-05-07. (Available on personal website of Prof. Randy J. LaPolla.)

（著述目录由马王储博士整理）

2 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

杨旭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 罗仁地先生提出“意义创造论”，强调语言是一种动态行为，属于交际和整体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其核心观点认为，人类通过溯因推理在解读的环境中创造意义，这一过程主观且不完备，但却是生存本能的体现。罗先生认为，交际行为是示意与推理的格式塔，语言仅是制约推理的工具，而非唯一方式。他还主张语言是一种文化习俗，反映并影响认知与文化，具有动态性和惯性。语言差异源于环境、社区和文化接触，研究应采取整合主义方法，结合跨学科、归纳法和实际语料，避免结构主义框架。

意义之创造，创造于头脑。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It's All in Your Head.)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罗仁地教授是一位奇妙的先生，面对他著作等身的成果，你会遇到范畴化的问题。罗先生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提供了两种分类法：一种是按照体裁，包括书籍、专刊、论文、报纸文章等；一种是按照语言和话题，包括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汉语、独龙语和日旺语、羌语、他加禄语、人工智能、语用学与语言发展、语言类型学与田野调查、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他人访谈自己、自己访谈他人等。这些洋洋洒洒的成果，拼凑出的是怎样一个罗先生呢？

罗先生是汉藏语专家，师从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权威詹姆斯·马提索夫 (James A. Matisoff) 先生，考察过上面提到过的诸种语言；他熟悉英语和汉语普通话及其方言，能够阅读法语和日语文献，还接受过两年的古藏文训练；正是在熟悉这些语言的基础上，他在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皆有精深见解。

他懂各种研究方法，做过田野调查，足迹遍及美国、菲律宾、中国（如北京、上海、台湾、香港、湖南、四川、福建、云南）等（罗仁地 2007；罗仁地、卢琳 2024）；做过心理学实验，如通过实验方法讨论了现代汉语的语音象征性问题（LaPolla 1994）；做过神经

杨旭. 2025. 罗仁地先生意义创造论导读.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20–30.

科学实验，试图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仪（EEG）技术，来研究溯因推理在大脑中的表征（罗仁地 2023a）。

他精通很多新兴的理论，如角色-指称语法、信息结构理论、构式语法、语法化学说、互动语言学等；也掌握很多经典的理论，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如布拉格学派）、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他也很懂非语言学的知识，在研究和教学中体现出跨学科性，比如罗先生曾说他的理论也考虑到给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去参考，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分布于中文系、哲学系、教育系、心理学系和社会学系等。

罗先生是如何把这些貌似差别很大的理论或领域熔铸在一起的？这就不得不提罗先生的意义创造论了。意义创造论的英文是 *The Creation of Meaning*，从这个名字本身就可以看出，这不是只关注语言的理论，而是从更大的视角出发的。何谓“意义”？我之前问过 AI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知道的是“人生”这个词的语义，但因为“人生的意义”这个表达已经“习俗化”了，它们给出的永远是哲学角度的回答。罗先生关注的就是这个更大的“意义”。

接下来，我将对罗先生的理论进行导读，主要基于这几篇文章：罗仁地（2017、2022、2023a）、罗仁地、潘露莉（2002）、LaPolla（2003、2015）。这几篇文章有重合之处，但各有侧重，如果非要推荐一两篇的话，我个人推荐罗仁地、潘露莉（2002）和 LaPolla（2015）。这篇导读的目的是在整理罗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帮助大家理清意义创造论之构建逻辑，带大家了解其纷繁复杂与内在统一；间或有我个人的点评，但不多，还是推荐大家去阅读原文。

一、世界因溯因推理而获得意义

意义创造论的核心主张是：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需要了解周遭发生的事情，需要了解我们如何与之互动，需要了解如何免于环境之伤害；这种了解即是在创造意义，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表面看来，这一核心主张没有谈及语言，但其实处处都在谈及语言，因为罗先生不仅把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考虑在内，而且把整体的交流行为与非交流行为都考虑在内，关心的是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包括与同类）之间的互动，而研究这种人类行为正是罗先生真正感兴趣的所在。

那么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通过思维或者推理。罗先生每次阐述意义创造论，都要把推理的知识先讲一遍（三者的定义、特征和案例见表 1），而且特意强调了溯因推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溯因推理在意义创造论中具有基础地位，因为意义创造的主要推理方式是溯因推测。人类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把那些最相关的事实或假设整合在一起，这既包括人类感知到的周围环境，也包括大脑里边激活的内在环境，从而创造出一种“解读的环境”（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¹在这个环境中，

¹ 可以看出，“环境”是一种认知或心理现象（Ungerer & Schmid 2006: 48）。

人类对某现象做出解释或提出假设，从而创造了意义。我们无法脱离这种解读环境进行推理，比如在判断那些脱离环境的词语的意义时，我们会无意识地创造出一种环境。

表 1 推理类型

类型	子类	定义	特征	例子
确定推理	演绎	从一般前提出发，通过演绎得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	前提真实保证结论真实	所有人都会死（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前提） 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不确定推理	归纳	对一组数据进行概括，获得一般结论	前提真实只能保证结论可能真实	我见到的天鹅都是黑的。（数据） 天鹅是黑的。（结论）
	溯因	针对某种现象提出原因（即因果推理）		有人拿着一把刀向我走来。（现象） 他是要过来给我切苹果。（解释）

遗憾的是，大家忽视了溯因推理，包括人工智能专家。罗先生说：“了解溯因推理法的功能和运用对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专做科技的学者甚至没有广泛认识到溯因推理法在下一步行动中的重要性，而这正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帮忙的地方。”（罗仁地 2023b）受罗先生启发，我在“认知语言学”课上讲到“语言决策”，也会特别地讨论到溯因推理法，并且概括了它的三个特征：（1）社会性，溯因推理属于社会推理，会激活用于心智解读的脑区；（2）概率性或主观性，因为意义的创造经常需要快速做出，所以整合的事实或假设必然是不完备的，所得结果也只能是大概率准确的；（3）自动性，即溯因推理经常是一种自动化加工，属于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直觉思维（gut feeling，Gigerenzer 2007）或者系统 1/快思考（System 1，Kahneman 2011）。

对溯因推理的一个误解是，它只是“溯因”，即由果及因，不包括由因及果。但事实上，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罗先生指出，由因及果即预测，是溯因推理的一种应用。举到的例子包括：开车的时候看到前面的车好像偏左，可以推测是因为他要换车道；黑云出现是因为水汽聚集，预测会下雨。好比我们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知兴替当然可以指导我们创造未来。当然，这种预测更像是预估，即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预言。具体到人际互动，我们通过溯因推理来理解同类行为（如动因、意图），也预测同类可能做出哪种行为（如帮助或伤害），这不过是普遍生存本能的一种应用；当我们理解了同类试图让我们了解其意图的意图，那么就具备交流的基础了。

二、交流是示意和推理的格式塔

交流涉及发起者和回应者二重角色，发起者做出示意行为，让对方明白自己想要就某些事情进行交流；回应者对之进行推断，得出示意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交流。发起者在做出示意行为时，也在推断回应者的理解能力，然后采用最有可能帮助对方理解的示意行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文学和幽默中，发起者的目的是对回应者的理解稍加阻碍，让对方付出更多的认知劳动以获取答案，因为我们人类有一种从推理中获得快乐的本能。罗先生关于文学和幽默的观点，让我对正在思考的修辞本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之前认为修辞和“元语言功能”密切相关，但是罗先生的观点启发我：我们之所以喜爱语言文字游戏，乃植根于我们喜爱推理的游戏本能（杨旭 2025）。

在罗先生看来，交流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是一个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的格式塔。他常举到的例子是上课点名：在课堂开始时，老师叫到“Alan”（艾伦），有一个学生指着艾伦的空位，说“厕所”。在这个交流行为中，学生知道老师叫人名字是在点名，而不是“称谓”；老师则根据语言线索“厕所”、非语言线索手势以及上厕所的百科文化知识等，推断艾伦到了，只是临时去了厕所，所以不应该标记为缺席。罗先生还举到纯视觉的例子，比如图 1，由爱尔兰风格的图案构成，虽然形式较为陌生，但人们仍能推断出 Google；再比如图 2，不同视角会得出不同的字母。罗先生想通过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意义，取决于我们的固有观念、我们认为重要/突显的东西，以及我们本身的视角。



图 1



图 2

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没有太大差别，都是服务于交流格式塔的。罗先生给了神经科学的证据：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表明，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处理位于大脑同一区域，包括被称为“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的区域。罗先生进一步假设，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心理学实验，来验证语言交流是否特殊，那么会发现语言与非语言交流并无差别。这也与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领域通用（**domain-general**）认知能力的观点相一致：即没有专门用来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用于处理语言的认知能力也在其他认知领域中发挥作用，语言不过是诸多领域通用认知能力的延伸。我有一门叫作“语言与符号”的课，会讲到姓名、脏话、唱歌、表情符号（**Emoji**）这些不被视为语言的例子，我发现通过这种交流格式塔视角，学生更容易对语言学产生兴趣。

在交流行为的格式塔中，语言和非语言的角色并列，都是用来制约对交流意图的解读的，只不过语言更为明确或精细，即“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区别是工具或方式的区别，进而导致精度的差异，就像手撕面包和刀切面包的区别一样”（**LaPolla 2021**）。需要注意的是，明确或精细是相对的，比如英语“**I have had lunch**”（午饭已经吃了）和“**I have been to the mainland**”（我到过大陆），都使用了强制的过去完成标记，制约得已经足够明确（我们不可能理解为现在或未来），但是过去是多久，只有结合环境才能知道：前者是发生在一个小时左右，后者是发生在更久的过去。更典型的例子是：我们会字斟句酌地制定法律，目的是明确，但仍然需要法院或法官来解读法律，这也给了坏人在法律灰色地带游走的可乘之机。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罗先生提出“一切都是语用学（**It is all pragmatics**）”这一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激进的说法。既然一切都是语用，那么与意义创造的主观性一样，交流行为也具有不确定性。交流不像过去认为的，是一种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做不到像邮寄包裹一样，邮寄的是什么，接收到的就是什么。交流主要基于具有概率性的溯因推理，其中语言相对于非语言固然提供了更多的制约，但永远不可能做到百

分之百制约。²我从罗先生的论述中领会到了辩证法：人类交流既体现出理性，因为合作原则的核心即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也体现出非理性，因为意义创造具有主观性，交流行为具有不确定性。

三、语言是一套涌现出的文化习俗

2019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我的合作导师林静夏老师推荐我去听罗先生的课。说实话，我当时没怎么听说过罗先生，因此并没有要去见大师的那种兴奋。只用了一节课，罗先生便征服了我，听他讲“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HOW & WHY LANGUAGES DIFFER），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抛开人格魅力不谈，这种一见如故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观决定的，因为我们都信奉：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王仁强老师学习了相关理论，还翻译了两篇论文（杨旭、王仁强 译 2015；王仁强、杨旭、李娜 译 2018）。在新加坡听罗先生讲课，我又找到了一位知己。

还是拿路的例子来说明比较好——这也是复杂科学和罗先生最常用到的例子——但不是类似于柏油路那样的路，而是草坪里面众人踩出来的路，英文叫作“欲望之路”（desire path）、“牛道”（cow path）或“羊道”（goat track）。人们在穿越草坪时，没有人想着要创造一条路，只是想着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即捷径）；一开始也只是踩踏的痕迹，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后，量变发生质变，一条路就“涌现”出来了，或者被人们识别出来了。这让我对鲁迅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了不同的认识。语言就像这条路，在前语言时代，没有人想着要发明一门语言，³但是当很多人尝试与同类沟通或互动时，语言便慢慢地形成了。这种形成没有目的或方向，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因此语言不是静态的事物，而是动态的演变，我们所看到的静态的词典、语法书，不过是动态演变的一个快照，语言唯一不变的是变异和变化。

罗先生认为，语言就像烹饪/饮食或者穿衣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习俗，其功能在于制约人类交流中的解读环境；所谓语言知识或规则，不过是我们以前如何使用词语和结构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经验。既然是文化，那么就可以施行“拿来主义”。罗先生举到的例子是英文中的 *gungho*（“有极大的精神或热情”），来自中文“工合”（“工业合作社”），英文“拿来”之后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文化来使用。好比东南亚虽然“拿来”了西方的叉子和勺子，但是使用的方式却非常不同。这些例子显示了语言和非语言文化之间的类似。

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罗先生为什么要用“制约”这个词，即是从反面来排除歧义的，或者说缩小可供推测的范围，而不是从正面促进“解码”得到语言中“编码”的意义的。

³ 当然，在语言诞生之后，人们具备了独立创造一门语言的能力，比如历史上有很多尝试创造世界通用语言的实践（如世界语），如今为影视剧创造的人造语言也是非常多（如克林贡语）。

语言既然是文化，那么也具有惯性特征。罗先生都是从个人角度论述这个特征的，但我认为应该区分一下个人习惯和集体习惯：个人在习得语言之后便形成习惯，比如把某些语音归为同一个音位，而把其他语音视为其他音位，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想改变这种习惯非常之难，因此口音是很难避免的；集体在涌现出语言之后也表现出惯性，即语言虽然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中，但不是极速或动荡的演变，否则很难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与之前强调的语言之“变”相比，集体语言又表现出稳定性或一致性。

把语言视为一种文化，就不得不谈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了，这是“语言与思维”领域所关心的话题。罗先生一直重视浪漫主义传统（LaPolla 2020），因此对语言与文化或思维的关系多有论述：

人们的文化和认知（例如，人们如何描述事件）会影响语言，但是一旦成为语言中的惯例，就会传递给后代，并且会影响人们如何思考这些事情。……语言编码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为我们从祖先那里学习了这些概念）。（LaPolla 2015）

看得出，罗先生基本上是主张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首先，语言反映出人们的文化和认知构建。以中文和英文对比为例（来自罗仁地 2017），“汤”和 soup，“南瓜”和 pumpkin、squash，“有”“在”和 have，它们之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不同语言反映了不同社群的认知范畴。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反映”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罗先生举了非语言的例子，比如戴领带、在英国喝茶前倒牛奶、公路上的拟人交警；也举了很多语言的例子，比如“回车键”（carriage return）的叫法来源于过去打字机纸架回位，“拨电话”（dial a phone）来源于过去的拨号盘，Goodbye 是对“God be with ye”的简化，这些例子都是过去自有其理据，但现在理据消失了，习俗化的行为留下了。

其次，语言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话镜》作者盖伊·多伊彻（Guy Deutscher）说，空间、性别和色彩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展示语言对思维有影响的领域（Deutscher 2010: 236）。但对我而言，语言学家不举语言本身的例子是说不过去的，罗先生就用了语言本身的例子：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真的会把普通话中“北京”中的开头声音听为/b/，他们也不会听到普通话中四个声调之间的区别。此外还举了自身的例子：罗先生在美国长大，认为小虾、大虾和龙虾是三种非常不同的动物，因为它们在英文中有非常不同的名字（shrimp、prawns、lobsters），但是在中文里，它们都叫“虾”，只不过在大小上有所区别（“小虾、大虾和龙虾”）。

四、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

前面讲过，我上过罗先生的一门课，叫作“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正是在这门课上，我体会到罗先生对一门具体的语言，可以了解得有多么细微。当我们阅读罗先生的理论文章时，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当我们阅读他的案例文章时，我们发现他是一个跋山涉水做过很多田野调查的科学家。

语言何以不同？关键词还是“制约”：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能表达或能理解什么，而是必须表达或必须理解什么；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因重复使用而发生习俗化之后，会选择对那门语言使用者来说最重要的概念领域进行制约。罗先生把这种“制约”呈现为3条公式，三者之间呈现递进关系（更多的例子参 LaPolla 2003）：

（1）语言是否制约对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比如，汉语没有标记时的结构，而英语有好几种标记时的结构。

（2）如果制约了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那么程度如何？比如英语将来时的解读分为过去、现在、未来，而日语分为过去和非过去，日旺语（缅甸克钦邦）分为非过去时和四种程度的过去时（取决于事件发生在过去多长时间）。

（3）如果制约了某一特定概念领域的理解，那么是如何制约的？比如说：一个说英语的人想说 *He is washing his hair*，必须用一个领属结构来制约对头发所有者的识别。在同样的情况下，日旺语也需要制约头发所有者的身份，但使用的是反身语和中动结构。

在这个框架下，罗先生对语言差异提出更理智的看法：不能简单地说某种语言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或对解读的制约更强，只能说某些语言在特定概念领域（如时态、共指）上选择了更强的制约，而在其他领域可能更为开放。这种多样性揭示了语言适应不同文化、认知和环境需求的灵活性。

至于语言为何不同，罗先生认为，语言的差异源于环境、社区规模、认知模式和文化接触的共同作用。语言不是静止的，而是通过无数个体的反复互动和适应逐渐演变的“无形之手”的产物。其结构和词汇反映了说话者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他们面临的沟通需求。尽管某些语言特征的最初动机可能不再明显，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和文化适应的证据（详参 LaPolla 2003）。

五、倡导整合主义的研究方法

罗先生倡导过很多种研究方法：

跨学科研究。既然语言本质上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灵活的文化行为、交流行为，那么语言学就是一门行为科学，所有有关行为的科学都跟语言学有密切关系，都是一体的（罗仁地 2017）。这也是为何罗先生会在“202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交叉学科前沿论坛”的演讲中说：“我的研究领域是语言学，……但是，当有人问我做什么样的研究的时候，我说我研究人类行为和认知。”（罗仁地 2023a）

归纳式方法。罗先生说，语言研究应基于真实语料，观察重复模式及其功能，依语言自身特性定义其范畴，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所谓跨语言范畴套用到未描述的语言身上，这样才能摆脱掉印欧语系或汉语框架的影响，确保每种语言的分析独立、客观，揭示其现象多样性（杨旭、卢琳 2021；罗仁地 2022）。罗先生呼应了石锋先生和李宇明先生（石锋 2025），倡议：“新时代的语言学研究，要着重以人为中心，呼吁大家走向社会！走向田野！走向实验室！走向互联网！”（罗仁地 2023a）

不区分共时和历时。罗先生指出，21 世纪的语言学研究观点认为，语言并非固定体系，也无“共时”与“历时”之别，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不断涌现。这种视角拓宽了语言学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所有交际行为，包括非语言交际和动物交际，而不仅仅局限于脱离语境的语言形式（罗仁地 2017；罗仁地 2024）。

具体的提倡还有很多，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那就是“整合主义”。罗先生把他所主张或认同的理论称为“非结构主义”或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方法，包括意义创造论、整合语言学（Integrational Linguistics）、极点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等。与结构主义的还原主义、成分主义和分布主义相比，整合主义以实际的言语单位（语调单位、构式）为基本单位，并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来看待言语行为，不仅包括语境和语调，还包括手势、眼神以及交际互动的其他方面（罗仁地 2022）。

罗先生的方法论是如何形成的？你可以说罗先生之所以提倡这样的方法论，是因为抱有前述认识论；但也可以说，是因为罗先生按照这样的方法论来展开研究，才形成了前述认识论。这种循环因果也体现在罗先生的论述里边：

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现象，是一种复杂自适应系统，是很多人进行交际时涌现出来的副产品。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解释其所以然。20 世纪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可以脱离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有关方面而单独研究语言的形式，但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带给我们有用的结果，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从交际互动的格式塔（完形）以及影响交际互动发生和运作的因素进行研究。

.....

遵循以上讨论的融合性方法，我对交际的本质以及语言的作用和本质有了新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与传统的看法很不一样：我了解到交际不是像电脑一样通过编码和解码进行的，交际的关键机制是溯因推理法，就是推测对方做出交际行为的目的。（罗仁地 2023a）

最后做个总结吧。我想说，罗先生不单单是一个语言学家，而是一个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也许正是这种人文精神，才是我特别喜爱罗先生的深层原因。我现在正在武汉大学代“人文社科经典导引”的通识课程，讲述仁爱、理性、正义、生死、爱恨、审美、悟性这些貌似很抽象的话题。这不是一门语言学的课，但我在课上也常引用罗先生的观点。比如讲到生死问题时，我会引用罗先生跟我们说过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是我们为

之赋予的意义,追求爱与被爱是意义之一种。尤其是在第一课,我在讲为何要设置人文通识课程时,会引用到罗先生那篇常读常新的演讲。所以,这篇文章以罗先生的引文开头,最后还是以罗先生的原话结束吧:

人类如果不想被机器取代,就必须回到使我们成为人的本能(get back to what makes us human)。这包括合作学习、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同理心——而这些正是与艺术和人文教育相关的技能。……。人文学科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明显但难以捉摸的能力,照亮我们共同的人性,照亮不同历史情况下的不同人的生活。这些作品以某种方式超越了自己创造的条件——针对其时代说话,但也超越其时代。(罗仁地 2023a)

参考文献

- 罗仁地 2007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语言学论丛》第 36 辑。
- 罗仁地 2017 尊重语言事实 提倡科学方法——21 世纪语言学刍议,《光明日报》2017 年 12 月 03 日 12 版。
- 罗仁地 2022 非结构主义语言学,《实验语言学》第 3 期。
- 罗仁地 2023a 以人为中心:交叉研究的必然走向,《语言战略研究》第 3 期。
- 罗仁地 2023b 人工智能要考虑到溯因推理,《长江学术》第 4 期。
- 罗仁地 2024 动物交际的机制,“实验语言学+云上论坛”,2024 年 03 月 26 日,南开大学(线上)。<https://mp.weixin.qq.com/s/obopPfSRuHIPS-HVdc8rNg>
- 罗仁地、卢琳 2024 21 世纪的田野调查——基于自然语料、归纳法和目的语母语人的认知范畴,《语言学论丛》第 4 期。
- 罗仁地、潘露莉 2002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第 3 期。
- 石 锋 2025 王士元之问——AI 与人类习得语言的方式如何不同,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2025 年 01 月 23 日。https://mp.weixin.qq.com/s/JQFbbARW_Fh6bFKB-6ujBA
- 王仁强、杨旭、李娜 译 2018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然语言,《英语研究》第 1 期:133-142。
- 杨旭 2024 一项宣言:语言是平的,微信公众号“摩登语言学”,2024 年 12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FzmR3IfllkkGEqglMYgnAA>
- 杨旭 2025 构式网络视角的汉语修辞研究,“构式网络与语法修辞”扁平工作坊,2025 年 03 月 29-30 日,中国·武汉,武汉大学。
- 杨旭、卢琳 2021 从功能视角看汉语研究若干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罗仁地访谈录,《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 杨旭、王仁强 译 2015 语言乃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立场论文,《英语研究》第 2 期。

- Deutscher, Guy. 2010.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Metropolitan books.
- Gigerenzer, Gerd. 2007. *Gut Feeling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Unconscious*. Penguin.
- Kahneman, Daniel.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LaPolla, Randy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s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In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eds.),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Pacific Linguistics.
- LaPolla, Randy J. 1994.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sound symbolism as it relates to Mandarin Chinese. In Leanne Hinton, Johanna Nichols & John Ohala (eds.), *Sound Symbolism*, 130–14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版: 杨旭译 2023 现代汉语的语音象征性, 《实验语言学》第 2 期。
<https://mp.weixin.qq.com/s/VFYrq5dJFytvylicl2UqJA>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connection for the origin of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31–44. John Benjamins. 中译版: 杨旭译 2022 语言结构与文化、认知的逻辑必然联系。
<https://mp.weixin.qq.com/s/SUqUFW8InuW1Atgania9dg>
- LaPolla, Randy J. 2020.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1): 147–167. 中译版: 杨旭译 2022 追根溯源、鉴古知今——实现语言类型学的现代化。
<https://mp.weixin.qq.com/s/3XDviv7-ooIJBmXhpog40A>
- LaPolla, Randy J. 2021.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05-21-2021, University of Sydney.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B4y1T7Qa/?from=search&seid=7579837679880514828&spm_id_from=333.337.0.0&vd_source=cc2dffce0723096c58949c3055dabe58
- Ungerer, Friedrich & Schmid, Hans-Jorg.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nd ed.). Routledge.

3 罗仁地先生对汉藏语研究的贡献

黄成龙 马王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汉藏语系研究学者,其学术贡献涵盖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描写语言学、田野语言学、语法理论及语言接触研究等领域。罗仁地先生通过实证研究和跨学科方法,对汉藏语系的溯源、演化和结构特征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必须避免主观臆断,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结合人口迁徙史和语言接触情况,开展汉藏语溯源研究。

一、罗仁地先生的学术生涯

罗仁地(Randy John LaPolla)先生 1955 年 10 月生于美国纽约。1981 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修语言学专业,这段经历成为罗仁地先生致力于汉语语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开端。罗仁地先生 1983 年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跟随王士元、万瓦林(Robert D. Van Valin, Jr)、Johanna Nichols 等先生系统学习语言学。1990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博士学位。1983 年至 1998 年期间,罗仁地先生先后任 Eurasia 出版社(Eurasia Press, New York)编辑、作者、译员及研究与发展部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师(Instructo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教师(Instructor)、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1990 年至 1997 年在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 Taipei)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助研究员(Research Assistant Fellow)、副研究员(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1997 年至 2004 年在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2004 年至 2012 年在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Australia)先后任/兼任首席教授(Chair Professor)、语言学系主任(Head of Linguistics Programme)、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2012 年任中央研究院首席教授。2012 年至 2021 年任在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黄成龙、马王储. 2025. 罗仁地先生对汉藏语研究的贡献.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 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 pp. 31-49.

University, Singapore) 任/兼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与多语学习系主任 (Head, Division of Linguistics and Multilingual Studie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教授 (Professor)。2021 年退休后, 罗仁地先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语言科学研究中心任特聘教授 (2021 年至 2023 年)。罗仁地先生至今仍笔耕不辍, 为世界汉藏语言文字研究作出突出贡献。

罗仁地先生自 1987 年以来, 一直从事世界汉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罗仁地先生尤其关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特别是羌语和独龙语/日旺语, 研究领域涉及语言描写、语言比较、语言起源与原始语言构拟、语言亲属关系、濒危语言问题、民族语言长篇语料记录、词典编纂等方面, 出版专著 20 余部, 发表论文 100 余篇, 是世界汉藏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本文拟就罗仁地先生汉藏语源流的研究和学术影响进行简要介绍。

二、汉藏语溯源研究

汉藏语溯源 (构拟) 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和热点问题之一。罗仁地先生在一系列论著和论文中对汉藏语溯源的方法论、汉藏语系的形成和演变、构拟原始汉藏语形态句法特征等方面均提出了重要的学术观点。

2.1 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决定汉藏语研究进展方向和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罗仁地先生在很多论著、论文中都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探讨。

1. 汉藏语溯源的方法

汉藏语溯源的研究必须要在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 (黄成龙、马王储 2025)。罗仁地先生在多篇论文中对原始汉藏语构拟时应当采取的方法问题进行论证。

(1) 汉藏语溯源与民族人口迁移史研究、语言接触研究相结合

罗仁地先生 (2000[2013a], 2001, 2006, 2012a, 2012b, 2019) 引用人口统计学的证据, 指出要正确理解汉藏语的历史发展, 必须先了解语言使用者的历史, 特别是迁徙历史。这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迁徙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语系为什么是现在的样貌。

罗仁地先生 (2000[2013a], 2001, 2006, 2012a, 2012b, 2019) 由此进一步指出汉藏语系语言的使用者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迁徙, 并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语言文化相接触, 这些接触是汉藏语系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 他强调语言接触不仅应该纳入考虑范围, 而且必须视为语言形成的基本要素。共同的发生学来源、分离性的人口迁移 (也就是这些分离之后发生的创新) 和语言接触是形成今天的汉藏语系的三项主要因素。

(2) 汉藏语溯源的计量研究方法

罗仁地先生 (2012a) 指出, 在原始语言构拟的过程中, 有些学者会把他们最熟悉的

语言当作是那个语系最保守、最原始的语言，因此会把所构拟的语言构拟成很像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即 Teeter 定律）。这种现象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一套经得起统计学评价的公认标准。对此，罗仁地先生（2000[2013a]，2012a）提出一种替代性研究方法——通过采用包括人称标记、反身态/中动态标记及其他显著特征在内的类词性变化集合（paradigm-like sets, sets of features）来构拟原始汉藏语的面貌。

2. 语言同源关系判定的方法

除用以构拟原始汉藏语面貌外，类词性变化集合也应该作为判定语言同源关系的基本方法（罗仁地 2000，2012a）。罗仁地先生（2000[2013a]，2003）指出，以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使用随机挑选的词汇列表建立语族中的亲缘关系，这种做法得到的结果往往经不起统计学检验。罗仁地先生建议，要运用历史比较法确立谱系关系，应使用新语法学派的方法论（Nichols 1996，另参看 Ringe 1992，1995，1996，1999；Campbell 2003），即找到统计意义上极不可能偶然发生的对应特征。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将同源成分（词汇或形态标记）组织成类词性变化集合，并将这些集合——而非单个元素——严格运用于亲缘关系判定。

2.2 汉藏语同源词溯源

汉藏语同源词是追溯汉藏语历史的重要证据，但同时也是学者们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黄成龙、马王储 2025）。在藏缅语族的很多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形式明显相关但有一个音段不同的词（罗仁地 1994b）。罗仁地先生（1994b）指出，有些词的变体形式（variation）明显受规则支配（rule-governed）（例如，藏语中的齿音后缀可将动词名物化或致使化），这种有规律的变体形式有助于原始汉藏语的构拟。

但罗仁地先生（1994b）也强调，即使面对是有规律的变体形式，研究者也必须确认严格齐整的对应关系。例如，即使我们并不知道藏缅语中 *la 和 *lap 为变体形式，但由于古汉语 *rap “（树）叶”和藏缅语 *la “（树）叶”的声母和韵母均齐整对应，并且词义相同，因此我们也可以确定古汉语 *rap “（树）叶”和藏缅语 *la “（树）叶”是同源词。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必须对每个音段的变体都做出解释，那么除非每个音段的变体均能找到多个个案的对应关系，否则不该强行构拟同源词。

同时，只有在同语族的语言和方言中找到相同类型的变体，才能构拟原始语言中的词。如果某种语言不具有特定形态性特征，那么该语言可能为特例。另外不同语支的语言可能具有不同类型的变体。当无法确定哪种变体形式出现更早时，必须构拟该语族中所有可能的变体形式。

2.3 藏缅语形态句法特征溯源

罗仁地先生还就原始藏缅语形态句法特征构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指出藏缅语中能够找到语言间平行发展的例证。特定类型的语法化现象往往出现在该语族不同支系中，有时甚至使用（词源上）相同的语素。该语族众多语言之所以频繁语法化出相同类型的语法范畴，并惯用相同语素实现这一过程，实则是受到“语言本质特性”的演变规律影响所

致。这种共同核心或本质特性，源于这些语言同出一源的亲缘关系。换言之，这些语言共同起源点的某些特征影响了每种语言的发展路径，从而导致了平行发展现象。因此，罗仁地先生沿袭了 Sapir (1921) 关于“语言漂移 (language drift)”的观点，指出正如“演变方向……可通过语言的历史轨迹推断 (Sapir 1921:150)”，我们也可沿此方向逆向追溯，从演变规律中反推这一共同起源点的本质特性 (LaPolla 1994a)。

罗仁地先生还特别指出，对原始藏缅语形态句法特征的构拟应当建立在以语言功能和类型学为基础的语法理论上，主张在构拟原始语言的过程中首先注意排除已知的语法化造成的结果，即剥离语法化的结果 (LaPolla 1992a, 1994a, 2001, 2012b)。罗仁地先生认为，从整体上看，原始藏缅语是一种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 (LaPolla 1989, 1992a)，现代藏缅语的形态几乎都是后起的。这一观点与其他学者以往观点不同，是罗仁地先生在原始藏缅语构拟方面提出的重要原创性观点。罗仁地先生对藏缅语形态句法特征的构拟如下：

性别标记：原始藏缅语中的反身词 (relex) *pa/*ma 可用作性别标记 (LaPolla 2003, 2015, 2017)。

小称标记：原始藏缅语中的 *ya “儿子、小孩”，表小称或表喜爱 (LaPolla 2003, 2015, 2017)。

名物化标记：原始藏缅语中的 *way/*yay，表示名物化；原始藏缅语中的反身词 *pa/*ma，表名物化（一般用于将普通名词转化为领格名词）(LaPolla 2003, 2015, 2017)。

从属标记：原始藏缅语中的 *way/*yay，表示从属化 (LaPolla 2003, 2015, 2017)。

句尾疑问标记：在小句形态层面，汉藏语可能拥有一个共同的句尾疑问标记 *la (LaPolla 2003, 2015, 2017)。

否定标记：原始藏缅语中小句否定的无标记形式为前置于动词的助词 (preverbal particle) *ma- (LaPolla 2003, 2015, 2017)。

禁止式标记：原始藏缅语中还有禁止式助词 *ta- (LaPolla 2003, 2015, 2017)。

基本语序：基于汉语内部证据，同时参照白语、克伦语的平行演变模式，以及 Wheatley (1984, 1985) 讨论的彝语连动结构，并结合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特别是塔芒语、基诺语和缅甸语）的语料，系统论证了原始汉藏语本为动词居末语序，而前上古汉语（原始汉语）、白语与克伦语则经历了从动词居末到动词居中的演变 (LaPolla 1994a)。根据构式的相对使用频率和构式的历时变化，罗仁地先生推断原始汉藏语的语序包括“指示词-中心词”、“中心词-数词”、“名词-介词”、“比较标准-(比较标记)-形容词” (LaPolla 2003, 2015; 2017)。

此外，罗仁地先生还对原始藏缅语构拟中出现的错误结论进行了批评。例如，罗仁地先生 (1992b) 批评了将等级序列的人称标记错误分析为作格标记的做法 (Bauman 1979; DeLancey 1989)。罗仁地先生强调，原始藏缅语的语法关系系统更接近典型的“语义角色决定型 (role-dominated)”，是一个不存在明确的“主语”或“直接宾语”的系统、篇章结构由语义和语用而非句法功能决定的系统 (LaPolla 1992b)，进而强调在原始藏缅语构拟的过程中，必须区分零标记和无标记现象，并指出格标记在藏缅语中多为非强制性特

征 (LaPolla 1992b, 1994a)。

三、汉藏语演化研究

罗仁地先生对汉藏语的演化，特别是藏缅语语法的演化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藏缅语内部语法差异较大，有些语言形态丰富，而另一些语言形态变化少，分析性强(黄成龙、马王储 2025)。罗仁地先生不仅对藏缅语的共同形态句法特征进行了深入复分析与总结，也对汉语、羌语、独龙语等语言的特异性特征展开了深入挖掘和研究。

3.1 藏缅语形态句法演化研究

罗仁地先生对藏缅语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派生形态、类别词、定指标记、非作格/非施事标记、语序类型等共同形态句法特征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1. 派生形态 (LaPolla 2003, 2015, 2017)

- (1) *s-前缀：致使化、去名物化、强调（状态变化）；
- (2) 清浊交替 (voicing alternation)：及物性发生改变；
- (3) *-t 后缀：将不及物动词转化为及物动词；
- (4) *-n 后缀：名物化后缀，在一些情况中表达集合语义；
- (5) *-s 后缀：通常为名物化后缀，派生出的名词一般为动词受事，有时也用于“方向的改变”或“注意力的逆转”。

2. 类别词 (LaPolla 2003, 2015, 2017)

类别词并非原始藏缅语的显著特征，但很多语言逐渐演化出类别词系统。

3. 定指标记 (LaPolla 2003, 2015, 2017)

原始藏缅语不使用定指标记 (definite marking)，仅羌语等个别藏缅语后续演化出了定指标记 (很有可能语法化自指示词)。很多演化出类别词的藏缅语和汉语方言还存在类别词-定指/特指标记 (definite/specific marking) 类并的现象。

4. 非作格/非施事标记 (LaPolla 1992b, 1994a)

罗仁地先生进一步讨论了 Matthew Dryer (1986) 对“主要宾语 (primary object)”标记 (即受事者/接受者的标记一致) 的分析。Dryer 认为这种标记是一种句法关系标记，但这在藏缅语中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种标记仅在藏缅语中的施事与非施事间出现歧义时出现。也就是说，这种标记实际是一种语义角色标记，而非句法关系标记。因此，罗仁地先生将其命名为“非作格 (anti-ergative)”标记 (LaPolla 1992b) 或“非施事 (anti-agentive)”标记 (LaPolla 1994a)。

5. 语序类型 (LaPolla 2003, 2015, 2017)

(1) 名词性短语

所有的汉藏语的名词性短语都使用“被领有者-领有者”和“修饰词-中心词”的语

序；所有汉藏语都使用“关系子句-中心名词”语序。汉藏语最初无名物化标记，关系子句也不使用关系化标记，但很多语言后续演化出相关标记。当关系子句实际为名物化结构时，“关系子句-中心词”实际为名词性短语的“修饰词-中心词”结构。

（2）动词性短语

绝大多数汉藏语为“否定词-动词”语序（但也有个别语言不使用这种语序）。

（3）焦点结构

汉语方言、Karen 语支语言和白语的无标记焦点结构为焦点后置于动词（而非其他语言中的焦点前置于动词），因此受事论元在小句中通常后置于动词。

3.2 具体语言形态句法研究

除对汉藏语（特别是藏缅语）进行溯源研究及对其整体特征进行比较与研究外，罗仁地教授也对汉语、羌语、独龙语/日旺语等汉藏语展开了深入调查，并得到了一系列开创性结论。罗仁地先生反对预设普遍范畴，主张根据语言内部证据定义语法关系。他强调，在对单个语言进行研究时，必须根据每种语言自身的特点进行研究（LaPolla 2011）。

1. 汉语形态句法研究

罗仁地先生的汉语研究以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为核心，挑战了结构主义传统（如主语-宾语框架），主张从语用、语义和构式角度理解汉语的独特性，对现代汉语句法关系的表达、汉语语序的历史演变过程与机制、汉语的信息结构等问题做出了原创性解释。

（1）现代汉语句法关系的表达（LaPolla 1988a, 1988b, 1990）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多研究者都曾尝试在汉语中寻找与印欧语系相同的语法特征。例如，试图证明汉语中也存在“主语”、“宾语”或“被动结构”等概念。然而，这些尝试始终都未成功。罗仁地先生指出，汉语不存在被动化（passivization）等句法功能转换规则（syntactic function-changing rules），也并未语法化“主语”、“宾语”等句法概念（LaPolla 1988a, 1988b, 1990, 1993）。

由于被动规则是跨语言中最常见的关系转换规则之一，因此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88a, 1990）对现代汉语是否存在词汇性被动结构进行了考察，经论证，现代汉语并不存在此类被动结构。汉语中只存在从语用视角出发、弱化施事、强化受事的受影响性的结构（参看 Shibatani 1985）。也就是说，汉语不存在超越语义角色的语法关系，也不存在改变关系的词汇规则（LaPolla 1988a, 1990）。

在此基础上，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88b, 1990）进一步主张对汉语语法关系采用基于话语的分析方法。他强调，语义角色与语法功能之间存在直接映射关系，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者完全依靠话语结构和语用知识（即真实世界经验）来准确指派语义角色。任何汉语句法分析都必须包含——甚至可能要以——话语层面为基础。虽然某些句法结构可以在句子层面进行分析，但就汉语的回指现象和语法关系而言，句子通常并非核心分析单位。此外，罗仁地先生还指出，正是由于汉语不存在语法化的句法角色，才导致形态标记的缺失。

为了证明汉语中不存在语法化的“主语”、“宾语”等句法概念，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90, 1993)全面考察了汉语跨句同指(cross-clausal coreference)、关系化(relativization)、比较结构(comparatives)、论元提升(rising to subject)、不可缺性(indispensability)、反身态(reflexives)、假被动结构(pseudo passives)中语义角色的限制性中和现象(restricted neutralization),以验证汉语中是否存在语法上可明确界定的“主语”或“直接宾语”范畴。经验证,汉语中并不存在此类现象。罗仁地先生进一步将汉语与典型的宾格型(accurative)语言和典型的作格型(ergative)语言进行比较,指出汉语既不是宾格语言又不是作格语言。

(2) 汉语语序的演变过程与动因

在证明汉语不是由句法关系决定语序的语言后,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90, 1994, 1995, 2006)提出,语用关系才是决定汉语语序的主要因素(LaPolla 1995)。他认为,原始汉藏语本为动词居末语序,而原始汉语(还有白语、克伦语)则经历了从动词居末到动词居中的演变。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94)通过跨语言材料说明,在世界上很多动词居末型语言中,某些焦点成分也倾向后置于动词(参见 Hetzron 1975; Herring & Paolillo 1993),这种现象同样见于藏缅语族塔芒语、基诺语、缅甸语。基于此,罗仁地先生假设原始汉语允许使用焦点成分后置于动词的结构,且这一原本有标记的语序模式因高频使用而逐渐成为无标记模式。此外,鉴于宾语是最常作焦点成分的名词性短语,其常规位置因此必将随之发生演变。

在此基础上,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95; 罗仁地、潘露莉 2022)进而探讨了汉语语序模式中的焦点结构及其语法化现象,指出动词居中的语序结构具有区分话题/非焦点名词性短语与焦点/非话题名词性短语的功能,而汉语已发展出特定句式结构,能够清晰标记焦点结构中的话题性(非焦点)成分与焦点性(非话题)成分。

(3) 汉语的信息结构

罗仁地先生沿袭了 Lambrecht (1986, 1987, 1988, 1989)提出的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概念,从焦点结构与话语指称对象的认知属性两个维度对汉语的句法结构进行了深入解析(参看 LaPolla 1990, 2009, 2013, 2017; 罗仁地、潘露莉 2022)。罗仁地先生通过汉语实例介绍了焦点结构的不同类型,并从焦点结构的角度解释了汉语的词序。他指出汉语动词居中的词序居多的原因是由于谓语焦点结构的句子居多(罗仁地、潘露莉 2022)。此外,由于汉语句子的主要构成原则为“话题-述题”结构,因此一些非常规的语序和语法结构也可以通过焦点结构(话题-述题)进行解释(LaPolla 2009; 罗仁地、潘露莉 2022)。

2. 羌语形态句法研究

罗仁地先生在全面调查、描写羌语语言系统基础上,对羌语的示证范畴、动词及物性、系词与存在类动词、形容词进一步展开了深入调查和描写,进而总结了羌语的类型学地位和形态系统所处的演变阶段。

(1) 羌语语言系统的全面描写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3, 2017; LaPolla with Huang 2003)对羌语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详细描写,包括羌语的语音系统、名词性短语、名词性形态、动词性短语、副词以及小

句。

（2）羌语形态句法的深入描写

a. 示证范畴（LaPolla 2003）

罗仁地先生对羌语中的三个示证标记进行了描写，指出对不同示证标记的具体解读取决于所涉及的活动或情境类型、行为者的人称属性，以及所使用标记的组合方式。

b. 形容词

罗仁地先生（LaPolla & Huang 2004）将可通过其语义范畴（表示维度、年龄、价值、颜色、品质和形状的词汇）及形态句法行为（参看 Huang 1994），与其他（及物和不及物）动词相区分的不及物动词定义为形容词。他指出，羌语的形容词与动词相同，可充当谓语，并接受相同的人称标记（一致关系）、方向标记、致使标记、示证标记以及多数体和否定标记。也就是说，羌语的形容词具备界定该语言动词的全部特征，因此实为动词的一个子类。但罗仁地先生也发现，羌语中也有极少量形容词形式具有修饰名词的能力，主要作方式状语使用且不出现于比较结构，同时兼具名词特性，因此主张将其归为副词词类。

c. 系词和存在类动词

罗仁地先生（LaPolla & Huang 2007）对系词与存在动词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羌语仅有一个系词动词，可用于等同关系、身份关系、修饰关系、命名关系、分裂结构及领属关系结构中。存在动词则有五个，其使用取决于指称对象的语义特征及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存在动词具有与形容词/状态动词相似的特性。例如，可受程度副词修饰，但无法直接修饰名词。但是，存在动词重叠的语义功能与形容词/状态动词不同。存在动词重叠引发动词的及物化，而形容词/状态动词的重叠则强化程度义。

d. 动词及物性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11）对独龙语和羌语动词及物性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独龙语和羌语的动词及物性系统存在差异，独龙语的标记系统具有更强的系统性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因此，罗仁地先生指出，不同语言中识别及物性的标准可能存在差异，每种语言都必须根据其自身特点进行研究。

3. 独龙语/日旺语形态句法研究

罗仁地先生在深入调查、描写独龙语/日旺语的基础上，对独龙语/日旺语的语音系统、反身态/中动态范畴（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变价手段（valency changing derivation）、比较结构（comparative construction）、小句连接（clause linking）、系词结构（copula construction）、名物化手段（nominalization）、关系子句（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及物性和谐（transitivity harmony）、人称标记（person marking）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描写，并对独龙语/日旺语与景颇语间的语言接触关系展开了研究。

（1）独龙语语言系统的全面描写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3, 2017）对独龙语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详细描写，包括独龙语的语音系统、名词性短语、名词性形态、动词性短语、比较构式、分裂构式等。

（2）独龙语语音系统的深入描写

罗仁地先生（LaPolla 1987）对独龙语的语音系统进行了详细描写。梳理独龙语的历

史发展脉络并整合分析所有语料后，罗仁地先生指出独龙语在音韵演变方面的高度保守性。例如，独龙语完整保留了诸如辅音丛与前缀加声母组合之间的区别等关键特征。得益于此，独龙语对于开展藏缅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3) 独龙语/日旺语形态句法的深入描写

a. 反身态/中动态范畴

罗仁地先生（罗仁地、杨将领 1996；LaPolla & Yang 2005）首次系统分析了独龙语动词后缀-*ɕur*³¹的多功能性，提出其核心功能为反身态标记，后演化出中动态标记功能，同时也有使行为动作的结果状态化的功能。从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和原型范畴（prototype categories）的角度来分析，-*ɕur*³¹的三种作用反映其历史发展上的三个阶段。这一发现填补了藏缅语中间态研究的空白。

b. 变价手段（LaPolla 2000）

罗仁地先生通过分析缅甸境内日旺语姆特江（Mvtwang）方言的语料，发现日旺语中及物性的编码方式以及通过“及物-不及物结构”传递不同语义的用法，是其语法体系的重要特征。除了及物-不及物动词（ambitransitive verbs）的不同用法外，日旺语还有两种降低配价和六种提高配价的形态手段。罗仁地先生还观察到，说话者可在同一从句中叠加使用多种不同的增价与减价语素（valency-changing morphemes），并通过它们的交互作用来实现差异化的语义表达。

c. 比较结构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4）深入描写了缅甸境内日旺语姆特江（Mvtwang）方言的比较构式，指出 A2 型比较构式是日旺语的典型比较构式。日旺语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采用 A1 型比较结构的变体。此外，日旺语中还存在一种双小句策略的比较构式。日旺语的等比语义通常通过比较构式中使用副词表达，极比语义则既可以通过语境推知，也可添加显性标记。

d. 小句连接

通过深入分析独龙语/日旺语语料，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6）指出独龙语/日旺语的主句通常以带时态标记的动词结尾，非主句则通常为名物化结构。非主句通常置于其所依附的主句之前。独龙语/日旺语通过并置、添加连接词等方式表达主句与非主句之间的不同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包括：并列、选择、对比、结果、时间、条件等。

e. 系词结构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6）发现，日旺语的系词虽采用不及物动词的形态结构，但却与其他不及物动词存在显著差异。日旺语的系词不能附加致使前缀，但可带两个无标记论元。日旺语系词句可以表达系词主语与系词标语间的修饰关系、身份关系、领属关系和命名关系等多种语义，并能与各类名物化小句搭配实现特定修辞效果。

f. 名物化手段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8）考察了日旺语中的名物化结构，观察得到 2 种名物化前缀和至少 5 种名物化附置词（enclitic）。此外，日旺语的名物化也可以通过声调屈折实现。

g. 关系子句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8）以自然语篇材料为基础，探讨了缅甸北部藏缅语族日旺语中的关系子句和名词补足语结构的类型及功能，并结合藏缅语族整体特征，分析了日旺语关系子句的历史发展轨迹。罗仁地先生在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前置型关系子句。其中，一类带有名物化标记，另一类无名物化标记。由于名物化结构本身具有名词性属性，因此也可通过同位结构后置于中心词。研究还结合藏缅语系整体特征，

h. 及物性和谐

在藏缅语族不同语言中，动词及物性在不同语言系统中的重要性存在较大差异。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8）对缅甸北部日旺语的动词及物性进行考察，发现该语言所有动词均通过形态明确区分及物性，并拥有丰富的增价/减价词缀。日旺语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及物性和谐”，即所有助动词本质均为及物动词，与句中的主要及物动词连用时，助动词直接接在主要及物动词后，与主要及物动词共享一套及物性标记形态；若主要动词为不及物动词，则助动词必须通过反身态/中动态后缀转换为不及物形式以实现和谐。此规律在主要动词为名物化形式时依然成立。罗仁地先生指出“及物性和谐”应当被看作一项类型学特征。

i. 人称标记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10）发现，日旺语的谓语动词上需要添加人称标记，且人称标记呈现出层级性（hierarchical）特征。第一人称通过多种方式（后缀、词尾辅音变化、元音延长等，且单个动词复合体内最多可出现五次标记）获得优先标记；第二人称则采用逆标记机制，即当存在第一人称参与者但非施事者，且第二人称参与时才会显现。罗仁地先生指出，这种标记系统与语义角色标记系统（如羌语）或语法关系标记系统（如英语）存在本质差异。

四、罗仁地先生的语言学观

罗仁地先生对世界汉藏语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汉藏语源流和演化的探索，也体现在田野语言学、描写语言学、词典与长篇语料编纂等方面。此外，罗仁地先生也具有前沿的语言学观和创新性的语言学研究视野。

4.1 以语言事实为优先，以类型学与功能为导向

罗仁地先生反对预设普遍语法范畴，并在研究中多次强调语言学研究必须尊重语言事实（Van Valin & LaPolla 1997; LaPolla 2002, 2006a-d, 2008a, b, 2016a-c）。首先，罗仁地先生呼吁在类型学和历史比较研究中坚持实证和逻辑严谨性，避免主观臆断。例如，罗仁地先生坚持同源词判定需满足音义对应规律，构拟需基于多语言变体证据，避免孤立分析，并提倡通过形态-句法特征集合（如人称标记、示证系统）验证语言亲缘关系。

其次，罗仁地先生反对结构主义的先入为主，强调对具体语言的研究必须从真实自

然语料出发，发掘语言的特异性特征（LaPolla 2006a, 2007, 2016a-c）。例如，罗仁地先生批评了 SVO、SOV 等分类忽略了语言事实，主张描述语言中决定词序的实际原则（LaPolla & Poa 2006），强调信息结构（如话题-述题）对汉藏语句法的塑造作用，提倡以构式为基础分析汉藏语句法（Van Valin & LaPolla 1997; LaPolla 2008b, 2013b）。

4.2 语言演化的多维驱动视角

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0 [2013a], 2001, 2003, 2011, 2012a,）在研究中反复强调语言演化的多维动因。他指出，语言演化是发生学遗存、人口迁徙和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特别强调接触语言学视角在谱系树模型研究中的主要性。

4.3 跨学科整合

罗仁地先生在语言学研究中融合了认知科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观点与方法，深化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例如，罗仁地先生（LaPolla 2001）强调语言与文化、认知密不可分。当文化接触的程度足够深，接触会慢慢改变借用者对某些事项的概念。青海五屯话（陈乃雄 1982）是一种深度藏语化的汉语方言。五屯话不使用两个词分别表示“寡妇”和“鳏夫”，而是和藏族人一样，用汉语“寡妇”同时表示“寡妇”和“鳏夫”。再如，罗仁地先生在一些列论文中指出汉藏语系承载着诸多历史东亚族群（包括汉族、藏族和缅族等）的迁徙历史，并指出汉藏语系的历史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并通过一项精确的计算分析方法证实，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其分支分化始于约 5900 年前（参看 LaPolla 2001, 2006, 2012b, 2019, 2022）。又如，罗仁地先生通过声学实验证明，与很多语言相似，汉语中也存在用高音质音段（acute segments）关联“小”范畴的词汇，以低音质音段（grave segments）关联“大”范畴的词汇（LaPolla 1994）。

五、结语

罗仁地先生（Randy J. LaPolla）的研究涵盖了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理论、语言接触与演变、田野调查方法等多个领域，其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和批判性。罗仁地先生的研究以实证为基础，融合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法，推动了汉藏语系研究的科学化。其批判性思维和对语言多样性的尊重，为语言学方法论提供了重要反思。罗仁地先生曾提问：“语言何以不同、为何不同”，这个问题仍需语言学者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 黄成龙、马王储. 孙宏开先生的汉藏语源流研究及其学术影响[J]. 中国藏学, 2025(01):179-192+220.
- 罗仁地. 2007.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 语言学论丛 36.0: 42-56.
- 罗仁地. 2020. 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和语言接触学. 载戴庆厦编, 汉藏语学报, 1-12.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罗仁地. 2023. 汉藏语系修饰指称词子句的类型和历史发展——从日旺语(独龙语)说起. 民族语文 1: 3-17.
- 罗仁地. 尊重语言事实 提倡科学方法——21 世纪语言学刍议[N]. 光明日报, 2017-12-03(12).
- 罗仁地, 潘露莉. 2005. 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 载徐烈炯, 潘海华编. 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 57-78.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罗仁地, 杨将领. 1996. 独龙语/日旺语动词的返身态和中间态标志. 载戴庆厦等编. 中国民族语言论丛, 13-34.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罗仁地, 杨将领. 2007. 通过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J]. 东方语言学 1: 11-18.
- 潘露莉、罗仁地.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J]. 中国语文. 2002(03): 203-209.
- Bauman, James J. 1979.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ergativity in Tibeto-Burman. In Frans Plank (ed.), *Ergativity: towards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419-433. London: Academic Press.
- Campbell, Lyle. 2003. How to show languages are related: Methods for distant genetic relationship. In Brian D. Joseph & Richard 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262-28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DeLancey, Scott. 1989. Verb agreement in Proto-Tibeto-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2.2: 315-333.
- Dryer, Matthew S. 1986. Primary objects, secondary objects, and antitativity. *Language* 62: 808-845.
- Herring, Susan C., John C. Paolillo. 1993. Focus position in SOV languages. In P. Downing and M. Noonan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163-198.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Hetzron, Robert. 1975. The presentative movement, or why the ideal word order is V.S.O.P. In Li C. N. (ed.),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345-38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uang Chenglong. 1994. *Qiangyu xingrongce yanjiu* (Study on the Adjectives of the Qiang

- Language). Yuyan Yanjiu, 1994: 2.181-9.
- Lambrecht, Knud. 1986. Topic, Focus, and the Grammar of Spoken French. PhD. dissertation, UC Berkeley.
- Lambrecht, Knud. 1987. Sentence focus,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the thematic-categorical disti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366-382.
- Lambrecht, Knud. 1988.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Syntactic amalgams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Lambrecht, Knud. 1989. When subjects behave like objects: A markedness analysis of sentence focus constructions across languages.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1987 LSA paper).
- LaPolla, Randy J. 1987. Dulong and Proto-Tibeto-Burman[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0.1: 1-42.
- LaPolla, Randy J. 1988a. Topicaliz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lexical passives in Chinese. In Marjorie K. M. Chan & Thomas Boyde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17.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 LaPolla, Randy J. 1988b. Subject and referent tracking: Arguments for a discourse-based grammar of Chinese. In Joseph Emonds, P. J. Mistry, Vida Samiian & Linda Thornbur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160-173. Irv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aPolla, Randy J. 1989. Verb agreement, head-marking vs. dependent-marking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In Kira Hall, Michael Meacham & Richard Shapiro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356-366. Lexington: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 LaPolla, Randy J. 1990.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iderati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LaPolla, Randy J. 1992a. On the dating and nature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5.2: 298-315.
- LaPolla, Randy J. 1992b.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TBA* 15.1: 1-9.
- LaPolla, Randy J. 1993.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759-813.
- LaPolla, Randy J. 1994a.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 *LTBA* 17.1: 61-80.
- LaPolla, Randy J. 1994b. Variable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5.1: 131-173.
- LaPolla, Randy J. 1994c.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phonetic symbolism as it relates to Mandarin Chinese. In Leanne Hinton, Johanna Nichols & John Ohala (eds.), *Studies in Sound Symbolism*, 130-1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5a.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41),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1995b.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6.4: 1149-1185.
- LaPolla, Randy J. 1995c.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into phonetic symbolism as it relates to Mandarin Chinese. In Leanne Hinton, Johanna Nichols. & John J. Ohala (eds.), *Sound Symbolism*, 130-1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5d. On the change to verb-medial word order in proto-Chinese: Evidence from Tibeto-Burman. In Kitamura Hajime, Nishida Tatsuo & Yasuhiko Nagano (eds.),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98-104.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1995e. Pragmatic relations and word order in Chinese. In Pamela Downing & Michael Noonan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297-32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1996. Middle voic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Maria Teresa Lino, Maria Francisca Xavier, Fátima Ferreira, Rute Costa & Raquel Silva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Pan-Asiatic Linguistics*, 1-15. Lisbon: 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Association.
- LaPolla, Randy J. 2000. Valency-changing derivations in Dulong/Rawang. In 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282-3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1a. Dulong Texts: Seven fully analyzed narrative and procedural texts[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 1-39.
- LaPolla, Randy J. 2001b.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n R. M. W. Dixon & A. Y. Aikhenvald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225-254.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3a. An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2-4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03b. Evidentiality in Qiang. In Alexandra Y. Aikhenvald & R.M.W. Dixon (eds.), *Studies in Evidentiality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 63-7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03c. English-Qiang Glossary by Semantic Field. In Ikeda Takumi (ed.), *Basic Materials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series, A03-004)* , 153-181. Suita: Faculty of Informatics,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 LaPolla, Randy J. 2003d.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In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eds.),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A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113-144.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LaPolla, Randy J. 2003e. Qiang.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573-58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03f. Dulong .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674-68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04.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In Ying-j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and Dah-an Ho (eds.),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43-7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05.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n Elena Filimonova (ed.), *Clusivity: Typ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the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291-3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Luo Rendì). 2006a. Lishi yuyanxue he yuyan leixingxu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ypology).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3.2 (March 2006): 27-30.
- LaPolla, Randy J. 2006b.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393-397. London: Elsevier.
- LaPolla, Randy J. 2006c. The how and why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and keynote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 Chang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7-9 July, 2006.
- LaPolla, Randy J. 2006d. On grammatical relations as constraints on referent identification. In Tasaku Tsunoda and Taro Kageyama (eds.), *Voic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Festschrift for Masayoshi Shibatani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139-15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LaPolla, Randy J. 2006e. Copula constructions in Rawang. In Ho Dah-an, H. Samuel Cheung, Pan Wuyun & Wu Fuxiang (eds.),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70th Birthday*, 1059-107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08a .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 45-66.
- LaPolla, Randy J. 2008b. Questions on transitivity. Keynote presentation to open the Workshop on Transitivity,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21 August.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as LaPolla, Kratochvíl & Coupe 2011.)

- LaPolla, Randy J. 2008c.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the Rawang Language[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4: 797-812.
- LaPolla, Randy J. 2008d .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the Academic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Beijing Forum, Peking University (ed.), *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Beijing Forum, Peking University and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Beijing, 2-4 November, 2007)* , 144-16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8e . ‘Transitivity harmony’ in the Rawang language of northern Myanmar. In Louise de Beuzeville & Pam Peters (eds.), *From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Parameters of language variation—E-Proceedings of the 2008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1-9.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 LaPolla, Randy J. 2009a. Chinese as a topic-comment (not topic-prominent and not svo) language. In Janet Xing (ed.),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pproaches*, 9-2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09b. Causes and effects of substratum, superstratum and adstratum influence, with reference t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n 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 227-237.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2010a.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nitic Languages[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5: 6858-6868.
- LaPolla, Randy J. 2010b. Hierarchical person marking in the Rawang language. 载戴昭铭编. 第4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论文集, 107-113.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LaPolla, Randy J. 2011. On Transitivity in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J]. *Studies in Language* 35.3: 637-650.
- LaPolla, Randy J. 2012a. Comments on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 117-132.
- LaPolla, Randy J. 2012b. Once again on person-marking in Tibeto-Burman: A reply to DeLancey 201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6-28 October.
- LaPolla, Randy J. 2013a. Subgrouping in Tibeto-Burman: Can an individual-identifying standard be developed? How do w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migrations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Balthasar Bickel, Lenore A. Grenoble, David A. Peterson, & Alan Timberlake (eds.), *What’s Where Why? Language Typology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y*, 463-47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13b.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 In Tseng Chiu-yu (ed.),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33-57. Taiwan: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15a. Sino-Tibetan Syntax. In William S-Y Wang & Chaofen Su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5-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15b.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connection for the origin of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Rik de Busser and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31-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16a. Review of *The Language Myth*, by Vyvyan Evans. *Studies in Language* 40.1: 235-252.
- LaPolla, Randy J. 2016b. Once Again on Methodology and Argumentation in linguistics: Problems with the arguments for recasting Sino-Tibetan a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9.2: 282-297.
- LaPolla, Randy J. 2016c. On categorization: Stick to the facts of the languages. Invited position paper for special issu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on descriptive vs. comparative categories, 20.2 : in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16d. On scholarship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Review article on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 by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and Newell Ann Van Auk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6.3: .
- LaPolla, Randy J. 2017a. An Overview of Sino-Tibetan Morphosyntax. In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nd Edition), 40-6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17b. Noun-Modifying Clausal Construction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Yoshiko Matsumoto, Bernard Comrie, & Peter Sells (eds.), *Noun-Modifying Claus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s of Eurasia: Reshaping theoret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91-10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17c. Causation as a Factor and Goal in Typological Comparisons. *Linguistic Typology* 21.3: 547-554.
- LaPolla, Randy J. 2019a.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Pronomenalisatio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2.1: 143-147.
- LaPolla, Randy J. 2019b.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Nature* 569.7754: 45-47.
- LaPolla, Randy J. 2019c.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in Proto-Sino-Tibeta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Daughter Languag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9.0: 122-144.
- LaPolla, Randy J. 2019d. Arguments for seeing theme-rheme and topic-comment as separate functional structures. In J.R. Martin, Y. J. Doran, & G. Figueiredo (eds.), *Systemic*

- Functional Language Description: Making meaning matter, 162-186. London: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20.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J].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1: 146-166.
- LaPolla, Randy J. 2022. The Chinese expansion and language coexistence in modern China. In Salikoko S. Mufwene & Anna María Escobar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Contact: Volume 1: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Language Change*, 64-8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23. How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movements influe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language history: The case of Mǐn Chinese. 载彭刚, 孔江平, 沈钟伟, 汪锋编. 高山仰止——王士元先生 90 华诞庆祝文集, 81-92.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LaPolla, Randy J. 2024. On the Overlooked Diversity of Clause Structures and Argument Structures in Non-Indo-European Languages. *Languages* 9.4: 135-143.
- LaPolla, Randy J., Dora Poa. 2003. Texts in the Qugu variety of Northern Qiang. In Kitano Hiroaki (ed.),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inority Languag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Project Series)*, 77-94. Suita: Faculty of Informatics,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 LaPolla, Randy J., Dora Poa. 2006. On Describing word order. In Felix Ameka, Alan Dench, & Nicholas Evans (eds.),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269-29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Polla, Randy J., František Kratochvíl & Alexander R. Coupe. 2011. On Transitivity[J]. *Studies in Language.*, 35(03): 469-492.
- LaPolla, Randy J., Huang Chenglong. 2004. Adjectives in Qiang. In R. M. W. Dixon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306-3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Huang Chenglong. 2007. 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Qiang[J].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33-248.
- LaPolla, Randy J., Yang Jiangling. 2005. Reflexive and middle marking in Dulong/Rawang[J]. *Himalayan Linguistics* 2.0: 1-13.
- Nichols, Johanna. 1996.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s heuristic. In Mark Durie & Malcolm Ross (ed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 Regularity and irregularity in language change*, 39-7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a, Dora, Randy J. LaPolla. 2007.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Osahito Miyaoka & Michael E. Krauss (eds.), *The Vanishing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337-3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nge, Donald A. Jr. 1992. On Calculating the Factor of Chance in Language Comparis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82.1: 1-110.

- Ringe, Donald A. Jr. 1995. Nostratic Factor Chance. *Diachronica*, 12.1: 55-74.
- Ringe, Donald A. Jr. 1996. The Mathematics of 'Amerind'. *Diachronica*, 13.1: 135-154.
- Ringe, Donald A. Jr. 1999.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scientific and unscientific methods. In Bryan Sykes (ed.), *The Human Inheritance: Genes, language and evolution*, 45-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Shibatani, Masayoshi. 1985. Passives and related constructions: a prototype analysis. *Language*, 61: 821-848.

4 专名的一类非专名化历程：从“胡搅蛮缠”说起

刘丹青 萧泳凯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专有名词“胡”“蛮”由族群称谓演变为普通副词的非专名化过程。“胡”原指北方、西方少数民族，“蛮”原指南方少数民族，二者初具专名属性。唐宋时期，“胡言”在佛教语境中既指外来语言，也可贬指“无稽之谈”，语义逐渐转向表示方式副词义，如“胡说”“胡乱”，并扩展至非言语动词，形成贬义色彩。“蛮”在与“胡”并用中，也经历语义弱化与贬义化。两者的裂变反映了语言中专有名向普通词的演化机制。

一、引言

人类语言意义的创造，有很多途径，其中有一条途径，被注意得较少，就是由专有名词创造出非专名的普通意义，最终成为人们感觉不到其专名词源的普通名词、形容词等，即在词库中实际上发生了库藏裂变（刘丹青 2019）。中外语言都有这样的实例。“胡搅蛮缠”就是一个典型实例。现代人说“胡搅蛮缠”，就觉得是两个状动结构构成的四字格习语，“胡”“蛮”都是方式副词，不会想到跟专有名词有关。实际上方式副词“胡”和“蛮”都来自作为民族群体泛称的“胡”和“蛮”，最初分别指北方少数民族“胡”和南方少数民族“蛮”。本文将主要以这两个词为例，探讨专有名词的这类非专名化过程。

作为参照背景，我们先看两个演化线索较清楚的欧洲语言例子。现代汉语中，“罗曼史”或“浪漫史”属于普通名词，现指丰富的情史。“浪漫”“罗曼蒂克”，是与此有关的形容词，形容某种富有感情、爱情意味的行为或风格。这些词都来自英语 *romance*、*romantic* 或其他欧洲语言的对应词。在英语中，它们早已不再是专有名词，拼写时首字母不大写。但是，它们都来自词根 *Roma*（罗马；现代英语 *Rome*），是个大名鼎鼎的地名，指罗马帝国及其首都罗马市。其形容词为 *Roman*（罗马的）。据在线词源网站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介绍，*romance* 原指用罗曼语族语言（*Romance languages*——罗马帝国的语言拉丁语及由此衍生的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写作的英雄传奇类故事，后来转指爱情故事，而 *romantic* 是由 *romance* 派生的形容词，指具有罗曼史风格（英雄传奇>爱情史）风格情调的性质。到这个阶段，名词形容词都不再使用首字母大写，与地名和语种的义的专有名词裂变了。借入中国成为“浪漫史”“浪漫”等词后，更是普遍不了解其专名的源

刘丹青、萧泳凯. 2025. 专名的一类非专名化历程：从“胡搅蛮缠”说起.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50–64.

头了。

另一个英语形容词 **frank**（诚实的）及其派生副词 **frankly**，来自专有名称 **Frank**（法兰克）。据上引词源网站，**Frank** 是一个早期的欧洲民族名，活动于今属德国的下莱茵河地区，现德语地名 **Frankford**（法兰克福）即来自此名，意为法兰克人渡口。后来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今法国），成为法国的一个主导民族，高卢也因此改名为法兰西（**France**，来自 **Frank**）。因为法兰克人是法国的统治民族，因此作为形容词，**Frank** 就得到了“自由的、非奴隶的、大方的、不受拘束的”等含义，进而发展出“勇敢的、直接的、坦诚的”等意义，此时 **frank** 与法兰克人的民族名 **Frank** 已经脱钩，库藏裂变，书面上也不再使用首字母大写了。

汉语中也有来自民族名、姓氏的普通名词和形容词。典型的有“胡、蛮、汉、姬、商”。本文聚焦“胡、蛮”，主要借助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和北京大学 CCL 古代汉语语料，考察这两个词的非专名化过程和新意义的由来。余待另文。

二、“胡”的族群义项

“胡”的字源义是一些动物颈项下垂着的肉，《说文》“胡，牛颡垂也，从肉，古声”。借指北方及西方的少数民族。《汉语大词典（第二版试用本）》“胡……^⑪古代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为胡。对西域诸国，汉、魏、晋、南北朝人皆称曰胡（包括印度、波斯、大秦等），唐人对印度则不称胡。有时特指中亚粟特人。”古人对“胡”的训释因具体语境而宽严有异。《文选·陆机〈从军行〉》“胡马如云屯”，张铣注“胡”字为“北方”。这是较宽的解读。《周礼·考工记·总目》“胡无弓车”，孙诒让“正义”注“胡”字为“即今内、外蒙古诸部落是也”。这是宽严居中的解读。不少语境中“胡”被直接注为“匈奴”，如《文选·鲍照〈出自蓟北门行〉》“旌甲被胡霜”，李周翰注“胡”为“匈奴也”。（均见宗福邦等主编 2003《故训汇纂》1852-1853 页“胡”条）。匈奴是胡的典型代表。陈寅恪认为“胡”字音与“匈奴”**huna** 字音同源；王国维认为“胡”指北方民族与胡人下巴多须有关，那“胡”此义就是引申，而非假借义了（均见叶晓锋，2024）。但叶晓锋指出西胡人多须，而东胡人并不多须，王国维说难以成立。叶文并认为“胡”古音并非 **hu**，而为 **gad**，与“匈奴”古音并不相近，而与音 **ngad** 的“外”同源，指外人、外邦人、敌人等。也备一说。

不管语源如何，“胡”在古汉语中的一个主要义项就是泛指北方、西北和西方的少数民族，虽然不是专指一个民族的专有名词，但也不是泛指所有外人、外族人。“胡”明显区别于东部的夷和南部的蛮，跟西部和西北的藏缅语族的氏羌系民族一般也不混。“胡”与西部和西北的戎、狄则有很大重合，有时分为东胡西胡，多属于阿尔泰语系民族（但匈奴语言的系属不详），因此“胡”是有专有名词属性的。与农耕定居为主的华夏族/汉族主体相比，胡人多为游牧民族，体格较大，惯于马上征战，性格粗犷。“胡”也因此可指与胡人相关的生活生产军事特征。如“胡服骑射”“胡笳”“胡马”等，以及大量由北方尤其

是西北引进内地的物产，如“胡桃、胡椒、胡琴”等。这些“胡”都没有脱离“胡”作为民族泛称的本义。后来也用“胡音、胡字”指包括梵文在内的印度或西域僧人所用的语言文字。

在先秦到六朝时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关的“胡”字主要作为专有名词使用，下面我们列举各个时代的若干用例并略加分析。

(1) 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⁴（《周礼》，《周礼注疏·冬官考工记第六》1957页）

(2) 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良馬四六。（《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汇校集释》195页）

(3) 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集释》327页）

(4) 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盐铁论》，《盐铁论校注》28页）

(5)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自烦。（《汉书·匈奴传》3780页）

(6) 公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29页）

(7) 括苍山有学道者平仲节，河中人，以**大胡**乱中国时，来渡江入括苍山，受师宋君存心镜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真诰·稽神枢》252页）

(8)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击南匈奴左部，破之，於是**胡羌、乌桓**悉诣寔降。（《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274页）

以上大致代表了先秦至中古时“胡”作为民族泛称的用法。除了单用的“胡”或加修饰语的“强胡”“大胡”外，常见“胡”出现在与其他各地区族名国名并列的表述中，如“戎夷胡貉巴越”六个族名并列，清楚显示“胡”也是族名之一，而非泛指外人外族。又有“胡羌”并用及“胡羌、乌桓”并用，反映“胡”和藏缅系的“羌”是有分别的。也有与主体民族“汉”的并列，如“胡汉”；还有用定语划出胡内部的支系，如“犬戎胡”表明犬戎是胡的一支。“强胡”“大胡”一类说法，体现了胡人的军事强势所留下的印象。以上“胡”都是做名词的核心或定语标记“之”前的领属定语。

“胡”也常用在不带“之”的复合词或类词紧密组合中做定语，表示属于胡人或来自胡地的属性。如：

(9) 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史记·李将军列传》2869页）

(10) 愍帝以**胡寇**方盛，欲怀来戎翟，拜骠骑将军、左贤王。（《华阳图志》，《华阳国志校注》159页）

(11) 其一株宿昔暴长，长一丈余，粗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鬣须发俱具。（《搜神

⁴ 文中引用古籍例句仅注明书名、章节和页码，具体版本信息见文末书目。

记·木不曲直》155 页)

(12)《横吹》，胡乐也。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进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为武乐。(《古今注》，《古今注校笺》93 页)

(13) 至於胡音，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义，寻大涅槃经，列字五十，总释众义，十有四音，名为字本，观其发语裁音，宛转相资，或舌根唇末，以长短为异。且胡字一音，不能成语，必余言足句，然后义成，译人传意，岂不艰哉！(《出三藏记集》13 页)

“胡人、胡兵、胡寇”都是指向胡地胡族群的人的，此外前引《文选·陆机〈从军行〉》“胡马如云屯”，这是指胡人所骑的战马。“胡乐、胡曲”都指胡人的音乐。“胡音、胡字”指胡人的语言文字，不过该例说的是梵汉文献翻译之事，指的是印度的梵语梵文。印度的佛教，主要是通过西域向东传入内地的，印度主要被古代中国人定位为西而不是南，而“胡”对西部少数民族本来有一定的兼容性(胡和西戎北狄的交叉，如例(2)“犬戎胡”)，用于形容来自西部的梵语梵文是很自然的扩展。不过与佛教僧人有关的“胡言”不一定是梵文，因为印度僧人不一定都用梵文，其他西域僧人也可能使用西域某种语言传播佛经，他们的语言通称“胡言”。从语料看，与佛教有关的“胡言”恰恰是“胡”产生非专名义的关键环节。

“胡”作为族名是中性的。“胡乐、胡曲”中不乏对异域情调音乐的欣赏赞美色彩。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南下与华夏政权及民众发生冲突，引发战争，因此，“胡寇”之类表述也是自然的组合。《广韵》更是直接用“胡虏”来解释“胡”义：“胡，胡虏”(《广韵》，《广韵校释》155 页)，即对整个胡人用“胡虏”来定性。此处的“虏”是对作战中的敌方的蔑称。但是，这些正面的组合和负面的组合都没有对“胡”的非专名化起决定性作用。起关键作用的应该是“胡”形容佛教佛经外来语言的用法。

三、从“胡言”“胡说”到“胡搅”“胡乱”

真正从专有名词义走向非专有名词义，是从“胡言”开始的。首先，上引南朝梁代时，已有指梵语的“胡音、胡字”用例。到唐朝时，出现了指印度或西域语言的“胡言”，包括动词性的“胡言”，说明前引《汉语大词典》说唐时“胡”不指印度不完全正确。如：

(14) 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隋书》1095 页)

(15) 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号三藏，善召龙致云之术。……独盛一钵水，以刀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有如龙状，其大类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复没于钵水中。(《次柳氏旧闻》51 页)

例(14)《隋书》的记载说明，唐时可以用“胡言”指佛教所用的外来语言，可能是梵文，也可能是印度或西域的其他语言。这是名词性的“胡言”。例(15)故事的主角是竺乾僧(“竺乾”是古印度的别称，竺乾僧即古印度僧人)无畏(号三藏)，他做法时“胡言数

百咒水”。这个“胡言”是用印度的语言说数百咒水的话，是“胡言”的动词用法。

虽然汉人（尤其在北方）在民族文化接触中有机会接触北方各种“胡言”，但汉族由于人口和文化的强势，在语言接触中也主要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少见汉人大规模使用“胡言”的情况。而来自印度的佛教，则是强势文化要素，其所使用的“胡言”即梵语或印度、西域的其他语言，即使懂者不多，也处于被尊崇的地位。大量梵文佛典被中印僧人译成汉语，佛寺中的念经等宗教活动也让梵语有很多机会以口头形式被信众感知，有时也遇到反佛人群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指印度或西域外来语言的“胡言”获得了更多被注意的机会。对大部分国人而言，听到的“胡言”只是一堆无意义的声音，出现了双重解读的可能，既可以中性地指称外来语言，也可以贬义性地指称没有意义、没有根据的话语，从而为专有名词向普通意义的引申提供了语境条件。如：

(16) 晋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法苑珠林》，《法苑珠林校注》1679页）

此例出自反佛教的道教人士。其所鄙视的“胡言”，既可以指外来的语言，也可指佛教宣扬者的没有根据的“乱说”。唐宋时期，是“胡言”的两种解读并存的时期。唐代时已有更加明确的以“胡言”表示乱说的例子，如：

(17) 天地父母三般卦，时师未曾话。玄空大卦神仙说，本是此经诀。不识宗枝俱乱传，开口莫**胡言**。若还不信此经文，但覆古人坟。（《天玉经》，《堪輿正经》204页）

(18) 名医开喉能取结，盲医不会乱**胡言**。（《司牧安骥集》，《司牧安骥集语释》418页）

此二例都没有佛教和梵语的语境，而且与“乱言”呼应或直接组成“乱胡言”，都凸显了“胡”的没有根据的意义。另一方面，直到宋代，“胡言”仍有指非汉语的用法，如：

(19) 学问不实，与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发一论，无非泛说，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此皆己之不实，不知要领所在。遇一精识，便被他**胡言**汉语压倒，皆是不实。（《陆九渊集·荆州语录》477-478页）

此例“胡言”与“汉语”相对，“胡言”显然指非汉语。此例是说学问不实，遇到稍有见识的人，便容易被对方的任何说辞轻易压倒。这里的“胡言汉语”倾向任指轻指，并不强调其高深有道理，与唐宋时“胡言”已有的乱说义有联想关联，是义项非独立性（刘丹青 2021）的一个好例。此例也再次说明“胡言”的乱说义确实跟指佛教所用的外来语言有义项关联。

宋代时，“胡言”当然也可以单纯指乱说，如：

(20) 稽首，一代豪举。感尽死生艰苦，中兴为龙为象。高坐骂风骂雨，是甚么精灵鬼怪，说许多**胡言妄语**。（《松隐集》147页）随也伤直，毁也适宜。非也害勇，毁将由谁？能守而直，胡言多之恤？（《毁箴》，《全宋文》367页）

唐宋时期，“胡言”常常用作动词性谓语，其中的“胡”逐渐获得副词状语的属性。当“胡言”与族群、语种义脱钩，单纯表示乱说时，“胡”就由专有名词彻底蜕变为一个方式副词，完成了非专名化。

我们认为“胡”就是在语种意义的“胡言”基础上发展成方式副词的，因为在我们考

察的语料中，“胡”的方式副词用法直到唐宋时还仅限于跟言语动词结合。除了最早出现的“胡言”，还首先扩展到口语化更强、沿用至今的“胡说”，而“胡说”未见有过语种义用法，是在“胡言”获得非专名义之后类推所得。如：

(21) 饶宅乃方行抄割所居七十七都人户，而延寿之七十六都、七十八都，长寿乡之六十三都皆是饶宅寄产去处，到处人烟皆是饶宅佃户，又忍于置之不卹，反倡为胡说，惑乱民情，妄称一都自了一都。（《四月二十五日委临川周知县漉出郊发廩榜》，《全宋文》54页）

(22) 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朱子语类·自论为学工夫》2620页）

(23) 此老此语极有见识，其他学佛者，若答此问，必是胡说乱道。（《庄子庸斋口义》，《庄子庸斋口义校注》278-279页）

(24) 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说！（《朱子语类·持守》208页）

再下一步，“胡”作为方式副词类推至言语以外的动词，宋代时已有了“胡思”，由言语动词到心理认知动词，距离较近，到元代时又加上“胡想”“胡作”“胡搅”“胡闹”，已扩展至行为动词。如：

(25) 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於物欲上轻，於义理上重。（《朱子语类·持守》201-202页）

(26) 坐脱似懒猫蹲宿火，看看烧尽尾和须，唤不起来成个什么。赵州三十年不下禅床，长庆蒲团破了七个，动一动有差有别，不动一动也是胡作乱做。青春不再来，白日莫闲过。（《坐禅偈》，《全元文》93-94页）

(27) 亦有万卷，佛孔百氏。尚遗身后，光怪设利。世可闻见，犹或不坠。矧其内者，非我能议。胡搅于怀，蕴藻莫备。公宁有知，荐此歎歎。庶几吾徒，是训是励。（《祭照元晦文》，《全元文》534页）

(28) 秋深何处生芳草？残菊边且胡闹。不似姚黄魏紫好，忍负良宵。（《【南吕】一枝花·秋蝶》，《全元散曲》1270页）

这些“胡V”组合，进一步巩固了“胡”的贬义方式副词的用法，也使方式副词“胡”更彻底地与专有名词义脱钩裂变。这些组合都沿用到今天，明代以后例子不烦再举。

从考察结果看，“胡”的方式义并不来自汉人对北方胡人和胡地文化的刻板印象，而来自“胡言”作为异族语言尤其是佛教所用外来语言的不知所云的含义，开始并无明显贬义，贬义是在“胡言”的语义引申和“胡X”组合扩展中逐步浮现的。“胡”贬义的浮现，还得力于经常与贬义方式副词“乱”及下文将分析的“蛮”同现，这种同现也促使“胡乱”直接组成一个并列复合词，这也在宋代就大量出现了，如：

(29)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朱子语类·论文下》3336页）

(30) 凶荒之後，必有丰年。他日尚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乱做事。（《四月初十日入抚州界再发晓论贫富升降榜》，《全宋文》45页）

(31) 因看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乱轻易了，又不得与低底下，后遇敌手便惯了，即败。狮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陆九渊集·语录·包扬显道所录》470页）

(32) 此人称是“东岳急脚子”，胡乱打人，不伏收领。（《续资治通鉴长编》8582页）

四、“蛮”的族群义项

“蛮”原指南方的少数民族。《说文》“蛮，南蛮。它种，从虫，𧈧声。”（《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1170页）“它种”，即“蛇种”，是解释从“虫”的由来，即以蛇为文化标签的种族，可能与蛇图腾等文化习性有关，这与“闽”字从虫相似。古代对华夏族周边民族，常用带动物类偏旁的汉字指称，其实华夏族群体本身也有以动物命名者，这些多与图腾等文化特性有关。如“狄”与北方和西北民族的狼图腾有关，“羌”与牧羊为生有关。黄帝本身叫有熊氏，还曾“教熊黑羆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3页），这些动物名可能都代表了一定的图腾。所以族名及其汉字的动物要素本身不一定有褒贬色彩。段玉裁对《说文》“蛇种，从虫”解释道：“说从虫之所由。以其蛇种也。蛇者，虫也。蛮与闽皆人也，而字从虫，故居部末。如貉之居豸末，狄之居犬末，羌之居羊末焉。”（《说文解字注》1170页）意思就是这些带动物类部首的字指的都是特定群体属性的人，不是非人的动物，所以（作为该部首不典型的所指）排列在该部的末位。

“蛮”有时有比南方少数民族更广义的用法。李学勤主编的《字源》载“‘蛮’旧指我国古代的民族，也泛称一切少数民族”（见李学勤主编2012：1166，“蛮”条）。古人有时也会直接将特定语境中的“蛮”训释为某一更具体的族群，包括并不在狭义的“蛮”范围内的族群。《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司马贞注“蛮”为“闽也，南夷之名”“亦称越”。更常见的用法则是介于各少数民族泛称和特定民族专称两者之间的概念——南方少数民族，也即《说文》所释的本义。如《论语·卫灵公》“虽蛮貊之邦行矣”，朱熹注“蛮”为“南蛮也”。《逸周书·职方》“四夷八蛮”，孔晁注“蛮”为“南方曰蛮”（均见宗福邦等主编2003《故训汇纂》2039页“蛮”条）。“蛮”主要指南方少数民族，这基本上已成共识，但对其语源则学者各执一词。如李永燧（1983）认为上古汉语“蛮”字是古苗瑶语民族的自称音译，与今天很多瑶族支系的称呼 Mien（勉）和苗族的称呼 Hmong 等同源，郑张尚芳（1998）认同李永燧“蛮”“苗”“勉”语言上同源的观点，并从音韵学角度做了补充论证；李连进（1995）则认为“蛮”是壮族先民的一个部落的族称“板”[ʔban]的音译，而朱文旭（1999）认为古汉语中的“蛮”实则为藏缅语“人”的汉语记音。从“蛮”的文献用例看，“蛮”与当时生活在华中两湖等地的苗瑶系民族关系最密切，读音上也与 Mien 等最近。在文献中，南蛮常常与北狄西戎东夷及泛指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的“胡”相对并称，有时与东南部“（百）越”及“闽”（闽越也是百越之一）即壮侗族群的先民也作区分，但未见“蛮”和“苗、瑶”相区分的。而藏缅族系的主要古称则为羌和氐，郑张尚芳（1998）认为藏缅古称是“戎”。“蛮”的词源义不太可能是夷、越—壮侗、藏缅等族系的族称或自称。但在“蛮”泛指南方少数民族时，会兼指非苗瑶的各

南方少数民族，还可包括属于南亚语系的百濮族群。

总之，“蛮”早期应带有专有名词属性，最狭义可能指苗瑶系族群，常用义项指以苗瑶为代表的南方少数民族。而《字源》所说的“泛称一切少数民族”则为更宽泛的后起之义。南方地区本土作物及外来作物都较为丰富，后向北传播时或被冠以蛮名。如蛮姜，即高良姜，《本草纲目》载其产于高良郡，并以此得名。高良郡，即今广东湛江、茂名一带。再如蛮瓜，即丝瓜，原产于印度，后传入我国南方。《本草纲目》记“始自南方来，故曰蛮瓜”（1315页）。这些“蛮”都没有脱离“蛮”的南方地域指向性。

在先秦到六朝时期，“蛮”主要作为专有名词使用，指南方少数民族或与之相关的事物。以下列举部分例子并加以简单分析。

(33) 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管子·小匡》393页）

(34)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周礼·职方氏》，《周礼注疏》1861页）

(35)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周礼·象胥》，《周礼注疏》1944页）

(36) 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战国策·燕策》1016页）

(37) 《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明堂位》，《礼记正义》3226页）

(38) 不告朔于诸侯，玉瑞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大戴礼记·用兵》，《大戴礼记解诂》211页）

(39) 昔轩辕不为涿鹿之师，则蚩尤之妖不灭。唐尧不兴丹水之陈，则南蛮之难不平。（《伐吴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1079页）

(40) 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三国志·魏书·辛毗杨阜高堂隆传》716页）

(41) 雍州刺史王奂启录小府长史刘兴祖，虚称“兴祖扇动山蛮，规生逆谋，诳言诽谤，言辞不逊”。（《南齐书·王奂传》849页）

以上例子大致代表了先秦至六朝“蛮”的使用情况，大多以南方民族泛称出现，个别的泛指少数民族，如例(36)“北蛮夷之鄙人”肯定不指“南蛮”。用法上，“蛮”既可以单用也可以加方位词、处所名词或数词进行修饰。如加方位词的“南蛮”，加处所名词的“山蛮”，进一步指明蛮族所在的位置。再如加数词的“百蛮”“八蛮”“六蛮”，做蛮族不同群体的合称；数词有时并非表示确数，只是反映南蛮族的族系繁多。“蛮”常用来与其他各地区族名国名并称，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蛮、夷、闽、貉、戎、狄”等，凸显了“蛮”在当时的族名属性，“蛮夷”并称尤为多见，而“夷蛮”的说法亦存。以上的“蛮”都是作为名词语的核心或定语标记“之”前的领属定语出现。

“蛮”也可以出现在不带“之”的复合词或类词紧密组合中做定语，表示带有蛮人蛮族或蛮地特征的事物。如：

(42) 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傍，其守王宫与其厉禁者，如**蛮隶**之事。（《周礼·司隶》，《周礼注疏》1909页）

(43) 《莫愁乐》，亦云**蛮乐**，旧舞十六人，梁八人。（《古今乐录》，《乐府诗集》698页）

(44)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姁隅**跃清池。”桓问：“**姁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姁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世说新语·排调》，《世说新语校笺》432页）

(45)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四将军讨之。（《后汉书·光武帝纪》76页）

(46) 齐有宦者内参田鹏鸾，本**蛮人**也。（《颜氏家训·勉学》124页）

(47) 夜有**蛮兵**数千斫平前垒，矢及平帐，平坚卧不动，俄而乃定。（《魏书·李平传》1452页）

其中，“蛮隶”“蛮寇”“蛮人”“蛮兵”皆指蛮地蛮族的人。“蛮乐”即源于蛮地的乐曲。“蛮语”“蛮名”指的是蛮族蛮人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词汇。至于“蛮府”，则为主管少数民族的官署。以上各例皆与“蛮”本义有关，指向其明显的专有名词属性。

大致来看，“蛮”作为族名其本身的感情色彩是中性的。当然，封建时代，中央政权和南方某些族群的矛盾冲突也不时有发生，“蛮寇”之类称呼也难免。而“蛮隶”，据《周礼·秋官司寇·司隶》，“蛮隶，百有二十人”，郑玄注“征南夷所获者”（《周礼注疏》1875页），可见亦是军事冲突下的产物。至于“蛮乐”，该例中实指《莫愁乐》，是汉魏六朝清商曲的一个重要部分。“蛮乐”之称，似乎不减对其的赞美之意。前面例(37)还提到“纳夷蛮之乐于大庙”，给予很高的地位。考察表明，这些正面或负面的组合并未对“蛮”的非专名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蛮”与泛指处所名词的组合，以及反映对“蛮”的刻板印象的一些常见话语和语境。

五、从“山蛮”、“野蛮”到“蛮横”、“蛮缠”

负面的语境确实影响着“蛮”后续发展的语义方向。历代文献中，泛称的“蛮”经常被赋予较为负面的形象，如：

(48) 若时得为人，**蛮狄**无义理，痴骏无孔窍，跛蹇哑不语。（《阿难问事佛吉凶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讲记》5页）

(49) 诸将欲召溱州酋长苻彦通为援，行逢曰：“**蛮贪而无义**，前年从马希萼入潭州，焚掠无遗。吾兵以义举，往无不克，乌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资治通鉴·后周纪》9483页）

(50) 晟之所为，虽蛮夷不足以论理，而人伦之内实所忍闻焉。（《五国故事》94页）

以上部分反映了古人对于蛮族的刻板印象，将“蛮”与“无义理”“贪而无义”这样的负面评价相联系。其中(48)(49)是直接给出的负面评价，(50)本身是谴责五代时南汉残暴皇帝刘晟的，说刘晟的作为即使用蛮夷的道理也讲不通，是比蛮夷更不讲道理的人。此句将蛮夷不讲道理当作常识放在了预设中。这些“蛮”虽然仍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但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下，时常被置于负面评价的话语和语境中，就容易浮现出贬义感情色彩，为“蛮”超越专名义，走向非专名化的形容词、副词奠定了语义基础。

唐代诗歌大兴，对仗尤盛。诗人往往会采用对偶等修辞手法以达到形式上的优美，这为“蛮”的词性变化增加了动力。如：

(51) 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土民稀白首，洞主尽黄巾。（《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白居易集》353页）

(52) 瘴雨蛮烟朝暮景，平芜野草古今愁。酣歌欲尽登高兴，强把黄花插满头。（《九日》，《全唐诗》5567-5568页）

(53) 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到恶溪夜泊芦岛》，《全唐诗》5397页）

例(51)中“蛮”与“瘴”并提。“瘴”修饰“地”，“瘴地”指空气湿热容易生病的地方。与之对应，此处的“蛮”虽仍为专有名词解读，但已是属性形容作用大于指称作用。类似地，例(52)中的“蛮”也是在与“瘴”并提中获得了属性作用。同样是“蛮”和“瘴”并提，例(53)中“蛮”的专名意味进一步减弱，属性形容功能进一步增强。在这些例子中，“蛮”都带上了属性形容的作用，并且与“瘴”一样带有负面评价，描述令北人不习惯的南方特有的凄风苦雨的环境。当然，这些“蛮”主要形容的还是地域自然环境，还不是形容人的品行，但与有关蛮族的刻板话语相呼应，共同推动着贬义色彩的浮现。

“蛮”从专名化转向非专名化的一大关键，是“蛮”与表泛指处所名词组合。由此，人们直接以地域来指某一群体的特点，最后实现了“蛮”的非专名化。突出个例是“山蛮”：

(54) 授辅国将军、宋安安蛮二郡太守，迁南义阳太守。累破山蛮，郡境清谧。（《梁书·马仙琕列传》280页）

(55) 累迁司卫监、洛州刺史。抑强扶弱，山蛮畏威，不敢为寇。（《北史·荀颍列传》929页）

(56) 或庵既领住持，士庶翕然来归，衲子传至虎丘。瞎堂曰：“遮个山蛮杜拗子，放拍盲禅，治你那一队野狐精。”或庵闻之，以偈答曰：“山蛮杜拗得能憎，领众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芭帚柄，拍盲禅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禅林宝训》，《禅林宝训讲释》376页）

“山蛮”字面上指居住在山上的蛮族，这个“山”描写性大于区别性，因为南蛮族群的居地本以山区为主。“蛮所恃者山林耳，若战平地，安能败我”（《资治通鉴·唐纪》8526页），表明山是大多数蛮族所仰仗的地方。这个“山”是泛指的，并非特定地名，这使“山蛮”整体上在作定语时也是指别作用小于属性形容功能。当“山蛮”跟人相关的名词组合，“山蛮”的形容性意义就可能进一步突显。如“山蛮杜拗子”，“杜拗子”是用来称呼

言语不通、说话难懂之禅僧，引申指妄自尊大、不明事理者。“杜拗子”前加的“山蛮”，已只有属性义，没有指称义，即像山蛮一样的、具有山蛮特性的（≈不讲道理的），而“杜拗子”本身已含不明事理义，定语“山蛮”在此主要是起点强化作用。此例中“山蛮杜拗子”形容的是唐代来自浙江台州的罗姓或庵禅师，与山蛮族群无关。可见，此例中“山蛮”或“蛮”的专名属性已消失，意义已偏向属性形容和负面评价。

“山蛮”作为形容词的非专名化用法没有得以保存，但类似的有后起的“野蛮”一词。

“野”跟“山”可以构成近义并列复合词“山野”，泛指远离都市的荒野自然环境，“野”后来还发展出“山”所没有的典型形容词义项（很野~*很山）。与“山蛮”结构平行、意义类同的“野蛮”也从指人群发展出属性形容的功能，时间上比“山蛮”的形容功能出现得晚些，但其非专名化的用法一直沿用至今。如：

(57) 大赅，周回百余里，悉是**野蛮**，无君长，地有瘴毒。南赅人至，中瘴者十死八九。阁罗凤尝遣使筑城于彼，管制**野蛮**。（《云南志》，《云南志补注》148页）

(58) 玳安叫掌起灯来，骂道：“**贼野蛮**流民，他倒问我是那里人！”（《金瓶梅》277页）

(59)（上江）好**野蛮**的百姓。（张白）你们回衙理事，听候旨意，再为定夺。（《因果报总讲·四本》，《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711页）

一开始“野蛮”作为专有名词，是指生活在郊野的蛮族。在人们对蛮族的刻板印象影响下，“野蛮”也就逐渐被用来类指这种群体的特性，逐渐浮现出形容词功能，如(58)，“野蛮”用在骂人话中做表鄙视的定语，事件环境是山东，被骂者是“两个带白毡帽子的酒太公”（造酒匠），与少数民族无关。(59)是“野蛮”作为成熟的形容词的用例，这类用法沿用至今，而“野蛮”的内部结构也从定中结构被重新分析为并列结构了。

除了与处所语素结合，“蛮”本身因其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自身的词性与语义也在朝属性形容的方向靠拢，如：

(60) 蛮帅梅芳攻陷扬州，而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曰：“**蛮畜**！我欲诛反贼，何谓反乎？”（《晋书·王广女传》2520页）

(61) 陈敬瑄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游于行宫，笑曰：“人言西川是**蛮**，今日观之，亦不恶！”（《资治通鉴·唐纪》8245页）

(62) 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太平广记·妖怪三》2868页）

当“蛮”常出现于负面话语、“山蛮”等又浮现出负面描述评价义项后，“蛮”在单用时就容易出现两解的情况。例(60)中的“蛮畜”本是指蛮族的畜生，“蛮”带有专名特征。但在此责骂梅芳的话语和语境中，“蛮畜”也可以理解为“不讲道理的畜生”。例(61)中的“是”作为判断动词和强调动词，其后既可以接名词，也可以接形容词。后接名词，即表达“西川是蛮族”，后接形容词，即是“西川（的人）是不讲道理的”。后面说“亦不恶”，隐含了对“蛮”——不讲道理的转折。“是”后接形容词的用法，同样见于宋代其他文献，

“此说话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说得这般话。”（《朱子语类·先进篇·子贡问师与商也章》1015页）。况且所言的西川是宋代成都，并非是蛮族聚居之地，此例的“蛮”更像是形容词用法。至于例(62)，此处的“蛮”也倾向作形容词解，因为与之平行的“怒”“喜”“妍”“丑”“老”“少”均为形容词或心理动词。

总的来说，“蛮”的非专名化发展可以归因于两方面，其一，人们长期对蛮族持有刻板印象，“蛮”多见于负面话语中，因而“蛮”吸收了语境中的情感色彩。其二“蛮”常与表泛指的名词“山”、“野”组合，本身的专名意味被削弱，在“山蛮”“野蛮”整体做定语时浮现出形容词功能。

“蛮”从形容人的整体特性基础上，还进一步扩展到修饰人的动作、话语等，浮现出状态形容词和方式副词的用法，如：

(63) 说长道短是和非，只与他**蛮缠**胡搅歪厮占。（《群音类选》，《群音类选校笺》1855页）

(64) 唐卿忙拦住道：“**莽如**，你且不用先怒，这不是**蛮干**得来的事。嫂嫂请我们来，是要给她想个两全的办法，不是请我们来代行家长职权的。”（《孽海花》216页）

(65) 周老爷把嘴凑在他耳朵边，将此事始末缘由，他如何为难，统领如何**蛮横**，现在想赖这笔银子的话，说了一遍。（《官场现形记》177页）

(66) 又见王先生拿袖子卷了两卷，把条腿夹在夹肢窝里，想用**蛮劲**再把这条腿扳过来。（《官场现形记》433页）

(67) 我道：“这个奇了，那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59页）

以上列举的“蛮N”“蛮V”等组合，进一步巩固了“蛮”作为贬义形容词、副词的非专名化用法。此外，还有并列复合词“X蛮”的组合，如“刁蛮”、“霸蛮”等，也进一步强化深化了“蛮”的贬义色彩，助力“蛮”完成非专名化。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已成并列式俗语的“胡搅蛮缠”（亦作“蛮缠胡搅”，如例(63)），因为两个贬义方式副词“胡”和“蛮”都来自地域少数民族的泛称，分别指向北方和南方，这个常用俗语集中展示了专有名词非专名化的历程和结果。但现代汉语使用者，早已感受不到其中的“胡”和“蛮”与其专名义的关系。在民族平等成为共识、地域偏见不得人心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特定民族的负面刻板形象也难以在公众话语中存在。“胡”“蛮”一类专名的非专名化历程，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偏见的产物。今天之所以“胡搅蛮缠”等还会常用，就因为“胡”“蛮”这类贬义词已经与其专名义项发生了库藏裂变，语言心理上已不再视为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而接近语义上无关的同音词了，虽然词典释义还没有完全处理为不同的词条，如《现代汉语词典》中“胡”“蛮”的专名义和非专名义是在同一条目下的不同义项。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们还存在着语源上的历史联系，如本文所展示的。但是，从纯共时角度看，库藏裂变后的不同义项是可以处理为不同条头的同音词的。

六、小结

本文通过对“胡”和“蛮”这两个古代区域少数民族泛称的考察，展示了汉语中专有名词非专名化的一种语义演变历程，它们由北方或南方的少数民族泛称，在历史上的民族刻板印象、带有评价和感情色彩的话语和语境、特定的搭配关系和句法位置（尤其是定语和状语）等因素影响下，实现了非专名化，成为表示某种属性的形容词并产生方式副词的用法。语言学界熟知方言地理学先行者席叶龙(Julies Gilliéron)的一句名言“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如果说这句话对所有词都适用，那么它对专有名词的非专名化尤其适用，因为专有名词是个性最强的词语，它们的语义演变史，更多展示词语的个性而非共性。即使是“胡”和“蛮”这两个南北高度对称的民族泛称专名，非专名化过程也呈现出各自的个性，例如“胡”的非专名化最早发生在与言语词语的组合，“蛮”就无此过程。但是对于语言学来说，从个性中发掘共性或一般规律是它的天职。我们从专名非专名化的考察中，仍能看到一些共同的机制，如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话语感情色彩的语境吸收导致的色彩赋义，特定句法位置催生新意义的作用等。我们在今后对专名非专名化的考察中，将继续关注这种个性中的共性。

参考文献

-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华建敏主编）2023《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连进. 1995. “蛮”为古代壮族族称再考. 广西师院学报 1:101-107.
李学勤 2012《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永燧. 1983. 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 民族语文 6:16-22.
刘丹青. 2019. 汉语中的库藏裂变. 语言教学与研究 5:34-50.
刘丹青. 2021. 语言单位的义项非独立观. 世界汉语教学 2:147-165.
叶晓锋. 2024. 胡人考——从古文字谐声材料看胡人的语源. “古文字与上古音整合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西湖大学.
郑张尚芳. 1998. “蛮、夷、戎、狄”语源考. 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收入《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中华书局 2012.
朱文旭. 1999. “蛮”语义及其文化现象.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8-41.
宗福邦, 陈世铄, 萧海波 2003《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

语料引用历代文献

周-秦

- (东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 2009《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李山, 轩新丽译注 2019《管子》中华书局
许维通集释, 梁运华整理 2009《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

两汉

- (东汉)安世高译,肖卫主编 2013《阿难问事佛吉凶经讲记》团结出版社
(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62《汉书》中华书局
(西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 1992《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
(西汉)刘向编,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 2012《战国策》中华书局
(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82《史记》中华书局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 1983《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 2007《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阮元校刻 2009《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魏晋南北朝

- (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点校 1982《三国志》中华书局
(西晋)崔豹撰,牟华林校笺 2015《〈古今注〉校笺》线装书局
(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1984《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
(东晋)干宝著,马银琴译注 2012《搜神记》中华书局
(东晋)郭璞注,王贻梁,陈建敏校释 2019《穆天子传汇校集释》中华书局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65《后汉书》中华书局
(南朝宋)刘义庆著,徐震堃校笺 1984《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南朝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 2011《真诰》中华书局
(南朝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2《南齐书》中华书局
(南朝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 1995《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
(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4《魏书》中华书局
(北齐)颜之推,檀作文译注 2011《颜氏家训》中华书局

唐-宋

-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 1979《白居易集》中华书局
(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 1995《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
(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4《晋书》中华书局
(唐)李德裕撰,吴企明点校 2012《次柳氏旧闻》中华书局
(唐)李石等编著,裴耀卿语释 2004《司牧安骥集语释》中国农业出版社
(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4《北史》中华书局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 2003《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
(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3《隋书》中华书局
(唐)杨筠松《天玉经》陈政儒编著 2003《堪輿正经》西苑出版社
(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3《梁书》中华书局
(清)彭定求等编 1960《全唐诗》中华书局

(宋)陈彭年,丘雍重修,蔡梦麒校释 2021《广韵校释》中华书局
(宋)郭茂倩编 1979《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宋)黄震撰,曾枣庄,刘琳主编 2006《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宋)净善辑,弘学讲释 2006《〈禅林宝训〉讲释》四川出版集团
(宋)李昉等编 1961《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1986《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2004《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 1997《庄子庸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
(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 1980《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75《新唐书》中华书局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 1956《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宋)佚名撰,张剑光,孙励整理 2019《五国故事》大象出版社

元明清-现当代

李修生主编 1998《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
隋树森编 1964《全元散曲》中华书局
(明)胡文焕编,李志远校笺 2018《群音类选校笺》中华书局
(明)兰陵笑笑生著 2005《金瓶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明)李时珍著 1999《本草纲目》中国档案出版社
(清)李伯元著,高书平注 2018《官场现形记》崇文书局
(清)吴趼人著 2018《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华文出版社
(清)严可均编 195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清)曾樸著,张国权注 2018《孽海花》崇文书局
黄仕忠主编 2013《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5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With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Chinese 在 *zài*-phrases in translation

ZHU Chunshe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https://orcid.org/0000-0002-7225-5446>

Abstract: In Chinese, *zài*-phrases like 在教室裡溫習 (‘be-in the classroom review [the lesson]’) are grammatical, but *溫習在教室裡 (‘review [the lesson] be-in the classroom’) is not, due to the ungrammatical use of the postverbal modifier. However, the phrase 沐浴在春風裡 (‘ba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which also includes a postverbal modifier, is felicitous with the meaning of ‘basking in the spring breeze’. Interestingly, 在春風裡沐浴 (‘be-in the spring breeze bathe’), which mirrors the structure of ‘be-in the classroom review [the lesson]’, should be grammatically correct but is infelicitous, as it conveys a meaning that defies common sen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discrepancy by linking it to the “discursive propensity” of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and its role in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that shapes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creation. The study takes the issue into the domai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a sharper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struing translation as a process of meaning (re-)creation. By examining pairs of texts that aim to convey the same meaning but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the paper characterizes meaning creation as a two-stage discursive experience: an initial private phase of meaning-making, followed by a communal phase of sense-making. It argues that, despite variations in discursive experiences among individual readers of the same text,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such experiences are textually accountable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s such, the felicity of an utterance, beyond grammatical considerations, is grounded in an experiential underpinning sustained by the discursive propensity originated by focalized information.

Zhu, Chunshen. 2025.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With a specific case study of Chinese 在 *zài*-phrases in translation. In Chenglong Huang & Xu Yang (eds.)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Randy J. LaPolla*, pp. 65–90.

1. Introduction

On many occasions, I have asked my students to compare two Chinese sentences as possible translations for *We bask in the spring breeze*: 我們沐浴在春風裡 ('we ba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and 我們在春風裡沐浴 ('w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bathe').⁵ They are fine with the first, but the second one often elicits laughter as if they ha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What they are laughing at is clearly not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since the sentence is perfectly grammatical. According to them, the first version evokes a sensible mental image of basking in the warmth of spring breezes, whereas the second conjures an image of open-air ablutions. If this is true, then what they laugh at has little to do with grammar but the meaning they have made of the second version, which they find from their world experience irreverent and laughable even as a non-translation utterance.

The disparity in their responses points to the involvement of an additional cognitive layer beyond meaning-making that is cued by a text's grammatical formulation. We have identified this additional mechanism elsewhere (Zhu 2022: 52) as sense-making (i.e., sensemaking in Weick's terms). That is, while making meaning of an utterance is a private mental process,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thus made—its commonsense plausibility—is communal, i.e., "unrelentingly social" (Weick 1995: 79, discussing Porac et al.; italics original), because one must decide, by common sense rather than semantic sense, whether it is acceptable and reasonable enough to count as a publicly shareable meaning within one's community. Meaning *creation* is therefore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aning-making and sense-making as the meaning creator observes the unfolding of a text as discourse. And in normal communication, we can only see the meaning created when the creator is confident enough in its sensibility to let it go public—in translation for instance in our case. The common sense one goes by in assessing the sensibility of a meaning, to be sure, is nurtured and conditioned by one's personal world experience, which can be so intrinsic to one's cognition that sense-making often proceeds subconsciously, or "automatically". That is why, in normal practice, the students would not have thought of the bathing-outdoors version, let alone sharing it as a legitimate translation.

Triggered by this translation experiment, we ask: Why has modifier placement in our case led to distinct interpretations, and how does this reflect broader principles of meaning creation across languag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aning and sense-making as an utterance or text unfolds itself along its word order by which its focal informa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s we shall demonstrate, has a subtl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meaning creation,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sentence, whether in primary

⁵ Semantic and syntactic glosses in this study are all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nd indicated by single quotation marks. Glosses may be used in lieu of the Chinese texts after their first appearance.

writing or in translation as a mode of meaning (re-)creation.

2. Meaning creation and grammar

Let us begin with a syntactic investigation, sinc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our two versions cited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introductory paragraph is the placement of the 在 *zài*-modifier ‘be-in the spring breeze’, which is either preverbal or postverbal. The preverbal placement complies with the “unmistakable” (“不爭的”, Zhang 2010: 986, 1110) tendency or practice in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grammar to use prepositional phrases as adverbials and place them preverbally, but the meaning it makes in our example is deemed ridiculous. The postverbal placement, supposedly a deviation from the norm in this case, appears to be acceptable and perfectly sensible. But why? Zhang (2010: 1122) indeed has noted the phenomenon of syntactic inversion in Chinese, which Fang (1992: 203–205) describes as adverbial transposition. It is a pattern of post-modification where the comma is required to mark the pause between the main clause and the end-positioned modifier, such as in Fang’s example from Lu Xun: 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 (‘I thank him for his kindness, for my own sake, for the sake of China’). But our postverbal version does not feature such inversion or transposition as the modifier cannot be marked off by a comma without becoming a highly marked variation of its preverbal counterpart.⁶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a broader issue in Chinese grammar: how preverbal and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influence meaning creation. According to Zhang, following the phraseological tendency of “modifier + head”, the language adopts the sequence of “known + new” in information structuring in an order of “accompanying features + predicate + outcome”. That is, any type of word, as long as it indicates the outcome of the event, has to be positioned postverbally. And directing attention to the outcome appears to be one of the central principles (“核心原則”) underlying the word order and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Chinese sentence. Most related to our case is that, according to Zhang, the location-indicating 在 (*zài*, ‘be-’) phrase, if placed preverbally, can only refer to the venue of the event. Hence 他在廚房裡做飯 ‘he be-in the kitchen cooks-meal’ is grammatical but *他做飯在廚房裡 ‘he cooks-meal be-in the kitchen’ is not. If placed postverbally, it can only refer to the place where the action ends up or where the participants are after the event ends. Hence 他掉在水裡 ‘he falls be-in the water’ is grammatical, but *他在水裡掉 ‘he be-in the water falls’ is not. (See Zhang 2010: 986, 988, 1099.)

⁶ A comma-marked version, i.e., 我們沐浴，在春風裡 ‘we ba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will be a transposed version of 我們在春風裡沐浴 ‘w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bathe’, paradoxically highlighting the location where the bathing physically takes place, hence increasing the absurdity of the meaning.

Our case, however, seems to represent an exception to this principl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That is, rather than the outcome, the phras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denotes the venue of the action regardless of the verb’s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Since both ‘bathe’ and ‘cook-meal’, unlike the momentary ‘fall’, indicate continuous events, our post-modification appears similar to the pattern in Zhang’s *‘he cooks-meal be-in the kitchen’. Actually,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ch “exceptions” in Zhang (albeit given to illustrate other points) that can be seen as milder, comma-less manifestations of adverbial transposition. For example: 戰士們巡邏在邊防線上 ‘soldiers patrol be-along the border’ (p. 734), and even such phrases as 流浪漢徘徊歐洲老街 ‘tramps wander-roam old European streets’ (p. 451), once the omitted preposition is restored, would be a similar transposition: 流浪漢徘徊在歐洲老街 ‘tramps wander-roam be-through old European streets’.

These exceptions can be partially explained within Zhang’s (2010: 942) grammar-semantics-pragmatics framework, particularly by the pragmatic principle of attention management. That is, in an unmarked structure, the postponed element receives the most attention. This principle aligns with Li’s (1984/1992: 495) questioning about the structural hierarchy that is implied in the term “complement” in Chinese grammar. Li has argued that in a V + C phrase the complemen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key component rather than a supplement to the verb. The argument, accepted as a new and noteworthy observation at that time (Wu and Liang 1992: 97), is followed by Fang’s (1992: 241) identification of complement as presentational focus (“表述重心”), and Zhang (2006: 62) regards it as the structural focus (“結構焦點”) of the entire sentence.

In this study, therefore, we will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postverbal “complement” and postverbal modifier, so that a complement can be regarded as functioning like an adverbial. Throughout our present thesis, we will describe it as a manifestation of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that can be examined alongside the positioning of other sentential components, such as clauses, to reveal its potential for attention management i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d order and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In our case, it is clear that the preverbal directs attention to the action of ‘bathe’, whereas the postverbal directs attention to a vernal environment of ‘be-in the spring breeze’. The difference in attention distribution, however, begs a further question: Why does the preverbal modification in our case, by emphasizing the act of bathing, result in the making of a meaning deemed absurd, while the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by shifting attention to the spring breeze, evokes a meaning that is perfectly sensible? This disparity in meaning-making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sense-making in judging the sensibility of the meaning made of an utterance. To describe how it works, we have to go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grammatical correctness and pragmatic feasibility.

3. Word order and meaning creation seen through translation

Since our question arises from a translation experiment, can translation studies offer some food for thought? After all,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with word and sense, and its cross-cultural and cross-lingual context amplifies the communal nature of sense-making, often to a scale influenced by ideological complian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ince the time of Cicero and St. Jerome, the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has been rooted in the dichotomy of “word for word” versus “sense for sense”. And the word-for-word approach was regarded as a rigid adherence to the source text’s word order, disparaged in favour of the sense-for-sense approach. As the “content” of the source text, the “sense” was supposed to be semantic sense seemingly independent of word order. The dichotomy underlies the conventional binary conception that “a thought is one thing and the way it is expressed another” (critiqued in Lodge 1966/2002: 37). In the 19th century, Schleiermacher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1813) proposed a hermeneutic journey metaphor of translation, which highlighted the target-text reader’s experience of meaning making. That is, formal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would move the reader to the source text to see an alienated meaning, whereas communicatively transferring the semantic sense would move the source text to the reader for them to make a naturalized meaning. In the 1990s, this dichotomy was updated by Venuti (1995/2004: 20) into a conflict betwee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with foreignization hailed as offering “an alien reading experience” in the service of a postcolonial agenda against hegemonic English, among other “isms” counted as modern political evils. Since then, the atten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turned to sense-making as a process of judging the sensibility of the meaning made of a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sense harboured by an ideological community.

This development helps us realize more keenly the role sense-making plays in meaning creation, although our experiment may not contribute directly to advan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is direction. Instead, our non-political approach affirms the fact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alienation-foreignization and naturalization-domestication, when realized in an individual reader’s experience, is nonetheless an “inner feeling and understanding” (Munday et al. 2022: 39, commenting on Schleiermacher). It also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textual accountability of meaning-making,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ord order and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before it undergoes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 In our case, ‘we ba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does appear like a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of *We bask in the spring breeze* and is supposed to produce some “alien” experience. Yet it is accepted by the 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 as meaningful and sensible rather than outland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aning made of ‘w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bathe’, a grammatically fully domesticated Chinese version, is collectively dismissed as neither natural nor congruous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cultural life.

This shows that word order is not merely a grammatical issue but a means for attention management via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that shapes the creation of a meaning, be it exotic or familiar, political or poetic. It is the word order that guides the reader in their primary meaning-making, as they feel their way through the text until they come to a belief that they have grasped the “meaning” *linguistically* presented as such, before they judge it to be sensible or otherwise in the light of the textual and social contexts they have perceived. This textually accountable meaning creation is an abductive process of inference, one of our “basic survival instincts” as LaPolla (2015) has maintained.

When a thought is linguistically rendered into a text, it is presented as an information flow that charts the topography of a textual terrain by its word order. So charted, the text invites or induces the reader to partake in a meaning-creation journey by navigating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elements backgrounded as a given to those foregrounded into a focal height. A translation, as a reiteration of the thought in a target language, can do nothing but the same. No matter whether it tries to stay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thought bodied forth by the original textual topography or to alter it to serve a different purpose, the word order, *ceteris paribus*, is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effect it finally produces in individual readers. In either case, all patterns of fore- vs. back-grounding are a matter of “these words in this order” in which lies the text’s specific “force of description” that supersedes the semantic accuracy of the text in it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and “[w]hat is said and how it is said are thus not distinguishable”, as Cameron has noted in his 1962 essay on “Poetry and Dialectic” (cited in Lodge 1966/2002: 38, 39). In our view, this force is not limited to poetic description as Cameron has maintained, since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discourses are similar in their textuality. By its word order, a description initiates and sustains in its readers an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the text as a world. And because one “lives in” this world, one instinctively needs to create meaning—making meaning and making sense—of it in order to “survive”.

To see how the formulation of a text is accountable for its meaning creation effe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or translation, since the target text is often rendered and reconstructed to effect the creation of a mean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the reader may have created of the source text. To that end, translation studies,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anti-linguistic stance maintained by the sweeping ideologically-oriented discourses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⁷ calls for a substantive re-engagement with linguistics, by keeping abreast of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ne such development is in the perception of grammar, which has been well characterized in Halliday (1999) through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⁷ Such comments as Venuti’s (1998: 23) are representative: ‘Current linguistics-oriented approaches lack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o conceptualize and execute such literary translation projects, but the methodological tools to analyze them’. See also Snell-Hornby (2006: Section 5.1).

grammatical metaphor, that is,

the lexicogrammatical system of any and every natural language ... is a theory of human experience. It is a way of imposing order, in the form of mutually defining relationships and categories, on the flux and unboundedness of the perceptual world. (p. 92)

Lexicogrammatically “theorized” (codified, systemized, textualized via word order) as such, human experience becomes communicable as concatenations of speech acts that perform to achieve certain perlocutionary effects in actu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in essence, is an operation of (re-)theorizing human experience by (re-)constructing the speech-act chain via word order. In other words, translation, beyond the incommensurability at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levels, entails such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s sharedness and communicability of human experience, fea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new modes of “theorizing” human experience, and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new ways of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rough discourse. All this boils down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perceived source-text world in the formulation of a target text, which, as a “source” text in its own right, will give rise to varying discursive experiences contingent on the social, non-linguistic contexts in which it is read to create a meaning. Such a re-engagement with linguistics will not, as some may be afraid, result in a diminution of the cultural or social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stead, it will enhance these observations with the rigour of textual accountability.

4.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towards a linguistic-hermeneutic perspective

Our surveys, from both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f grammar and the operation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highlight the pivotal role of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in connecting word order to meaning-making, with a knock-on effect on the sensibility of an utterance. The study of focus (in relation to topic) has indeed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different models of language research and has generated useful insights, although, as Xu (2005) has observed, approache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e.g., those of phonology, syntax,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nd using different terminologies, have given rise to a medley of sometimes overlapping or even confusing notions of focus. From the literature, we may still be able to derive the following working hypotheses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focalization—illustrated by our case of bathing versus basking—from an 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These hypotheses are elaborated in this section to varying degrees of detail according to their immediate relevance to our present study.

4.1 Informational focus can be identified in every sentence.

Our review in Section 1 affirms that “topic and focus, along with related phenomena, are universally represented” (Schwabe and Winkler 2007: 4) in many languages, including Chinese. Specifically, every sentence must have a focus, which is closely tied to the presenc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serves as a prerequisite for its communicative validity (Xu 2005: 17).

4.2 Focus is marked by morphosyntactic means, although the marking may differ from language to language.

The word order of a text facilitates its background-foreground arrangement of information, determining when and how to convey its specific elements in focu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ocus is managed through means such as positioning, modification (see Zhu 2022: e.g., Section 5.4 for a discussion on the implications of modification for focalization and attention management), intonation, and language-specific devices. For example, in Chinese, the *shì...de* (是...的) and *de shì* (的是) constructions (Zhu 1996: Section 4; see also Xu 2001: 117–118), along with adverbs like *jiù* (就), *yě* (也), *cái* (才), and *dōu* (都), as well as progressive parallelisms (Zhang 2006: 200), play an important role.

4.3 The semantic sense of a sentence is not affected by the placement of information focus.

This is noted in Xu (2005: 23), that is, which constituent of the sentence the focus is placed on does not affect its semantic sense or truth value. So, *theoretically*, focus shift in transl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semantic sense the translation shares with its source text. What it affects is the reader’s discursive experience of meaning creation.

4.4 What is put in focus is new, but not necessarily brand new, information.

Focus is highly related to “new” information, but it does not mean the information has to be “brand new” (Xu 2005: 14, with a mention of, e.g., Schwarzschild’s proposal not to associate focus with new information). A succinct overview of the issue can be found in Butler (2003: Section 2.5.1.2.1 *What is focus?*), from which we may conclude that an entity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discourse, hence given and old, can also be re-introduced and placed in focus if it is pragmatically presupposed to be non-recoverable from the immediate context or situation, or if it is deemed so important for the discursive progression that its reiteration and focalization become desirable.

4.5 The sentence/clause-initial and sentence/clause-final positions are normally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ons of informational prominence.

This proposition has backing from psychology and psycholinguistics, which have found that, among other things, the subjects remembere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ords much better than

the centre-positioned ones in the clause (Downing 1995: 16, mentioning Jarvella's 1979 experiments; see also Butler 2003: 171 and Section 2.5.2.1 *Initial posi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design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mponent in question as topic or focus.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syntactic development from sentence-initial to sentence-final entities represents a cumulative progression of information—commonly observed in the unmarked right-branching structure in English, as opposed to the marked front-heavy left-branching and compressive mid-branching structures (Tufte 1971: e.g., 156)—Butler (2003: Section 2.5.2.2.2, *What meanings are associated with placement in 'final' positions?*, referencing P. H. Fries) notes that “clause-final position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is the most usual site for the placement of newsworthy information”.

In Chinese, according to Zhang, sentence-final position is for the “conventional” and “natural” context/situation-independent “static” focus. The position of the marked, “dynamic” type of focus, on the other hand, is dependent on the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to register a contrast, and can thus be more mobile: at sentence-final, it overlaps the static end-focus; at sentence-initial, it becomes the “topical focus”. And what is put in the topical (focus) position has much to do with viewpoint setting and adjustment. (See Zhang 2006: esp. 181 fig. 1, 182–183, 194, and 198.) This makes the distribution of “old” and “new” information more accountable in that the viewpoint determines what should be given as old information and what should be foregrounded and focalized as new information, i.e., as the key element that justifies the saying and that propel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course.

Similarly, focalization has served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in the discussion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lthough different terminologies may have been employed, e.g., sentence-initial functionally extraposed focus versus unmarked, sentence-final focus and the stylistically highly marked sentence-medial one (Liu 1992: 167; see also Shan 1990: 353 and Li 1998: 254 for similar attention to focality). Therefore, while being awar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entity in the sentence-initial position (e.g., viewpoint-setting), it seems advisable to apply the principle of end-focu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ld-before-new ordering of informatio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s the unmarked benchmark for information (re-)structuring in translation, to facilitate, among others, the observation of any shift of a non-focal entity in the source text via certain target language-specific markings to a focal position in the target text, or vice versa, to comply with its grammar or to manipulate the reader's response for ideological purposes, for instance.

4.6 The significance of focus (as opposed to topic) should be appreciated not only within the clause/sentence but also in terms of discourse development.

Barthes, inspired and informed by generative and functional grammars in his 1960s studies on literature and discourse (Barthes 1987/2004, 1977: 79–124), has identified a comparable,

“hom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sentence and discourse”.⁸ This is one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meanings engendered and ... engenderable by work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acceptability (1987/2004: 29). It also underpins his conception of an “obviously ... linguistic” model of “*science of literature* (or of writing)” (p. 28, italics original), in which literature is construed as discourse. As “a science of discourse”, the model is designed to integrate the examination of “those signs which are shorter than the sentence” (which underpin “al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ry language as a whole”)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ose “signs which are longer than the sentence, ... from which one can infer a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poetic message, of the discursive text, etc.” (p. 31), to “allow [the critic/reader] to explain how chains of symbols are established along certain lines” and see “an ever-increasing unity” (p. 34) in a work of literature. This enables him to stratify on an operational level of structural analysis the discourse (or narration) in layers and project it into the world or situation from which only can it “receive its meaning” (Barthes 1977: 115).

This homological relation and the notion of the world as the source of meaning can be further substantiated by later developments in linguistic research,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nter-sentential thematization where the rheme of the previous sentence contains an element (usually in its focus) that becomes (part of) the theme of the subsequent sentence. Insofar as the beginning of a discourse implies a *there + be* declaration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it features a “sentence-focus” in Lambrecht’s terms in that the entire sentence is to introduce new information to start the story, or, if it occurs in the middle of the discourse, to “introduce a new discourse referent or ... to announce an event involving a new discourse referent” (Lambrecht 1994: 14, also 222). Such *there + be* type of sentence must be a focus in its entirety at the text level, because it cannot find an entity as its topic to justify its focality. In this way it plays “a hybrid function ... of topicality and focality” for “introducing future Topic” to advance the discourse (Gómez-González 2001: 151, 153). It follow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a focalized entity—whether in a “static” or “dynamic” focal position (Zhang, previously)—does not reside in its status as either topic or focus *within* the clause or sentence. Instead, its importance lies in its contribution to inter-sentential thematization, where the sentence receives its full textual meaning from the world of discourse as its focal information links it to subsequent sentence(s). This power of connection we call the discursive propensity of the information focus, which should be an active quality of

⁸ “...the most reasonable thing is to posit a hom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sentence and discourse insofar as it is likely that a similar formal organization orders all semiotic systems, whatever their substances and dimensions. A discourse is a long ‘sentence’ (the units of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sentences), just as a sentence, allowing for certain specifications, is a short ‘discourse’.” Also, “Structurally, narrative sh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tence without ever being reducible to the simple sum of its sentences: a narrative is a long sentence, just as every constative sentence is in a way the rough outline of a short narrative.” (Barthes 1977: 83, 84)

Cameron's "force of description" (previously) to propel the sentence into a broader context with a prospective topic. On the discourse level, this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d focus" of a discourse, or the ending of its story, for relating the discourse to a historical or social world to receive its contextual meaning. A telling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the essay "Of Cunning",⁹ where Francis Bacon remarks how a "cunning" person would put the most material matter in the postscript of a letter or postpone the truly intended point until the end of a speech, as if it were an afterthought. Cunningly or artfully delayed as a punchline so to speak, the focal sentence acquires a propensity to catapult the person's discourse into some worldly business of his genuine concern beyond the text.

More specifically, given the grammatical fuzziness surrounding the concept of sentence,¹⁰ observing the discursive propensity of a syntactically focalized entity will particularly help trace out the contribution a constituent of the discourse makes to orchestrating an experience of meaning creation, in which the text offers itself for meaning-making and the world beyond conditions the sensibility of the meaning made. The assertion that "each sentence [in a text] can achieve its end only by aiming at something beyond itself" (Iser 2006: 17, overviewing Ingarden) applies not only to literary texts but to all types of texts, as long as their sentences are correlated to refer to a real or fictional world. By relating meaning to the world, meaning creation acquires a hermeneutic dimension worth exploring in the subsequent section.

4.7 There is a need to extend the perspective on focus from the speaker's intention to include both discourse and the hearer's discursive experience as shaped by the text.

Since a discourse receives its meaning from the world (Barthes, previously), it should rece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speaker's world to justify its being said in such a way in the first place. But it should be in the hearer's world that its meaning is made and its sensibility judged. That is, it is the hearer who creates the meaning by going through the discourse as it textually proceeds and by relating it to their world through interpretation. As such, the hearer's interpretation entails a world substitution. According to Eco (1992: 26–27), there are "two basic interpretative attitudes", "that is, two ways of deciphering either a text as a world or the world as a text". The two are correlative in that reading a text as a world is a projection of one's life experience (with its intrinsic biases and blind spots) of being in *this* world that one has read as a text onto *that* world which one is seeing emerging from the text that is being read as a world. And the experience of projecting oneself as being in that world—by participatorily reading the text as a world—is supposed to make one more perceptive in reading this world as a text. When a text is read as a world, by being a "world", its topography of "words in this order" (Cameron,

⁹ "Of cunning" in *Francis Bacon Essays*.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7; p. 62.

¹⁰ As Favretti et al. (1999: 23) have noted, "Standard *sentence* grammar is, in general, a grammar of the *clause*, and would thus be inadequate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e of the larger units of discourse" (italics added).

previously), or “chains of symbols ... established along [this] line” (Barthes, previously), is bound to throw up certain of the features of what it says into relief via when and how to say it. Such when and how, as Wittgenstein sees it,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 social use of language as manifested through (literary) texts; and it is with this concern with the when and how that grammar becomes meaningful in “show[ing] in which contexts words can be used and how they can be combined with other words” (see Huemer 2004: 5).

In this connection, we see a close inter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hermeneutics in meaning creation. Indeed,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 hypothesized author/speaker intention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a deterministic factor for focus identification, as seen in such remarks as the focus carries “the information in the sentence that is *assumed by the speaker* not to be shared by him and the hearer” (Jackendoff cited in Lambrecht 1994: 207, italics added). Similarly, Xu (2001: 118, also 141) claims that determination of a focus is not entirely dependent on specific grammatical marking devices but on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is intended by the speaker to be the key message. Other assertions of speaker-centrality can be found, e.g., in Sidiropoulou (2004: 94), Gómez-González (2001: 256), and Butler (2003: 157, 160).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t is the speaker who initiates communication with an intention. As Halliday (1994: 299) puts it, both “listener-oriented” Given + New and “speaker-oriented” Theme + Rheme segmentations are, “of course, speaker-selected”. However, with the physical absence of the author in written communication, interpretation of an authorial intention is largely based on the reader’s empathy with a notional author whom they have perceived via the text (alongside paratexts perhaps) in such and such a situation. Yet, since the discursive experience the same text may engender varies from reader to reader, even from reading to reading by the same reader, no meaning made by an individual reader on a specific occasion is the final and absolu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uthor’s intention or, for that matter, an exhaustive explication of the text’s meaning potential.

Thus, the inaccessibility of a definitive authorial intention is compounded by a hermeneutic tension between the necessity and the unreliability of reader intuition due to the openness of an individual’s discursive experience. This openness is illustrated, on the one hand, by the difficulty in characterizing the reader (see MacKenzie 2002: 38 for various descrip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author “between the intention of a given human being and the linguistic intention displayed by a textual strategy” (Eco 1992: 69, referencing Mauro Ferraresi).¹¹ Moreover, there is uncertaint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¹¹ In text linguistics, intentionality is one of the seven properties of textuality ascribed to a human-produced text, but it cannot be confused with a specific authorial intention that is impossible to verify in the practice of text interpretation (see MacKenzie 2002: 202, note 6 on Hirsch), despite the fact that even in the extreme case of poetic discourse, “critics are generally unwilling to accept that a poet did no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will

biographical context and the text, besides the “impossibility of emptying our minds of our own prejudices and prejudgements in order to duplicate an author’s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guarantee[ing]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an author’s words will allow us to re-experience his or her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 (MacKenzie 2002: 40–41, 45). This means that world substitution is not a simple replacement of the author’s world with the reader’s own world. Instead, it leads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from the text, which is activated and charted by “these words in this order” (Cameron, previously). Meaning is made as this new world takes shape. In short, the world a reader interprets from a text is not solely the author’s creation. It is a text-induced and textually accountable construct that the reader finds meaningful and sensible enough to “live in” and to share with others, for example, through translation.

It is therefore of interest to observe meaning creation from a dual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hermeneutics reviewed in MacKenzie (2002: Chapters 3 and 4). Positive hermeneutics upholds a definite, unchangeable “textual meaning”, claiming that “[t]o relate textual meaning to any context beyond itself is not to create *meaning* but only *significance*”, and that “[i]f a reader responds differently to a text at two different times, it is the response that changes, not the meaning”; that is, “positively”, a text establishes its meaning, as “willed or intended by the author” (see MacKenzie 2002: 34, with reference to E. D. Hirsch, *italics original*), independently of the significance or meaning that a reader may create by referring it to a real or fictional world. Thus, when a text’s significance changes with the reader’s response, it changes because the text is being responded to as signifying something in the real or a fictional world now perceived somewhat differently by the reader beyond the author’s intention. Admittedly, in immediate oral communications—where interlocutors are present and available for mutual verification if necessary—or i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where interlocutors typically share a common stock of working knowledge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the world perceived by the hearer may closely align with the world referred to by the utterance, making consensus on meaning possible. This convenience, however, cannot be assumed in written communication, or in artistic communication where the text refers to an imaginary world. Furthermore, since no definite, unchanging “meaning” can be identified as referential counterpart to “significance” to trace out the latter’s changes, Hirsch’s “significance” is actually the meaning made by the reader via world substitution and deemed sensible in their current context. With changes in its significance, a text’s history of reading is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its potential for meaning creation, with all the meanings created converging to contribute to “an ever-increasing unity” of its “poetic message” embedded in its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in Barthes’s (previously) terms.

Hermeneutics thus turns “negative” and maintains that the text is essentially “a resource

or intend whatever it is that their analysis reveals” (see MacKenzie 2002: 58, reporting this remark from Jean Starobinski in the conclusion of his 1971 book on Saussur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rather than a source: a heuristic stimulus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meanings involving elements absent from or even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textual surface” (MacKenzie 2002: 46, italics added). As a “resource” prior to reading, the text does not have an “old”, unchangeable meaning that could serve as a yardstick to compare any newly created meaning. The reader is therefore given a more active and decisive role to play than in Schleiermacher’s and Venuti’s binary models reviewed previousl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eader is a free meaning creator. As *reading* dictates, there is always the need to engage with the text’s “surface” to discern its focal message. This involves surveying its topography to verify the nuance and sensibility of the meaning in relation to one’s own context at that moment. The meaning thus verified and created does not appear “new” *vis-à-vis* a fixed authorial meaning. Rather, it is new in comparison to the meanings created by the same reader in their previous readings or by their predecessors.

All in all, regardless of how the paradigm of reading evolves, the text remains a constant resource, its topographic “surface” unchanged in its these-words-in-this-order arrangement—a textual *mise-en-scène* where some information elements provide a topical viewpoint while others take on a focal position. The nuances of such focalization fine-tune—and thereby account for—the readers’ contextual creation of “[new] meanings”. In translation as meaning (re-)creation, every choice of word and word order permitted by the target language—once materialized in the target text, whether made by an AI program or a human agent—is textually accountable not only for its role in meaning-making but also for its contribution to sense-making within a social or communal context.

4.8 Identification of the focus of a clause/sentence is not always a straightforward exercise.

Given such hermeneutic uncertainties, critics tend to resort to two means to help ascertain focus identification: intonation and native speaker intuition. But these two approaches may not prove to be sure solutions. Regarding intonation, such observations as the following are pertinent: “it is argued that, when the Focus is marked morpho-syntactically, this category needs (sic) not be marked prosodically, and if it is so marked, it gets a weaker prominence (Gómez-González 2001: 143, referencing Dik), and “what is really at issue is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the tone group not being an informationally independent unit” (Butler 2003: 162, referencing Fronek). Since our study is on translation of written texts, we shall take morpho-syntactic devices as the primary marking of focus.

As to native speaker intuition, or an intuitive feel for language (語感), it is a linguistic kind of common sense nurtured by the speaker’s or hearer’s exposure to or experience of a language in use in their community. About the openness of this personal “taste and style”, Downing’s (1995: 22) remark is very much to the poin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quantify, ma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word order, making absolute predictability an unachievable goal”. And in Chinese, the same utterance can be parsed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 intuition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Pan 1997: 191). Yet, from time to time, critics may still have to resort to intuition in explaining away a delicate case, and controversy can thus ensue.¹²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criticism, the possibility of impressionistic or even self-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arising from this intuition-based approach is amplified. For example, Liu gave the following as a counterexample to what he described as a general tendency of end-weight:

- (1) 在胡適先生說來，高於一切、指引一切的，是他的母親的精神薰陶
(Liu 1992: 169 (a))
‘as to Mr. Hu Shi, above all, guiding all, *de shì* [‘is’] his mother’s spiritual influence’.

According to Liu, the “weight” falls on the sentence-medial ‘above all, guiding all’, an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offered accordingly as follows:

- (1.1) In Mr Hu Shi’s case, a mother’s hallowed influence has been the guiding star of his life.

A linguistically informed awareness of end-focus, however, would lead to a different observation, namely that ‘above all, guiding all’, like the intensifier *above all* in English, accentuates the entity that follows it, bringing it into focus, rather than directing focus onto itself. This interpretation confirms rather than counters the so-called “general tendency of end-weight” in Chinese and is morpho-syntactically marked by the focus-indicating ...*de*, *shì*... (“...的，是...” pattern. By keeping ‘his mother’s spiritual influence’ in end-focus, the same information but structured differently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may give rise to a different discursive experience:

- (1.2) As for Hu Shi, the most important moral principles guiding his life can be traced to his mother’s spiritual influence.

Observations in this section make Hypothesis 4.5 all the more meaningful for both intra-lingual interpretation and cross-lingual translation.

¹² An example seems in order here. In Chinese, there is a special *bǎ* (把) construct, which enables the fronting of the object to a preverbal position, i.e., turning the unmarked S+V+O into a marked S+*bǎ*O+V. Xu, in contesting Tsao’s conception of the fronted object as the Secondary Topic, bases his observation on his intuition (“語感”) and claims that the fronted object should be the focus (Xu 2001: 140). However, if we follow Xu’s observation made later in the same section (p. 142), that the sentence-final constituent tends to become the focus, we may come up with a different description, i.e., S_{Top}+*bǎ*O_{SecTop}+V_{Focus}, and detect a more general tendency of postponing the verb to the end-focal position, as also seen in the passive *bèi* (被) construction.

4.9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can be managed to account for different discursive experiences by which a meaning is created.

An unmarked sentence proceeds from initial topic to final focus. Given the compatibility in topic-focus sequ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our review has so far indicated, our study focuses les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yntactic means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and more on the distribution facilitated by these means in the source text, as well as the means availabl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o ensure a similar distribution, if desired.

The translator may of course choose to organize the source-text information in a different pattern for a specific purpose, with or without explicitly declaring such an intention. In either case, the source text can serve as a benchmark for examining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target text. This examination can focus on its effectiveness in achieving the translator's declared purpose, or, if the purpose is not made public, on its potential effect on the reader's discursive experience. Let us take a few examples from Fang (1999) for closer examination. The following two sentences were presented in Fang (p. 207) to substantiate his observation about sentence focus. Specifically, he notes that the weight of a sentence is often postponed in Chinese texts but can be front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2) 我原來打算今年 1 月訪問中國，後來不得不推遲了

(2.1) I *had to postpone the visit* which I had intended to pay to China in January;

(3) 他 5 歲生了一場病，變成了聾子

(3.1) He *became deaf* after an attack of illness at 5.

(Fang's examples, emphases original)

The focal in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texts is fronted to become the topical information. Both sentence-initial and final positions are important in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Hypothesis 4.5). However, the key issue lies in the discursive experience that the change of the focal constituent may engender.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such cases where the change is optional rather than grammatically obligatory:

(2.2) 我不得不把訪問推遲了，原來是打算今年 1 月來中國的

'I had to have the visit postponed, originally I planned to come to China in January'

(3.2) 他聾了，因為 5 歲時生了一場病

'he became deaf, because of an attack of illness at five'.

In light of Hypothesis 4.6, we see that the end-positioned postponement of the visit in (2) and of the protagonist's becoming deaf in (3) are to foster a propensity to arouse the reader's interest in

the cause of the schedule chang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hearing impairment respectively. In (2.2) and (3.2), the distribution is reversed. By delaying the mention of the original schedule to the end focus, the flashback in (2.2) encourages an expectation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sit originally planned for January, which could develop into a future topic. Similarly, the flashback in (3.2) tends to prioritize explaining the cause of the illness over describ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eafness as a prospective topic of the discourse. This discursive propensity is what we have found in (2.1) and (3.1),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provided by Fang, though realized through different syntactic means.

It is true that different languages may display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placing certain information constituents in focal or topical positions. And it is tempting to generalize such seemingly prevalent preferences as an inh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nguage community. For instance, Sidiropoulou (2004: 98) claims that “[t]he fact that the preference for deictic specificity with respect to time and space [to appear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in modern Greek] overruns genres ...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 [which] makes it a better candidate for being part of *Greek cultural heritage*” (italics added). Incidentally, Chinese grammar shares the tendency to put time and space constituents at the sentence-initial or preverbal position to set the circumstantial scene for the event. Against the tendency, postponements may appear marked or have to be marked by a comma, as illu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他們都跑過來了，從教室裡，從操場上，從宿舍裡 (‘they all run over, from the classrooms, from the playground, from the dormitories’, Zhang 2010: 381; see also Lu Xun in Section 1). But there is a risk of over-generalization in relating such grammatical preference to cultural predilection. For example, Fang (1999: 208) in a similar spirit claim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word order between (4) and (4.1) and between (5) and (5.1) reflects cultural discrepancies:

(4) 接到你們的賀函，我十分愉快

‘receiving your message of congratulations, I am very happy’

(4.1) I am very happy to receive your message of greetings

(5) 現在有機會互相介紹彼此對各種問題的觀點，對此，雙方認為是有益的

‘now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o each other their views on a variety of issues, this, both parties regard as beneficial’

(5.1) The two sides found it beneficial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o one another their views on a variety of issues.

According to Fang, the fact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attitude or opinion, rather than reporting the event or fact, takes the sentence-initial position reflects an extrovert Western culture, as seen in (4.1) and (5.1). In contrast, in Chinese, the initial position is typically given to the event, as shown in (4) and (5), which reflects a generally more reserved cultural tendency.

However, this explanation contradicts his (previous) observation about sentence ‘weight’, which, if applied to these cases, would lead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 Specifically, by placing in end-focus the speaker’s personal feeling (e.g., ‘I am very happy’) or judgment (e.g., ‘the opportunity is beneficial’)—rather than the cause of the feeling or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conclusion—(4) and (5) convey a more assertive attitude.

The divergence is more of an issue of the utterance’s discursive propensity than of cultural legacy. This becomes evident when we compare (4) and (5) with (4.2) and (5.2). The latter examples demonstrate that it is almost equally natural and common in Chinese discourses to create a less self-assertive discursive experience by front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r judgment as a given—i.e., as a phatic lead-in to more substantive information worthy of further attention.

(4.2) 我十分高興收到你們的賀函

‘I am very happy to receive your message of congratulations’

(5.2) 雙方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讓彼此能交換對各種問題的觀點

‘the two parties agree that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allowing them to exchange views on a variety of issues’.

Despite the generally assumed existence of linguistic or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any two language communities, what we see in these cases is that altering the focal content of an utterance will result in a different discursive experience at the interpersonal level even though the ideational meaning or truth value is not affected. In view of such discrepancies, translation as an act of communication that mediates between two systems of values is first of all a proactive operation of focus management, with the source text as its reference, to make the formulation of a target text accountable for an effect intended by the translator or perceived by the reader, when the meaning made undergoes sense-making in a communal context.

5. From focalization to metaphorization: back to the ‘bask’

The hypotheses discuss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highlight how word placement in a sentence influences what information we focus on and how we interpret meaning. Together, they form a multi-faceted framework. Some of the hypotheses, such as 4.1 that concerns the viability of a text and 4.5 the efficacy of information structuring, to be sure, are implicit assumptions. Hypotheses 4.6 and 4.7, however, directly address the cognitive process at work in meaning creation as a reader’s discursive experience. For instance, Hypothesis 4.7 suggests that the discursive experience a text generates may not necessarily align with the author’s original intent,

nor are the experiences derived from readings of the same text necessarily identical all the time. In this sense, “positive” hermeneutics is right in asserting that it is the reader’s response that changes. However, what remains unchanged is not the text’s meaning—since meaning emerges from the response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meaning- and sense-making—but the text itself. More specifically, it is the discursive propensity created by the text’s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which operates through focalization at every structural level—from the whole text down to the phraseological level of modification. As Halliday (2004: 330) points out, “the item located at Postmodifier has the greater potential as news”. To observe the propensity of a postmodifier for its “potential as news”, as Hypothesis 4.6 suggests, it has to be exam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what follows in the text, beyond the phrase, the sentence, or the text as discourse operating in a communal context. Since our ‘bask’ case is a single-phrase clause, let us look first at (6), the title of a web article,¹³ to observe its inter-phrasal propensity:

(6) 百歲楊絳：坐在人生邊緣，看時間跑、地球轉

‘centenarian Yang Jiang: sitting be-on the edge of life, [from there] watching time run, [and] the earth rotate’.

Postmodified, ‘sitting’ is not as much the “news” as the end-positioned ‘[be-on] the edge of life’. The end-positioned location, in turn, furnishes an implicit circumstantial viewpoint for the subsequent ‘watching’-phrase, enabling the centenarian to perceive time and earth in their cosmic movements beyond her life.¹⁴ In contrast, if ‘sitting’ were premodified (as in 在人生邊緣坐著, ‘be-on the edge of life sitting’), the focus would shift to the act of sitting itself. This would imply a contrast with other postures, such as lying or standing, and suggest that it is specifically the sitting posture that enables the protagonist to see time and earth in this way.¹⁵ In actual reading of (6), the word ‘sitting’ by itself can very well indicate a physical posture until it

¹³ 傅小平, 18 August 2023, <https://yuwen.chazidian.com/yuedu5361/>, accessed 20 June 2024.

¹⁴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on the Ximalaya (喜馬拉雅) website (<https://m.ximalaya.com/ask/q9460974>, accessed 20 June 2024), there is a post (10 August 2023) soliciting sentences good for following the postmodified 遨遊在知識的海洋裡 (‘[freely] voyage in the ocean of knowledge’). The actions that follow voyaging in five of the eight options proposed by an anonymous respond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antithetical couplet and two containing mixed metaphors, all develop from the location ‘in the ocean of knowledge’, such as: 遨遊在知識的海洋裡, 開啟探學知識航船的風帆 (‘[freely] voyage be-in the ocean of knowledge, [where you] unfurl the sails of the ship for exploring knowledge’).

¹⁵ On the same Ximalaya (喜馬拉雅) website (<https://m.ximalaya.com/ask/q6073897>, accessed 20 June 2024), there is also a post (26 December 2022) soliciting sentences good for following the premodified 願你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 (‘may you be-in the ocean of knowledge [freely] voyage’). The actions that follow voyaging in five of the eight options proposed by an anonymous respond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wo antithetical couplets and one containing mixed metaphors, all elaborate on the ‘[freely] voyage’, such as: 願你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 到達嚮往的詩和遠方 (‘may you be-in the ocean of knowledge [freely] voyage, to arrive at a distant land of poetry you’ve longed for’).

is modified by the metaphorical ‘edge of life’, which exerts a retroactive effect to turn the ‘sitting’ into a metaphor and the whole line attains its metaphorical coherence. In this connection, we see a realization of the “retroactive effect” on the phraseological level, in that the subsequent elements “automatically have a retroactive effect on what has gone before, which now appears quite different” (Iser 2006: 17, reviewing Ingarden; see also MacKenzie 2002: 51–52 for a concise description of such retroactive effects).

As we have noted, the translation of *We bask in the spring breeze* cannot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semantic) sense-for-sense versus (formal)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nor in terms of foreignization versus domestication, but it does demonstrate a more decisive working of retroactive effect than (6). For further discussion, let us recall the case under (7).

(7) We bask in the spring breeze

(7.1) 我們在春風裡沐浴 (‘w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bathe’)

(7.2) 我們沐浴在春風裡 (‘we ba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In (7.1), ‘be-in the spring breeze’ and ‘we bathe’ make good sense in their respective literal meaning until they combine to form the premodified sentence. Unlike the metaphorically sensible ‘edge of life’ in (6) that retroactively turns ‘sitting’ metaphorical, the ‘the spring breeze’, being literally meaningful and sensible, does not have this forward effect of metaphORIZATION. Instead, it foregrounds the ‘bathe’, cognitively bringing the ambience to close in on it and syntactically completing the meaning-making of the sentence with a *full* stop. Thus end-positioned, ‘bathe’ does not have any intra-sentential cues to trigger a metaphorical conversion. And as a prospective topic, it is inclined to promis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its physical details, amplifying the absurdity of bathing outdoors in the breeze. So, the version was dismissed as a translation for (7) not because the students failed to make meaning of it but because the meaning privately made failed to pass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mmon sense on which the sensibility of (7) rests.¹⁶

The experience of (7.2) is quite different. In this right-branching sentenc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we bathe’ is initially sensible. However, the event is set by the postmodifier ‘in the spring breeze’ (rather than, say, in the river), creating a scenario that clashes with our real-world knowledge and common sense. But the postverbal placement primes the reader to focus on the circumstantial detail as the anchor for imagining a balmy day with comfort, warmth, and relaxation drawn from their world. Through this deeper cognitive engagement, the focalization

¹⁶ Utterances such as (7.1) may still make sense if they receive meaning from a different world where ‘bathing’ in public is accepted. For instance, it could be the world of the sacred ritual of bathing in the Ganges River for Hindus, or the Water-Sprinkling Festival, a springtime celebration of the new year by the Dai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that includes a public ceremony of participants profusely spraying water on each other.

exerts its retroactive effect on ‘bathe’, projecting it from the conceptual domain of physical action of washing to a broader experiential or emotional domain of enjoyment (see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e.g., Chapter 12). Through this metaphorization, ‘bathe’ shifts from an action verb to a stative, copula-like use, and the sentence is construed at a different conceptual level, where interpretation is more “about plausibility” (Weick 1995: 57) than about semantic accuracy. It therefore represents an exception to Hypothesis 4.3.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calized circumstantial detail, as a prospective topic, gains the propensity for projecting the event into a grander environment, similar to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yellow*, the *blue sky*, and the *English landscape* in (8):

- (8) I bathed myself in the intense yellow under the intense blue sky; how it dimmed the oak trees and copses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Logan Pearsall Smith, “The Wheat”,
in *All Trivia*, Constable & Co. 1947. p. 5)

As (8) shows, this world-opening effect can be better appreciated beyond a single phrase or sentence (Hypothesis 4.6), and even on the level of an entire text, as seen in (9), which demonstrates how metaphorization could transform a literal description into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something beyond itself” (Iser, previously). The lyrics of a well-known Taiwanese song, *Barefoot on the Ridge* by Joseph Yeh (葉佳修, released in 1979), are a case in point. The title of the song reads:

- (9) 赤足走在田埂上

‘bare-foot walk be-on a raised footpath [in the paddy field]’.

Unlike the premodified 赤足在田埂上走 (‘bare-foot be-on a raised footpath [in the paddy field] walk’) that focuses on ‘[bare-foot] walk’, (9) directs attention, via *walking*, to the *raised footpath*. With the walking backgrounded, the footpath starts a text that strings an array of rural entities into an idyllic scene: 黃昏的小村道上 / 灑落一地細碎殘陽... (‘in the dusk the small country road / is dappled with the last rays of sunshine...’), with a sonic effect of the bare feet walking on the wet paddy-field footpath: 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 聽著腳步劈啪劈啪響 (‘barefoot walking be-on the narrow field path / listening to the flip-flop of the footsteps’). All appears to be a factual description until the last line: 帶我走回童年的時光 (‘bring me back to my childhood’). With the anastrophe, the footpath is turned into a metaphor of time and the walking into a metaphor of temporal trip back to childhood, inviting the reader to make a symbolic sense of the country excursion by giving it meaning from their own world.

In a sentence that is meaningful and sensible in its literal terms, the postverbal *zài*-modifier

as the focus has a simple forward effect of projecting the event into a broader context by setting the scene for the subsequent events. When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clashes with real-world knowledge or common sense—for example, the ‘edge of life’ is not a chair for sitting, a footpath cannot physically take one back to childhood, and the spring breeze is not water for bathing—the focalized modifier demonstrates a dual propensity. It not only anchors the sentence’s meaning but also exerts a retroactive effect that renders the verbal head metaphorical for its sensibility. This explains why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s are typically set in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to enable the creation of a sensible, albeit metaphorical, meaning. To maintain their sensibility, they allow no reversion:

- (10.1) 沉浸在歡樂的海洋裡
‘sink-immersed [oneself] be-in a sea of joy’
- (10.2) 拜倒在石榴裙下
‘kneel-prone be-at [a woman’s] pomegranate skirt’—be infatuated with a woman
- (10.3) 屹立在高山之巔
‘firmly-stand be-on top of a mountain’
- (10.4) 埋頭在書堆裡
‘bury-head in a heap of books’
- (10.5) 食在廣州，穿在蘇州，玩在杭州 (folk saying)
‘eat be-in Guangzhou, dress be-in Suzhou, play be-in Hangzhou’
- (10.6) “閱讀在銅鑼灣”，“閱讀在修頓” (book fair titles, *Ming Pao*, 17 January 2010; p. A10)
‘read be-at Causeway Bay’, ‘read be-at Southorn’.

6.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Our interest in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in Chinese was triggered by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 bask in the spring breeze*: (7.1) 我們在春風裡沐浴 (‘w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bathe’) and (7.2) 我們沐浴在春風裡 (‘we ba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We initially approached the issue from a grammatical perspective to explain why both are grammatically correct and semantically meaningful, yet (7.2) makes good sense while (7.1) sounds absurd. The investigation affirms that preverbal modification has the focus on the action. With the verb end-positioned, there is no further information in the sentence to update its meaning-making. As the ‘bathe’ in (7.1) indicates a highly private action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 “public” scene the ‘be-in the spring breeze’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utterance sounds ludicrous. But postverbal modification shifts focus from the verb onto environments or outcomes.

Thus in (7.2), the meaning of ‘bathe’ is retroactively updated by the end-positioned postmodifier ‘be-in the spring breeze’ to a metaphorical sense of enjoyment. Yet the privacy the literal ‘bathe’ implies still lingers to make the utterance a most striking example among other similar constructs of postmodification, such as those under (10). More importantly, this observation enabled us to see meaning creation as a dual process: the private act of meaning-making and the communal act of sense-making, both conditioned by the textual structure and the reader’s world knowledge.

So the process cannot be adequately described in mere grammatical terms. We then examin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he cross-lingual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 of translation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sense-making in shaping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creation. Since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linguistic operation but also an interpretative act that reformulates human experience through text, translators navigate between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expectations by managing information focus to produce a target text that is supposed to resonate with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This hermeneutic awareness relates linguistic analysis to interpretative act, emphasizing that meaning creation is both textually grounded and socially situated.

This awareness heightens the need for a more rigorous account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sense-making in facilitating meaning creation. To address the need, we derived from the literature nine hypothese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presenting a linguistic-hermeneutic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interplay among word order,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we have been able to more specifically characteriz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the postverbal placement of *zài*-modifiers plays in sense-making by identifying its dual discursive propensity. That is, firstly, it may accentuate the circumstantial detail with a forward effect to turn it into a prospective topic that would project the event into a broader context. Secondly, it may exert a retroactive effect of metaphorization that projects the head entity into a different conceptual domain. This mechanism is essential for attaining metaphorical sensibility when the meaning initially made of the sentence clashes with real-world knowledge or common sense. In this wa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postverbal modifiers may evoke broader symbolic meanings, making their placement an effective tool for meaning creation in both primar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Ultimately, it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linguistic and hermeneutic approach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meaning creation.

Future research might stem from our findings by exploring other linguistic features in relation to information focalization and meaning cre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corporating other approaches such as psycholinguistic methods could lead to deeper insights into how readers process focalized information and metaphorical reinterpretation. Corpus-based investigations may also help observe the workings of the discursive propensity of focal information on the discourse level.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textual

accountability in translation as well as in other modes of communication. It calls for renewed attention to linguistic principles to enhance the rigour and dep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doing so, it opens new pathways for understanding how texts mediate between languages, cultures, and human experiences, whether these texts are produced by humans or AI programs.

References

- Barthes, Roland. 1977.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Heath, Stephen, pp. 79–124. London: Fontana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87/2004. *Criticism and Truth*,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Keuneman, Katrine Pilcher.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 Butler, Christopher S. 2003.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 guide to three major 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ies, Part 2: From clause to discourse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Downing, Pamela. 1995.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By way of introduction." In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edited by Downing, Pamela and Michael Noonan, pp. 1–27.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Eco, Umberto. 1992.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With Richard Rorty, Jonathan Culler, Christine Brooke-Rose), edited by Collini, Stef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Fang, Mengzhi [方夢之]. 1999. 《翻譯新論與實踐》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Qingdao: Qingdao Chubanshe.
- Fang, Yuqing [房玉清]. 1992. 《實用漢語語法 ('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 Favretti, Rema Rossini, Giorgio Sandri, and Roberto Scazzieri. 1999. "Translating language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Incommensurability and Translation: Kuhnian perspectives 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theory change*, edited by Favretti, Rema Rossini, Giorgio Sandri, and Roberto Scazzieri, pp. 1–29.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USA: Edward Elgar.
- Gómez-González, María Ángeles. 2001. *The Theme-Topic Interface: Evidence from Englis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alliday, M.A.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 Halliday, Michael A.K. 1999.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framing of the English clause." In *Incommensurability and Translation: Kuhnian perspectives o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theory change*, edited by Favretti, Rema Rossini, Giorgio Sandri, and Roberto Scazzieri, pp. 85–116. Cheltenham, UK and

- Northampton, USA: Edward Elgar.
- Halliday, M.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Third Edition). Revised by Matthiessen, Christian M. I. M.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 Huemer, Wolfgang. 2004. "Introduction: Wittgenste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Wittgenstein*, edited by Gibson, John and Wolfgang Huemer, pp. 1–1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Iser, Wolfgang. 2006. *How to Do Theory*. Malden, Oxford, and Carlton: Blackwell.
- Lakoff, George and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brecht, Knud.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Topics,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and cognitive connection for the origin of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edited by De Busser, Rik and Randy J. LaPolla, pp. 31–4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i, Linding [李臨定]. 1984/1992. 〈究竟哪個「補」哪個？——「動補」格關係再議（‘which complements which?—rethinking “Verb-Coplement” constructs’）〉. In 《現代漢語補語研究資料（‘research data on complements in Modern Chinese’）》，edited by Beijing Yuyan Xueyuan Yuyan Jiaoxue Yanjiusuo, pp. 495–503.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 Li, Yunxing [李運興]. 1998. 《英漢語篇翻譯（‘English-Chinese text translation’）》. Beijing: Tsinghua UP.
- Liu, Miqing [劉宓慶]. 1992. 《漢英對比與翻譯（‘Chinese-English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Nanchang: Jiangxi Jiaoyu Chubanshe.
- Lodge, David. 1966/2002. *Language of Fiction: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verbal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nove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cKenzie, Ian. 2002. *Paradigms of Reading: Relevance theory and deconstructio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unday, Jeremy, Sara Ramos Pinto, and Jacob Blakesley. 2022.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fifth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an, Wenguo [潘文國]. 1997. 《漢英語對比綱要（‘an outline of comparative Chinese-English studies’）》. Beijing: Beijing Yuyan Wenhua UP.
- Schwabe, Kerstin and Susanne Winkler. 2007. "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meaning and form: Generalizations across languages." In *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Meaning and Form: Generalizations across languages*, edited by Schwabe, Kerstin and Susanne Winkler, pp. 1–29.
- Shan, Qichang [單其昌]. 1990. 《漢英翻譯技巧（‘techniques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Sidiropoulou, Maria. 2004. *Linguistic Identities through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Snell-Hornby, Mary. 2006.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Tufte, Virginia. 1971. *Grammar as Sty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Venuti, Lawrence. 1995/2004.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eick, Karl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Wu, Jingcun [吳競存] and Liang Boshu [梁伯樞]. 1992. 《現代漢語語法結構與分析 (‘modern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s and analyses’)》.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 Xu, Jie [徐傑]. 2001. 《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 (*Grammatical Principles and Grammatical Phenomena*). Beijing: Peking UP.
- Xu, Liejiong [徐烈炯]. 2005. 〈幾個不同的焦點概念 (‘varied conceptions of focus’)〉. In 《焦點結構和意義的研究 (‘studies on focal structures and meaning’)》, edited by Xu, Liejiong and Pan, Haihua, pp. 11–33.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Xu, Liejiong [徐烈炯] and Pan Haihua [潘海華], eds. 2005. 《焦點結構和意義的研究 (‘studies on focal structures and mean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reface, pp. i–iv.
- Zhang, Bin [張斌], ed. in chief. 2010. 《現代漢語描寫語法》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Yufeng [張豫峰]. 2006. 《現代漢語句子研究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sentences’)》.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 Zhu, Chunshen. 1996. “Syntactic status of the agent and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in translating the passiv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Multilingu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15:4, pp. 397–417.
- Zhu, Chunshen. 2022. *Fathoming Translation as Discursive Experience: Theo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6 Abductive inference in Mandarin interactions

ZHENG Wuxi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projection in the form of brief interruptions in Mandarin interactions and looks at how interjections are based on projection from specific grammatic or lexical features. These projections manifest the role of abductive rather than deductive in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Individuals' knowledge involves more than the situation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abductive inference. Abductive projection is, essentially, a hypothesis that is not deterministic. The cases investigated here show that the interruptee in a conversation judges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interrupter's abduction in the immediately following utterance. The projections in the form of interruptions are generally unsuccessful and single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The aim of the interruptee is not to take the floor but to encourage or help the interrupter to continue talking by showing interest.

Keywords: projection; interruption; abductive inference; Mandarin

1. Introduction

Auer (2005:8) defined projection as “an individual action or part of it foreshadows anoth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is projected, interactants need some kind of knowledge about how actions (or action components) are typically (i.e., qua types) sequenced, i.e., how they follow each other in time.” The mental process part of “projection” is talked about in psychology as anticipation or prediction, and it has been argued to be the main thing our brains to, so Clark (2013) argued that “the brain is a prediction machine”. Projection involves the ability to guess what is coming next in an interaction, and grammatical mechanisms assist the hearer in making such guesses. The ability to make these guesses is referred to as abductive inference. Peirce (1965b: 99) distinguished three categories of reasoning, namely,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abduction, using statements about beans as examples. Induction proceeds from the case (These

Zheng, Wuxi. 2025. Abductive inference in Mandarin interactions. In Chenglong Huang & Xu Yang (eds.)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Randy J. LaPolla*, pp. 91–119.

beans are from this bag) to the result (These beans are white) to the rule (All the beans from this bag are white). The conclusion is a rule because it represents a generalization about all the beans in the bag. Deduction proceed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general rule (All the beans from this bag are white) to a particular case (These beans are from this bag) to a result (These beans are white); for Peirce (1965a: 374), “all deduction is merely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l rules to particular cases.” Abduction proceeds from the rule (All the beans from this bag are white) and the result (These beans are white) to the case (There beans are from this bag). The basis of his classification, then, is that “deduction proves that something must be; induction shows that something actually is operative; abduction merely suggests that something may be” (1965b:106). Peirce defined abduction as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n explanatory hypothesis” (1965b:106), considering it prior to induction and deduction—in other words, first, a hypothesis is formed, and then it is tested through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He considered abduction an extremely valuabl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declaring that “Every single item of scientific theory which stands established today has been due to abduction” (1965b:106).

Scholars have various ideas about the factors that play in communication. Sperber and Wilson (1986:94) offered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deduction system used for spontaneous inference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normal utterances, arguing that the function of this system is to analyze and manipulate the conceptual content of assumptions (1986:103). LaPolla (1997, 2015, 2019) argued that abductive inference, rather than deductive inference, plays a role in communication, with communicators applying abductive inference to infer a speaker’s future intention.

Sperber and Wilson (1986:3) argued further that the code model (the notion that communication involves encoding and decoding messages) and the inferential model (the notion that communication involves producing and interpreting evidence) are not incompatible and can be combined in various ways. From their perspective, language is a code that pairs phonetic an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s, bu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s and the thoughts actually communicated by utterances that is filled, not by more coding, but by inference (1986:11). LaPolla (2019:166) argued to the contrary that communication involves, not coding and decoding, but ostension and abductive inference,¹⁷ and, further (2015:33) that a person performs an ostensive act to show the intention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while the other party to the conversation must infer (guess)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behind the ostensive act.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n, communication is achieved, not through coding, but through ostension and abductive inference. If communic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of messages, the meaning would be deterministic, while the

¹⁷ LaPolla’s (1997, 1998, 2015, 2016, 2019) use of the term ostension follows that of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but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diverges in many important ways from Relevance Theory.

meaning achieved through abductive inference would be non-deterministic.

Interruption is a communicative strategy associated with proj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equential model, interruption or overlap describes instances in which more than one speaker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at the same time (Sacks et al. 1974), for instance, when one speaker begins to talk before another has finished speaking (Weatherall and Edmonds 2018). Previous studies have classified interruptions based on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Mishler and Waxler (1968)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types of interruption, successful, in which the interrupter prevents the interruptee from completing a statement, and unsuccessful, in which the interrupter fails to take the floor before the interruptee has completed a statement. Roger et al. (1988), by contrast, focused on the number of interruption attempts, in particular, comparing one attempt (a single interruption) with multiple attempts (a complex interruption), while Murata (1994) distinguished between cooperative and intrusive interruptions.¹⁸ A “disagreeing interruption” denies the content of the previous interlocutor’s turn, presents opposite arguments, raises doubts, or questions another’s opinion—for the fact is that not all interruptions are intended to disrupt the previous interlocutor’s turn and take the floor. Rather, the aim of some interruptions is to show involvement and sustain the interruptee’s topic. The present study describes shallow, unsuccessful, single interruptions, whether cooperative or expressing disagreement as a form of projection.

Typologically distinct languages show various types of projection (LaPolla 2019:167). Communication involves anticipating what is to come, so languages provide clues regarding what to expect. What’s more, projection is quite important to communication. As Hopper (2012: 208) explained, “Projection is what makes verbal communication an open and collaborative affair; as participants develop a sense of where the discourse is going, they tacitly mould it, allow it to continue, harmonize with the speaker’s goals, interrupt it with their own contribution, offer supportive tokens of various kinds, or predict when their turn will come”. During interaction, projection may lead to interruption. The hearer infers what the speaker is about to say and interrupts with a contribution. In this study, I identify clues that help speakers to make projection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s (Section 3.1).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I describe the data collection. In Section 3, I present the analysis of correct inferences, including the point at which projection occurs and the motivations for it. In Section 4, I discuss wrong inference and my analysis of the participants’ incorrect inferences. In Section 5, I present my conclusions.

¹⁸ Murata (1994) further distinguished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as either topic-changing, floor-taking, or disagreement; the focus here is on the latter type.

2. Data

The source of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is a corpus of 10 conversations among six participants that I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in 2022 amounting to nearly 10 hours. These six native speakers were about 20 years old at the time and fluent in Standard Mandarin (Putonghua). They are undergraduates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The conversations are naturally-occurring. Each conversation involves two participants, who are classmates or close friends.

Among the collections, I identify 103 cases of projection as the basis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enomenon in that language. Among the 103 cases, 91% of the instances of projection involve correct abduction and 9% involve incorrect abduction. The recorded conversations show that, in most cases, the interrupter's projection is immediately confirmed by the interruptee (i.e., *dui* 'correct'). This result proves that the interactants in this study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a correct projection in most situations. However, some situations are unexpected, and result in incorrect projection. I discuss the correct inferences in Section 3 and the incorrect inferences in Section 4.

In practice, projection in the form of interruption and overlap is fairly infrequent, occurring on average 10 times during a half-hour-long conversation. An interactant may infer or guess what comes next during an interaction but may not always express the inference explicitly. Brief interruptions can serve this purpose, expressing a participant's projection, which was inferred using abductive inference.

3. Correct inferences

The discussion here addresses two questions regarding correct abductive inferences, the point at which projection occurs (§ 3.1) and the motivations for it (§ 3.2).

3.1 The point at which projection occurs

The 103 cases of projection analyz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three common types: a modifier projects its modified head, a main clause projects a subclause, and a copula projects a complement.

3.1.1 Modifier projects its modified head

The first type of interrupter's projections occurs after modifiers such as a numeral/demonstrative-classifier (example 1), noun (example 2), adjective, or adverb in the

interruptee's utterance. In Chinese these modifiers all preceded the head noun. During communication, the hearer makes an abductive inference about the referent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in the speaker's ostensive act. Irrespective of the speaker's ostensive act, the hearer may make an inference based merely on personal experience. Accordingly, projection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after a modifier. The position of the head noun at the end of the phrase is a point where projection often occurs. Thus, the head noun can often be omitted because of this.

In (1), the projection *shexiang* 'camera' occurs in the utterance of the speaker WM (Line 8). In the preceding context, the speaker RM introduces two facts: first, the students made a video recording of the teacher's singing performance; second, cell phones were prohibited on campus (Lines 2–6). There is a short pause after the modifier *na-ge* 'that' (Line 7). The hearer WM makes a projection in the form of an interjection after the speaker RM's short pause. The projection is an abductive inference (guess) that is confirmed to be true by the speaker RM (Line 9). Abduction thus proceeds from the rule (Cell phones were prohibited on campus) and the result (The students make a video of the teacher's singing performance) to the case (The singing performance was recorded by video equipment, but not cell phones). In fact, video cameras and cell phones are the most common but not the only form of video equipment. So, if cell phones were forbidden, a video camera would, presumably, have been used to record the teacher's singing performance.

(1) [Conversation 9_344 , 00: 30: 06]

1 WM:你们唱的什么歌?

nimen chang-de shenme ge?
2PL sing-NOM what song
'What song did you sing?'

2 RM:我和我的祖国，然后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wo he wo-de zuguo, ranhou jiu shi ni jiu keyi kandao
1SG and 1SG-GEN country then just COP 2SG just can see
'*Me and My Motherland*. You could see

3 他们各个摄像头一直在那里拍拍拍拍拍。

tamen gege shexiangtou yizhi zai nali pai~pai~pai.
3PL every camera ceaselessly at there take.video
'they kept videoing.'

4 WM:也许。

maybe

‘Maybe.’

- 5 RM:然后, 就是现在的学生跟我们当时

jiu shi xianzai-de xuesheng gen women dangshi
just COP now -ASSOC student compare 1PL that.time

- 6 的很不一样, 就是他们(.)都不能用

de hen bu yiyang, jiu shi tamen(.) dou buneng yong
NOM very not same just COP 3PL all cannot use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us at times like that.’

- 7 手机, 但是他们都会有那个(.)

shouji, danshi tamen dou hui you (na-ge)
telephone but 3PL all can have that-CL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use cell phones, but all of them had one (.)’

- 8→ WM:摄像。

shexiang.
camera
‘Camera.’

- 9 RM:摄像机。

shexiangji.
camera
‘Camera.’

- 10 WM: 哦, 摄像机。

wo, shexiangji.
oh camera
‘Oh, camera.’

- 11 RM : 对。他们就平常就蛮记录

dui. tamen jiu pingchang jiu man jilu
correct 3PL just usual just very record
‘Correct. They usually record

- 12 他们的生活的。
 tamen-de shenghuo de.
 3PL-GEN live PART
 their live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speaker projecting a head noun is presented in (2). The projection *gaokaoti* 'entrance examination' (Line 7) is the head noun of the modifier *gaozhong-de na-zhong wenyawen-de* 'the classical Chinese tested in high school' (Line 6). The hearer XY makes an abductive inference based on the speaker ZT's description of the examination in the preceding utterance (Lines 2–6). In this context, the punctuation, content words, and function words are not tested only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whereas many examinations are administered during the three-year high school studying period. Therefore, the speaker's inference regarding *gaokaoti* 'entrance examination' may be true rather than must be true. The speaker XY's hypothesis is proved to be correct by the speaker ZT (Line 7). The abductive inference is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Many examinations are conducted during high school, but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emorable. Both of the interlocutors have experienc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ommunication, speakers are more willing to discuss events or entities that are familiar to all interlocutors, for excessive new information makes it difficult for hearers to follow a conversation.

(2) [Conversation 14_117 , 00: 08: 05]

- 1 XY: 那古代汉语考吗?

 na gudaihanyu kao ma?
 that Classical.Chinese exam PART
 'Did (you) take the classical Chinese exam?'

- 2 ZT: 考, 但是他(.)考大概每年就是(.)

 kao, danshi ta(.) kao dagai meinian jiu shi(.)
 exam but 3SG exam about every.year just COP
 'Yes, (I) took the exam, but this (.)'

- 3 考一考你的断句,

 kao-yi-kao ni-de duanju,
 exam-one-exam 2SG-GEN punctuation
 exam covered punctuation,

- 4 考一考你的那个实词虚词。
 kao-yi-kao ni-de na-ge shici xuci.
 exam-one-exam 2SG-GEN that-CL content.word function.word
 exam content words, and function words.'
- 5 哦。
 Oh. (?)
 'Oh.'
- 6 就挺像高中的那种文言文的(.)
 jiu ting xiang gaozhong-de na-zhong wenyanwen-de(.)
 just very like high.school-ASSOC that-CL classical.Chinese-ASSOC
 It resembl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classical Chinese tested in high school (.).'
- 7→ XY: 高考题。
 gaokaoti
 entrance.examination.ques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 question.'
- 8 ZT: 对。
 dui.
 correct
 'Correct.'

3.1.2 Connector projects subclause

The second type of projection is a connector projecting a subclause. In other words, the speaker completes the first subclause but then is interrupted by the hearer when the speaker is about to say the subclause. The interruption generally occurs after connectors such as *ranhou* 'then', *danshi* 'but' and *huozhe* 'or' as (3) shows.

In (3), the speaker ZC discusses her internship experiences in a middle school. During a class, the teacher wanted to talk about a father's love and offers the example of sending his children to school, but the students were unmoved by the teacher's story and laughed, because being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it. In the speaker ZC's utterance, "but it may be due to the students' youth" is interrupted by LC's projection (Line 5). The interactant ZC is interrupted at the point of the connector *ranhou* 'then' and the interrupter LC's projection is an abductive inference based

on context.

(3) [Conversation 1_585 , 00: 31: 56]

1 ZC: 他就拍一个他们学校门口的照片。

ta jiu pai yi-ge TAMEN xuexiao menkou-de zhaopian
3SG just take.photo one-CL 3PL school door-GEN photo
'He took a photo of his school door.'

2 LC: 我觉得这个好。

wo juede zhe-ge hao.
1SG think this-CL good
'I think this is good.'

3 ZC: 对, 对。不过, 学生可能那个年纪吧,

dui, dui. buguo xuesheng keneng na-ge nianji ba,
correct correct but student may that-CL age PART
'Correct. Correct. But it may be due to the students' young age,

4 然后(.)

ranhou
then
then (.)'

5→ LC: 就会笑。

jiu hui xiao.
just would laugh
'(The student) would laugh.'

6 ZC: 对。((laugh))他们不是真正的那个感动。

dui. ((laugh)) tamen bu shi zhenzheng-de na-ge gandong.
correct 3PL NEG COP really-ASSOC that-CL touched
'Correct. They were not really touched.'

3.1.3 Copula projects complement

The third type of projection is a copula projecting a complement. In (4), *fugu* 'retro' is the

complement of the copula *jiushi* ‘that is’ (Lines 4–5). In context, the speaker LC says that her classmate perms various kinds of hairstyles, but the hearer ZC disagrees, in that she thinks that classmate merely prefers one hairstyle, that is, the retro style. The speaker ZC is interrupted by the speaker LC when she is about to say ‘retro style of perm’ (Line 4), and then ZC confirms LC’s projection (Line 6). In this communication, the speaker LC makes an abductive inference based on the hints *duan shijian nei* ‘in a short period’ in the speaker ZC’s utterance. The abductive inference proceeds from the rule (That girl loves to perm only one hairstyle in a short period), the result (That girl is retro style now), and the case (That girl loves the retro style).

(4) [Conversation 5_814 , 00: 46: 58]

1 LC: 她后来就, 她后来烫了各种烫。

ta houlai jiu, ta houlai tang-le gezhong tang.
3SG later just 3SG later perm-PFV various.kind perm
‘She later permed various hairstyles.’

2 ZC: 没有, 她只爱一种烫。

mei-you, ta zhi ai yi-zhong tang,
NEG-have3SG just love one-kind perm
‘No, she doesn’t (perm various hair styles). She only loves to perm one type of hairstyle.’

3 我跟你说, 在短时间内,

wo gen ni shuo, duan shijian nei,
1SG with 2SG say short time during

4 我发现, 她只爱一种烫, 就是, 就是(.)

wo faxian, ta zhi ai yi-zhong tang, jiu shi(.)
1sg find 3sg just love one-kind perm just COP
‘Let me tell you, in a short time, I found that she just loves one type of perm, that is (.)’

5→ LC: 复古。

fugu.
retro
‘Retro (hair style).’

- 6 ZC: 对! 复古那种, 那种烫。
 dui! fugu na-zhong tang.
 correct retrothat-kind perm
 ‘Correct! (She loves the) retro (hair style).’

3.1.4 Projection within a construction

The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e preceding two subsections indicates that a modified head, subclause, and complement are especially likely to serve as projection in communication because the modifier, main clause, and topic prior to them, respectively, provide ostensive acts to help the interlocutor to make an abductive inference. These three kinds of projection involve projecting words or clauses indicating complete meaning. Here, I introduce another kind of projection that is not a content word representing an entity, event, or property but, rather, merely a constituent within a construction. In (5), the projection *youguan* ‘about’ is a constituent of the construction *gen ... youguan* ‘be related to...’ (Line 3). This projection does not provide complete meaning but functions only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complete.

(5) [Conversation 10 , 00: 16: 58]

- 1 RM: 没想到它爆发得这么严重。
 mei xiangdao ta baofa-de zheme yanzhong.
 NEG expect 3SG break.out-ASSOC such serious
 ‘It is unexpected that it (COVID-19) should be this serious.’
- 2 WM: 对, 可能跟这个病毒就是经常变体(.)
 dui. keneng gen zhe-ge bingdu jiu shi jingchang bianti(.)
 correct may with this-CL virus just COP often vary
 ‘Correct. Maybe the virus often varies (.)’
- 3→ RM: 有关。
 youguan.
 relate
 ‘Related to.’
- 4 WM: 现在都变了多少了?
 xianzai dou bian-le duoshao-le?
 now already vary-PFV how.many-PFV

‘How many variations has the virus already gone through so far?’

- 5 之前不是那个，那个什么德尔塔，对吧？
zhiqian bu shi na-ge, na-ge shenme deerta, dui ba?
previous NEG COP that-CL that-CL what Delta correct Q
‘It was Delta previously, right?’

- 6 现在就是奥秘克戎。
xianzai jiu shi aomikerong.
now just COP Omicron
‘Now it is only Omicron.’

3.1.5 Projection in the form of overlapping

Interruption can take place without any actual overlapping (cf. Tannen 1991:192, Murata 1994:388), as the examples above show. Here, I illustrate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 with overlapping. As mentioned, Sacks et al. (1974:706) defined “overlapping/interruption” as more than one speaker attempting to communicate at the same time. One of the bases of overlap derived from the projectability of start or completion places at possible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s. In (6), the hearer XY infers the direct quotation *bu yong-le* ‘No, thanks!’ from the speaker ZT’s ostensive acts, and this inference overlaps with the speaker ZT’s utterance.

(6) [Conversation 16_52 , 00: 04: 28]

- 1 ZT: 她的舍友是有伞的，
ta-de sheyou shi you san de,
3SG-GEN roommate COP have umbrella PART
‘Her roommate had an umbrella.’
- 2 她的舍友说，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ta-de sheyou shuo wo gen ni yiqi huiqu ba.
3SG-GEN roommate say 1PL with 2SG together back PART
‘Her roommate said, ‘I will go back with you
- 3 就一起，大家打一把伞，
jiu yiqi, dajia da yi-ba san,
just together all take one-CL umbrella

and share an umbrella.'

4→ 她说 [不用了。]
ta shuo [bu yong-le.]
3SG say NEG use-PFV
'She said 'No, thanks!''

5→ XY: [不用了。]
[bu yong-le.]
NEG use-PFV
'No, thanks!'

6 ZT: 龙杰说他从宿舍里面给我带伞,
Longjie shuo ta cong sushe limian gei wo dai san,
person.name say 3SG from dormitory inside give 1SG take umbrella
'Longjie said he would take an umbrella for me from the dormitory.'

7 我们当时在教学楼诶!
women dangshi zai jiaoxuelou e!
1PL that.time at teaching.building PART
'We were at the teaching building!'

3.2 Motivations for projection

Projections are, then, very important in communication. Based on my analysis of the 103 cases of projection in the recorded conversations, I summarize four motivations for projection in the form of interruption.

3.2.1 To show involvement

Communication i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projection and interruption are manifestations of interaction. When a speaker provides a sufficient description of an entity or event, the hearer can use abductive inference to infer related information about it. Projections in the form of interruption are likely to express the key information during communication. Interruptions are variously evaluated across cultures. Tannen (1981, 1984) noted that, in some "co-operative imperative" cultures, interruptions may be welcomed and encouraged since they are interpreted as the interrupt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an ongoing conversation, while, in som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cultures, interruptions may be considered rude, aggressive,

and/or disrespectful to the speaker. In Chinese culture, interruption is welcomed in some situations as an indication of active involvement in a conversation or discussion whereas in other situations it is considered impoli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ruptions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ocuto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conversations.

In (7), the speaker WM introduces her experiences of taking part in the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exam. Because the interactant WM has obtained a postgraduate recommendation, she does not need to work as a civil servant, meaning that she simply wanted to try doing so;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were not important for her. In the interruptee RM's utterance, the projection is the summarized information *shi yi xia* 'have a try' (Line 7) rather than the less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exchange. In the subsequent context, the speaker WM immediately confirms RM's inference and then introduces more details to explain why she took the exam.

(7) [Conversation 7_16 , 00: 01: 21]

1 WX:你参加过国考吗?

ni canjia-guo guokao ma?

2SG join-EXP national.civil.servants.exam PART

'Did you take part in the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exam?'

2 WM: 对, 我参加了一次国考。

dui, wo canjia-le yi-ci guokao.

correct 1SG join-PFV one-timesnational.civil.servants.exam

'Yes, I took the test once.'

3 因为,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

yinwei, (.) shiqing qishi shi zheyang de.

because thing actually COP this.way PART

'Because, in fact, the situation was like this.'

4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 嗯,

jiu shi qishi na-ge shihou, en,

just COP actually that-CL time um

'In fact, at this time,

5 保研(.)情况已经出来了嘛。

baoyan(.) qingkuang yijing chulai-le ma.

postgraduate.recommendation result already come.out-PFV PART

the results of the postgraduate recommendations had come out.'

6 已经上岸了。

yijing shangan-le.

already land-PFV

'(I) was already successful.'

7 RM:对。

dui.

'Correct.'

8 但是我爸妈还是想让我就(.)

danshi wo bama haishi xiang rang wo jiu(.).

but 1SG parents still want let 1SG just

'But my parents still hoped that I would (.).'

9→ RM: 试一下。

shi yi-xia.

try one-times

'Have a try.'

10 WM: 对, 试一下。他们说你就尝试一下,

dui! shi yi-xia. tamen shuo ni jiu CHANGSHI yixia,

correct try one-times 3PL say 2SG just try one-times

'Correct! Give it a try. They said, 'You just have to try.'

11 你就不要有压力呀。什么。

ni jiu bu-yao you yali ya. shenme.

2SG just NEG-will have press PART what

'Don't feel stressed! Something like this.'

12 随便去体验一下。

suibian qu TIYAN((glaring)) yi-xia.

feel.free go experience one-times

'Go experience (the test) casually.'

13 然后我就报了那个国考。

ranhou wo jiu bao-le na-ge guokao.
 then 1SG just apply-PFV that-CL national.civil.servants.exam
 ‘Then I applied for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exam.’

3.2.2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 to fill a moment of hesitation

During interactions, when a speaker slows or pauses briefly, a conversational partner may perceive the hesitation and supply what the speaker is searching for. Murata (1994:387) described this situation, in which a conversational partner, with no intention of taking the floor, encourages a speaker to continue by showing interest, listen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as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

In (8), the interactant RM cannot think of the word for *beidan* ‘sheet’, and says *mianbei* ‘quilt’ with a rising intonation to express uncertainty (Line 2). Another interactant, WM, interrupts RM after a short pause and makes abductive inferences, *xizi* ‘mat’ and *beidan* ‘sheet’ based on the attributive expression *bao* ‘thin’ and the classifier *zhang*. The interactant WM guesses that the missing word could be *yi-zhang xizi* ‘a mat’ or *yi-zhang beidan* ‘a sheet’ (Line 4). If the classifier is *tiao* rather than *zhang*, WM would guess that the missing word is *yi-tiao tanzi* ‘a blanket.’ This example illustrates that phon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intonation and pauses can communicate a speaker’s hesitation or uncertainty, and a classifier can pragmatically help the hearer make an inference. The interactant WM is, then, cooperating with another interactant, RM, in supporting the flow of the conversation by supplying the word that RM is trying to find, *beidan* ‘sheet’.

(8) [Conversation 9_32 , 00: 03: 31]

- 1 RM: 我当时就因为没有(.)没有带那个睡垫,
 wo dangshi jiu yinwei meiyou meiyou dai na-ge shuidian,
 1SG then just because NEG-have NEG-have bring that-CL mattress
 ‘Just because I didn’t take that mattress
- 2 然后只带了一张那种(.)棉被(?)。
 ranhou zhi dai-le yi-zhang na-zhong(.) mianbei(?),
 then only bring-PFV one-CL that-kind quilt
 but only took a quilt.
- 3 也不是, 就很薄的一张(.)
 ye bu-shi, jiu hen bao-de yi-zhang(.)

also NEG-COP just very thin-ASSOC one-CL
 No, it wasn't a quilt, exactly, it was a very thin (.).'

4→ WM: 席子, 被单。

xizi? beidan?
 mat sheet
 'Mat? Sheet?'

5 RM: 一张被单, 然后就铺在上面睡。

yi-zhang beidan, ranhou jiu pu zai shangmian shui.
 one-CL sheet then just cover at above sleep
 'It was a sheet. Then (we) just slept on (the sheet).'

Another example of filling a moment of hesitation occurs in (9). In the utterance of the interactant LC, a short pause occurs after the numeral-classifier *yi-ge* "one" (Line 3). She wants to say "it is a secret" or "it is cheating behavior," and her hesitation indicates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a computer store's deceptive action. The interactant LC feels that it is inappropriate to discuss such illegal behavior.¹⁹ This example illustrates the use of a phonological pause to express the interlocutor's stance. At the moment of the pause, the hearer LC captures the turn timing and says *dou dong de* "anyone can understand" to indicate that she perceives what the speaker ZC intends to say, that is, to demonstrate agreement. In fact, the hearer LC does not say the head noun of the numeral-classifier *yi-ge* "one," but the speaker ZC still says *dui* "correct" in response, and then she describes the cheating behavior in detail.

(9) [Conversation 2_479, 00: 22: 14]

1 ZC: 他说你怎么可以放在人家店里?

ta shuo ni zenme keyi fangzai renjia dian-li?
 3SG say 2SG how can put other store-in
 'He said, 'Why did you leave (your laptop) at someone's store?''

2 他说他们这些其实是就是(.),

ta shuo tamen zhexie qishijiu shi(.)
 3SG say 3PL these actually just COP
 'He said, "They actually were (.).'

¹⁹ LC may have been unsure whether it was appropriate to say such things when her words were being recorded.

- 3 嗯，可能也是他们这一行的一个(.)
 en, keneng ye shi tamen zhe-yi-hang-de yi-ge(.)
 en maybe also COP 3PL this-one-trade-ASSOC one-CL
 ‘Uh, it may be their business’s (.)’
- 4→ LC: 都懂的。
 dou dong de.
 all understand PART
 ‘Everyone knows that (the store is secretly cheating).’
- 5 ZC: 对，就是他会给你动一点手脚的，
 dui. jiu shi ta HUI gei ni dong yidian shoujiao de,
 correct just COP 2SG can give 2SG do a.little cheat PART
 ‘Correct. That means he could cause some problems on (your laptop).’
- 6 然后可能本来你有一点问题，
 ranhou keneng benlai ni you yidian wenti,
 then maybe originally 2SG have a.little problem
 ‘Maybe your (laptop) just has a little problem.’
- 7 他会让你的问题更严重一点。
 ta hui rang ni-de wenti geng yanzhong yidian.
 3SG can let 2SG-GEN problem more serious a.little
 ‘He would make the problem worse.’

3.2.3 Interruption as a repair device

When an interlocutor makes an incorrect projection, the interrupter may rectify it, in which case interruption functions as a repair device for correcting errors in conversation. Correction is an abductive inference based on the preceding context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Murata (1998:390) called this type of interruption, which occurs when the next speaker feels the need to disagree with what the current speaker says, “disagreement interruption”. Thus, in (10), the speaker ZC says that the stores in tall buildings are similar to producers and factories, but the hearer LC believes that ZC has spoken wrongly because producer is equivalent to factory. ZC’s utterance is interrupted, though she hasn’t finished speaking the word *gongchang* ‘factory’ (Line 5). The projection is *xiaoshou* ‘seller’ (Line 6). Based on her personal knowledge, the stores in a

- 8 LC: 对。
 dui.
 ‘Correct.’
- 9 然后也有维修什么的。
 ranhou ye you weixiu shenme de.
 then also have repair whatPART
 ‘Then (they) also can repair (computers).’
- 10 ZC: 对, 比较全面。
 dui. bijiao quanmian.
 correct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Correct. (They) are fairly comprehensive.’

3.2.4 Further exploring the preceding turn

In communication, an interlocutor may make a conclusive statement based on inference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r the preceding context. Communicative projection is, to a large extent, driven by an interlocutor’s existing knowledge and a speaker’s ostensive acts. In (11), the speaker ZT’s utterance is interrupted by the hearer XY (Line 7). ZT is introducing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choice of a school for the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 (Lines 1–6). Both interlocutors know that the admission rate of Chinese Studies is so low that many students are afraid to choose this major. This fact is known by both interlocutors. Therefore, when the speaker ZT says “I checked the previous year’s admission rate,” the hearer XY interrupts to make a projection: “You were scared, right?” and ZT immediately confirms the projection.

(11) [Conversation 14_22 , 00: 01: 37]

- 1 ZT: 我是其实, 我本来首先是想
 wo shi qishi, wo benlai shouxian shi xiang
 1SG COP actually 1SG originally firstly COP want
- 2 考学语的, 学科语文,
 kao xueyu-de xueke yuwen,
 exam Chinese.discipline-ASSOC discipline Chinese
 ‘Actually, I originally wanted to take the exam of Chinese Studies.’

- 3 然后我想的是考本校嘛，
 ranhou wo xiang-de shi kao benxiao ma,
 then 1SG want-NOM COP exam this.school PART
 Then I wanted to take our school's exam.
- 4 后来，后来就是那个初试。
 houlai, houlai jiu shi na-ge CHUSHI,
 later later just COP that-CL first.test
 Later, that was the first test.
- 5 他们一考完初试之后，
 tamen yi kao wan chushi zhihou,
 3PL once exam completely first.test after
- 6 我就查那个往年的报录比。
 wo jiu cha na-ge wangnian-de baolubi.
 1SG just check that-CL previous.years-ASSOC admission.rate
 After they finished the first test, I checked the admission rate.'
- 7→ XY: 吓到了，是吗？
 xiadao-le, shi ma?
 scared-PFV COP PART
 'Were you scared?'
- 8 ZT: 对，我被吓到了，
 dui. wo bei xiadao-le,
 correct 1SG PASS scared-PFV
 'Correct. I was scared.'
- 9 我觉得自己感觉不是那么的(.)有把握。
 wo juede ziji ganjue bushi name-de(.) you bawo.
 1SG think self feel NEG COP such-ASSOC have confidence
 'I don't feel very confident.'

4. Incorrect inferences

Unlike deductive inference, abductive inference is non-deterministic. One person performs an ostensive act, and another infers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using abductive reasoning. A hypothesis is not definitely true. In the recorded conversations, 10 of the 103 cases involve incorrect inferences (projections).

In (12), the participants discuss their internship experiences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In her utterance, ZC slows down the pronunciation of *bijiao-de jiu* to show her difficulty finding an appropriate word to describe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The interactant LC interrupts ZC's utterance to guess that the students are unwilling to answer the teachers' questions, having formulated the hypothesis through abductive inference that "not willing to answer teachers' questions was one of the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room." The speaker LC's inference regarding the utterance of ZC is immediately proved wrong: rather than refusing to answer their teachers, the students are simply "inattentive in the classroom." Not answering the teachers' questions is considered a manifestation of bad behavior in the class. This example shows that projection or in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is based largely on the hearer's existing knowledge. Context is important for the addressee, but personal experience plays a larger role in helping interlocutors to make an inference.

(12) [Conversation 1_725 , 00: 41: 02]

- 1 ZC: 嗯, 嗯, 我觉得可能高中课堂会好一点,
 en en wo juede keneng gaozhong ketang hui hao
 yes yes I SG think maybe high.school classroom would good
- 2 初中的话, 还是(.)<会比较的>, 就。
 yidian, chuzhong dehua, haishi(.) hui <bijiao-de> jiu.
 a.little middle.school as.for still would relative-ASSOC just
 'Yes, I think the (situation) in the high school's classrooms would be a little better. As
 for middle school, (the situation) would be <relatively> (.).'
- 3→LC: 不回答。
 bu huida
 NEG answer
 '(The students would) not answer.'

- 4 ZC: 也不是不回答, 就是他们没那么, <嗯>
 ye bushi bu huida, jiu shi tamen mei name, <en>,
 also NEG.COP NEG answer just COP 3PL NEG so um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they wouldn’t answer (their teachers’ questions).<um>,’
- 5 就是, 上课可能没那么集中,
 jiu shi, shangke keneng mei name JIZHONG,
 just COP attend.class maybe NEG so concentrate
 They may not be, concentrating in class.
- 6 你知道吗? 他们会, 他们会,
 ni zhidao ma? tamen hui, tamen hui
 2SG know Q 3PL would 3PL would
 You know, they may be,
- 7 就是会分神。
 jiushi hui fenshen.
 just COP absent-minded
 They may be inattentive.’

In (13), the abduction proceeds from the rule (different hobbies may cause conflict) and the result (they quarreled) to the case (they quarreled because of hobbies). The hearer XY was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individual under discussion, Longjie, so she simply guesses why the individuals in question quarreled. Though the hearer XY does not know the reason for the quarrel, she interrupts the speaker ZT and makes a projection, *aihao* ‘hobby.’ This example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abductive inference plays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13) [Conversation 16_143 , 00: 11: 36]

- 1 ZT: 而且她平时会跟龙杰
 erqie ta pingshi hui gen Longjie,
 in.addition 3SG usual would with person.name
 ‘In addition, she would usually
- 2 她看很多动漫嘛。
 kan henduo dongman ma.
 look many cartoon PART

watch many cartoons with Longjie.’

- 3 所以她会跟龙杰很多共同话题，
suoyi ta hui gen Longjie henduo gongtong huati,
so 3SG would with person.name many common topic
‘Therefore, she had many common topics to (discuss) with Longjie.’

- 4 但是(.)他们(.)经常在一些观点问题上会吵架。
dashi(.) tamen(.) jingchang zai yixie guandian-shang hui chaojia,
but 3PL always at some opinion-on can quarrel
‘But (.) they (.) always quarreled about some (of their) opinions.’

- 5 就不是三观方面，是比如说(.)。
jiu bu shi sanguan fangmian, shi biru shuo(.).
just NEG COP three.outlooks aspect COP for.example say
‘(They quarreled) not because of views on the world, life, and values, but, for example (.)’

- 7→ XY: 爱好。
aihao.
hobby
‘Hobby.’

- 8 ZT: 不是爱好，比如说他们一起去看《进阶的巨人》，
bu shi aihao, jiu biru shuotamen yiqi kan Jinjie-deJuren,
NEG COP hobby just example say 3PL together look cartoon.name
‘No, not because of a hobby. For example, when they see *Advanced Giant*,

- 9 他们对于，嗯，结局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tamen duiyu, en, jieju-de yixie(.) guandian gen kanfa
3PL about um, ending-ASSOC some opinion and view

- 10 是很大分歧。
shi HEN DA fenqi
COP very big differences
they had very different opinions and views about the ending.’

- 11 然后两个人在饭堂经常能吵起来。
 ranhou liang-ge-ren zai fantang jingchang neng chao-qilai.
 then two-CL-person at canteen usually can quarrel-start
 ‘Then the two usually would quarrel at the canteen.’

In (14),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hearer RM to guess the strange point about Inner Mongolia, and she wrongly says “lots of sand.” In the preceding context, though the speaker WM talked about the grass in Inner Mongolia being very lush when she went there, the hearer RM’s response “lots of sand” describes the opposite of “rainy weather.” RM’s inference is based on her personal knowledge of Inner Mongolia, where, as is well-known, sand storms occur every spring and winter. However, her short pause and use of a rising tone for *sha* “sand” indicate that the interactant RM herself suspects that her hypothesis is incorrect (Line 7). In this case the speaker RM has less confidence in the inference. Having less confidence in what the speaker projects doesn’t mean she hasn’t projected, it means that the evidence she based on her projection on is less stronger.

(14) [Conversation 7_278 , 00: 20: 47]

- 1 WM: 对，雨水比较丰沛，
 dui, yushui bijiao fengpei,
 correct rain.water relatively abundant
 ‘Correct. The rain was relatively abundant.
- 2 然后水草非常丰美，
 ranhou shuicao feichang fengmei,
 then grasses very abundant
 Then, the grasses were very abundant.
- 3 草就非常，很绿。
 cao jiu feichang, hen lv.
 grass then very very green
 The grasses were very green.
- 4 然后，我觉得很开阔。
 ranhou, wo juede hen kaikuo.
 then 1SG feel very wide
 Then, I thought (the grasslands were) very wide.

- 5 但是内蒙有个
 danshi neimeng you-ge
 but Inner.Mongol have-CL
- 6 很，很奇怪的点，就是(.)
 hen hen qiguai-de dian jiu shi(.)
 very very strange-ASSOC point just COP
 But Inner Mongol has a very strange feature, that is (.)
- 7→ RM: 沙(?)(.)比较多。
 sha(?)(.) bijiao duo.
 sand relatively too.much
 ‘Lots of sand.’
- 8 WM: 不是不是，很奇怪的点就是，
 bu shi bu shi, hen qiguai-de dian jiu shi,
 NEG COP NEG COP very strange-ASSOC point just COP
- 9 他们那边的草场好像都是
 tamen nabian-de caochang haoxiang dou shi
 3PL there-ASSOC grassland seem all COP
- 10 国家分配给个人去放牧的。
 guojia fenpei gei geren qu fangmu de.
 country allocate give person go graze PART
 ‘No, no. The very strange feature was that the grasslands are al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5. Conclusions

In Mandarin interactions, projections in the form of interruptions are generally single and unsuccessful. The interrupter does not seek to prevent the interruptee from completing an utterance and taking the floor. Rather, the interrupter’s aim is merely to make a projection in order to indicate involvement in the conversation. Our studies show that a modified head, subclause, and complement are especially likely to serve as projection in communication.

Projection involves abductive, rather than deductive, inference. In fact, human communic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abductive inference as the addressee infers the communicator's intention in performing an act. According to LaPolla (1994:242), the "inference of motivations for doing things is done all the time, but it isn't communication unless the communicator intended for the addressee to infer the intention for the action," and inferences involve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context),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and their possible motivations for performing some action. The abductive inference of intentions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a 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 The recorded data presented here indicate that hearers make hypotheses based on context, individual knowledge, speakers' facial expressions, or prosodic features. Sometimes, the hearer makes an abduction merely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which case the hypothesis is either correct or incorrect. Correct inferences are far more common than incorrect inferences, an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knowledge is crucial during conversation. If all of the information involved were new, communication would prove difficult.

Appendix A: List of Abbreviations

1, first; 2, second; 3, third; ASSOC, associative; CL, classifier; COP, copula; GEN, genitive; PASS, passive; NOM, nominalizer; PFV, perfective aspect; PART, particle; PL, plural; sG, singular; Q, question.

Appendix B: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

,	continuing intonation
.	terminal intonation (falling)
?	rising intonation
((glaring))	facial expression, gesture or bodily movement
[]	overlapping speech
:	lengthening
(.)	micro pause
< >	slower than the surrounding talk
CAPS	loud sounds relative to the surrounding talk
→	a relevant instance

References

- Auer, P. 2005. "Projection in interaction and projection in grammar." *Text*, 25(1).7–36.
Auer, P. 2009. "On-line syntax: thoughts on the temporality of spoken language." *Language*

- Sciences*, 31.1–13.
- Clark, A. 2013. “Whatever next? Predictive brains, situated agents, 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181–253.
- Hopper, Paul J. 2012. “Emergent Grammar.”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edited by Michael Handford & James Paul Gee, 301–314. London: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fossi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single theory of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minar in Linguistics, November 6.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edited by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pp. 33–44.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16. “Review of The language myth, by Vyvyan Evans.” *Studies in Language* 40(1). 235–252.
- LaPolla, Randy J. 2019. “Arguments for Seeing Theme-Rheme and Topic-Comment as Separate Functional Structure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anguage Description: Making Meaning Matter*, edited by J. R. Martin, G. Figueredo & Y. Doran, pp. 162–186. London: Routledge.
- Mishler, E.G. & Waxler, N.E. 1968. *Interaction in Famili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Family Processes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Wiley.
- Murata, K. 1994. “Intrusive or cooperative?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interrup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1. 385–400.
- Peirce, Charles S. 1965a.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2.” In *Elements of Logic*,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 Paul Wei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harles S. 1965b.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In *Pragmatism and Pragmaticism*,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 Paul Wei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 D., Bull, P., Smith, S.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classifying interruptions.” *Journal of Language Social Psychology* 7. 27–34.
- Sacks, H., Schegloff, E.A.,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nnen, Deborah. 1981. “The machine-gun question: An example of conversational style.” *Journal of Pragmatics* 5. 383–397.
- Tannen, Deborah. 1991.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London: Virago Press.

Tannen, Deborah. 1984. *Conversational style*. Norwood, NJ: Ablex.

Weatherall, Ann & D. M., Edmonds. 2018. Speakers formulating their talk as interruptiv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3. 11–23.

7 现代汉语超常规三重否定：形成机制、类型与动因

李姝姝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

内容摘要 双重否定表肯定是汉语无标记的一种否定用法，而语言实践中存在着一种超常规否定用法——三重否定表肯定。本文结合其他语言类型学研究成果，并从认知加工、交际互动、言语产出等方面分析了这种超常规否定用法的形成机制与动因，指出这种三重否定构式是两个音、形、义均有高度相似性的双重否定构式的整合。从认知加工机制来看，否定层级的叠加显著提升处理负荷，但听者在知觉整体性驱动下，会优先提取语境化整体语义而非精确计算否定算子数量。这种“意义完形优先”原则导致三重否定构式在实际交际中被重构为特殊强调手段，其理解过程印证了 LaPolla(2015、2021)的“意义创造论”，即语言交际本质上是语境驱动的动态协商而非形式符号的静态推导。

一、前言

自然语言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语言，在日常交际中，人们的话语不总是遵循着逻辑的规定来进行构建。譬如，过去曾受到关注的羡余否定就无法用“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的数学逻辑来运算。除了比较常见的羡余否定（如“好不热闹”）外，有一种三重否定表肯定的超常句法现象散布于网络与语料库中。例如：

- (1) 这两句话，如果当作笑话听，那么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不承认它说得有理。（《十日谈》，BCC语料库，1987年²⁰）
- (2) 没有什么产品不会不过时，无论这种产品多么先进，多么拥有市场，都是临时的。（《玻璃企业：从突破口突破》，中国知网1998年）
- (3) 他有着让人心动的美丽容颜，恐怕世界上没有女孩子不会不对他动心吧。（《零之使魔》，BCC语料库，2004年）
- (4) 失败很正常，没有人不会不失败。重点是我们千万要放平心态，不要被无数的失

李姝姝. 2025. 现代汉语超常规三重否定：形成机制、类型与动因.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120–135.

²⁰ 为了让读者对三重否定表肯定的超常句法现象出现的时间有一个大致的认识，(1) - (4) 的语例中标注了时间，但是由于本文不是历时研究，后续的例子不再标注语例的时间。

败所击败。（《年轻人需要具备的几点能力》，网络语料，2016年）

以上例子中，每个下画线小句都含有三个否定词。如果严格按逻辑分析，以上画线句因为其中的两个否定互相抵消，只剩一个否定，最终应该表达否定义。但是根据语境推理，说话者通过画线小句表达的却是肯定性命题义，如“女人会承认它说得有理”“产品会过时”“世界上女孩子会对他动心”“人会失败”。

除了书面媒介的语料中出现三重否定用例之外，自然口语会话中也存在类似现象。下面这则会话片段来自《锵锵三人行》，主持人和嘉宾讨论的话题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06行曹红辉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肯定有人知道三聚氰胺这个事儿。但是曹红辉脱口而出“不可能没有人不知”这样的没有说完的三重否定句，只不过在“不知”说出后，说话人启动修复（repair），将“不知”修复为“知道”。

(5) 《锵锵三人行》会话片段

01 曹红辉：那三聚氰胺从哪儿来的呢？

02 叶 檀：对呀。

03 曹红辉：到底谁-谁买的呢？谁采购、谁放进去呢？

04 叶 檀：嗯

05 窦文涛：嗯

06→曹红辉：不可能没有人不知-呃知道这个事儿吧，

07 窦文涛：嗯

08 曹红辉：所以这个话是说不过去的，道理上。

09 叶 檀：对。

在汉语方言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如粤语网络语料中，存在“有人唔會唔 VP”“无人唔會唔 VP”“唔會有人唔 VP”（其中“冇、唔、无”是否定词）等三重否定表肯定的用法，例如：

(6) 如果想报学琴，可以考虑 Crystal Chow,佢经验丰富，而且仲曾于外地考取音乐科硕士学位，……在琴行里，有人唔会唔识佢，大把入争住想跟佢。（网络语料，2019²¹）

(7) 去完韩味无穷，行完挥春街买嘢，就嚟到公正路行大笪地，讲起大笪地可以话喺佛山无人唔会唔知道嘅灯光夜市，从晚上六点半开市，一直到深夜 11 点……（网络语料，2019）

(8) 相信 70-90 年代亚洲电影界唔会冇人唔识佢！（网络语料，2019）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介语语料中，也有三重否定表肯定的用例，例如：

(9) 中国市场是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人不重视中国这个国家呢？（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例（9）中，反问结构“怎么可能……呢”以及否定词（组）“没有”“不”都含否定义，是个三重否定，如果按照逻辑来分析，这个句子表达的意思是“没有人重视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按语境上下文来看，这位汉语学习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却是“人们都很重视中国这个国家”。

以下是一个正常的三重否定表否定的例子，例如：

²¹ （6）-（8）中的 2019 指的是检索时间，作者当时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学，因此收集的一部分语料是通过谷歌搜索引擎获得的，原文使用了繁体字，本文引用时转成了简体字。

(10) 我不是不生气, 不是不会不开心, 只是觉得是小事情, 没必要把情绪摆到面上来。(网络语料)

例(10)中的画线句“不是不会不开心”的意思是“是会不开心”, 这是一个三重否定表否定的符合逻辑运算的用例。

例(1-9)中的三重否定表肯定的语言使用现象, 如果从逻辑和规定性语法的角度来看, 其中的一个否定词是羡余的, 这也是为什么本文称之为“超常”的原因。但是从基于描写和使用(usage-based)的语言观来看, 超语法、超常组合并不奇怪, 它们是语法和修辞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陈满华, 2015)。在世界语言中, 一个句子出现三个否定词的现象是较为少见的, 对它的分析和理解也会更复杂(刘丹青, 2017)。为什么汉语语言交际中会产生三重否定形式表达肯定的用法? 三重否定在结构类型上是否能够呈现出某种特点? 这背后有哪些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调查。文章具体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相关研究回顾、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结构类型及形成机制、三重否定超常构式产出的动因、余论。

二、研究回顾

2.1 关于否定的研究

在语法和语义分析中, 否定表示“对句子意义作部分或全部的反驳”(Crystal, 1997/2000: 237), 它反映的是矛盾或对立关系, 对于语义的理解作用十分重大(袁毓林, 2018: 141)。赵元任(1979: 348)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 就谈到汉语的否定问题: 汉语“一个短语或小句之中有两个否定词的时候, 互相抵消, 不是像俄法或法语那样互相支援”。俄语中的否定性无定代词(negative indefinite pronoun, 类似于英语中的nobody, nothing, nowhere等)总是和谓语的否定词共现(Haspelmath, 2013); 法语书面语中的“ne...pas”结构中, “ne”与“pas”表达的两个否定义不抵消, 而是进行联合否定(Horn, 1989/2001: 455), 也被作为否定协和(negative concord)的代表。否定协和指的是句内两个否定成分共现但不表达肯定义的现象(Horn, 2010)²²。以下是几则具体的语例(Horn, 2009: 406; Haspelmath, 2013; St-Amour, 2009:436)。

- (11) Nikto ne prišel. (俄语)
Nobody NEG came.
'Nobody came.' (Haspelmath, 2013)
'没有人来。'

- (12) Milan ne vidi nikoho. (捷克语)
Milan NEG.sees nobody

²² “否定协和”也称“否定一致”, 主要用于指与否定性无定代词(如no, nobody, nothing, none等)有关的一种否定现象, 即句子中有一个否定性无定代词, 但与句中另一个否定词在语义不互相抵消, 整个句子表示否定义。西班牙语被认为是较为典型的“否定协和”型语言。

‘Milan doesn’t see anybody’ (St-Amour, 2009: 436)

‘米兰没看到任何人。’

(13) Well, really, how can I **keep from not** worrying? (英语口语)

‘Well, really, how can I keep from worrying?’ (Horn, 2009: 406)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与否定协和相对的是遵循负负得正的双重否定, 不过这只是一种方便称呼的大致分类, 它和否定协和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自然语言不总是严格遵循这种分界, 两种类型的否定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或不同语体中, 如非洲裔美国人口语 (Labov, 1972: 785)、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的英语克里奥尔语 (Shnukal, 1988: 72)、南非荷兰语口语 (van der Wouden, 1997: 192)、德语方言 (Haspelmath, 1997: 205) 中存在否定协和现象。在有的语言中, 否定协和是标准语语法的一部分, 如匈牙利语、希腊语、罗马尼亚语和斯拉夫语等 (de Swart, 2010: 21)。

除了两个否定之间存在否定协和的现象之外, 语言中还存在着“三重否定迷惑” (Triplex negatio confundit) (Horn, 2009)。实际上, “三重否定迷惑”这类现象从根本上说还是涉及到否定协和的问题, 因为其中两个含否定义的词互相不抵消, 它们联合加强否定后, 再与最后一个否定进行抵消, 整个构式义表达肯定义。下面是英语口语中的两则三重否定表肯定的例子:

(14) There **isn’t** a man there who **doesn’t** think they **can’t** do it. (Horn, 2009: 408)

意译: 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们不能这么做。

(15) **No** head injury is **too** trivial **to be ignored**. (Wason & Reich, 1979)

意译: 不能因为头部创伤轻微就不重视

上述两则例子, 均含有三个表达否定意义的成分, 如例 (14) 中是“isn’t” “doesn’t” “can’t”, 例 (15) 中是“no” “too……to” “be ignored”, 其中“ignored”是一个隐性否定词²³。根据 Horn (2009: 408) 的分析, 英语母语者在阅读上述例句时, 并非按“负负负得负”的逻辑来进行否定理解, 而是作肯定理解。²⁴关于例 (15), Wason & Reich (1979) 曾调查过英语母语者的理解情况, 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倾向于认为“逻辑上错误”但“语用上合理”。也有研究者认为“No X is too Y to Z”表达肯定义的现象不能分析为逻辑不正确或者归因于加工错误, 它是一种结合了形式和意义的规约化了的否定构式, 具有特殊的修辞功能, 反而是它所对应的所谓正确表达, 如“No head injury is too trivial to pay attention to”无法实现同等修辞效果 (Fortuin, 2014: 249-250)。

以上关于世界语言中的两个或多个否定语义的研究表明自然语言中的否定表达的复杂性、多样性, 以及两个否定语义成分共现共同加强否定义这种现象分布的广泛性。世

²³ Horn (2009:407-408) 指出, 在英语口语中, 当其中一个否定义由本身具有否定意义的谓语动词如“surprised, avoid, deny, doubt”表达时, 三重否定表示肯定的倾向尤其普遍。

²⁴ 在此补充另一个实验结果: 对于英语否定性无定代词和谓语否定词共现的句子的解读, 研究者通过眼动实验发现英语母语人在阅读包含两个句法否定词的句子时, 会同时产生肯定和否定的解读, 并且当句子的宾语为否定形式时, 如“She didn’t answer nothing in that interview”, 被试更容易产生强化否定(否定协和)的解读 (Blanchette & Lukyanenko, 2019)。

界语言中关于否定表达的多样研究打破了语言否定一定会遵循逻辑否定这种假设。

汉语研究否定的文献也很丰富（如石毓智，1993；沈家煊，1994；袁毓林，2000、2018）。不过，汉语学界讨论较多的羡余否定²⁵大多不是指两个显性否定词之间彼此不抵消的情况，主要是指句中显性否定词（通常只有一个）删去不影响句子命题义的表达这种情况，如“差点儿没VP、好不VP、小心别VP、后悔没VP、在没有VP之前”。吕叔湘（1985）称这类否定现象为“否定作用的模糊化”。

有学者认为应当为上述所说的羡余否定确定一个研究范围，将“口误”和“笔误”排除在否定研究的范围之外，例如张谊生（2005：347）认为有些羡余否定式“似乎”（原文表述）接近于口误或笔误，不宜将这类情况纳入羡余否定的研究范围。张文举的例子是：

(16) 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戏没有教育意义吧。（张谊生，2005）

(17) 个别单位拒不执行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同上）

本文认为像例（16）和（17）这样的语言使用现象也是可以纳入研究范围的。描写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研究的目标不是评判和决定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语言，什么是正确的、合语法的结构，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合语法的结构（Leech et al., 2005；Lakoff, 1973；Newmeyer, 2003）；描写语法的研究兴趣在于发现语法在不同语境中以及不同目的驱使下实际上是如何被应用的（Hinke, 2018：1）。本文描写和分析超常规三重否定构式，目的是跳出正误判定的窠臼，将其置于一个更广的世界语言的图景中，结合人类交际、认知特点，来展示和分析否定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复杂现象。

实际上，并不是只有我们关注到三重否定超常构式。陈青（2018）也关注到了该现象，文中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语料，这些语料与我们自己搜集的语料形成本文的语料基础。陈文的研究既包括含有三个显性否定词的超常规三重否定，也包括含有一个隐性否定词两个显性否定词的情况，陈文还从语言主观性、认知隐含脱落、认知象似性等角度对超常规三重否定现象作出解释。不过，陈文主要是就汉语自身来进行分析，没有纳入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对超常规三重否定的分析视角比较局限。为了让研究对象相对聚焦，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含有三个显性否定词的重重否定表肯定的现象上。

2.2 句式整合²⁶

本文要研究的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形成机制是构式整合，因此这里要对学界以往关于句式整合的研究成果做一介绍。关于句式整合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一支是以沈家煊（2006）为代表，沈先生受到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Fauconnier & Turner, 1998、2000、2002）的启发，分析了汉语中的句子整合现象，沈文所说的“整合”强调的是概念或意义的整合；另外一支以叶建军（2010、2013、2014、2020）为代表，主要关注

²⁵ “羡余”（redundancy）“冗余”等词有“多余”之义，这是就逻辑的角度而言的，如果从语用效果的角度讲，多余的否定词又是有功用的，不过考虑“羡余”这个称呼的通行性，本文在转述汉语文献观点时还是会使用“羡余”一词。

²⁶ 本文将句式看作是构式的一种，构式的范围更大。在进行文献综述时，尽量延用文献中的表述。

的是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在形式上的整合，叶建军（2020）认为构式整合（原文称句式糅合）是汉语特殊句式的重要生成机制，叶文将“句式糅合”定义为“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 A 与 B，因某种语用目的主要通过删略重叠成分合并成一个新的句式 C 的过程或现象”。汉语句式糅合的现象有很多出现在六朝至近代的文献中，口语化程度高的文献越容易出现句式糅合现象（叶建军，2010：328）。

无论是上文所说的“句式糅合”还是本文所说的“构式整合”，名称不同所指现象基本相同，并且都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对此学者们已有一些论述，如江蓝生（2008：484、487）认为构式整合多发生于两个核心语义基本相同的构式之间。叶建军（2013）提出了句式糅合的三个基本原则——语义相近原则、时代先后原则和成分蕴含原则（或语义蕴含原则）。语义相近原则指的是“源句式 A 与 B 在语义上必须相同或相近”；时代先后原则指的是“语义相同或相近的源句式 A 与 B 必须先于糅合句式 C 而存在，或与糅合句式 C 同时存在”；成分蕴含原则指的是“糅合句式 C 必须蕴含源句式 A 与 B 的主要成分，甚至是全部成分”。

三、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结构类型及形成机制

3.1 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结构类型

基于本研究收集到的总计约 110 多个三重否定表肯定的用例，我们总结出两大类七小类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常见类型。

第一类是基于否定词“不”“没”形成的三重否定构式，具体小类和对应的用例如下：

A 类：没有[]类属名词不[]助动词/心理动词不[]动词谓语句

(18) 没有什么产品不会不过时，无论这种产品多么先进，多么拥有市场，都是临时的。（科技文献，BCC 语料库）

(19) 没有人不敢不给这攻下伊谢尔伦的勇士一点面子。（《银河英雄传说》，BCC 语料库）

B 类：[]类属名词没有不[]助动词/心理动词不[]动词谓语句

(20) 其实学生没有不想不好好学习的。谁都想门门功课考一百分，谁都想学习好出人头地，受人夸奖。只是摸不到学习的门径而已。（网络语料）

C 类：不[]助动词/心理动词没有[]类属名词不[]动词谓语句

(21) 刘德华，这个闪耀的名字，相信不会没有人不认识吧!!!（网络语料）

(22) 在哪个天涯海角举行婚礼，只要他肯请，不愁没有人会不来。（同上）

D 类：不是不[]助动词/心理动词不[]动词谓语句

(23) 顾衣轻笑了一声，“我知道，你们跟着我在端居未必是最好的出路，若是你们二人想要寻个别的出路，我又不是不会不放人。”（网络语料）

第二类是基于具有文言色彩的否定词“无”“非”以及普通否定词“不”形成的三重否定，具体小类如下：

E 类：并非不是不[]动词谓语句

(24) 另外，麦克梅纳明还强调，科比现在并非不是不想打得更加团队一些，如果他能

够实现得分超越乔丹这一壮举，那么他将马上回归团队篮球的表现。（《重庆晨报》）

F 类：不是不无[]抽象名词

(25) 雷德立克之所以相信打倒巨人就等于打倒了威诺，看来也不是不无道理。（《罗德岛战记》，CCL 语料库）

G 类：并非不无[]抽象名词

(26) 倘若生逢其时，他被拥立登基为王也并非不无可能。（雪乃纱衣《彩云国物语》）

至此，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式再次归纳出前文所列举的七种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结构类型，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基于显性的否定词形成的。



图1 显性三重否定的结构类型

上述三重否定的高频组合模式可从结构层级与命题辖域两个维度解析：其一，在句法线性序列中，第二与第三否定词（N2 和 N3）通过两种方式构建紧密的双重否定单元——或于否定词间嵌入情态助动词（如“会、能”）及心理动词（如“敢、想”），形成“否定词+[情态助动词/心理动词]+否定词”的嵌套式框架（如“不敢不”“不能不”），或由第二、三否定词（N2 和 N3）直接词汇化为固定结构（如“不无”），该双重否定单元进一步受首位否定词（N1，如“没有”“并非”）统辖，构成“N1+(N2+N3+X)”的三重否定。其二，在语义辖域层面，首位否定组合（如“没有”“不是”“并非”及“不会”）具备高层否定功能，通过将内嵌的双重否定结构整体纳入其否定辖域，形成三重否定。

超常规三重否定内部的否定成分之间的语义关联并非严格遵循线性序列或单一逻辑层级，而是受语境驱动与交际意图调控，允许否定在句法表层灵活组合。具体而言，三个否定词（N1、N2、N3）可以形成不同层级的否定关联：（1）N1 与 N2 优先绑定：首位否定词 N1 可与紧邻的 N2 组合，构成双重否定单元（如“并非不无可能”中，“并非”可以与“不可能”组合，整体表“有可能”）；（2）N1 与 N3 跨层关联：N1 亦可绕过 N2，直接与 N3 形成语义呼应（如“并非不无可能”中，“并非”可解读为对“不可能”的否定，组合后整体等价于“有可能”）；（3）N2 与 N3 关联：N2 与 N3 也可组合构成双重否定（如

“不无可能” $\approx$ “有可能”）。

上述特征表明，三重否定并非简单的线性否定叠加，而是由不同层级的否定成分构成的复杂整合。

三重否定也可以基于一些显性否定词和隐性否定词（如“防止、杜绝、制止、避免、否认、后悔”等）的组配而形成，如例（27）（28）所示。

(27) 早晨，有个什么人邀请阿尔卡季·伊凡诺维奇喝茶，他无法拒绝不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脆弱的心》）

(28) 最后的结局不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并不否认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例。有，但却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么多，那么强烈……（裘小龙《心理分析学派试探》）

不过，为了研究的聚焦性，本文目前只重点分析基于三个显性否定词而产生的三重否定表肯定的现象。

3.2 三重否定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认为三重否定超常构式是一种多源构式（multiple source construction）（Van de Velde et al., 2013），它是由两个不同的双重否定构式经过句法整合（syntactic blends）而成的，它符合叶建军（2013）提出的构式整合的三个基本原则：首先，三重否定句所对应的两个源构式的语义是相近的。以三重否定超常构式“没有 NP 不会不 VP”的形成为例。从逻辑上讲，被整合的构式之一“没有 NP 不 VP”是否定存在构式，另一个被整合的构式“NP 不会不 VP”是类指构式，两者都表示全称肯定，逻辑恒等。但是二者又有细微的差异，例如：否定存在构式“没有女孩子会不喜欢他”的语义逻辑是：在由语境限定的“所有女孩子”形成的集合中，不存在一个这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可以归入由具有“会不喜欢他”这种属性的元素构成的集合中。而类指构式“女孩子不会不喜欢他”的语义逻辑是：在由语境限定的“所有女孩子”形成的集合中，全体元素毫无例外地都不可以归入由具有“不会喜欢他”这种属性的元素构成的集合中，也就是说所有的女孩子都会喜欢他。因此，“没有 NP 不 VP”与“NP 不会不 VP”具有一致的核心语义，这是二者进行构式整合的基础之一。其次，在共时层面，“没有 NP 不 VP”和“NP 不会不 VP”的出现早于三重否定超常构式“没有 NP 不会不 VP”；最后，三重否定超常构式“没有 NP 不会不 VP”蕴含了源构式“没有 NP 不 VP”和“NP 不会不 VP”的全部部分。

在同义构式整合的过程中，会发生重复项归并的“噬同”现象（沈家煊，2006），即把两个相同的重复成分进行归并。用 Coppock（2010）的话说，就是位于平行句法位置上的两个源构式中的成分在句法整合时会形成竞争，最终保留一个。以双重否定句“没有女孩子不喜欢他”和“女孩子不会不喜欢他”为例，在构式整合过程中，“女孩子”以及“不喜欢他”分别发生归并（连线所示），保留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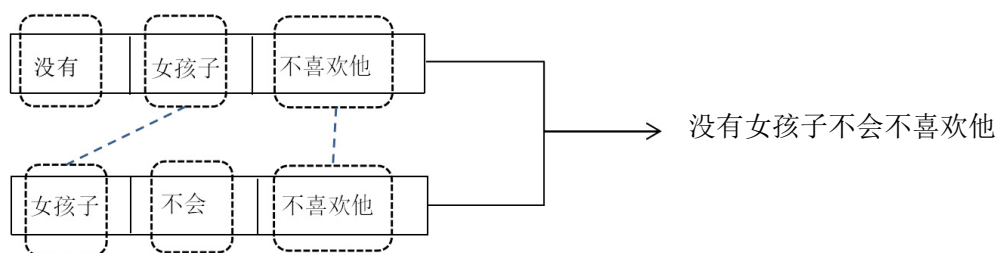


图 2 构式整合过程示意图²⁷

下面表 1 中，最右侧的三重否定超常构式，它是由左侧的双重否定构式 1 和双重否定构式 2 整合形成的。

表 1 双重否定句糅合而成的三重否定句

双重否定构式 1		双重否定构式 2		三重否定构式
没有人不犯错误	+	人不会不犯错误	→	没有人不会不犯错误
学生没有不想好好学习的	+	学生不想不好好学习	→	学生没有不想不好好学习的
不会有人不知道	+	没有人不知道	→	不会没有人不知道
我又不是不放人	+	我又不会不放人	→	我又不是不会不放人
并非不想打得更加团队一些	+	不是不想打得更加团队一些	→	并非不是不想打得更加团队一些
不是无道理	+	不无道理	→	不是不无道理
并非无道理 ²⁸	+	不无道理	→	并非不无道理

如何确定一个三重否定构式的源构式究竟是哪几个？下面将结合具体例子来阐述。本研究将三重否定超常构式“没有 NP 不会不 VP”的来源构式拟定为“没有 NP 不 VP”与“NP 不会不 VP”的整合，而没有选择与“没有 NP 不 VP”形成竞争关系的双重否定构式“没有 NP 不会 VP”“没有 NP 会不 VP”来作为源构式之一。理论上，“没有 NP 不 VP”“没有 NP 不会 VP”“没有 NP 会不 VP”这些近乎同义的双重否定构式都有可能是“没有 NP 不会不 VP”的源构式，但是考虑到“没有 NP 不 VP”在语料库中的使用频次是最高的（详见表 2、表 3²⁹），我们会更倾向于将“没有 NP 不 VP”看作是源构式之一。其余的一个源构式“NP 不会不 VP”是确定的，没有其他构式与其形成竞争关系。

²⁷ 该图的绘制受 De Smet（2013）的启发。

²⁸ 在现代汉语中，“并非无 NP”与“并非没有 NP”都有使用语例，如“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并非无计划”“但这种模式并非无后顾之忧”“美国经济向借贷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并非没有争议”。

²⁹ 语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统计时已经剔除掉非目标语料，如表示让步条件关系的“没有爱情不会死人的”，因为这不是我们要研究的“没有 NP 不会 VP”。此外，这些数据反映的语料是下载量限制条件为 1000 时的使用频次倾向性。

表 2 以“没有 NP”为首的三种双重否定表达式的出现频次³⁰

表达式	文学	报刊	多领域	微博	科技	篇章
没有 NP 不 VP	112	291	470	400	150	0
没有 NP 会不 VP	6	6	80	55	9	0
没有 NP 不会 VP	0	3	16	17	0	0

表 3 以“没有人”为首的三种双重否定表达式的出现频次

表达式	文学	报刊	多领域	微博	科技	篇章
没有人不 VP	75	174	467	262	102	0
没有人会不 VP	3	1	55	47	5	0
没有人不会 VP	0	2	14	16	0	0

四、三重否定超常构式产出的动因

三重否定超常构式形成的语言基础是存在两种音近、形近、义近的双重否定构式，除此之外，它们的形成还受到如下交际、认知以及言语产出方面的动因驱使：

4.1 传递极性义和强烈情感

重复是一种增强和凸显语义强度的手段（Jespersen, 1924/2010；Martin, 2008）。Jespersen（1924/2010：518-519）曾指出强化语义和情感的动因对于反复使用否定的重要影响：

“在强烈的感情影响下，说话者想要绝对保证否定的意义得到充分理解，因此，他不仅把否定词加在动词上，而且加在句中任何易于构成否定的成分上：事实上他给整个句子蒙上了一层否定色彩而不是把否定局限在一个地方。”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Martin(2008)在论述人际意义时，也表达了与 Jespersen(1924/2010)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否定协和的语义效果是将极性（polarity）意义传递到它所管辖的整个小句上，例如（29）中反复出现的“no”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29) If you don’t get **no** publicity you don’t get **no** people at the fight, ...If you don’t get **no** bums on seats you don’t get paid . . . Anyway I enjoy it. (Martin 2008)

相较于常规的双重否定构式，三重否定超常构式通过将两个双重否定整合，也具有在整个句子中加强传递双重否定所表达的主观肯定极性义的效果。

4.2 音形义相近构式的联想和激活扩散

不少关于词语或句法整合（syntactic blends）的研究发现，语音或概念相似的词语或句法会在使用者的大脑中形成联想关系（Carl, 1998；Baars et al., 1980；Coppock, 2010），或者用认知心理实验的描述就是，当一个词语出现在被试大脑中时，另一个语音或概念

³⁰ 数据统计时间为 2019 年。

相关的词语也更容易会激活，这就是语义加工的扩散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理论，例如 slick/slippy→slickery（Collins & Loftus, 1975; Dell, 1986; Hudson, 1984、2010）。在构式整合中，句法相似性和语义相似性都会加强整合。本文所讨论的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源构式无论从形式上、语音上，还是语义上的相似性都很高，它们之间很容易形成联想关系，在言者大脑中浮现源构式 A 后，又叠加整合进去源构式 B，最终形成三重否定表达肯定的超常否定构式。

4.3 话语的时间性特征为话语的创新提供空间

话语是在时间流中渐进展开，具有时间性（temporality）特征（Hopper 2012; 陆镜光，2020），说话者需要在已说出的话语的基础上一点一点或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在其后增添新的成分。话语的前端总是有可能受到后边所增添部分的影响，后增添部分可能会将一个原来预测（projected）出现的构式 A，在 B 的作用下转化至一个新的构式 C。就本文的研究的三重否定如“没有女孩子不会不喜欢他”而言，言者本来要产出构式 A “没有女孩子不喜欢他”，但是由于在“女孩子”的后边加入的是“不会”，句子最终转化至一个超常规三重否定“没有女孩子不会不喜欢他”。这也显示，语言结构自身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它们会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历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Hopper, 2012: 301）。从浮现语法的视角来看，说话者在产出话语时要参考自己和其他说话者以前在类似环境下经常反复使用的语言结构，但是说话者产出这些语言结构时，与标准语法推导出来的语言结构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说话者在构建话语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创新空间，可以使用不同的旧有表达式进行创造性的组合（Hopper, 2011、2012）。语言的创新用法涉及语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语言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人们在使用它进行交际时必须受到这种规范力量的制约；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一种交际工具，每个个体在具体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又会带入一些个人创新的成分。

总之，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形成动因涉及多个方面：（1）人际互动方面，说话者试图在整个句子上传递极性义和强烈情感；（2）认知加工方面，音近、形近、义近构式容易产生联想和激活扩散现象，为构式整合提供可能；（3）言语产出方面，话语的时间性特征从根本上为话语的创新提供了空间。

五、余论

语言中的一些创新用法在一段时间或很长时间内是被归入语误的范围内。个体对语误的态度与其对语言的敏感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描述一种语言的实际使用状况时，一种用法是否存在要以实际的语言使用状况为准。而实际语言使用情况要比人们认为的灵活得多，甚至一些时候人们都意识不到某种变异说法的存在，Lambrecht（1988）、陈琦（2018）以及 Nakayama & Horiuchi（2021）分别记录了英

语、德语、日语中的此类现象。³¹ 对于三重否定构式的接受度，如果只是参考当前已有的汉语语料库，如 CCL 语料库、BCC 语料库等，那么必然会基于它极低的使用频率而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种不符合语法规则的用法，不值得研究。但是正如 Rissanen (2012: 313) 所指出的那样，数字语料库也是经过选择的，它们只能代表语言现实的一部分。

有研究表明，否定句比肯定句更有标记性 (markedness)，加工的难度更大 (参见 Horn, 1989/2001: 第三章)。当否定词或者含有否定意义的隐性否定词的数量过多时，听者 (读者) 更容易模糊对句子中否定项数量的记忆追踪。对于听者而言，当否定词的数量过多时，听者更容易对句子的整体意义进行把握，而对句子中的组成部分——否定词——的数量感知便不那么敏感。这也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完形心理学的实验证明，人们对整体的感知比对组成成分的感知来得更容易 (参见沈家煊, 2011)，这也被称作“知觉的整体性”，在该知觉现象下，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 (胡珊, 2012)。知觉的整体性也会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在它的抑制下，有时人们会忽略个别成分和细节特征。在听到或读到一个三重否定超常构式后，听者会倾向于结合上下文语境去把握句子的整体意义，而不是去根据逻辑去计算句子中的否定词的数量。

否定表达的跨语言分布特征显示出人类在表达否定的策略上有不少差异，但是在否定的理解上也有不少相似性。虽然，不同的语言最终选择了双重否定 (表肯定) 或否定协和类型 (粗略分类) 中的其中一种策略作为该语言无标记的解读方式，但是在各自的方言或者变体中，依旧会出现另一种理解策略。例如在双重否定型语言中，否定协和结构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它们仍旧分散于非正式的口语中。

正如 Jespersen (1924/2010: 515-516) 所言，语言不是数学，自然语言中的否定不完全等同于逻辑否定，在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看来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也可能会面临挑战。逻辑也并不是先于话语，互动交际才是第一位的 (Hopper, 1987, 2012)。三重否定表肯定的超常规语言使用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可以看出其有较为常见的几种结构类型，形成过程及动因都深受交际、认知以及言语产出规律的影响。三重否定超常构式的理解也并非线性的，对其的肯定解读代表了一部分汉语母语者在处理三重否定时的一种特殊加工方式。听话者在互动中主动重组否定层级，将三重否定视为语境制约下的特殊强调手段而非逻辑悖论。这种加工过程呼应了 LaPolla 教授所主张的“意义创造”论——人们“交流的根本不是语言结构，而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在进行交流活动时的互动” (LaPolla, 2015)，意义创造的本质是语境驱动的主观整合，而非

³¹ Lambrecht (1988) 曾研究过美国人口语里使用的一种结构 [NP V NP] [VP]，如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I have one of my uncles was an engineer and he told me...”。当他采访一些大学教授、语言学家时，对方均强调自己从来不这么说，或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句子，或认为这样的句子无法理解。但是当作者记录其中一位教授的谈话时，该教授 15 分钟内就使用了 2 次该结构。在德语书面语中被视为语法错误的由多个动词不定式词干构成的“紧密构式” (德语原文为 *Dichte Konstruktion*) 却出现在叙述类、描述类会话中 (参见陈琦, 2018: 27)。在日语中，一向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在话语起始位置的“wa” (话题标记) 近来却被发现可以出现在应答语 (提问-应答) 的起始位置，用以表达感叹的功能 (Nakayama & Horiuchi, 2021)。以上来自英语、德语、日语的例子皆表明，一些被视为口误的用法，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

形式符号的客观解码 (LaPolla, 2021)。

附记：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罗仁地教授和杨旭副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在此鸣谢！

参考文献

- 陈 琦 (2018)《德语互动语言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 陈 青 (2018) 羡余化三重否定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陈满华 (2015) 合语法、不合语法及超语法——“合语法性”问题的构式主义阐释，《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胡 珊 (2012)《视听心理学》，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
- 江蓝生 (2008) 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中国语文》第 6 期。
- 刘丹青编著 (2017)《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 2 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陆镜光 (2020) 会话分析和汉语话语研究——新方法、新语料、新发现，方梅、李先银主编《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三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85) 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第 4 期。
- 沈家煊 (1994) “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和语用解释，《中国语文》第 4 期。
- 沈家煊 (2006) 糅合和截搭，《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沈家煊 (2011)《语法六讲》，北京：商务印书馆。
- 石毓智 (1993) “对差点儿类”羡余否定句式的分化，《汉语学习》第 4 期。
- 叶建军 (2010)《〈祖堂集〉疑问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叶建军 (2013) “X 胜似 Y”的来源、“胜似”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语言科学》第 3 期。
- 叶建军 (2014) 从相关句式看“拒不 V 双”的来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叶建军 (2020) 句式糅合的界定、研究现状及句式糅合说的解释力，《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袁毓林 (2000) 论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中国语文》第 2 期。
- 袁毓林 (2018)《汉语否定表达的认知研究和逻辑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谊生 (2005) 羡余否定的类别、成因与功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79)《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Baars, Bernard J., Hans W. Dechert & Manfred Raupach (1980) The competing plans hypothesis: An heuristic viewpoint on the causes of errors in speech. In Dechert, Hans W., Manfred Raupach, & Frieda Goldman Eisler (Eds.) *Temporal variables in speech*, 39-50.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Blanchette, Frances & Cynthia Lukyanenko (2019) Unacceptable grammars? An eye-tracking

- study of English negative concord.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1(1): 1-40.
- Carl James (1998) *Error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use: Exploring error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Collins, Alan M. & Elizabeth F. Loftus (1975)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2(6): 407-428.
- Coppock, Elizabeth (2010) Parallel grammatical encoding in sentence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syntactic blend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5(1): 38-49.
- Crystal, David (1997)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4th edn., Blackwell. 沈家煊译, 《现代语言学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De Smet, Hendrik (2013) Change through recombination: Blending and analogy. *Language Sciences* 40: 80-94.
- De Swart, Henriette (2010)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egation: An OT typology*.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Dell, Gary S. (1986)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retrieval in sentence produ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3(3): 283-321.
-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1998)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Cognitive Science* 22(2): 133-187.
-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2000) Compression and global insight.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3/4): 283-304.
- Fauconnier, Gilles, & Mark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Fortuin, Egbert (2014) Deconstructing a verbal illusion: The 'No X is too Y to Z' construc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neg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5(2): 249-292.
- Haspelmath, Martin (2013) Negative indefinite pronouns and predicate negation. In Dryer, Matthew S. & Haspelmath, Martin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wals.info/chapter/115>, Accessed on 2021-12-25.)
- Haspelmath, Martin (1997) *Indefinite pronou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nke, Eli (2018) Descriptive versus prescriptive grammar. In Liontas John I. (ed.) *The TESOL encyclopedia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1st edn, 1-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Hopper, Paul J. (1987) Emergent grammar.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 139-157.
- Hopper, Paul J. (2011). Emergent grammar and temporality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In Auer, Peter & Stephan Pfäder (eds.), *Constructions: Emerging and emergent*, 22-4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opper, Paul J. (2012) Emergent grammar. In Gee, J., & Handford, M.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1st edn, 301-314. London: Routledge.

- Horn, Laurence R. (1989)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so Horn, Laurence R.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1.
- Horn, Laurence R. (2009) Hypernegation, hyponegation, and parole violations.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35(1): 403-423.
- Horn, Laurence R. (2010) Multiple negation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In Horn, Laurence R. (ed.), *The expression of negation*, 111-148.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Hudson, Richard A. (1984) *Word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 Hudson, Richard A.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wor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espersen, Ott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st ed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叶斯柏森《语法哲学》，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Labov, William (1972) Negative attraction and negative concord in English grammar. *Language* 48(4): 773-818.
- Lakoff, George (1973) Fuzzy grammar and the performance/competence terminology gam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9:271-291.
- Lambrecht, Knud (1988)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Syntactic amalgams revisite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4): 319-339.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33-4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杨旭译，语言结构与文化、认知的逻辑必然联系，
<https://mp.weixin.qq.com/s/SUqUFW8InuW1Atgania9dg>.
- LaPolla, Randy J. (2021, May 21)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意义的创造] [Lecture]. University of Sydney.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B4y1T7Qa>.
- Leech, Geoffrey, Margaret Deuchar, & Robert Hoogenraad (2005) *English grammar for today: A new introduction*,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 Martin, J. R. (2008) What kind of structure? Interpersonal meaning and prosodic realization across strata. *WORD: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59(1-2): 111-139.
- Nakayama, Toshihide & Fumino, Horiuchi (2021) Demystify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ucturally marginal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the wa-initiated responsive construction in Japanese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72: 215-224.
- Newmeyer, Frederick J. (2003) Grammar is grammar and usage is usage. *Language* 79(4): 682-707.
- Rissanen, Matti (2012) Corpora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nglish. In Merja Kytö (ed.),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Crossing paths*, 197-220. Amsterdam: Rodopi.
- Shnukal, Anna (1988) *Brok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eole language of Torres Strait*. Canberr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St-Amour, Michelle (2009) Focused n-words and double negation readings in negative concord languages. In Iksoo Kwon, Hannah Pritchett, & Justin Spenc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36-446. Berkeley: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Van de Velde, Freek, Hendrik, De Smet, & Lobke, Ghesquière (2013) On multiple source constructions in language change. *Studies in Language* 37(3): 473-489.
- Van der Wouden, Tom (1997) *Negative contexts: Collocation, polarity and multiple negation*. London: Routledge.
- Wason, Peter C. & Shuli S. Reich (1979) A verbal illu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1: 591-597

Non-canonical Triple Negation in Modern Chinese: Formation Mechanisms, Typology, and Motivations

Shushu 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hinese, the use of double negation to express affirmation constitutes an unmarked negation strategy, while linguistic practice reveals a marked negation usage—triple negation for affirma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typological findings from other languages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is non-canonical negation strategy from cognitive processing,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and speech production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triple negation construction arises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wo double negation structures that share high similarity in phonology, form, and semantics. From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perspective, the layering of neg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processing load. However, driven by perceptual gestalt principles, listeners prioritize extracting contextualized holistic meanings over precisely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negation operators. This “principle of gestalt meaning prioritization” leads to the reanalysis of triple negation constructions as pragmatic intensifiers in actual communication. Their interpretation aligns with LaPolla’s (2015, 2021) “Meaning Creation Theory,” which posits that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s fundamentally a context-driven dynamic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a static decoding of formal symbols.

8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and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

WANG Fe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ound corresponde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Determining sound correspondence involv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historical divergence, language contact, and accidental resemblance. From a probabilistic perspective, identifying sound correspondences must first account for the interference of chance similarities. By reviewing previous research of tonal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ao-Yao based on experience and incorporating the probabilistic calculation of tone comparison across Yao languag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obability-based algorithm grounded in actual distributions to assist in evaluating accidental correspondenc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probabilistic foundation for sound correspondence identification. Some mathematic tools or convenient software are expected to develop to evaluate the relevant probability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under the guid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1. Introduction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speech of William Jones (1786) 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He said: “The Sanskrit language, whatever be its antiquity, is of a wonderful structure; more perfect than the Greek, more copious than the Latin, and more exquisitely refined than either, yet bearing to both of them **a stronger affinity**, both in the roots of verbs and in the forms of grammar, than 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produced by accident**; **so strong** indeed, that no philologist could examine them all three, without believing them to have 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 which, perhaps, no longer exists: there is a similar reason, though not quite so forcible, for supposing that both the Gothick and Celtick, though blended with a very different idiom, had the **same origin** with the Sanskrit, and the old Persian might be added to the **same family**...[Emphasis added]”. (Cannon 1991:31) However, the claim of “some common source” or “the same origin” for Sanskrit, Greek, Latin, Gothick, Celtick, and Persian,

Wang, Feng. 2025.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and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 In Chenglong Huang, Xu Yang (eds.) :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Randy J. LaPolla*, pp. 136–143.

is purely based on William Jones' experience or belief, which helped him to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accident.

Afte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was first put forward by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in his 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³², that is, there is no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gnal and its meaning. Thanks to this presupposition, Antonine Meillet (1866-1936) explicate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his cornerstone book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therwise, if a sound has a nature connect with its meaning, all languages would be related. In this book, numerals in languages like French, Italian, Spanish and etc., are listed as examples to show the non-arbitrariness across these languages. The key point is to find the so-called sou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se languages. For instance, the pattern of *ui* (French *huit*)-*o* (Italian *otto*)-*o* (Spanish *ocho*) detected in the numeral eight is repeated in some other words like *night*, *cook*, *milk*, and *fact*. According to Meillet, Such pattern could not be due to accident, and suggests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s. The reason why sound correspondence could not be resulted in by chance has not been discussed in Meillet (1926).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and the followed procedure of reconstruction seems to support such judgement. The complex inflections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 were taken as strong evidence for their common ancestral language, whereas lack of such morphological phenomena in Asian languages like Chinese, Vietnamese, and etc. may be a huge handicap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proto-languages.

In spite of Meillet's alarm, the Sino-Tibetan hypothesis has been proposed. The detailed history may be refereed to van Driem (2001).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posal in China could be attributed to Li (1937). The late professor Li Fang-Kuei put Chinese, Kam-Tai, Miao-Yao and Tibeto-Burman into a language family named Indo-Chinese. This paper was reprinted in the inaugural issue of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ith only some minor modifications in 1973. The editor added the note: "A condensed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first appeared in Chinese Year book, Shanghai, 1937. Since that time,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reference on this subject. Although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brought us a more refi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 dialects, Li's broad outline remains essentially accurate and useful." Three characteristics, namely, tendency towards monosyllabism, tendency to develop a tonal system, and unvoicing of the original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are taken as major evidence, aside from "many items in the lexicon which are shared in common in this family". However, this argumentation was criticized as thes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seen as typological similarity rather than genetic resemblance.

32 The content was compiled a famous book,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and published in 1916.

Interestingly, Baxter (2002) examined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found that “the technique of using regular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among genetically related languages to reconstruct aspects of the phonology, lexicon, and morphology of their common ancestor” as the standard metho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 quite recent. Following Nichols (1996), LaPolla (2012) agreed to consider the evidence employed for genetic relatedness probabilistically, which would better to be “whole systems or subsystems with a good deal of internal paradigmaticity, ideally multiple paradigmaticity, and involving not only categories but particular shared markers for them” (Nichols 1996:48). As it was well known, most Sino-Tibetan languages are monosyllabic morphology-poor, so that such standard is very difficult, though not impossible. LaPolla (2012) suggests to look for “particular elements (words and/or morphological markers) to be organized into paradigm-like sets and applied rigorously to determine relatedness. That is, the sets are treated as if they were paradigms and used as individual-identifying evidence of relatedness, because the particular combination of independent elements as an internally-structured set would give us the level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e need.” Notably, such proposal i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 however, the actual probabilistic calculation has not been conducted. Maybe, it is still experience-based.

2. Probabilistic calculation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Looking into the term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again. It may b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If one set of words shared one sound X in language a,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ared one sound Y in language b, then “X” and “Y” are sound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language a and language b. In fact, sound correspondence indicates a recurrent pattern, not necessarily with phonetic similarity. Thus, at least two examples are needed to support a sound corresponde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iven words (indicating a constraint of particular meaning), sound correspondence suggests a non-arbitrary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se words, and it must be due to some reasons. Excluding onomatopoeic words and a few words with sound symbolism, the reason can be attributed to language relatedness. However, chance resemblance may cause the problem. For instance, is the sound correspondence sp- < > ph-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the following table due to genetical relatedness or chance resemblance? (Examples are quoted from Prof. Chen Baoya’s course.)

English	Chinese
split	劈[phi]
spill	泼[pho]
spread	铺[phu]

Here, maybe three examples are not enough. “Are 500 enough, then? And if not, are 501 sufficient? Nobody can give a satisfactory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And this is no doubt the reason that linguistics may disagree over whether a particular proposed genetic relationship is sufficiently supported or not.” (Hock and Joseph 1996:493) The problem cries out for a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

A null hypothesis should be made before the probabilistic calculation. In this case, it would be postulated that sou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wo languages without genetical relationship could be generated. As far as we know, the number of phonemes in a particular language is quite limited. For Mandarin Chinese, a syllable can be divided into initial, final, and tones. There are 22 initials, 35 finals and 4 tones, but actual syllables in use are 1298 at most. (Su and Lin, 2006) Therefore, if the number of morphemes or words in the comparative work are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syllables, the chance resemblance would be unavoidable. However, the probability of chance resemblance could be evaluated, and the threshold for the sound correspondence not due to chance could be calculated then.

3. A case study of Miao-Yao tonal correspondences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ton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Miao-Yao languages are illuminating. The eight tones in Proto-Miao-Yao were reconstructed in Chang (1947). Records of 6 Miao-Yao dialects were selected as the basis, and 8 sets of tonal correspondences were detected. Each set was supported by several examples, three at least or nine at most, as follows.

Tone	examples	Notes
1	water, two, three, five, four, deep, snake, monkey	Lack ‘monkey’ in Yongcong
2	flower, leaf, door, nine	
3	full, fruit, house, tail, long, dog, road, bone, blood	
4	fish, fire, village	Lack ‘village’ in Yongcong
5	name, moon, iron	
6	die, eye, rain, bird	Lack ‘rain’ ‘bird’ in Yongcong
7	wing, smile, to drink	
8	see, tongue, bean, ten, eight	

It is notable that several words (called characters in this paper) do not fit any of these 8 sets, though they look quite similar across these dialects as follows. (Chang 1947:101)

		高	廣	荔	永	榕	台	貞
‘落’	1.	poŋ˥	paau˥	paui˥				
	2.				pa˥	pa˥	paɪ˥	
‘穿’	3.	ŋaŋ˥	ŋoŋ˥	ŋɛ˥				
	4.			nan˥	nɛŋ˥	naŋ˥	ne˥	
‘地’	5.	loŋ˥	lau˥	lou˥				
	6.				lɛ˥	la˥	la˥	

Since each tonal pattern of them could not be supported by one more example, these examples were regarded as exceptions.

Another way to view this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experience is to check whether a priori assumption may have made. As is well known, the four tones in Middle Chinese split into eight based on voicing of the initials. Based on the eight tones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voiced or voiceless initials, the earlier four tones were further reconstructed for Proto-Miao-Yao. In other words, the develop of tonal system of Miao-Yao languages seems to be a parallel of Chinese. Anyway, as LaPolla (2012:120) suggested: “The solution to thes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s to be aware of the 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and be aware of how assumptions can influence our interpretations, and try to work as inductively as possible, and make explicit arguments for all generalizations and assumptions.”

We did an experiment of Miao-Yao tonal comparison. From a vocabulary collection of Miao-Yao languages, which was edi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of Miao-Yao languages 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 (Chuan-qian-dian) Miao language and a Yao (Mien) language were selected. Their morphemes are not equivalent. Among 1443 Miao morphemes and 1593 Yao morphem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tones is listed as follows.

Tone	Miao	Yao
1	251	335
2	142	252
3	194	214
4	130	85
5	256	276
6	186	169
7	150	176
8	134	86

To evaluate the probability of a set of tonal match under such an uneven distribution, an algorithm has been proposed in Wang and Zhang (2021). Once the collection of morphemes of two languages under comparison is given, it is possible to quickly calculate the upper bound of a set of matched random distributions under a given confidence level using a Matlab program.

The probability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are as follows: Assume there are N matches in total, the two languages have m and n Tone 1, respectively, so if these matches are randomly scrambled, the resulting number X of 1$\diamond>1$ is a random variable following the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H(m,n,N), whose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formula:

$$P(X = k) = \frac{C_m^k C_{N-m}^{n-k}}{C_N^n}$$

A software application can be employed to derive a unidirectional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aforementioned hypergeometric distribution, which can then be compared with the figure corresponding to a 1$\diamond>1$ correspondence obtained via semantic match.

	Correspondence	Examples	95%	99%	99.9%
1	1$\diamond>1$	109	66	71	75
2	3$\diamond>3$	61	35	38	42
3	7$\diamond>7$	34	22	24	28
4	5$\diamond>5$	72	56	60	64
5	2$\diamond>2$	53	28	31	34
6	4$\diamond>4$	20	12	15	17
7	8$\diamond>8$	20	12	14	16
8	8$\diamond>6$	32	22	25	28
9	6$\diamond>6$	30	27	30	33

With different confidence levels, the tone matching that reaches the upper limit fluctuates. The first eight matches are robust. However, set 9 (6$\diamond>6$) exceeds the upper limit of 95%, equals the upper limit of 99%, and falls below the upper limit of 99.9%. The eight-tone system of Miao-Yao languages based on sound correspond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unchangeable theory since it was first established by Chang Kun (1947). According to the table abov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6$\diamond>6$-tone correspondence has developed to the edge of randomiz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eparation time of the Miao language and the Yao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peed, the earliest randomization and the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that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probability calculation is this correspondenc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matching of 8$\diamond>6$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attention, because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traditional eight-tone system of Miao-Yao. However, this problem is not difficult to explain, because the nine sets of matches are calculated at a 95% confidence level and are non-random matches, that is,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sound correspondences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us may be caused by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or language contact. Instead of explain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8$\diamond>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plit, it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te

language contact. It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fter split, but more likely it is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fter split with the other language, for example, Chinese. Nevertheless, in any case, given the same probability evidence, the match of $8 \triangleright 6$ should be treated like any other sound correspondence.

If we adhere to the most rigorous probabilistic assessment (excluding random matches), with 99.9% as the standard, we must pay some price that some sound correspondences (e.g., tone correspondence $6 \triangleright 6$) due to language split are not recognized. In this sense, strict requirement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can ensure the stable foundation of reconstruc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but at the cost of recognition. The significant probability can only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is not accidental, and the cause may be genetic relationship, contact, or a mixture of the two. Therefore, other criteria are needed to distinguish the properties of these non-random corresponding results.

4.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volution, if two related languages diverge from a single ancestor, their earlier phonological matches and supporting examples gradually show a random matching state with the respective replacement of common words. When the two languages differentiate for a long time, the non-random state of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will eventually collapse. In this spirit, rethinking the position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in historical comparison, it is indeed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any other steps. The question is how to define it and how to make use it properly. The experience has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compariso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other languages, through about two hundred years. Based on this experience, some mathematic tools or convenient software are expected to develop to evaluate the relevant probability of sound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oming of AI era, this hope may come true in the near future.

Acknowledgement: This research was funded by a grant from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No. 22JJD740002).

References

- 苏新春、林进展 2006 普通话音节数及载字量的统计分析——基于《现代汉语词典》注音材料[J]. 中国语文, 2006(3):274-284.
- 汪锋、张原 2021 一种评估偶然对应的概率算法——以瑶语声调比较为例. 载汪锋、宋作艳、

- 李子鹤（主编）《理论照亮材料》.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1-29.
- 张琨 1947 苗瑶语声调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93-110.
-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编 1987《苗瑶语方言词汇集》.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Baxter, W. H. 2002. 'Where doe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come from?', in Cavoto, F. (ed.), *The linguist's linguist: A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honour of Alexis Manaster Ramer*. Munich: Lincom Europa, pp. 33–52.
- Cannon, G. 1991. Jones's "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 1786-1986. Pp.23-47 in *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Language*. S.M.Lamb and E.D.Mitchell, ed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riem, George. 2001.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an ethnolinguistic handbook*. Leiden; New York; Koln: Brill.
- Hock, H.H. & B.D. Joseph, 1996. *Language History,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Polla, Randy. 2012. Comments on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1:117-132.
- Li, Fang-Kuei. 1937.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Chinese Year Book*, Shanghai.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3.1:1-13.
- Meillet, Antonine.1925.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Oslo: H. Aschehoug & Co. (Reprint,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66).
- Nichols, Johanna. 1996.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s heuristi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 Regularity and Irregularity in Language Change*, ed. by Mark Durie & Malcolm D. Ross, 39-7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nge, D. 1992. On Calculating the Factor of Chance in Language Comparis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82, no. 1.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 类型学框架下的彝语诺苏话关系从句

胡素华

中央民族大学

内容摘要 关系从句 (relative clause) 是绝大多数语言共有的句法结构,即用关系化手段提取名词性成分,这么做是因为主句中名词成分和从句中的名词是一种替代关系 (substitution),即关系化或同指。彝语的关系从句尚未进行过全面、系统地研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彝语的关系从句进行描写:有无核心名词、核心名词的位置、关系化的策略、关系从句性质及标记、关系从句的名词短语可及性序列、关系从句与其他句法范畴之间关系。研究表明彝语的关系从句包括有核和无核两种类型,有核类型中关系从句都是外置于核心名词的,有关系从句后置型 (NRel) 和前置型 (RelN) 两种语序,其中后置型是主要的,前置型是受汉语影响在书面语长句中新发展出来的类型,早期表示处所和时间的前置型关系从句已演变为小句名物化结构,另一种无标记的前置型则发展为固定搭配、不可扩展的词组。从关系从句的性质看,有限定性关系从句是主要的,非限定性关系从句比较少和不典型。关系从句标记有用名物化标记 *su*³³ (包括量词与 *su*³³ 结合的短语)、量词 (包括指示词与量词结合的短语) 两种类型。彝语名词短语可及性中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格论元、领有者、比较参项 (比较的主语)、比较基准 (比较的宾语) 都可以被关系化。关系化有留空、宾格代词复指、保留领属代词、介词悬空四种策略。

关键词 彝语; 关系从句; 关系化策略; 名物化; 名词短语可及性

一、引言

在跨语言视野中,关系从句 (也称为关系小句或关系子句) (relative clause) 是绝大多数语言共有的句法结构,即使用关系化手段提取名词性成分,这么做是因为主句中名词成分和从句中的名词是一种替代关系 (substitution),即关系化或同指。关系子句就是子句所修饰的中心名词在子句中也有一个句法位置,也称之为共元 (common argument)。

胡素华. 2025. 类型学框架下的彝语诺苏话关系从句. 黄成龙、杨旭 (主编)《意义创造论: 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 pp. 144–158.

Comrie (1981) “一个关系小句必定包含一个中心名词和一个限制性小句。中心名词本身的所指对象有某个潜在的范围，而限制性小句用一个命题来限制这个范围”。关系从句和补足语从句与主句间的关系最紧密，其间语调无间隙，属于嵌入式子句(embedded clauses)。

在关系从句结构特点的认识上，基本达成共识(Dixon)(2010)：1.由一个主句和一个子句构成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只有一个语调。2.主句和子句共享同一个论元，即共元(common argument)，它既是主句的论元，也是子句的论元。在具体的语言中既可能两个小句中都出现共元，也可能只出现在一个小句中，或是在两个小句中都不出现。在子句中常常由代词来指代。3.在句法上，关系子句作为主句共元的修饰成分；在语义层面上，关系子句可以是提供相关信息来表示共元的聚焦(focusing)-或是限制(restricting)-或是指称(reference)；也可以是，当共元为人称代词或专有名称时，子句提供与此相关的背景信息。前者为限定关系子句(restrictive RC)，后者为非限定关系子句(non-restrictive RC)。4.关系子句必须具有一个基本小句的结构——谓语和谓语的核心论元(core argument)。在有些语言中，RC 可以包括外围论元(peripheral argument)，有些语言却不可以包括。一般不能用主句的语法范畴——如时、体、情态等来标记。

类型学的研究发现，不同语言中关系子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这些参数上(孙天心 2006)：1.关系子句结构本身(是否限定，名物化与否)；2.中心词与关系子句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子句在中心词之内还是之外，若在之外是前置还是后置；3.名词关系化手段(strategies of revitalization)，是留空还是保留完整的名词，或是用关系代词或复指代词；4.哪些论元可被关系化，即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序列；5.关系子句中动词的形态(即名物化成分)所属的范畴；6.关系子句本身差异所属的范畴。

彝语诺苏话(圣乍音)属于彝语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云南北部，他们自称“诺苏”，是彝语保留得最好和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区，其关系从句的个性和关系化策略却有着其独特点，尚未在类型学框架下系统地描写过的彝语诺苏话(圣乍音)(下文简称彝语)的关系从句。

二、彝语关系从句的类型

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彝语关系从句进行分类：第一，从有无核心名词(head noun)来看可以分为有核关系从句(headed relative clause)和无核关系从句(headless relative clause)。第二，从核心名词和关系从句的位置来看，有关系从句后置型(NRel)和有关系从句前置型(RelN)，其中关系从句后置型是主要的。第三，从关系从句的性质看，可以分为限定性关系从句和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前者是基本的。

2.1 有核关系从句和无核关系从句

彝语以有核心名词的关系从句为主，也有不少无核关系从句。

1、有核关系从句

主句中有核心名词从子句中提取出来的是有核关系从句。如下例(1c)中“的小伙子”(2b)中的“马”是从(1a)中提取出来关系化的核心名词,其后的关系从句用来修饰限定前面的核心名词:

- (1) a. su³³i⁵⁵=ma³³ mu³¹pa⁵⁵ dzɿ³³=ta³³ la³³. “一个小伙子骑着马来。”
 小伙子=CL.INDEF 马 骑=ADV.DURA 来
 b. su³³i⁵⁵ (= ma⁴⁴-su³³) dza⁴⁴ dzu³³=ndzo³³. “(那个)小伙子正在吃饭。”
 小伙子=CL-DEF 饭 吃=PROG
 c. su³³i⁵⁵ [[Ø mu³¹pa⁵⁵ dzɿ³³=ta³³ la³³] = ma⁴⁴su³³] RC dza⁴⁴ dzu³³=ndzo³³.
 小伙子 马 骑=ADV 来=CL-DEF.REL 饭 吃=PROG
 “那个骑着马来的小伙子正在吃饭。”
 (2) a. mu³¹pa⁵⁵ zɿ³³ dzu³³=ndzo³³. “马正在吃草。”
 马 草 吃=PROG
 b. mu³¹pa⁵⁵ [[su³³i⁵⁵ Ø dzɿ³³=si⁴⁴/*ta³³ la³³] = ma⁴⁴-su³³] RC zɿ³³ dzu³³=ndzo³³.
 马 小伙子 骑=ADV/LINK.INST 来=CL-DEF.REL 草 吃=PROG
 “那匹小伙子骑着来的马正在吃草。”

2、无核关系从句

无核关系从句是被修饰的核心名词不出现,这也是小句名物化结构。同如汉语的“的”字结构:“我买的”、“看热闹的”。彝语无核关系从句的中心词可以省略(也都可以补上),能省略是因为彝语的关系从句是一个名物化结构,通过语境(上下文)或是句中的关系化标记、谓语语义特征或是类别量词来推知省略的核心名词。例如:

- (3) Ø [[pi³¹tei³³bo³³=ndzo⁴⁴] = su³³] RC a⁴⁴mu³³ a⁴⁴ti³³ dzo³³.
 (人)北京 去=EXP =NML.REL 阿木 只 有
 “去过北京的(人)只有阿木。”
 (4) nu³³ Ø [ŋa³³ mu³³=su³³] RC tsho³¹lo³³ dzu³³ hu⁴⁴=a⁴⁴.
 2SG (饭) 1SG 做= NML.REL 一 下 吃 看=IMP
 “你吃一下我做的(饭)吧。”
 (5) Ø [bu³³ɕɿ³³ thu³³=su³³] RC =li³³, lu³³ɕu³³ si³¹=la³³ ho⁵⁵.
 (伤口)蛇 咬=REL.NML=TOP 麝香 拿=sQ 敷
 “蛇咬的(伤口),拿麝香来敷。”(胡素华 2020: 229-230)

上例(3)-(5)为无核关系从句,其 tsho³³(人)、dza³³(饭)、ma³³ya³³(伤口)可以在核心名词的位置 Ø 上补出。从句末要用 su³³ 作为关系化词(relativizer)或称标句词(complementizer),它是连接关系子句和核心名词的联系项,也是一个名物化标记,其实词源头义为“人”。关系从句标记实际上也是其名物化功能的扩展(戴庆厦、胡素华 1999, Liu&Gu2011, 胡素华、邹雨橙 2020)。

2.2 关系从句后置型和关系从句前置型

从跨语言看，有核心名词的关系从句，其核心名词有外置、内嵌两种类型，彝语只有核心名词外置于关系从句的类型，而没有像同属藏缅语的羌语这种内嵌型：

- (6) [tha_χa-ji stə tʃə] tha-ra qa dzə da-sa.

3PL-AGT 饭 做 那-锅 我 吃 DIR-完:1SG

“他们做的那锅饭我吃完了。”（刘光坤 1998, 转引自黄成龙、余文生 2007）

从语序类型学上看，VO 语言几乎总是使用“核心名词+关系从句”（NRel）的语序，汉语是较少的反例之一；而 OV 语言则两种语序都有。彝语关系从句以后置（NRel 型）为主，也有少数关系从句前置的特殊句型。

1、关系从句后置型（NRel）

彝语以关系从句后置型为主，如上例（1c）（2b）及下例大部分例句都属于此种类型。再如《彝语大词典》（彝文版 1997：549）中对“松叶”一词的解释句：

- (7) thu³¹tshi³³: thu³³bo³³tchi⁴⁴tchi³³[ɿ³¹ mu⁴⁴du³³=ko³³ dzu³³=su³³]_{RC} thi³³.

松叶： 松树 叶子 脱落地面=LOC 躺在=REL 指

“松叶：指脱落在地上的松树叶子。”

2、关系从句前置型

彝语关系从句前置型比较少，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受汉语的影响而新产生的书面语的长句翻译；第二类是核心名词语法化的从句前置型，即后置的核心名词语法化为名物化标记，为非典型性关系从句。

第一类关系从句前置型也是用 su³³作为关系从句标记(relativizer)，如下例（8）：

- (8) [dzu⁵⁵la³³vo³³tsho³³ Ø bo³³pha⁵⁵du³³la³³=su³³]_{RC} sɿ³¹zi³³yuu³¹dzu⁴⁴ the⁴⁴du³³=su³³...

人类 创造 出来=REL 文明 成果 优秀=ATTR

“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余华 2020：118）

第二类关系从句前置型，是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从句，用处所名词 du³³（处，地）和时间名词 thu³³（时）作核心名词，核心名词逐渐语法化为表处所和时间的名物化标记。地点和时间名词重新分析为名物化标记，成为没有核心名词被提取出来关系化，也不能补出来的句子，仅表示地点和时间小句名物化，这种句型演变为非典型性关系从句，如下例（9）（10），小句名物化后做地点和时间状语从句：

- (9) nu³³ [[tsho³¹yo⁴⁴i⁵⁵mu³¹tsɿ³³]_{RC} du³³]= (ko³³) la³³. “你来他们种玉米的地方。”

2SG 3PL 玉米 种 处:LOC.NML.LOC 来

- (10) nu³³ [[tsho³¹yo⁴⁴i⁵⁵mu³¹tsɿ³³]_{RC} thu³³]= (ko³³) la³³. “你在他们种玉米的时候来。”

2SG 3PL 玉米 种 时:TEMP.NML.TEMP 来

典型的关系从句中，地点名词作为旁格论元时也可以被提取出来关系化，关系从句内有悬空的旁格标记 si³¹，并有关系从句标记（量词+su³³），成为核心名词被子

句限定的关系从句后置型结构，原来的核心名词 du^{33} （“处”）语法化为处所名物化标记，可以省略，如下例（11）：

- (11) $nu^{33} mu^{44} du^{33} [[tsho^{31} \gamma o^{44} \emptyset = si^{31} i^{55} mu^{31} ts_1^{33} = ta^{33} = (du^{33})] = teo^{55} - su^{33}]_{RC} = (ko^{33}) la^{33}$.
 2SG 土地 3PL=INST 玉米 种=ANT=LOC.NML =CL-DEF.REL=LOC 来
 “你来他们种了玉米的那块土地上。”

彝语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可以省略（也都可以补上），能省略是因为彝语的关系子句是一个名物化结构，通过语境（上下文）或是句中的关系化标记、谓语语义特征或是类别量词来推知省略的核心名词。表示时间和地点的状语从句用名物化和格标记来承担，它们不是关系从句。即上例（10）没有关系化的同指成分，而上例（11）则有关系化的同指成分（土地），子句内有其原位。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类似关系从句，无任何标句词，但它应该属于短语而不是小句，如下例（12a），它更像是个动词分词短语，与其后的名词构成一个表示用途的定中短语，而不是前置的关系从句；而典型的关系从句还是后置于中心名词，如下例（12b），从句内名词留空后仍留有工具格标记 si^{31} ：

- (12)a. $[vo^{55} \eta o^{31}]_{PRTC} ma^{33} tee^{33} \eta i^{33} dzu^{33} a^{31} - \eta a^{33}$. “放猪赶鞭也搁不稳”（引自民间故事）。
 猪 赶 鞭子 也 躺置 NEG-愿
 b. $ma^{33} tee^{33} [\emptyset = si^{31} vo^{55} \eta o^{31} = su^{33}]_{RC} \eta i^{33} dzu^{33} a^{31} - \eta a^{33}$. “用来放猪的赶鞭也搁不稳。”
 鞭子 =AGT/INST 猪 赶=REL 也 躺置 NEG-愿

上例（12a）中修饰成分与名词关系紧密，更像是一个固定搭配短语，而不像是一个受子句修饰的名词性结构。因为：（1）、修饰成分与名词关系较紧，中间无任何连接的标记；（2）、作为一个子句是可以通过增加附属成分来扩展的，而彝语中位于名词前的动宾词组却不可以扩展，类似的前置定中短语和复合词还有：

- | | | |
|-------|---------------------------------------|--------------------------------------|
| 定中短语： | $vo^{55} si^{55} do^{44} mu^{33}$ 杀猪刀 | $s_1^{31} \eta gu^{31} tcho^{31}$ 聊友 |
| | 猪杀 刀子 | 聊天 朋友 |
| 复合词： | $dz_1^{33} mu^{33}$ 用来骑的马 | $tee^{33} mu^{33}$ 用来驮的马 |
| | 骑 马 | 驮 马 |
| | $mo^{33} lu^{33}$ 耕牛 | $si^{55} lu^{33}$ 祭祀的牛 |
| | 耕 牛 | 杀 牛 |

汉语中的情形也一样。谓词不带“的”作定语的情况应排除在关系子句之外，如“出口商品”，定语与核心词关系特别紧密，很像一个复合词（刘丹青 2008：40）。

VO 语序语言几乎总是使用“核心名词+关系从句”语序。从语序和谐的角度看，OV 语言的修饰成分应该与 VO 成为镜像位于中心名词之前，但根据重成分后置原则（heavy constituent principle）（Hawkins 1983）及直接成分尽早原则（early Immediate constituents）（Hawkins 1994），RC 可以后置于中心名词之后。因此 OV 语言既有“关系子句+中心名词”（RelN）的语序，也有“中心名词+关系子句”（NRel）的语序，就世界范围来看，OV 语言中关系子句后置的语言稍多于前置的（Dryer 1992, Whaley 2009:90）。

2.3 限定性关系从句与非限定性关系从句

关系从句与核心名词之间语义关系有限制性和非限制性两类，前者是更基本的，有非限制性从句的语言都有限制性从句，反之则不必然。彝语同样也是限制性关系从句的是主要的，如上文和下文所举的例子都是限制性关系从句，也有少数非限定性的，即对核心名词的背景信息的补充。限定性的关系从句用标句词 su^{33} ，如下例（13a）；而非限定性的用复指（同位语）指示代词 ei^{31} 来标示，作“如此这般”的补充说明，例如（13b）：

- (13) a. $zu^{33} [o^{31} dzo^{33} = ta^{33} \quad a^{44} z_1^{33} = su^{33}] \quad no^{33} su^{33} \quad ho^{31} \quad a^{31} - s_1^{31} = o^{44} = ndzi^{55}$.
儿子 西昌=LOC 长大=RES.REL 彝族 语言 NEG-懂==IND==INFR
“在西昌长大的儿子可能不懂彝语了。”
- b. $zu^{33} [o^{31} dzo^{33} = ta^{33} \quad a^{44} z_1^{33} ei^{31}] \quad no^{33} su^{33} \quad ho^{31} \quad a^{31} - s_1^{31} = o^{44} = ndzi^{55}$.
儿子 西昌=LOC 长大 non-RES.REL 这样 彝族 语言 NEG-懂==IND==INFR
“儿子这样在西昌长大的，可能不懂彝语了。”

非限定性关系从句还可以用其他独立的小句形式来补充说明主句的核心名词。

三、彝语关系从句标记、指涉特征及名物化

关系化词一般由一个关系化标记或关系代词介引，也有的语言不用任何语法标记。彝语关系从句主要用名物化标记 su^{33} （包括量词与 su^{33} 结合的短语）、量词（包括指示词与量词结合的短语）两种类型。具体根据语义和具体语用中的指涉特征而异（胡素华 2010, Jiang & Hu 2010）。

3.1 关系从句标记 su^{33}

su^{33} 是典型的关系从句标记，也是名物化标记。可用于有核的关系从句，如上例（1c）、（2b）、（10）、（11）和（12b）；也可用于无核的关系从句，如上例（3）-（5）。可用于关系从句后置和前置的类型，前置的类型只能用 su^{33} 来标记。非限定的关系从句如上例（13b），不能用关系从句标记 su^{33} 。

1、 su^{33} 单独作关系从句标记

su^{33} 单独作关系从句标记时，常用于无核关系从句，小句名物化功能突显，在指涉特征上可表示核心名词是定指如（14a）或类指如（13b）：

- (14) a. $dza^{33} [ja^{33} \quad mu^{33} = su^{33}] \quad tsh_1^{31} lo^{33} \quad dzu^{33} \quad hu^{44} = a^{44}$. “你吃一下我做的饭吧。”
饭 我 做=REL.NML 一下 吃 看=IMP
- b. $dza^{33} [ja^{33} \quad mu^{33} = su^{33}] \quad nbo^{31} - dz_1^{33} - nbo^{31}$. “我做的饭很好吃。”
饭 我 做=REL.NML 好吃-很-IFX-好吃

2、“量词+ su^{33} ”作关系从句标记

个体量词与 su^{33} 结合时表示定指，“量词+ su^{33} ”作为关系从句的标记时表示核心名词的指涉特征是定指。如上例（1c），重复如下：

(15) su³³li⁵⁵ [[Ø mu³¹pa⁵⁵ dɿ³³=ta³³ la³³] = ma⁴⁴-su³³] RC dza⁴⁴ dzu³³= ndzɔ³³.

小伙子 马 骑 =ADV 来 =CL-DEF.REL 饭 吃=PROG

“那个骑着马来的小伙子正在吃饭。”

3.2 量词作关系从句标记

1、量词单独作关系从句标记

量词可以单独作关系从句标记，只有量词时，核心名词的指涉特征为不定指，如上例（15）的关系从句标记可以删除 su³³，只用量词 ma³³：

(16) a. su³³li⁵⁵ [[Ø mu³¹pa⁵⁵ dɿ³³=ta³³ la³³] = ma³³] RC dza⁴⁴ dzu³³= ndzɔ³³.

小伙子 马 骑 =ADV 来 =CL-INDEF.REL 饭 吃=PROG

“一个骑着马来的小伙子正在吃饭。”

b. *su³³li⁵⁵ [[Ø mu³¹pa⁵⁵ dɿ³³=ta³³ la³³] RC dza⁴⁴ dzu³³= ndzɔ³³.

小伙子 马 骑 =ADV 来 饭 吃=PROG

拟表达：“骑着马来的小伙子正在吃饭。”

c. su³³li⁵⁵ dza⁴⁴ dzu³³= ndzɔ³³. “小伙子正在吃饭。”

小伙子 饭 吃=PROG

上例（16c）中光杆名词“小伙子”可以做主语，但（16b）中关系子句没有量词做标记时，不能修饰限定核心名词。再如：

(17) a. ve⁴⁴ve³³ [[a⁴⁴mu³³ Ø ka³³ ɛ³¹le³³ a³³dɿ⁴⁴-ma³³ bɿ³¹] = pu³³] RC a³³vu³³=o⁴⁴.

花儿 阿木 AUX 姑娘 DIST.DEM-CL 给 =CL:朵.INDEF 干枯=PFV

“一朵阿木给那个姑娘的花儿干枯了。”

b. *ve⁴⁴ve³³ [[a⁴⁴mu³³ Ø ka³³ ɛ³¹le³³ a³³dɿ⁴⁴-ma³³ bɿ³¹] RC a³³vu³³=o⁴⁴.

花儿 阿木 · =AUX 姑娘 DIST.DEM-CL 给 干枯=PFV

拟表达：“阿木给那个姑娘的花儿干枯了。”

c. a⁴⁴mu³³ ve⁴⁴ve³³ ka³³ ɛ³¹le³³ a³³dɿ⁴⁴-ma³³ bɿ³¹.

阿木 花儿 =AUX 姑娘 DIST.DEM-CL 给

“阿木给了那个姑娘花儿。”

d. ve⁴⁴ve³³ a³³vu³³=o⁴⁴.

花儿 干枯=PFV

“花儿干枯了。”

上例(16a)有核心名词“花儿”量词做关系从句的标记，而（17b）因为没有量词做关系从句的标记，故不成立；（17c）和（17d）中无论“花儿”做宾语还是主语，都成立，因为光杆名词是定指的（胡素华，2010）。

2、量词与指示词共同作关系从句标记

量词与指示词共同作关系从句标记，表示核心名词的定指性，如下例（18）的关系从

句标记可以用“指示词+量词”的形式，其定指义与上例（15）“量词+su³³”的功能是一样的：

- (18) su³³li⁵⁵ [[Ø mu³¹pa⁵⁵ dzɿ³³=ta³³ la³³] = a³³dzɿ⁴⁴-ma³³] RC dza⁴⁴ dzu³³= ndzɔ³³.

小伙子 马 骑 =ADV 来 =DEM-CL.REL 饭 吃=PROG

“那个骑着马来的小伙子正在吃饭。”

再如：

- (19) a.ve⁴⁴ve³³ [[a⁴⁴mu³³ Ø ka³³ ɕɿ³¹le³³ a³³dzɿ⁴⁴-ma³³ bɿ³¹] a³³dzɿ⁴⁴-pu³³] RC a³³vu³³=o⁴⁴.

花儿 阿木 =AUX 姑娘 DIST.DEM-CL:个给 DIST.DEM-CL:朵 干枯=PFV

- b.ve⁴⁴ve³³ [[a⁴⁴mu³³ Ø ka³³ ɕɿ³¹le³³ a³³dzɿ⁴⁴-ma³³ bɿ³¹] pu³³-su³³] RC a³³vu³³=o⁴⁴.

花儿 阿木 =AUX 姑娘 DIST.DEM-CL:个 给 CL:朵-DEF 干枯=PFV

“那朵阿木给那个姑娘的花儿干枯了。”

关系从句是对核心名词的限定，核心名词的所指对象构成一个可选项集合，关系小句由于其意义上的限定功能，使核心名词的所指对象确指为这个集合中限定性的某一个或几个元素（唐正大 2005）。几个元素可以成为一类，便成为类指，若仅是特定的或某一个或几个元素，则为定指或不定指。

3.3 关系子句与名物化

1、词汇名物化标记 su³³

su³³ 也是词汇名物化的标记，可以将动词名物化为动词的名词论元——施事者、经历者或动作结果或自指事件本身，或是将形容词名物化为具有该性质特征的人或物。例如：

- (20) ku⁵⁵=li³³ su³³ dzɿ⁴⁴=su³³. “工匠是打铁者。”

工匠=TOP 铁 打=NML

- (21) vi⁵⁵-ɕe³¹ zɿ³³=su³³ ndi³¹, phu³¹ŋo³³ dzɿ⁵⁵=su³³ ndi³¹.

衣-铠甲 大=NML 争 田地 小=NML 争

“长子争衣甲，幼子争田地。”（12：258-259）

将动词名物化后转指行为施事者，也可自指行为本身。如：

- (22) khu³³=su³³ ŋge³³=su³³=li³³ tha³¹-zo³³.

偷盗=NML 撒谎=NML= TOP PROH-学习

“不要学习偷盗（者）和撒谎（者）。”

su³³ 可以将动词短语 ya³³-tshɿ⁵⁵-ya⁴⁴-zu³³ “后-代-后-生”名词化，它也可以分析为无核关系从句，su³³ 作为关系化标句词，它同时还具有定指的功能。如下例（23）中具有名物化功能的 su³³ 转变为定指标记：

- (23) ya³³-tshɿ⁵⁵ ya⁴⁴-zu³³=su³³, dzu³³=lu³³ pha⁵⁵mo³¹ tsa³³.

后-代 后-生=NML.REL.DEF 吃=NML 父母 吃:CAUS

“后生（的人）们，要让父母享美食。”

Comrie 和 Thompson（2007：378-379）曾指出：“名物化的一个罕见功能是能作为关系从句修饰核心名词”“在某些语言中，关系化（Relativized）与名物化难以区分”。藏缅

语族语言的拉祜语也是“名物化结构、关系子句、领属三者之间有紧密联系”(Matisoff 1972); 拉萨藏语(Delancy 1986, 1999; Agha 1993)藏语的名物化标记-pa可作关系化标记(和名词结合)、补语标记。Delancey (1986, 1999)指出关系从句是名物化的特殊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名物化后的从句修饰核心名词, 并与核心名词并列。Shibatani (2019)也指出名词性结构有两种用法, 一是名词短语用法(NP-use), 具有指称功能; 二是修饰用法, 具有限定功能。

LaPolla (罗仁地) (2008a, 2008b)提出汉藏语从关系子句到名物化结构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没有标志的关系子句前置修饰中心名词; 第二阶段是核心名词语法化为名物化标志; 第三阶段是用这种带名物化标志的关系子句修饰核心名词, 即汉藏语最初的结构“关系子句+中心名词”, 通过语法化, 中心名词虚化为名物化标志, 再通过重新分析, 名物化标志成为名物化关系子句的一部分。黄成龙(2008)认为羌语代词化关系子句的差异性证实了罗仁地提出的汉藏语从关系子句到名物化结构演变的不同发展阶段。

如上所述, 彝语中表示处所 du^{33} “处, 地”和表示时间 thu^{33} “时”的两个名词后置于关系从句作中心名词, 然后它们进一步语法化为名物化标记, 如上例(9)(10), 也符合 LaPolla (罗仁地)提出的从关系子句到名物化结构的演变阶段, 彝语中这种结构进一步发展成为非典型性关系从句, 典型性关系从句则由 NP+RC+ su^{33} 表达, 如上例(11)。彝语里表示“人”义的名词 su^{33} 则语法化和重新分析为关系从句标记, 并将重成分关系小句后置, 中心名词提到句首满足直接成分尽早确立原则, 形成 NP+RC+ su^{33} 型; su^{33} 的位置也可以是量词, 原本也是被关系从句修饰的核心名词, 进一步语法化为关系从句标记。另外一种可能是, su^{33} 先虚化成为词汇名物化标记, 进而功能扩展为小句(关系小句和补足语小句)名物化标记(胡素华、姚晶 2012)。此外, 传统上无关系化标记的“关系从句+中心名词”结构则固化为定中短语结构或是“动+名”复合词, 成分不可扩展为小句。

四、彝语关系从句的名词可及性及关系化手段

4.1 彝语名词短语关系化可及性

彝语的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与格)、领属格、伴随格、工具格都可以关系化, 即这些成分的名词短语都可以提取为主句的核心名词。

1、主语名词关系化

彝语主语名词关系化是最常见的, 如上例(1c)的“小伙子”等例句皆是主语关系化。再如下例(24):

(24) $\epsilon_1^{31} i_e^{33} [\emptyset a^{44} mu^{33} he^{33} vu^{33}] a^{33} dz_1^{44} -ma^{33} bo^{33} = o^{44}$. “那个喜欢阿木的姑娘走了。”

姑娘 阿木 喜欢 DIST.DEM-CL 走=PFV

2、宾语名词关系化

宾语名词关系化的如上例(2b), 再如下例(25):

- (25) [ɕʰ³¹ɿ³³ [a⁴⁴mu³³ ko⁴⁴ he³³vu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 bo³³=o⁴⁴. “阿木喜欢的那个姑娘走了。”
姑娘 · 阿木 3SG.ACC 喜欢 DIST.DEM-CL 走=PFV

3、直接宾语关系化

- (26)a. a⁴⁴mu³³ [ve⁴⁴ve³³=pu³³]DO ka³³ [ɕʰ³¹ɿ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IO bʰ³¹.
阿木 花儿=CL:朵·INDEF AUX 姑娘 DIST.DEM-CL:个 给
“阿木给了那个姑娘一朵花儿。”
b. ve⁴⁴ve³³[[a⁴⁴mu³³ Ø ka³³ ɕʰ³¹ɿ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 bʰ³¹] pu³³-su³³]RC a³³vu³³=o⁴⁴.
花儿 阿木 =AUX 姑娘 DIST.DEM-CL:个 给 CL:朵-DEF 干枯=PFV
“那朵阿木给那个姑娘的花儿干枯了。”

4、间接宾语关系化

- (27) ɕʰ³¹ɿ³³[[a⁴⁴mu³³ ve⁴⁴ve³³=pu³³ ka³³ ko³³ bʰ⁴⁴] ma⁴⁴-su³³] bo³³=o⁴⁴.
姑娘 阿木 花儿=CL:朵 AUX 3SG.ACC 给 CL:个-DEF 走=PFV
“阿木给了她一朵花儿的那个姑娘走了。”

5、旁格（介词宾语）关系化

- (28) a. a⁴⁴mu³³ do⁴⁴mu³³=si³¹ zo³³ si⁵⁵. “阿木用刀杀羊。”
阿木 刀 =INST 羊 杀
b. do⁴⁴mu³³ [a⁴⁴mu³³ Ø=si³¹ zo³³ si⁵⁵] tɕhi⁵⁵-su³³ ndzu⁵⁵dzu³³=o⁴⁴.
刀 阿木 =拿:INST 羊 杀 CL:把-DEF 生锈=PFV
“那把阿木用来杀羊的刀生锈了。”
(29) a. a⁴⁴mu³³ ɕʰ³¹ɿ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tɕo⁴⁴ za³³=ndzɔ³³. “阿木在跟那个姑娘说话。”
阿木 姑娘 DIST.DEM-CL:个=DAT 说=PROG
b. ɕʰ³¹ɿ³³ [a⁴⁴mu³³ ko³³=tɕo⁴⁴ za³³=ndzɔ³³]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 kha⁴⁴di³³ ŋu³³?
姑娘 阿木 3SG.ACC=DAT 说=PROG DIST.DEM-CL:个 谁 是
“那个阿木在对她说话的姑娘是谁？”

6、领属名词关系化

- (30) a. ɕʰ³¹ɿ³³ dzu³³mo³¹ tɕho³³ khu³³-si⁴⁴-bo³³. “姑娘的钱被人偷走了。”
姑娘 钱 人 偷-LINK-走
b. ɕʰ³¹ɿ³³[[(tɕh³¹) dzu³³mo³¹ tɕho³³ khu³³-si⁴⁴-bo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RC zi³³ŋo⁴⁴=ndzɔ³³.
姑娘 3SG.GEN 钱 人 偷-LINK-走 DIST.DEM-CL:个 哭=PROG
“那个被人偷走了钱的姑娘在哭。”

7、比较参项（比较的主语）关系化

- (31) a. ɕʰ³¹ɿ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 a⁴⁴mu³³ zʰ³¹ a³¹-tɕh³³. “那个姑娘比阿木高。”
姑娘 DIST.DEM-CL:个 阿木 高似/大似 不止
b. ɕʰ³¹ɿ³³[Ø a⁴⁴mu³³ zʰ³¹ a³¹-tɕh³³] a³³ɕʰ³¹⁴⁴-ma³³ dza³³ mu³³=ndzɔ³³.
姑娘 阿木 高似/大似 不止 DIST.DEM-CL:个 饭 做=PROG
“那个比阿木高的姑娘在做饭。”

8、比较基准（比较的宾语）关系化

- (32)a. $a^{44}mu^{33} \epsilon_1^{31} e^{33} a^{33} dz_1^{44} -ma^{33} \quad z_1^{31} \quad a^{31} -tsh_1^{33}$. “阿木比那个姑娘高。”
阿木 姑娘 DIST.DEM-CL:个 高似/大似 不-止
- b. $\epsilon_1^{31} e^{33} [a^{44} mu^{33} ko^{33} \quad z_1^{44} \quad a^{31} tsh_1^{33}] a^{33} dz_1^{44} -ma^{33}] dza^{33} mu^{33} =ndz_1^{33}$.
姑娘 阿木 3SG.ACC 高似/大似 不止 DIST.DEM-CL:个 饭 做=PROG
“那个阿木比她高的姑娘在做饭。”

Keenan 和 Comrie(1979)考察五十种语言所得的名词短语可及性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等级序列为: SU(主语)>直接宾语(DO)>IO(间接宾语)>OBL(旁格)>GEN(领属语)>OCOMP(比较基准)(比较的宾语),即越靠左的成分越容易被关系化,关系化限制最多的语言只能关系化最左边的主语,凡是右边某成分能关系化的,其左边的成分肯定也能关系化。只有少数语言能在这个关系化等级中全部都能关系化。彝语就是全部能关系化的语言,不同成分的关系区别在于其关系化手段有别,其中最容易被关系化的主语在其被关系化后在子句位置上采用留空手段。

4.2 彝语名词短语关系化的手段

关系化策略(strategies of relativization)是指子句中被关系化的名词位置的形态手段,跨语言观察中一般有留空(gap)、完整名词保留(full NP)、关系代词(relative pronoun)、复指代词(resumptive pronoun)或代词保留 pronoun-retention(Comrie 1989)等关系化手段。彝语有留空、复指宾格代词、领属格代词(可以省略)、旁格助词(介词)悬空四种类型。

1、留空

彝语子句的主语被关系化时,主语位置采用留空手段,在关系子句内原位上用零形式表示。如上例(1c)(24),比较参项也是比较句的主语也采用留空手段,如上例(31b)等;宾语是生命度等级低、无施事能力的名词时,如双及物句中客体(直接宾语)也留空,如上例(11)(17a)(19a)(19b)(26b)等。

2、用复指宾格代词 ko^{33-44}

间接宾语和受事宾语为生命度等级高即为人类时,要用宾格复指代词 ko^{33-44} ,如上例(2b)(25)(27),与格的宾语如(29b)及比较基准(比较级的宾语)(32b)。指人的宾语在子句关系化位置要用宾格代词 ko^{33-44} 来复指,以避免施受歧义。

3、用领属代词 tsh_1^{31}

领属名词在子句关系化位置要用属格代词 tsh_1^{31} 来指明和强调,但是也可以省略。如上例(30b)。

4、格助词(介词)悬空

旁格论元(如工具格)名词被提取时,原位名词空位,留下其格助词(介词)悬空。例如上例(2b)(8)(12b)(28b)中工具名词被提取关系化,子句内留下工具格助词 si^{31} 悬空。

五、结论

与跨语言研究及汉藏语研究结果一致，彝语的关系化与名物化之间关系密切，核心名词是一个范围（也是一个话题），后置的关系子句是一个名词性结构对范围名词进行限定。后置的关系从句必须有标记，其标记可以是名物化标记 *su*³³，也可以是量词；被限定的核心名词为有指成分，它可以是类指、定指和不定指，由名物化标记 *su*³³和量词来标明。

彝语可以关系化名词短语可及性序列中的所有成分都可以关系化，关系化手段如上所述有四种。关系化策略总的遵循避免歧义原则和经济原则。留空策略一是就近原则，空位与中心名词的位置之间没有被其他成分隔开；二是低生命度无施事能力的名词短语即使远距离（作宾语成分）也留空，因为这不会产生歧义。彝语的领属名词和被领属名词之间是前后并置的结构，中间无连接项，故领属代词可以省略也可以保留。代词保留策略只有宾格复指代词，用于生命度高（人类）作动词宾语、间接宾语、与格宾语中。工具格助词可以悬空留在子句原位，标明核心名词为工具成分。

此外，彝语关系从句与定语从句、与补足语从句之间关系密切（胡素华、姚晶 2012），值得探讨；彝语关系从句与主句之间的语法范畴有同有异，彝语诺苏话与其他方言、其他藏缅语之间也有共性差异，对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会有益于深入揭示彝语关系从句的特点，因篇幅有限，这部分另文再分析。

缩略语：

1SG:first person singular（第一人称单数）；2SG:second person singular(第二人称单数)；3SG:third person singular（第三人称单数）；ACC:accusative（宾格标记）；ADV:adverbial（状语标记）；AGT:agent（施事标记）；ANT:anterior（先时体 / 完成体）；ATTR:attributive（定语标记）；AUX:auxiliary（助动词）；CAUS:causative（致使形态）；CL:classifier（类别量词）；DAT:dative（与格标记）；DEF:definite（定指标记）；DIR:directive（趋向标记）；DIST.DEM:distal demonstrative（远指指示词）；DURA: durative（持续体标记）；GEN:genitive（属格形态）；INDEF: indefinite（不定指标记）；INST:instrumental（）；LOC: locative（处所格标记）；NEG:negative（否定标记）；NML:nominalizer（名物化标记）；non-RES: non-restrictive(非限定性结构)；NP:noun phrase（名词性短语）；PFV: perfective（完成体标记）；IFX: infix（中缀）；IND:indicative(直陈语气)；LINK:linker（连接项）；PROH: prohibitive（禁止前缀）；PROG: progressive（进行体标记）；PRTC:participate(动词分词形式)；RC: relative clause(关系从句)；REL:relativizer（关系化标记）；RES: restrictive（限定性结构）；TEMP:temporal（时格标记）；TOP: topic（话题标记）。

附记：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彝文文献《玛牧特依》译注及语言学与哲学研究（2018VJX05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语言生态学的语言接触知识库研究（22JJD740002）”资助。

参考文献

- 戴庆厦, 胡素华 1999 《凉山彝语的结构助词 su³³》, 载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世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胡素华 2012 《彝语诺苏话中光杆名词和名量短语的指称性》, 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总第 45 辑 P231-246
- 胡素华 2020 《<勒俄特依 (ꞑꞑꞑꞑ) > 译注及语言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素华、姚晶 2012 《类型学视野下的彝语诺苏话补足语子句》, 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学报》
- 黄成龙 2008 《羌语子句的关系化手段》, 《民族语文》第 4 期
- 黄成龙、余文生 2007 《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 中央民族大学《汉藏语学报》第 1 期
- 刘丹青: 编著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罗家修搜集整理 1985 《玛木特依》(教育经典)(彝文版),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孙天心 2006 《草登嘉戎语的关系句》, 《语言暨语言学》第 7 卷第 4 期
- 唐正大 2005 《汉语关系从句的类型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 余华 2021 《新时代视野下的彝语文翻译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Agha, Asif. 1993. *Structural form and utterance context in Lhasa Tibetan: Grammar and indexicality in a nonconfigurational language*. Frankfurt: Peter Lang.
- Comrie, Bernard & Sandra A. Thompson. 1985. *Lexical Nominalizatio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ed. by Shopen, Timot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86. *Relativization as nominalization in Tibetan and Newar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 DeLancey, Scott. 1999. *Relativization in Tibetan*. Topic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ed. by Yogendra P. Yadava & Warren W. Glover, Kathmandu: Royal Nepal Academy, 1999.
- Hawkins, John. A. 1983. *Word Order Univers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4.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Order and Constituen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Li & Hu Suhua. 2011. *An Overt Determiner and Complementizer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量词语言中的一个显性定指词和标句词), Proceedings of GLOW in Asia VIII 2010, Universals and Variation, ed. by Gao Ming-le,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Keenan, Edward and Bernard Comrie. 1979.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revisited. *Language* 55.3:649-664.
- LaPolla, Randy J. 2008a.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45-66.
- LaPolla, Randy J. 2008b.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Rawang languag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4:797-812.

- Liu Hongyong and Gu Yang. 2011. *Nominalization in Nuosu Yi*.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ed. by Foong Ha Yap, Karen Grunow-Hårsta & Janick Wrona. John Benjamins.
- Shibatani, Masayoshi. 2019. *What is nominalization? Toward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nominalization*. Nominalization in languages of the Americas, ed. by Roberto Zariquiey, Masayoshi Shibatani & David Fleck.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Matisoff, J. A. 1972. *Lahu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genitiviz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 Noonan, Michael. 1997. *Versatile nominalization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In honor of Talmy Givón, ed. by Joan Bybee, John Haiman & Sandra A. Tompson, John Benjamins.
- Yap F.-H, & Matthews S.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nominalizers in East Asian an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The Relative Clauses of Nuosu Yi in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HU Suhu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ve clause is a syntactic structure shar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languages, which extracts nominal elements through relativiza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nominal elements in the main clause and the relative clause are in a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that is, they are relativized or co-referential. The relative clauses of Yi have not been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ive clauses of Yi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core noun, the position of the core noun, the strategies of relativization, the nature and marking of relative clauses, the accessibility sequence of nominal phrases in relative claus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clauses and other syntactic catego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lative clauses of Yi have two types: with a core noun and without a core noun. In the type with a core noun, all relative clauses are external to the core noun, and there are two word orders: the postposed type (NRel) and the preposed type (RelN). Among them, the postposed type is the main one, and the preposed type is mainly a new type developed in written long senten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he preposed relative clauses that were originally used to indicate location and time have evolved into clause nominalization structures, while the other unmarked preposed type has developed into fixed collocations that cannot be expanded.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relative clauses,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are the main type, while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are relatively rare and atypical. The marking of

relative clauses includes nominalization markers su³³ (including phrases combining quantifiers with su³³) and quantifiers (including phrases combining demonstratives with quantifiers). In the accessibility sequence of Yi nominal phrases, the subject, direct object, indirect object, oblique argument, possessor, comparative subject, and comparative object can all be relativized. The strategies of relativization include nulling, anaphoric pronoun repetition, retention of possessive pronouns, and preposition stranding.

（通讯地址：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100081；
电子邮件：husuhua_Lh@163.com）

10 知识论视角下语气词“哈”的知识与道义调节

周士宏、段晓臻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摘要：以社交行为的识解为切入点，本文重点关注交际双方在使用语气词“哈”时的知识状态和立场调节，从而对其知识立场与道义立场表达进行综合分析。就知识维度而言，“哈”字句能够执行确认信息、请求证实和寻求认同三类社交行为，听说双方呈现出“低—高”的相对站位。就道义维度而言，“哈”常出现于请求、建议、提供帮助等指令性行为中，属于说话人对自身道义站位的降级处理。总之，知识立场和道义立场中的“哈”均是说话人以较低的站位标记受话人为权威，请求对方参与到言谈互动中，最终达成立场上的一致。

一、引言

“哈”是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中常见的语气词，多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交际之中。关于语气词“哈”，当前学界基本认为：“寻求认同或确认”是“哈”的核心语义和语用功能（贺阳 1994；尹世超 1999；原苏荣 2008；苏小妹 2008；崔希亮 2011）。近年来，部分学者以言语互动的视角对“哈”及相近语气词³³做出了一定的考察与研究。宗守云（2020）提出河北涿鹿方言中“噢”的主要功能是要求对方回应自己的揣测性询问并进行确认或认同。周士宏（2020）认为东北方言语气词“嚟”是说话人以较低的知识站位寻求听话人的证实、认同或一致性回应，从而达成双方立场一致。高顺全、杨璐（2021）分析了河南商城话中的“好”和“啥”，前者用于说话人意图建立一致立场的发起序列，后者则用于不平等权势关系下负面情感立场的表达。以上研究极具启发性，为普通话中语气词“哈”的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和对比思考的可能。

本文在知识论(Epistemics)的理论框架下，从言说双方的立场(stance)和站位(footing)（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的角度对语气词“哈”展开分析与讨论。基于自然会话语料，本文对知识立场和道义立场下的语气词“哈”进行行为识解和功能归纳，最后做出

周士宏、段晓臻. 2025. 知识论视角下语气词“哈”的知识与道义调节.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159–171.

³³ 在方言中，与语气词“哈”意义相似但存在语音差别的语气词有“嚟”[hau]、“好”[xɔ]、“吭”[xan]、“嗽”[ɔ]、“嚒”[xo]等。

归一性解释，力图厘清其互动交际功能。

本文使用的口语语料主要包括媒体语料和自然语料两部分，均为对话场景。媒体语料选自情景喜剧和访谈节目中无剪辑且对话完整的交流片段。自然语料为笔者自行采集、录制并转写的语料，总计时长约 12 个小时，涉及不同的交际关系与对话场景。

二、知识立场：“哈”的行为归属与立场构建

知识论（Epistemics）是会话分析领域用来解释社交行为生成与发展的新兴理论，重点关注言语交际者在话轮转换和序列建构中带有知识（knowledge）的话语成分以及宣告或让渡自身知识权威的立场表达手段。Heritage（2012a、2012b、2013）认为任何交际者都拥有自己的包含不同信息程度的知识域，即双方对所谈论事件的知识可能处于知识梯度（epistemic gradient）的不同位置，占有较多知识用 K+表示，占有较少知识则用 K-表示，反映了交际双方的知识状态（epistemic status）。相较于静态的知识状态，知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则是说话人出于在话轮转换中向听话人展现自身知识状态的需要，通过一些语言形式表达在某一知识域的即时性相对地位，多为对自身站位的升级（upgrade）或降级（downgrade）处理。结合行为识解与位置分析，知识立场下“哈”字句分别执行了确认信息、请求证实和寻求认同三类社交行为，交际双方也具有不同的知识状态与站位。

2.1 确认信息

作为确认标记（confirmational marker）的语气词“哈”多见于讲述性语体中，为陈述式上升语调，且常伴有注视（gaze）和下巴轻微抬起等动作符号，主要用于对言谈交际中参与双方知识状态的管理与维护。例如：

（1）（谈论朋友与性格）

1 窦文涛：那（（朋友））互相之间 X 发现不对付的会直接说（0.9）

2 [不好听的话吗]？

3 陈坤：[当=然.直接说=]

4 周迅：[当然啊]

5 陈坤：但是不会说不好听的话（1.2）会直接说的。

6 周迅：对。

（2.1）

7 → 窦文涛：你觉得哈.就像你看.

8 → 我发现很多.她的哥们儿都说她身上有爷们儿的这一面哈.

9 陈坤：[嗯=]

10 窦文涛：[但是]真的只有这个吗（0.8）

- 11 我其实我感觉.她也有很江南女子的(1.1)很周到=
12 陈坤:反正她挺中性的。
13 她阶段性 XX.就是我们演员下意识有一个人格扮演状态。

(《圆桌派》)

上例中的陈坤和周迅是多年好友,主持人窦文涛对二人的性格以及交友方式进行提问。在结束“朋友之间是否有话直说”话题(第1-6行)后,窦文涛将身体转向陈坤,并做出了“陈述+提问”的行为。基于自身通过人际交往积累的知识,窦文涛在预前序列(pre-pre)(第8行)做出了“周迅有爷们儿的这一面”的背景信息式断言,并使用“哈”以部分知晓(partially K+)的知识状态向陈坤的高位知识状态发出检验信号。只要受话人未对该信息表现出疑惑或质疑,就可以确保双方对共享知识的理解顺畅,从而推动后续目标序列的展开。

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来看,表确认的“哈”字句并不期待受话人的必然回应,只是用以确认自己在交际过程中的知识状态,即是否准确接收到对方所传达或拥有的信息。但有时,受话人也会对此做出话语回应或点头确认,目的在于齐平双方的知识站位,确保交际参与者在会话交谈中的步调一致,从而达到最大化的互动效果。

2.2 请求证实

“哈”可以用于表示说话人就关涉对方的事件信息(B-events)向受话人寻求证实(verification),询问其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通常出现在对话非初始序列的第一位置,即非初始提问序列。例如:

(2)(在早点铺购买早餐)

- 1 顾客:三个小碗((锅巴菜))三个烧饼.带走。
2 店员 A:三个小碗(0.8)三个烧饼。
3 → 店员 B:油酥的,哈?
4 顾客:[对]
5 店员 B:[七块五],找您两块五。
6 顾客:好,谢谢。

(《财经视界》)

例(2)是早上六点天津传统早点铺前顾客和店员之间的一段对话,店员A负责点餐和收银,店员B负责打包装袋。顾客首先进行点单(第1行),店员A在回应位置采用完全会话重复(repetition)以确认和识记顾客需求。现场菜单上有油酥烧饼和牛肉烧饼两种,价格分别为五毛和两块,且油酥烧饼销量更高。因此,在顾客未说明烧饼种类需求的情况下,店员B基于经验(有限的知识通道)发出了揣度性提问“油酥的,哈?”,顾客随后也做出了肯定回答。需要注意的是,店员B对顾客的喜好虽拥有一定的知晓程度,但具体到特定受话人的信息疆域中则十分有限,在站位上仍处于K-位置。从受话人的角度来看,该信息属于第一类知识³⁴,因此顾客具有更高的知识权威进行宣告(K+位置),且对

³⁴ Pomerantz (1980: 186-198)从信息来源的角度区分了第一类知识(type1 knowables)和第二类知识

店员 B 的提问负有回应的责任与义务。

执行请求证实行为的“哈”字句包含的信息大多与听话人有关，即说话人虽然通过有限的知识渠道获取了一定知识，但由于这些知识是听话人自身所拥有或亲涉的，因此听话人拥有更高的知识权威，交际双方在相对知识状态上也呈现出更大的差距。就回应而言，位于 K+位置的听话人需要在下一话轮中以高知识权威证实或证伪目标信息，因此回应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2.3 寻求认同

执行寻求认同（seeking alignment）行为的“哈”常出现在话轮末尾，偶见于话轮中间，同样属于非初始序列。说话人通过“哈”来寻求听话人对自身观点的认同，通过实时知识对齐（on-line alignment）（Morita 2005: 214）来保证后续交际的顺利开展。例如：

（3）（讨论考试中的运气因素）

- 1 X: 我朋友就运气挺好的，她当时考了第三。
2 Y: 嗯=
3 X: 第一是因为好像检查身体还是什么呀.有点问题来不了=
4 就让第二来（0.7）第二最后在考察前跑了。
5 Y: @@@.hh
6 X: 然后=一般第三顶上来的特别少。
7 Y: 对。
8 X: 然后第三她顶上来了.你说人家这不就是运气吗？
9 Y: 对，这确实是运气。
10 → X: 一般第三肯定就没戏了哈？
11 Y: 对（0.4）再一再二（1.2）[再三]这概率就很小了。
12 X: [对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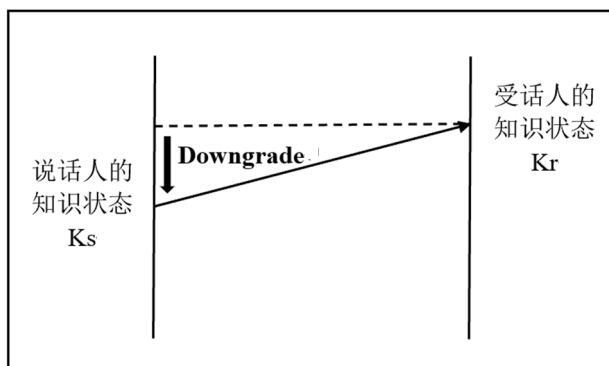
（日常对话录音）

例（3）是两位应届毕业研究生讨论编制考试中运气因素的一段对话，X 和 Y 是同学关系。“在招一排三的情况下难以被录用”的观点属于两人共享的知识背景，因此双方具有相等的知识通道和知识优先权（Stiver et al. 2011: 9），知识状态最初位于相对齐平的位置。在前四个话轮中（第 1-9 行），X 以朋友的亲身经历向 Y 讲述了考试中运气因素的作用，长时间把持着话轮，而听话人 Y 也一直给予肯定性附和。接着，X 虽然在第 10 行句子开头使用了“一般”，但其句子重音落在了“肯定”上，实际展现出她对“第三难以被录用”这一知识的确信程度之高。此时，X 使用语气词“哈”主动对自身知识状态进行降级处理，以较低的站位寻求对方的认同和参与，避免占据话语主导权，从而推动言谈交流的良性发展。听话人 Y 也在下一话轮中给予了肯定性回应，并辅以“再一再二不再三”

（type2 knowables），前者指说话人有权利和义务知道的知识，如自己的名字、所做的事情等；后者指说话人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到的知识，如听说、推测等。

的理据支持。双方的知识站位如下图所示：

图 1：“求认同”行为中交际双方的知识站位与立场示意图



当寻求一致性观点时，“哈”字句所包含的信息多为双方共同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事情，还可以是具有共同知识基础的社会共识。此时，说话人和听话人具有相等的知识通道和知识权威，因此双方的知识状态也基本齐平。但在实际的话语操作中，说话人使用语气词“哈”主动降级（downgrade）自己的知识立场，以提问的方式请求对方参与并寻求认同，将部分知识权威让渡给听话人，避免因处在拥有知识优先权（epistemic primacy）的第一位置而对言语互动造成的不利影响（参看周士宏 2020: 81）。

从回应层面来看，与“求确认”、“求证实”行为不同，寻求认同的“哈”字句必然要求听话人回应，但对单独出现的肯否定性回答（如：对、嗯、是的）的需求相对较低，听话人通常采用直接标明自身话语立场或与肯否定回应共用（即“肯否定性回应+自身立场表达”）的方式来进行回应。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对知识立场下语气词“哈”的互动功能做出归一性解释：说话人通过使用“哈”，以较低的知识站位向听话人请求证实、确认信息或寻求认同，最终在话轮推进中实现知识立场上的一致（seeking alignment of epistemic stance）。三种社交行为下“哈”的位置分布和知识站位如下表所示：

表 1：知识立场下“哈”的行动归属、位置分布和知识站位

行为类型	话轮位置	序列位置	知识立场表达		回应层面
			知识状态	知识站位	
确认信息	话轮之中	讲述性告知序列	$K_s < K_r$	$K_s \text{ partially}+ < K_r \text{ fully}+$	无需强制性回应
请求证实	话轮末尾	非初始提问序列	$K_s < K_r$	$K_s- < K_r \text{ fully}+$	需要证实或证伪
寻求认同	话轮末尾或话轮之中	非初始提问序列	$K_s = K_r$	$K_s \text{ partially}+ < K_r \text{ fully}+$	展现自身立场

三、道义立场：指令性行为中的“哈”

3.1 道义立场与指令性行为

在知识论的理论体系下，Stevanovic & Peräkylä（2012）从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权威的道义维度——道义权威（deontic authority），即有权决定应该、允许或禁止做的事情。相应地，道义权利（deontic rights）指的是个体决定行为的能力。

在一定的道义域内，具有更高道义权利制定规则或决定怎样去做的一方拥有更多的道义权威，故而享有更高的道义状态（deontic status）。就真实的对话互动而言，参与者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手段来调控自身的道义站位以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和动态的道义立场（deontic stance）构建。因此，具有更高道义状态的一方并不总是以高权威宣告的方式（如：表示命令、禁止的祈使句）进行立场表达，交际双方能够通过设计话轮、使用特定句式或小词等手段来调整各自在道义梯度上的站位，从而缓和宣告其道义权利。

从行为归属上看，道义立场表示言者对听话人所做的请求、邀请、承诺、建议、警告、禁止、命令等指令性行为（directives）。在指令性行为中，会话成员之间社会地位的相对关系与其扮演的角色和执行的行动又密切相关（Stevanovic 2018: 375）。Couper-Kuhlen（2014）从未来行为主体与受益者关涉自身或他人的角度，将指令行为划分为四类，自然地搭建起了“道义立场—指令行为—施受益主体”的理论阐释桥梁。因此，本文对指令行为的分类同样参考下表。

表 2：Couper-Kuhlen（2014）对指令行为的划分

	未来行为主体（Agent）	未来行为受益者（Beneficiary）
提议（Proposal）	自身和他人	自身和他人
提供帮助（Offer）	自身	他人
请求（Request）	他人	自身
建议（Suggestion）	他人	他人

3.2 “哈”字句的指令性行为识解与道义立场表达

基于对自然会话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指令性行为中的语气词“哈”经常出现于机构语境（institutional settings），如：医院、学校、办公场所等，多为目标驱动的任务导向型对话（Drew & Heritage 1992: 22）。相较于日常生活对话，机构性会话一般篇幅较为精简并具有特定类型的发生场景，交际双方在道义和知识上存在不对称的现象，即代表机构的一方的知识状态明显优于非机构一方的知识状态，因而拥有更高的权威去宣告自身的道义权利。就行为归属而言，表达道义立场的“哈”字句多见于请求、建议和提供帮助三类行为中，用以让渡部分道义权威及其相应的责任，避免独自掌握实施行为的权利。

3.2.1 请求

说话人可以使用“哈”字句执行请求行为，即让听话人为自己做事以获取帮助，其在序列一般为“提出请求—做出回应”结构。例如：

（4）（老师请求学生帮忙转交材料）

1 D: R 老师，下午好。

- 2 R: 诶=你来得正好 (0.4)
 3 等会有个学生来找我.但是我现在=得去开会。
 4 D: 嗯=
 5 R: 等会他来了, 你就把这个发票这些材料.给他。
 6 D: 嗯=好的。老师, 需要登记啥的吗?
 7 R: 不用不用, 你把这些东西给他就行。
 8 D: 好的。
 (23s)
 9 → R: D, 我走啦.你帮我东西给一下哈 (0.5) 有事微信找我。
 10 D: 好嘞。

(日常对话录音)

这是是大学行政老师 R 和学生助管 D 之间的一段对话, 对话发生场景在学校办公室。R 希望 D 帮忙转交发票材料, 在正式的请求行为开始之前, 说话人首先发出了一个告知 (inform) 前序序列 (第 3 行), 在阐述自身需求的同时也对请求被接受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在得到 D 的确认后, R 立马提出了请求, 并就具体流程展开短暂讨论。临走之前, R 使用“哈”字句再次向 D 明晰了请求, 以缓和宣告的方式结束了这一行为。

3.2.2 建议

建议行为的实施主体和受益者均为他人, 即让某人做对其有好处的事情。通常认为, 交际双方的知识或道义状态不对称驱动着建议行为的执行与识别。如:

- (5) (“马路天使”环卫工人岳大姐)
 1 → 岳大姐: 小杨, 早啊, 等会撮堆儿哈 (0.8)
 2 几点来的?
 3 小杨: 四点=就到这了。

 4 岳大姐: 大姨, 别往这扔了.大姨, 这不是垃圾点。
 5 大妈: 啊=不是这儿啊?
 5 岳大姐: 嗯=不是垃圾点。
 6 → 来, 我给你拿了吧, 明天就别往这放了哈。

(《新闻纵横》)

以上对话涉及两个场景: 在第一个场景中, 岳大姐首先向年轻同事小杨打招呼, 而后提醒她将垃圾归拢成堆儿并运走 (“撮堆儿”), 属于建议行为, 第 2-3 行则是一个关于小杨上班时间的“提问—回应”序列。在第二个场景中, 岳大姐对大妈未将垃圾放置在正确地点的行为予以制止 (第 4 行), 大妈的回应 “不是这儿啊?” 也反映了其较低的知识状态。之后, 岳大姐再次强调了 “此地不是垃圾点” 的信息, 并对大妈未来行为的执行提出建议。在两段自然会话中, 岳大姐由于自身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性而拥有更多的道义权利与决策权威, 因此均占据着更高的道义状态 (D+), “祈使句+哈” 格式的频繁使用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此时, 语气词 “哈” 实际上是对高道义立场的一种降级处理, 缓和宣告自己

的道义权威，从而减轻建议行为的强硬程度。

3.2.3 提供帮助

与请求、建议不同，提供帮助是由自身（self）发出的并使他人受益的行为。执行该行为的“哈”字句的特点主要包括：（1）未来行为动作是关涉自身的（determine their own doings）（Stevanovic 2013: 25）；（2）受话人往往是“专家”的角色。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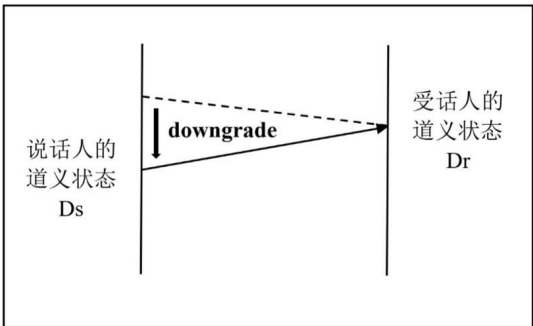
- （6）（“重庆粉王”平凡展示新菜品）
- 1 肖东坡：都叫什么菜啊？
- 2 平凡：比如说那个咱们知青时代的“革命生产大丰收”、咱们那个
 “祖国山河一片红”、“上山下乡走四方”等等等等。
- 3 要不要肖老师，给您这个再品尝品尝？展示展示？
- 4 肖东坡：展示展示？好，我来看看。
- 5 → 平凡：肖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哈。
- 6 肖东坡：嗯——
- 7 平凡：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山河一片红”……

（《乡约》）

肖东坡和平凡分别是本期《乡约》的主持人和嘉宾，被誉为“重庆粉王”的平凡试图介绍新菜品。在第 1-4 行中，两人达成了“展示菜品”的一致意见。接着，平凡在开始证实介绍菜品之前设置了一个预前序列（pre-pre），即第 5 行的“我给您介绍一下哈”，而“介绍”则是被投射的未来行为。从道义维度来看，“介绍菜品”的行为关涉平凡自身，按理说他拥有更高的道义权威去决定，但由于肖东坡是把握栏目节奏与进度的专家角色，对该行为执行同样具有一定的道义权威。此时，句末“哈”的使用则是通过降低自身的道义站位来寻求对方允准，使言语互动更加得体。

综合以上三类行为识解，我们认为语气词“哈”在指令性行为中普遍作为调整指令表达的一种缓和策略（mitigation）。说话人通过使用“哈”主动对自身的道义状态进行降级处理，从而减轻行为执行时的道义权威，通过让渡部分道义权利及其相应的责任来改变投射到目标行为上的强度和说服力。一方面可以达成想要实施的社交行为和特定的交际意图，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因其高道义状态与实际行为不相符而需要承担的责任。此时，交际双方的道义站位与立场表达如下图所示：

图 2：交际双方的道义站位与立场表达示意图



3.3 道义立场下“哈”字句的优选回应

指令行为序列通常由多个相邻对构成，前件一般为说话人发出的指令，后件则期待受话人对该指令的回应。本文搜集到了 97 例表示道义立场的语料，其中有 82 段对话中的回应话语表现出对指令性行为的完全接受，即“哈”字句的优选回应(preferred response)。从序列组织的角度来看，道义立场下的“哈”字句经常出现于非初始序列，即请求、建议、提供帮助等行动在前序序列中已初步达成行为预备，因此不必在回应序列中进行协商。从主体角色关系的角度来看，指令性行为中的交际双方多处于机构话语中，各自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权势关系，如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前辈与后辈等，因此在以“哈”字句寻求道义立场一致性后，双方道义状态趋于齐平，相关序列组织也随着受话人的肯定性回应而顺利结束。

但是，当说话人的道义地位没有以优选方式被承认时，他们倾向于通过信息确认的方式来敦促受话人明确未来行动。例如：

(7) (Z 和 H 为师生关系，Z 要求 H 完成一个任务。)

1 → Z: 那就先按咱们刚说的来，你搞好后发给我哈。

2 H: ((沉默，无回应。))

3 Z: H?

4 H: 啊?

5 Z: 你记得整理完微信发给我。

6 H: 嗯=好的。

(日常对话录音)

四、归一性解释：知识和道义的归属与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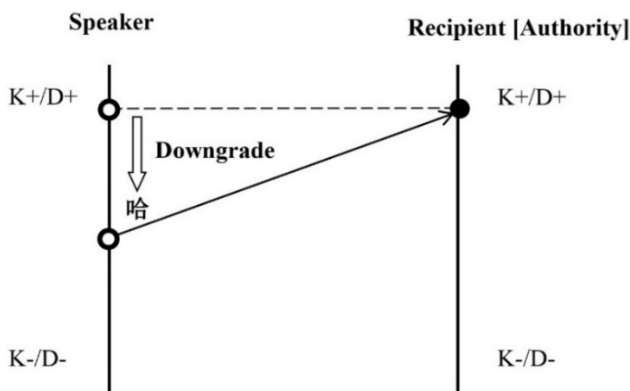
在话轮转换中，说话人经常根据受话人的知识背景和话语期待来设计并选择相应的会话内容和语言形式，即 Sacks et al. (1974) 提到的“受话人设计”(recipient design) 原则。在这一原则下，说话人不仅需要定位自身的权威与状态，更重要的是评估并假定对方的知晓程度和行为决定权威，从而形成了知识和道义在听说双方之间的归属(attribution) 和分配(distribution) (参看 Sidnell 2012; Drew 2018)。其中，“归属”指的是“谁拥有知识或道义权利与权威”，属于定性层面；“分配”则指“听说双方各自拥有多少权利与权威”，属于定量层面，二者共同成为话语立场构建与表达的本质性阐释维度。

Stevanovic (2013) 认为特定知识领域内的权威或专家更加具有制定未来行为的权利，即说话人在某个知识域内具有更高的知识状态，其道义状态相应也会高一些，享有更高的决策权威。因此，我们认为知识与道义具有展现一致倾向性的平行关系，这一点也可

以从 Palmer (2001) 对知识情态和道义情态的讨论中找到解释思路³⁵。

以知识和道义在听说双方之间的归属与分配为核心,我们将知识和道义立场下“哈”字句执行的四种行为的共性进行梳理与对比,可以得到以下立场表达示意图:

图 3: 权威归属与分配视角下“哈”的立场表达示意图



基于有限或共享的知识通道,说话人在句末使用小词“哈”展现出了较低的站位或降级原本较高的站位至部分知晓的站位,将自身置于知识与道义不饱满的状态,而定位对方为知识权威和道义权威 (authority, 见图 3 中右上方标示)。因此,知识立场和道义立场中的“哈”均是说话人以较低的站位将受话人标记为更高的知识或道义状态,从而请求对方参与到言语互动中,最终达成交际双方在立场上的一致。

五、结语

本文以知识论为理论根基对汉语小词“哈”的知识立场建构和道义立场表达进行分析,聚焦交际双方在言语互动中宣称和争夺知识权威的社交行为及其知识状态与站位表达,从而对“哈”的互动功能做出归一性解释。研究发现,不管是知识立场下“求确认”、“求证实”、“求认同”的行为,还是道义立场下“哈”字句的第一位置降级表达,小词“哈”均是说话人以较低的站位将对方标记为权威,邀请其参与到言语互动中来,从而达成立场一致。

语气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典型特征,也是汉语自然会话立场构建的重要资源。关于语气词“哈”,本文在知识论的阐释背景下对其立场表达功能做出了初步探索。但是,“哈”与其他语气词在功能上是否存在互补或对立,以及在现代汉语语气词系统中的地位,这些问题有待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探讨。

³⁵ 具体来说,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都与命题真值的可能性、真实性和必要性有关,前者注重确信程度的评估,后者则侧重于言语行为的施行。此外,说话人对某一命题真值的确信程度越高,就拥有越高的认识权威和道义权威,从而更加可能做出指令性行为,因此二者存在平行之处。

语料转写体例说明

→	表示会话序列中所要分析的焦点句子
(())	标注者的解释、评论或说明性文字
.	小于 0.2 秒的停顿
(0.5)	大于等于 0.2 秒的停顿, 括号内数字表示具体停顿时长
=	表示语音的延长, 每一个=表示一个延长的音节
.....	表示话轮的省略, 且内容与转写焦点不相关
[]	表示交谈双方话语重叠的部分
.hh	表示交谈中听得见的吸气声
@	表示笑声, 每一个@代表一个音节的笑声
XXX	表示模糊音, 每一个 X 表示一个音节

参考文献

- 崔希亮 2011. <语气词“哈”的情态意义和功能>,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4 期, 39-45。
- 高顺全、杨璐 2021. <从立场表达的角度看商城话语气词“好”与“啥”的区别>,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5 期, 116-122。
- 贺阳 1994. <北京话的语气词“哈”字>, 《方言》, 第 1 期, 60-63。
- 苏小妹 2008. <说说句末语气词“哈”和“哈”附加问句>,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第 4 期, 21-23。
- 尹世超 1999. <说语气词“哈”和“哈”字句>, 《方言》, 第 2 期, 95-103。
- 原苏荣 2008. <汉语的“哈”与英语的 Eh>,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第 3 期, 64-72。
- 周士宏 2020. <东北方言的“嚎”与“嚎字句”——结构层次与知识立场>,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第 5 期, 74-86。
- 宗守云 2020. <河北涿鹿话的互动语气词“噢”和“嗨”>, 《方言》, 第 3 期, 289-295。
- Couper-Kuhlen E. 2014. What does grammar tell us about action. *Pragmatics*, 24(3): 623-647.
- Couper-Kuhlen E, & Selting M. 2018.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ew P & Heritage J. 1992.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ew P. 2018. Epistemics in social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20(1): 163-187.
- Heritage J. 2012a.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45(1): 1-29.
- Heritage J. 2012b. The epistemic engine: sequence organiz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45(1): 30-52.
- Heritage J. 2013. Turn-initial position and some of its occupan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57: 331-337.
- Morita E. 2005. *Negotiation of Contingent Talk: The Japanese interactional particles ne and sa*.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merantz A. 1980. Telling my side: “limited access” as a “fishing” device. *Sociological Inquiry*, 50(3-4): 186-198.
- Sacks, H, Schegloff E.A. &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4): 696-735.
- Sidnell J. 2012. “Who knows best?”: evidentiality and epistemic asymmetry in conversation. *Pragmatics and Society*, 3(2): 294-320.
- Stevanovic M & Peräkylä A. 2012. Deontic authority in interaction: the right to announce, propose, and decide.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45(3): 297-321.
- Stevanovic M. 2013. Deontic Rights in Interaction: A Conversation Analytic Study on Authority and Cooperation.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Stevanovic M. 2018. Social deontics: a nano - level approach to human power pla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8(3): 369-389.
- Stivers T, Mondada L, Steensig J. 2011. Knowledge, morality and affili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 Morality of Knowledge in Conver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4.

The Epistemic and Deontic Modulation of Modal Particle “H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ics

Zhou Shihong and Duan Xiaozh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Mechanics and Electricity

[Abstract] Taking the recognition of social action as an entry poi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pistemic status and stance accommodation of interlocutors when using particle “ha”, thus analyzes epistemic stance expression and deontic stance expression. As far as the

epistemic dimension is concerned, sentences with “ha” can perform three types of social actions: confirming information, seeking verification, and seeking alignment, with a relative stance of “low–high” between the interlocutors. As far as the deontic dimension is concerned, “ha” appears in directives such as requests, suggestions, and offers, constituting the speaker's downgraded treatment of his/her own deontic footing. In conclusion, “ha” in both epistemic stance and deontic stance marks the speaker's lower position to signal the recipient's authority, inviting the latter to engage in discourse, ultimately reaching alignment on stance-taking.

11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their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LIU Na¹, LU Jun²

¹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²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127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honorific system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binary politeness distinction and multiple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with a majority of languages coming from the Tibetan branch. Morphologically, suppletion and affixation are primarily adopted, while inflectional methods are less common. Regarding their origins, most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re derived from the expansion of existing personal pronominal forms, such as the use of plural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and reflexive pronouns.*

Keywords: Tibeto-Burman languages; personal pronouns; honorifics; typology

1. Introduction

Honorifics are lexical items or morphological units that have the expression of politeness or formality as one primary aspect of their meaning. They are found widely across languages (see Agha, 1994 for a useful survey), and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linguistics, both from formal and informal perspectives. A wide range of expressions in natural language might be thought of as having an honorific character, or which sometimes function to mark or perform politeness (Shen, 2000; McCready, 2019). However, this diversity is neither random nor unconstrained. Languages have the choice between multipl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but only certain values within these categories are recruited for honorification. The recent paper by Wang (2023) on honorifics without [HON]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norific form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personal pronouns. Wang's (2023) analysis aligns with LaPolla's (2015) argument on the cultural and cognitive underpinnings of linguistic

Liu, Na and Lu, Jun. 2025.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their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Chenglong Huang, Xu Yang (eds.)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Randy J. LaPolla*, pp. 172–198.

structures, emphasizing that honorific forms are deeply embedded in cultural norm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Specifically, LaPolla (2015) emphasizes that linguistic structure arises from cultural and cognitive patterns. LaPolla (2015) argues that communication is not about coding-decoding but about ostension and inference, where speakers use repeated linguistic patterns to constrain interpretation. These patterns are shaped by the speakers' cognit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influencing how meaning is communicated. Over time, conventionalized linguistic forms reflect societal values and cultural norms, which also shape cognitive categories, linking language closely with culture.

Language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such as China, Japan and Korea, have developed a complex system of honorifics over a long perio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many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Tibetan-Burmese communities, have also developed quite a complex system of honorifics after undergoing the rule of feudal dynasties (Hu, 1985; Guillaume, 2008). These honorifics are partly reflected in the pronoun system, especially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s. At present, studies on honorifics are concentrated in a few languages such as Japanese and Korean, and there is a relative lack of studies on Chinese honorifics, and even fewer studies on honorific forms of Tibetan-Burmese personal pronouns. Given th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ersonal pronouns of 127 Tibetan-Burmese languages (cf. Sun, 2013), and finds that 23 of them have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even language branches: the Tibetan branch, the Yi branch, the Qiang branch, the Naga Bodo branch, the Kuki-Chin branch, the Himalayan branch, and the Karen branch.

2. Tibetan-Burmese Pronoun Honorific Forms

2.1 Tibetan Branch

Statistically, among 24 Tibetan sub-languages or dialects, ten of them have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cluding Tibetan Lhasa, Purik Tibetan, Ladakhi Tibetan, Amdo Tibetan, Dzongkha, (Metok dialect of Monba), Lhomi, Kurtop, Denjongke, and Newar dialects.

Among them, the Metok dialect is quite unique, unlike other languages that have specialized forms of honorific pronoun, the Metok dialect pronouns have the form of abomination³⁶, which

³⁶ We consider honorific speech to be a relative concept; for example, Japanese honorific speech exists in the form of respect for the other and self-effacement, with the former reflecting respect by elevating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latter showing respect for the other person by demeaning oneself. When there is a form of demeaning, the regular form is relatively the more polite way of saying it, so we include the demeaning form in the honorific system.

is used for people who are disgusted, but not for family members. It mainly appears in third-person pronouns:

(1)		Non-honorific	Derogatory
3 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roʔ	dan
	dual	roʔeɪŋ	dacɪŋ
	plural	rokte(ba)	dai
			daite

(Sun et al., 1980: 83)

The main means of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in several other languages are the following:

1) Addition of quantity morphemes or reflexive morphemes

After the original personal pronouns, the morphemes with quantitative meanings are added, such as in LhasaTibetan, whose non-honorific first-person dual inclusive is ང་རང་གཉིས་ (first-person + self + numeral2), meaning “both of us”, and whose honorific form is ང་རྒྱུ་གཉིས་ (Zhou and Xie, 2003), where རྒྱུ་ is derived from རྒྱུ་པ་, meaning “you all” “all of you”. The use of རྒྱུ་པ་ as a plural marker derives from its grammaticalization as a noun “kinds, styles”. (Wang and Chen, 1983: 280) There is also the first-person plural inclusive ང་རང་ཚེ་ (first-person + self + plural marker), meaning “we”, with the honorific form “ང་རྒྱུ་ཚེ་”.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i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ཁྱེ་རྒྱུ་ཚེ་ as well as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ཁོང་རྒྱུ་ཚེ་. Several of the pronouns mentioned above have the morpheme ཚེ་, which expresses respect through the double plural marker, added in spite of the existing plural marker རྒྱུ་.

The only language in which honorific forms are currently found in first-person pronouns is Lhasa Tibetan. Helmbrecht’s (2001, 2003) survey of honorific personal pronoun in 100 languages showed that honorific forms existed in the personal pronouns of 25 % of the languages, and that only a third of these languages (7% of the total) had honorifics in their first-person pronouns. This includes Burmese, Thai, Japanese, Korean, Indonesian, and Vietnamese. He suggests that the presence of honorifics in the first-person pronouns of these languag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pronoun avoidance” phenomenon, whereby, firstly, these languages encode a variety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ir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and, secondly, the speakers of these languages do not like to use personal pronouns to refer to a particular speech act participant (Helmbrecht, 2004). Cao (1994) points out that in Tibeta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address, ལགས་ or མཚོག་ is usually added to the name, title, or position, thus constituting a respectful address. If this kind of honorific address is prioritized in daily life, it is in line with the view put forward by Helmbrecht, that is, Tibetan does not tend to be referred to directly by personal

pronouns.

A similar strategy is also found in Denjongke, another language of Tibetan branch, where the honorific form of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singular is represented by the plural of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non-honorific form, although no plural morpheme is added directly after the non-honorific pronoun. In addition, its honorific plural form is overlaid with a variety of plural markers, with khõ: itself being plural, ʎɛŋɣɛ: originally meaning “everyone, everybody”, and tsu being a plural suffix:

(2)		Non-honorific forms	Honorific forms
3 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khu (male)	khõ:
		mù/mò (female)	khõ: ʎɛŋɣɛ:
	plural	khõ:	khõ: ʎɛŋɣɛ:(=tsu)
			(Yliniemi, 2019: 240)

A similar phenomenon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Jiang (1957), who found that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in Jiangsu Ganyu could indicate both the personal plural and serve as honorific for the singular second-person.

Another way of constituting the honorific form of pronouns in Tibetan branch languages is the addition of reflexive morphemes, such as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of Lhasa Tibetan :

(3)		Non-honorific forms	Honorific forms
2 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chøʔ ⁵³ chøʔ ⁵⁵ ra ⁵³ che ra raŋ	cheʔ ⁵⁵ raŋ ⁵⁵
	dual	chøʔ ⁵⁵ ŋiʔ ⁵³ chøʔ ⁵⁵ ra ⁵⁵ ŋi ⁵⁵	cheʔ ⁵⁵ ŋiʔ ⁵³ cheʔ ⁵⁵ raŋ ⁵⁵ ŋi ⁵⁵
	plural	chøʔ ⁵⁵ tsho ⁵³ chøʔ ⁵⁵ raŋ ⁵⁵ tsho ⁵³	che nam ŋi che ⁵⁵ tsho ⁵³ cheʔ ⁵⁵ raŋ ⁵⁵ tsho ⁵³ che nam tsho che nam pa
			(Zhou, 2003: 229)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form also undergoes a vowel alternation in the root , followed by the reflexive pronoun རེག་, and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third-person pronouns, but with the phenomenon of synaeresis occurring in the third-person

pronouns:

(4)		Non-honorific forms	Honorific forms
3 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kho ⁵³ kho ⁵⁵ ra ⁵³ po: mo ¹¹ raŋ ¹⁴	khonj ⁵⁵
	dual	kho ⁵⁵ ŋi ⁵³ kho ⁵⁵ raŋ ⁵⁵ ŋi ⁵⁵ moranŋi	khonjŋi khonj ⁵⁵ nam ⁵⁵ ŋi ⁵⁵
	plural	kho ⁵⁵ tsho ⁵³ kho ⁵⁵ raŋ ⁵⁵ tso ⁵³ morantsho	khonj ⁵⁵ tsho ⁵³ khonj ⁵³ nam ⁵⁵ tsho ⁵³

(Zhou, 2003: 229)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is kho for non-honorific and khonj for honorific, which appears to be different root but in fact its honorific form is the result of synaeresis of kho raŋ.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s of synaeresis is “nin” in Mandarin Chinese, which is derived from “ni + mən” (literally you+plural marker)(Wang, 2016) or “ni + lau”(literally you+old) (Lyu, 1985).

Identical to Lhasa Tibetan is Denjongke , where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of Denjongke has the non-honorific khu, and the corresponding Tibetan is ཁྱེ, with the honorific pronoun khō:

(5)		Non-honorific	Honorific
3 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khu(male) mù/mò(female)	khō: khō: ʎeŋge:
	plural	khō:	khō: ʎeŋge:(=tsu)

(Yliniemi, 2019: 240)

Similarly, there is the Ladakhi dialect of Tibeta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in the Ladakhi dialect also requires the reflexive pronoun rəŋ to be attached, but the roo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on-honorific form. The honorific form of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on the other hand, is consistent with Lhasa, and we hypothesize that this form is also the result of synaeresis of singular pronouns and reflexive pronouns:

(6)			Non-honorific	Honorific
3 rd person pro	singular		kho	khon
noun	plural		khogun/kun/sək	khongun/kun/sək

(Koshal, 1979: 109)

There is also the Amdo dialect (Gonghe County), whose thir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form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Lhasa and Ladakh dialects, with the same presence of the reflexive pronoun ran, and an r sound in its third-person pronoun non-honorific,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ran, and whose source of the honorific form needs to be further examined to see if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Lhasa and Ladakhi dialects:

(7)			Non-honorific	Honorific
3 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khə(r)ga(male)	khon
			mə(r)ga(female)	
	dual		khənika(male)	khonika
			mə(r)genika(female)	
	plural		khətəho	khontəho

(Ebihara, 2018: 58)

2) Vowel alternation

This morphological process is not found in many Tibetan sub-languages, as in the case of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second-person pronoun in Tibetan Lhasa:

(8)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 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chø ⁵³	che ⁵⁵ ra ⁵⁵
			chø ⁵⁵ ra ³⁵	
			che ⁵³ ra ⁵³	
			ran ¹³	
	dual		chø ⁵⁵ ni ⁵³	che ⁵⁵ ni ⁵³
			chø ⁵⁵ ra ⁵⁵ ni ⁵⁵	che ⁵⁵ ra ⁵⁵ ni ⁵⁵
				che nam ni
	plural		chø ⁵⁵ tsho ⁵³	che ⁵⁵ tsho ⁵³
			chø ⁵⁵ ra ⁵⁵ tsho ⁵³	che ⁵⁵ ra ⁵⁵ tsho ⁵³
				che nam tsho
				che nam pa

(Zhou and Xie, 2003: 229)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honorific form uses vowel alternation, changing the vowel *ø* in the root to *e*. In fact, the root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རྩེད་ is also related to the first form mentioned above, since in Old Tibetan རྩེད་ was only used as the plural form of the neuter second-person pronoun rather than as a honorific pronoun (Hill, 2010). Essentially, the honorific form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in Lhasa also developed from the plural form.

Another example is Amdo dialect of Tibetan (Gonghe County), where the *o/i* in the non-honorific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becomes the *e* in the honorific (Ebihara 2019):

(9)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tcho	tchel
	dual	tchiŋika	tehe(l)ŋika
	plural	tchitcho	tehe(l)tcho

3) Suppletion

This strategy is most common in the Tibetan sub-languages, where honorific pronouns use a different root than non-honorific pronouns. For example, in the Purik dialect of Tibetan, the honorific form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uses a different root from the non-honorific form, with the honorific form having the root *ja-* and the non-honorific form having the root *khje-*.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s also have a synaeresis form, *khjaŋ*,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honorific forms are also similarly merged:

(10)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khjeraŋ	jaŋ
		khjaŋ(univerbation)	jaŋ(univerbation)
	plural	khintaŋ	

(Zemp, 2018: 248)

The same situation also applies to the Ladakh dialect of Tibetan, where the root of the second-person non-honorific is *khjo-*, while the root of the honorific is *je-*.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exclusively derogatory *khjot* in Ladakh dialect, the origin of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the same with the second-person non-honorific རྩེད་ of Lhasa. Due to the more frequent use of *khjo+r əŋ*, it has replaced the regular form *khjot*, and *khjot*, which was originally a common second person pronoun,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derogatory form:

(11)			Non-honorific	Honorific	Derogatory term
2nd	person	singular	khjorəŋ	ɲerəŋ	khjot
pronoun		plural	khjorəŋgun/kun/sə	ɲerəŋgun/kun/sə	khjodgun/tkun/ʈsə
			k	k	k
			khjəʒə (Muslim)	ɲeʒə	
			khjəʒəgun/kun/sək	ɲeʒə/gun/kunsək	

(Koshal, 1979: 109)

Second-person pronouns in Dzongkha likewise use different roots, tʃhø and na-, to distinguish honorifics from non-honorifics, with the Dzongkha honorific na deriving from the proximal locative pronoun -na:

(12)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tʃhø	na
	dual		tʃheɲi	naɲi
	plural		tʃhe	natʃha:tʃhap
			tʃhetʃha:tʃhap	

(Watters, 2018: 189)

Similarly to Dzongkha, Kurtöp also uses the proximal demonstrative “tsho(here)” as a honorific form of second-person :

(13)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wit	tsho
	plural		nin	

(Hyslop, 2011: 370)

The non-honorific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in Lhomi is 'khət or raŋ, and its corresponding honorific form is nitəa-, whose non-honorific form, raŋ, seems to be consistent with reflexive in Lhasa, and can be used either as a reflexive pronoun to mean ‘oneself’ or as a second-person pronoun singular, but in a lower level form used only between very close people or by adults for children..’khət, on the other hand, is used between acquaintances, people of the same age or class. The honorific form nitəa-raŋ was initially popular in only one village then gradually spread, and is not yet accepted by all Lhomi people:

(14)	Low level	Non-honorific	Honorific
singular	raŋ	‘khøt	niteaŋ nitea-raŋ
plural		‘khit, ’khis-so	

(Vesalainen, 2016: 22)

Both second and third-person pronouns of Denjongke have honorific forms, where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first level *təhøʔ* is used when addressing close friends, social inferiors, or people the speaker looks down upon. The second level, *rã:*, is used for those who are equal or inferior to oneself, and it shares the same origin as the reflexive pronoun *rang* (རང་, meaning "self") in Lhasa Tibetan, which also serves as a non-honorific second-person pronoun in Lhasa. Its honorific form is *ʃeŋgeʔ* རྒྱལ་གྱིས་, which is used for people who have a higher social status than one's own, strangers, or people deserving respect. *ལྷན་གྱིས་* means “everybody, everyone, all of you”, and the honorific form is singular-plural homogeneous, but it can be followed by a plural marker, *tsu*. *ʃeŋgeʔ* can be used with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as well. Since *ʃeŋgeʔ* can be used in both the second and third-person, its exact meaning sometime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15)		Non-honorific	Honorific	Derogatory term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i>rã:</i>	<i>ʃeŋgeʔ</i>	<i>təhøʔ</i>
	plural	<i>rã:tsu</i> <i>k'uteaʔ</i>	<i>k'utea ʃeŋgeʔ</i> <i>ʃeŋge:(=tsu)</i>	<i>təhø:=tsu</i>

(Yliniemi, 2019: 240)

The honorifics of the Newar second-person pronouns also use a suppletive root, with *tʃhi* in the non-honorific form and *tha-* in the honorific form, which is typically used when addressing the elders, gods, or benefactors. Since the use of honorifics is non-obligatory, they are not frequently used.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16)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i>tʃhi</i>	<i>thamu</i>
	plural	<i>tʃhipen</i>	<i>thapen</i>

(Genetti, 2007:130)

All 10 languages of the Tibetan branch use the means of suppletion for the honorific forms of their pronouns. On top of this, there is vowel alternation in the Amdo dialect, adding quantitative morphemes in Lhasa, and reflexive morphemes in dialects such as Ladakhi. Overall, the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different lexical forms instead of making morphological changes based on the original pronouns. In terms of perso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s of nine languages have honorific forms, the third-person pronouns of five languages also have honorific forms, and of the languages counted so far, only Lhasa Tibetan has honorific forms in the first-person. Thus there is a sequence of implicational hierarchy in the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in the Tibetan branch of languages: i.e., honorific forms for first-person pronouns > honorific forms for the third-person > honorific forms for the second-perso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equence of personal pronoun politeness hierarchies proposed by Helmbrecht (2004), who, by counting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in which honorific pronouns occur, states that the first-person is least likely to acquire the honorific/non-honorific distinction, while the second-person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politeness distinction, and the third-person is somewhere in between. This pattern, however, is not absolute in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such as Hakhun Tangsa, mentioned later.

Although the examples above show that the Tibetic languages have a relatively rich variety of strategies for expressing honorifics, overall, only a minority of these languages actually employ honorific forms in their pronominal systems. . This may be related to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According to Cao (1994) , the use of honorifics in early Tibetan literature was limited both in scope and target, mainly for monarchs and religiously related such as the Buddha, and only in later periods was it expand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addition, the early honorifics did not change in rank, an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er feudal dynasties and the further refinement of class and religion, the system of honorifics developed further. Häsler (1999) has examined the honorifics of the Tibetan dialects in the Kham region, and found that the use of honorifics is not as common as in the Ü-Tsang Tibetan region, with the number of honorific nouns in the Dege dialect being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ongwang Tibetan. Bartee (2007) argues that the Dongwang region, which is predominantly farmers, lacks the social strata that would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orifics. In most cases, honorific expressions—when used—conveyed distance or anger rather than respect, except in very limited contexts. This is largely true for other languages lacking developed honorific systems as well. In addition, some languages do possess honorific systems or expressions, but these are not reflected in personal pronouns., such as Kurtöp, where some nouns and verbs have honorific forms (Hyslop, 2011), e.g. the word *luspu* ‘body’ has the honorific form *kuzu*. Similarly, in Machu Tibetan, honorifics are used within a specific context, mainly when addressing high-ranking monks such as living Buddhas and occasionally important guests. They are not used casually (Zhou, 2003). For example, *hzək* “to see”, its honorific form is *rta*. Some nouns and verbs in

Tshangla have honorific forms, mainly borrowed from Dzongkha or Tibetan. Its pronouns,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have specialized honorific forms (Andvik, 2010).

2.2 Yi Branch

Among the 35 Yi languages, only four Bai dialects and the Lijiang Naxi have honorific forms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namely, the Zhaozhuang Bai, the Qinghe Bai, the Baishi Bai, and the Jinhua Bai. Listed below:

(17)		Non-honorific	Honorific
Bai : Zhaozhuang		nɔ ³³	ŋi ⁵⁵
Bai : Qinghe		nǎu ³¹	nǐ ⁵⁵
Bai : Baishi		nɔ ⁴²	nu ⁵⁵
Bai : Jinhua		no ³¹	ji ⁵⁵
(Zhao, 2009; Zhao, 2010; Yang, 2014; Xu and Zhao, 1984)			

As they are different dialects of the same language, these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phonological form and means of expression, except for the Jinhua dialect, which employs suppletion, the other dialects use inflectional strategies: vowel alternation and tonal alternation. The honorific forms lack morphological methods compared to the non-honorific forms. In these dialects, the non-honorific pronouns exhibit inflectional changes between the nominative-accusative case and the genitive case, whereas such inflectional distinctions are absent in the honorific pronouns.. Compared with the Tibetic languages, the honorific forms of the pronouns of Yi languag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obtained by morphological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the non-honorific pronouns.

In contrast, the Lijiang Naxi pronoun honorific system is much more complex, basically using lexical form:

(18)			Non-honorific	Honorific
1st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ŋə ¹¹	
	plural	exclusive	ŋə ³³ ŋgu ¹¹	
		inclusive	ŋə ⁵⁵ ŋgu ¹¹	ŋa ²⁴ ŋgu ¹¹ (affability)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nu ¹¹	na ²⁴ (junior)
				ma ²⁴ (relative)

			ŋv ⁵⁵ (elders)
			wu ³³ (peers)
			eiã ³³
	plural	nur ³³ ŋgu ¹¹	wu ³³ /wa ⁵⁵ /ŋv ⁵⁵ /eiã ³³ +xə ³³
			na ²⁴ +ŋgu ¹¹ /xə ³³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thu ³³	the ¹¹ ŋgv ³³ (affability)
			the ¹¹ ŋgv ³³ mu ⁵⁵ (honorific)
	plural	thu ³³ ŋgu ¹¹	
		tha ²⁴ xə ³³	
		tha ²⁴ ŋgu ³³	

(Yang, 2004: 292)

The second-person is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age of the target and kinship, in practice, the direct use of nur¹¹ (subject-object) or nur³³ (agent/possessives) is considered impolite, These forms are generally used when addressing someone of lower status or among close peers with an informal relationship. In other contexts, using these pronouns is usually avoided.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the¹¹ŋgv³³ expresses both closeness and respect,, while the¹¹ŋgv³³mu⁵⁵ is honorific, where mu⁵⁵ means “older” and it is used when referring to someone older or deserving of respect (Yang, 2004).

In addition to languages mentioned above, we actually find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in Sadu. However, unlike the previously discussed languages where honorific pronouns correspond to unmarked forms (such as the nominative or absolutive case), in Salar the honorific forms appear in the genitive case. The Sadu first-person pronoun singular is ŋo²¹, while its genitive case has five types, wua³³, wua⁴², wua⁵⁵, ŋo²¹, ŋo²¹ge²¹, which are used for categories of senior relatives, wua³³is used for elders such as grandparents, parents, and in-laws; wua⁴²is used when referring to aunts (especially maternal aunts), sisters-in-law, and similar kinship terms; and ŋo²¹is used for uncles and aunts (including paternal uncles and their spouses), sons-in-law, daughters-in-law, sons, daughters, and so on (Bai et al., 2012).

wua ³³ po ³³ : my grandfather	wua ⁴² mo ²¹ le ³³ : my second aunt
ŋo ²¹ ta ⁵⁵ te ³³ : my uncle	ŋo ²¹ ge ²¹ ku ³³ : my relatives

The genitive form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person pronouns also show similar distinctions., For the second person singular, the nominative form is nə²¹, while its genitive forms are na³³, ne³³ge²¹, na⁵⁵, and nə²¹. Among these, na⁵⁵ is an honorific form used when referring to elders such as older sisters and aunts (on either side), as well as relatives of the grandparents' generation. nə²¹is the neutral (non-honorific) form, used only for younger siblings, such as younger sisters.

For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the nominative form is i³³, and its genitive forms are i³³, za³³, and i³³ge²¹. Among these, za³³ is the honorific form, used when referring to elders such as grandparents, parents, and older sisters.

2.3 Qiang Branch

Languages within the Qiangic branch that exhibit pronominal honorific forms are relatively few. Among the 28 languages or dialects surveyed so far, three dialects of rGyalrong language have honorific pronouns, namely, the Mora dialect, the Kyom-kyo dialect, and the Cog-tse dialect.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re as follows:

Mora dialect:			
(19)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nəɖʒo	nəʒo
		nəɖʒi	
		nəɖʒoɖʒis	
	dual	ɖʒidʒo	nijɔne
		nəɖʒoʒo	
		ɲidʒo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ɲo	
		wuʒo	
		wudʒo	
		mə	
		wumə	
		məza	
	dual	wuʒoɖʒis	
		wudʒoɖʒis	
		wuʒɔne	
	plural	wudʒoʒo	
		wudʒɔne	
		ɲijɔne	
		məne(jo)	

(Nagano, 2018: 37)

The pronominal honorifics in these dialects appear in both the second and third persons. Example (19) reveals that -jo in the second-person honorific nəʒo likely functions as a plural marker, while its root agrees with the singular person. Similarly, the honorific nijɔne of

singular third-person pronoun can also serve as a non-honorific plural form. Therefore, similar to some languages in the Tibetic branch, Mora Gyalong expresses respect through the singular use of the plural form.

The same situation occurs in the Kyom-kyo dialect. In traditional rGyalrong society, where social status is taken more seriously, the neuter form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honorific form by adding the plural suffix -no to the noun or pronoun in Kyom-kyo dialect (Prins, 2016). Such as:

(20)

smonde=no	sloppən=no	nəŋjo=no
doctor=plural marker	teacher=plural marker	you=plural marker
doctor (honorific)	teacher (honorific)	you (honorific)

There is also a third-person singular pronoun, wuna, in Kyom-kyo dialect, which is often used by adults for children, with a sense of condescension. Prins (2016) suggests that wuna can be analyzed as a pejorative or modal pronoun that elevates the speaker by demeaning a third party.

The honorifics of the personal pronouns of Cog-tse rGyalrong are also expressed through plurality, as follows:

(21)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no	ŋo
	dual	ndʒo	
	plural	ŋo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wəjo	wəjo-ŋe
		mə	mə-ŋe
	dual	wəjo-ndʒəs	
		mə-ndʒəs	
	plural	wəjo-ŋe	
		mə-ŋe	

(Lin, 1993: 98, 176)

Where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ŋo agrees with the non-honorific plural,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is added to th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with a plural suffix. As with Kyom-kyo dialect, this approach not only transforms common pronouns into honorific forms, but can also be added after other words such as appellation to change them into honorifics.

Overall, the languages of the Qiang branch, although more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plural in the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In addition, like the Tibetic languages, the Qiang branch also has some languages in which honorific expressions exist but are not reflected in the pronoun system. For example, Muya languages have honorific verbs when it comes to religion, temples, etc., but nouns or other word classes seldom have honorific forms (Bai, 2019).

2.4 Naga-Bodo Branch

There are fewer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Naga Bodo languages, and so far the only descriptions of honorifics are found in Hakhun Tangsa, which is unique in that its honorific pronouns occur only in the third-person, as follows:

(22)		Non-honorific	Honorific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atî(familiar)	atîvâ(unfamiliar male) atîpù(unfamiliar female)
	dual	hənî mîni/vàhî tânî(mîni/vàni)	
	plural	hənîrûm târûm	

(Boro, 2017)

The language first identifies whether the referent is a familiar person, and does not use honorifics if it is a familiar male or female, and if it is an unfamiliar male or female, the affixes -vâ or -pù is added to the original singular third-person pronoun. These suffixes are derived from vâ “father” and pù “mother”, respectively, in the language. This suffix thus conveys both gender and serves as a honorific suffix. They can also be attached to other nouns to show respect, as in the case of mé-pù “cow” (Bora, 2017).

2.5 Kuki-Chin Branch

The honorific form of the pronoun is also currently found only in Karbi.

(23)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naŋ	naŋli
	plural	naŋli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alan
		anaŋ
	plural	alanli
		anaŋli
		anali
		la(hel)

(Philippova, 2021: 85)

The second and third-person pronoun plural forms are realized by adding the honorific suffix -li to the singular personal pronou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plural also serves as a honorific (Philippova, 2021).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lural pronouns are also used as honorifics. Helmbrecht (2003)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second-person singular honorifics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person plurals, the third-person singular, demonstratives, reflexive pronouns and even kinship appellation, and appellation that indicate status. In his survey of 100 languages, in 25% of the languages where personal pronoun honorifics exist, 16% of the honorific pronoun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second-person plural. Chen (2008) notes that honorification is one of the triggers for the singularization of the plural of personal pronouns. we observe a similar phenomenon in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although not in the second person, but in the third person. Take the case of Lhomi as an example:

(24)		Non-honorific	Honorific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roo	‘khon
		gotta	
		‘khontso	
	plural	roo-so	
		‘khontso-so	
		‘kho-pa	
		‘kho-pa-so	

The third-person singular pronoun *‘khontso* means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same group”, and it consists of the third-person singular honorific *‘khon* followed by the noun *tso*. It consists of the third-person singular honorific *‘khon* followed by the noun *tso*, “a group of people, a gathering of people”, but when combined together it is used as the third-person singular instead of the honorific (Vesalainen, 2016). In addition, a similar phenomenon occurs in the Denjongke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where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plural *khō* also serves as a honorific for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singular, as well as in several dialects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s. Among languages in the Burmese branch, although specific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are not found, similar phenomena exist. For example, in Bola, in the genitive case of personal pronouns, when a possessive modifier refers to someone, the singular form is neutral, while the plural form may express humility or respect—particularly when addressing elders. (Dai et al., 2007). Heine and Kuteva (2012: 319) point out tha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such as using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to refer to singular objects is very common, with these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often evolving into singular honorific forms. As mentioned earlier,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English second-person pronoun ‘you’ and the French ‘vous’, both of which have transformed from plural to singular forms.

Regarding the phenomenon of using plural forms to indicate singular honorifics, Helmbrecht explains it through face threat theory, suggesting that when speaker X lacks authority or the ability to request something from addressee Y, using the second-person plural to refer to Y assumes a hypothetical group of listeners, thereby diffusing or weakening the obligation or responsibility placed on Y (Helmbrecht, 2003). Chen (2008), on the other hand, points out that one of the motives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e communicative mode, i.e., in the typical mode of two-party dialogues, if a plural form is used deictically or anaphorically but only one individual is present, the plural form semantically shifts toward a singular meaning. There is also a singularization of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plural they in English, when describing a third-person, where either he or she would be inappropriate due to the lack of clarity about his or her gender, and *they* would be used in this case. This usage mirrors the patterns observed in the honorific systems of Tibeto-Burman pronominals.

2.6 Himalayan Language Branch

Of the 13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n branch, one language has been found to have an honorific form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namely, Bunan, whose second-person pronoun has a non-honorific stem of *han-* and an honorific form of *ini-*.

(25)		Non-honorific	Honorific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han	ini
	plural	hanei	iniei

(Widmer, 2014:273)

The honorific form of Bunan agrees with the form of its emphatic pronoun; *ini* in the example below is an emphatic pronoun, and Widmer suggests that the honorific form may derive from the emphatic pronoun (Widmer, 2014):

(26)

han	ini=re	doŋ=thir-a	riŋ-k-are
2sg	yourself=EXT	come.IMP=send-IMP.SG	say-INTR-PRS.DJ.SG

“‘You yourself come with us as well!’, he said.” (Widmer, 2014: 276)

In addition, the Dhimal language exhibits derogatory forms in its third-person pronouns:

(27)		Non-honorific	Derogatory term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wa	ya
		ya(proximal)	
	dual	udhimi	
		idhimi(proximal)	
	plural	obalai	
		ebalai(proximal)	
		imbalai(distal)	

(King, 2008: 66)

Among them, the third-person singular wa is an unmarked form, while ya with some spatial attribute (proximal reference) is used for non-human things or for pejorative references to people. Additionally, the language has a set of forms kja and nja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person pronouns that are used exclusively between relatives. As King notes, these forms represent archaic plural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person pronouns.

2.7 Karen Language Branch

The number of languages of the Karen branch in the current sample is small, and the one language in which the presence of honorifics for pronouns was found is Kayah.

(28)		Non-honorific	Humilific
1st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vē	ʔū
	plural	pe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ʔa/lū/ʔū	
	plural	jesī(rare)	
		ʔa/lū/ʔū	

(Solnit, 1997: 183)

Kayah has three third-person pronouns that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singular and plural, of which ꞥu also serves as a first-person modal pronoun. This is less common in the languages of Southeast Asian mountain cultures (Solnit, 1997: 184).

From the discussion above,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23 languages within the Tibeto-Burman family exhibit corresponding honorific forms in their pronominal systems. These honorifics are primarily expressed through suppletion and the singular use of plural forms., In some languag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are applied to different personal pronoun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ir origins are not uniform.

3.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in Other World Languages

From the analysis abov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jority of languages with honorific systems primarily apply these distinctions to second-person pronouns. Helmbrecht (2001) examines the polite forms of second-person pronouns across 207 languages and categorized these languages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whether polite forms are present i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s:

3.1 Second-person Pronouns without Honorific Forms (136/207)

About 65%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do not have honorific forms for their personal pronouns, which is also evident in the case of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and the proportion is even higher in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where 104 languages or dialects (82%) do not have honorific forms for their personal pronouns. For example, the Darma of the Tibetan branch:

(29)

1st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ji
	plural	niŋ
2n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ge
	plural	geŋi
3rd person pronoun	singular	ꞥu
	plural	wi

(Willis, 2007: 199)

Its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is relatively simple, distinguishing only between singular and plural, and there is no inclusive-exclusive distinction for the first-person, and none of the three personal pronouns have honorific forms.

3.2 Second-person Pronouns with Binary Honorific Distinction (i.e., honorifics and non-honorifics, 49/207)³⁷

This pattern is most common when honorifics occur in second-person pronouns, accounting for 23.7% of the cases. For example,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ni-nin” in Mandarin Chinese is a typical honorific/non-honorific dichotomy. According to Wang Cong, “you + old man (or its variant)” in many official dialects for honorifics can also be categorized in this category (Wang, 2016). In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this pattern is also the most common. out of the 23 languages with honorific forms of pronouns, 14 languages or dialec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ype 2, accounting for 11%.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s Structures, according to Helmbrecht’s categorization, languages with binary honorific distinction of second-person pronouns are mainly found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forms in Tibetan-Burman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bias, mainly because of the small number of samples included in this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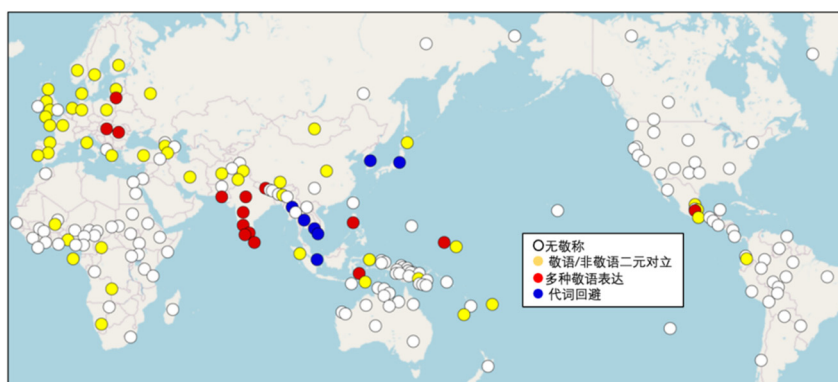


Figure 1: Patterns of second-person honorifics in world languages (cf. Helmbrecht, 2013)

3.3 Second-person Pronouns with Multiple Honorific Levels (15/207)

It refers to personal pronouns with two or more degrees of politeness distinction. This type of language is also relatively rare in the statistical sample, accounting for only 7.2%.

³⁷ According to Helmbrecht (2013), dichotomies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fact that pronouns do not differentiate between more than one degree of politeness, and even though there are multiple honorific forms, they are dichotomized if they differentiate between only one degree of honorific/non honorific. For example, in Polish *wy* and *Pani*, the former is used in rural areas and the latter in urban areas. However, both express the same degree of respect, so it is still a dichotomy.

Worldwide, it occurs mainly in India and in some languages of Eastern Europe, where there are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in politeness and multiple second-person pronouns are used depending on the addressee. For example, in Marathi in India,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tū* is used for family members, *te/he* is used for people of higher social status, and *āpan* is used for priests or teachers (Pandharipande, 1997). Five languages or dialects of Tibetan-Burman currently fall into this category, accounting for 3.9% of the total, e.g., the Ladakhi dialect of Tibetan, Denjongke, where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s have pejorative forms in addition to honorifics. The Naxi and Sadu of the Yi branch also have different forms of pronoun honorifics used for different relatives.

3.4 Avoiding the Use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out of Courtesy (7/207)

Languages that use pronoun avoidance strategies are even rarer, occurring in the sample languages only in Japanese, Korean, and a few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These languages are very sensitive to politeness and the need to reflec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social status, etc. between speaker and hearer in conversation. In some languages, direct address is avoided, and in these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personal pronouns are not used for polite address, but rather for expressions of status, kinship, or position. Therefore, pronouns in these languages are rarely used in honorific forms, and second-person pronouns are generally used to address an equal or subordinate person, whereas polite addresses such as *-san*, which is attached to a surname in Japanese, do not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personal pronouns. Since the majority of the authors in our collection do not mention the pragmatic features of their pronouns,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above forms are preferred in real life. Descriptions of pronoun avoidance have been found only in the materials of the Kadu language of the Mizo branch. In Kadu-speaking societies, where it is very impolite to use pronouns directly against people of higher status, the strategy is to replace personal pronouns with kinship appellative (Sangdong, 2012).

Based on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the honorifics of Tibetan-Burman personal pronouns can be categorized as follows:

Table 1: Honoring patterns of Tibetan-Burmese second-person pronouns

		Binary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Multiple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Pronoun avoidance	Others
Tibetan	Lhasa	+			
	Purik	+			
	Ladakhi		+		
	Amdo	+			
	Dzongkha	+			
	Monba metok				+

	Lhomi	+			
	Kurtop	+			
	Denjongke		+		
	Newar	+			
Loloish	Bai	+			
	Zhaozhuang				
	Bai Heqing	+			
	Bai Baishi	+			
	Bai Jinhua	+			
	Na Lijiang		+		
	Sadu		+		
Qiangic	rGyalrong Mora	+			
	rGyalrong Kyom-kyo		+		
	rGyalrong Cog-tse	+			
Naga-Bodo	Hakhun Tangsa				+
Kuki-Chin	Karbi	+			
Himalayish	Dhimal				+
	Bunan	+			
Karen	Kayah				+
Mizo	Kadu			+	

According to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s Structures, the diversity of honorific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s higher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and 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region have polite distinctions. This is also reflected in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the Tibetic languages, where the proportion is quantitatively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Figure 2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pronoun honorifics is basically along the periphe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which was also the main area covered by the historical Tubo dynasty.



Figure 2: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econd-person salutation patterns in Tibetan-Burmese

4.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ersonal Pronoun Honorifics

According to early scholars, such as Brown and Gilman (1960) who proposed the T/V system, T refers to the regular form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while V refers to the main strategy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salutation, including the use of the third-perso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plural, or certain other forms of the pronoun. Later Joseph, after examining som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further suggested that the main source hierarchy of secon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 forms is the pronoun second-person plural > third-person singular > third-person plural. His explanation is that languages tend to use less direct or less specific referents to convey greater politeness. If a more direct form loses its polite value, the language will adopt a less direct form from a structural hierarchy for polite address.(Joseph, 1987). Helmbrecht, however,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He argues that the second-person plural is categorically closer to the intended referent in communication because it inherently combines features of both second- and third-person values. When referring to a second-person singular, using the second-person plural is more specific and less prone to ambiguity. That said, he does not endorse Joseph's proposed hierarchy of grammaticalization paths, citing numerous counterexamples where third-person plural pronouns are more commonly used for polite address than third-person singular ones. According to Helmbrecht's findings, the primary sources of second-person honorifics include:

Second-person plural pronouns,

Status-denoting nouns (e.g., terms indicating social rank),

Third-person plural pronouns,
Reflexive pronouns,
Kinship terms.

Other strategies, such as using third-person singular pronouns or first-person plural pronouns for second-person honorifics, are extremely rare.

The situation of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generally aligns with the descriptions of previous scholars. In most cases, these languages adopt existing morph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plurals, reflexive, etc.—to construct honorific form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notable differences compared to patterns observed in other language families. For instance, in some languages of the Tibetan branch, second-person honorific pronouns employ suppletion or inflectional forms, and certain dialects of Bai (a language within the Yi branch) do not derive their honorific forms from the commonly cited sources mentioned abov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polite fo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some Tibetan-Burman languages do not appear in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as in the case of Hakhun Tangsa, where the source of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honorifics derives from the plural suffix of the noun, rather than from the plural form of the pronoun similarly as in the case of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While most languages prefer modifying existing linguistic elements to avoid generating an excessive number of new forms, certa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have taken alternative path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pronominal honorific systems in this family suggests that additional factors—beyond those previously identified—must be considered to fully explain these variations.

References

- Agha, Asif. 1994. Honorif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277-302.
- Andvik, Eric. 2010. *A Grammar of Tshangla*. Leiden: Brill.
- Bai, Bibuo and Xianming Xu. 2012. *A Study on Sadu*, Beijing: Minzu Press.
- Bai, Junwei. 2019. A Grammar of Munya. Ph.D. dissertation, James Cook University.
- Bartee, Ellen Lynn. 2007. A Grammar of Dongwang Tibet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 Boro, Krishna. 2017. A Grammar of Hakhun Tangs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 Brown, Roger and Albert Gilman. 1960.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Style in Language*, edited by Thomas A. Sebeok, pp. 253-276.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Cao, Xiaoyan. 1994. A Brief Discussion on Tibetan Honorifics. *Tibetan Studies*, 3: 115-123.
- Chen, Yujie. 2008. The Singularization of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5: 39-46.

- Dai, Qingxia, Ying Jiang and Zhi-en Kong. 2007. *A Study on Bola*. Beijing: Minzu Press.
- Ebihara, Shiho. 2019. *A Grammar of Amdo Tibetan*. Tokyo: Hituzi Syobo.
- Genetti, Carol. 2007. *A Grammar of Dolakha Newar*.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 Häsler, Katrin Louise. 1999. 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Dege (sDe.dge) Dialec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erne.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1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Translated by Long, Haiping, et al.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Helmbrecht, Johannes. 2001.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in Pronouns. In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edited by Matthew Dryer, Martin Haspelmath,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lmbrecht, Johannes. 2003.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in Second-person Pronouns. In *Deic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ce, Time and Person*, edited by Friedrich Lenz, pp. 185-202. Amsterdam: Benjamins.
- Helmbrecht, Johannes. 2004. Personal Pronoun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rfurt.
- Helmbrecht, Johannes. 2013.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in Pronouns. In *WALS Online (v2020.3)*, edited by Matthew S. Dryer and Martin Haspelmath, Zenodo.
- Hill, Nathan W. 2010. Personal Pronouns in Old Tibetan. *Journal Asiatique*, 549-571.
- Hu, Shujin. 1985. Honorifics of Tibetan.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93-103.
- Hyslop, Gwendolyn. 2011. *A Grammar of Kurtöp*.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 Jacques, Guillaume. 2008. *A Study of rGyalrong*. Beijing: Minzu Press.
- Jiang, Xiwen. 1957. Personal pronouns in Ganyu Dialect.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8.
- Joseph, John E. 1987. Subject Relevance and Deferential Address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Lingua*, 73.4: 259-277.
- King, John T. 2008. *A Grammar of Dhimal*.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 Koshal, Sanyukta. 1979. *Ladakhi Grammar*.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edited by Rik De Busser and Randy J. LaPolla, pp. 33-4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in, Xiangrong. 1993. *A Study on rGyalrong*. Chengdu: Sichuan Minzu Press.
- Lyu, Shuxiang. 1985. *Demonstratives of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Xuelin Press.
- McCready, Elin. 2019.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Honorification: Register and Social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gano, Yasuhiko. 2018.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Bhola Dialect*. Tokyo: Kyuko Shoin.

- Pandharipande, Rajeshwari V. 1997. *Marathi: A Descriptive Gramma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Philippova, Nailya. 2021. A Grammar of Amri Karb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Prins, Maria C. 2016. *A Grammar of rGyalrong, Jiăomùzú (Kyom-kyo) Dialects: A Web of Relations*. Leiden: Brill.
- Sangdong, David. 2012. A Grammar of the Kadu (Asak) Language. Ph.D. dissertation, La Trobe University.
- Shen, Jia Xuan, trans. 2000.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olnit, David B. 1997. *Eastern Kayah Li: Grammar, Texts, Glossar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un, Hongkai. 2013. On the language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Corridor.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6): 29-39.
- Sun, Hongkai, Shaozun Lu, Jichuan Zhang, et al. 1980. *Languages of Monpa, Lhoba, and Mishm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Vesalainen, Olavi. 2016. *A Grammar Sketch of Lhomi*.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 Wang, Yao and Jian Chen. 1983. *Selected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Chengdu: Sichuan Minzu Press.
- Wang, Cong. 2016. A Study of Chinese Personal Pronouns. Ph.D. dissert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Wang, Ruonan. 2023. Honorifics without [HON].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41.3: 1287-1347.
- Watters, Stephen A. 2018. *A Grammar of Dzongkha (dzo): Phonology, Words, and Simple Clauses*. Ph.D dissertation, Rice University.
- Widmer, Manuel. 2014.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Bun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ern.
- Willis, Christina M. 2007.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Darma: An Endangered Tibeto-Burman Language*.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Xu, Lin and Yansun Zhao. 1984. *A Brief History of Bai Language*.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Yang, Huandian. 2004. *A Study of Naxi*.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ress.
- Yang, Xiaoxia. 2014. *A Reference Grammar of Baishi Bai Language*.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 Yliniemi, Juha. 2019.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Denjongke (Sikkimese Bhut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Zemp, Marius. 2018. *A Grammar of Purik Tibetan*. Leiden: Brill.
- Zhao, Jincan. 2010. *A Study of Heqing Bai Language*.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Zhao, Yanzhen. 2009. *A Reference Grammar of Zhaozhuang Bai Language*.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 Zhou, Jiwen and Houfang Xie. 2003. *A Grammar of Lhasa Tibetan*. Beijing: Minzu Press.
- Zhou, Maocao. 2003. *A Study of Maqu Tibetan*. Beijing: Minzu Press.

12 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

姜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内容摘要：胶辽官话内部差异较大，地处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市荣成市、文登区、乳山市与烟台市的牟平区方言更为接近（简称为文荣方言），文荣方言中存在一种目前尚未在其他方言中发现的正反问结构“（是）negVP”。本文尝试对文荣方言的四种疑问结构进行梳理，探讨疑问结构各类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是）negVP”结构的来源，并从焦点的类型、语义倾向等方面探讨是非问与正反问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一、前 言

疑问范畴或疑问结构（疑问句）一直是语法研究的重点，但学界对疑问结构内部小类的划分观点各有不同，目前接受度较高的为黄伯荣（1957 年）提出的四分法：是非问、选择问、正反问、特指问。除此之外，学者们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疑问结构进行分类，吕叔湘（1985）认为，各类疑问结构之间是有派生关系的，可以总结为两个大类，包括特指问和是非问，其中是非问中派生出选择问和正反问；朱德熙（1982）认为，根据疑问句和陈述句的转换关系来看，可将疑问结构分为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三种，选择问中包括正反问；等等。也有学者认为，几种疑问结构之间并没有派生关系，徐杰（1999）通过对疑问范畴中的疑问属性和焦点进行分析，认为“疑问”仅属于功能的范畴，并没有独立的语法地位，所谓的疑问结构是“公用”的，因此而不存在分类的问题。

我们认为疑问既是功能的范畴，也是语法结构的一种。探讨疑问结构、疑问标记，包括疑问结构中的焦点均应该放在语句中考察，多数疑问结构都有其相对独特的语法结构特征。而从纵深的角度来看，所有语言或方言土语中疑问标记或疑问结构的发展都是有脉络可寻的，个别疑问结构类型的难以区分或某类疑问结构的难以定位就是在交际表达需要的前提下，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语义的发展、创新，各类型疑问结构之间转化、融合又相互关联的表征。

胶辽官话是汉语的官话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分布于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吉林东南

姜静. 2025. 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199–213.

* 本文的语言材料来自于语言调查及作者自省。语言合作人为：郑德华（60 周岁），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人；张洪革（58 周岁），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荣成市人；祝伟伟（42 周岁），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等等。

部等地,《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把胶辽官话区分为登连片、青州片、盖桓片,各片区内部又有细分,如登连片内部又可分为烟威小片(包括17县市区)、蓬龙小片(3县市区)、大岫小片(3县市区)。胶辽官话内部差异较大,其中烟威小片中的“东三县”(威海市辖区的文登、荣成、乳山)及与文登接壤的烟台市牟平区部分地区的方言相近,而与其他地区的方言差异更为明显,该方言区域所处地区为胶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有独特的语音及语法特征,我们暂将该区域的方言称之为文荣方言。

本文将对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进行梳理,探讨疑问结构的类型特征、“(是)negVP”结构的来源、疑问结构语义倾向、疑问与焦点的互动关系等等。

二、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类型

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可以分为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和正反问。其中,正反问是选择问的一种特殊类型,但由于二者在形式上已有较大差异,我们暂将其归为单独的一类。

2.1 特指问

特指问是问话人通过特定的疑问代词针对某一事件、人物、地点、时间、数量、重量等确切目标对答话人发起的询问。文荣方言的疑问代词主要有:谁、哪儿、么(什么)、多少、几、怎么等等,与汉语普通话差别不大。

(1) Q:ʃue³⁵ lai⁵¹ lə⁰? A:an²¹⁴ ma⁵¹ lai⁵¹ lə⁰.

谁 来了 俺 妈 来了

问:谁来了? 答:俺妈来了。

(2) Q:ni²¹⁴ tə⁰ ʃan³⁵ na⁵⁵ khy⁵⁵? A:wo²¹⁴ tə⁰ khy⁵⁵ kan²¹⁴ tsɿ³⁵.

你 的 上 哪 去 我 的 去 赶 集

问:你要去哪? 答:我要去赶集。

特指问最主要的特征是句中包含疑问代词,但并不是所有包含疑问代词的句子都是疑问句,当包含疑问代词的小句充当了另一个小句的句法成分的时候,此时包含疑问代词的句子并不表示疑问。如:

(3) 谁弄坏了门框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得诚实。

(4) 我管你的上哪去。(我才不管你要去哪。)

并且,并不是特指问中都有疑问词出现。在对已然发生的事件中的处所进行询问时,句中表示处所的疑问词“哪”及所处的谓词短语可以省略。如:

(5) 俺妈(上哪去)了?

(6) 妈,我书包(哪去)了?

例(5)与例(6)括号内的内容在对话中经常是省略掉的,与普通话“你妈妈呢?”

“妈，我的书包呢？”表达的意义形同，但形式上有所差别，句末没有语气词“呢”，而是由体标记“了”代替，文荣话中的此类特指问是小句中包含处所疑问词“哪”的谓词性短语省略，只保留名词性短语及体标记的结果。例（5）表示的是“你妈妈去哪了”，句中省略了谓词短语“上哪去”，直接由“NP+了”的形式表示特指疑问意义。例（6）是对说话人母亲的发问，意为“我的书包在哪里”，句中省略的是谓词短语“哪去”，也是直接由“NP+了”的形式表示特指疑问意义。

由此可见，在特指问中，表达疑问意义的不只是疑问代词，是包含疑问代词的小句。并且，当包含疑问代词的小句充当了另一个小句的句法成分的时候，该复杂句则不表示疑问意义。

2.2 是非问

是非问是通过句末添加语气词“么”或“啊”对于整个事件进行询问的一种疑问结构类型。是非问得到的是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是对一个事件或事物属性的确认。

- (7) Q: xai⁵⁵ts_l⁰ tʰər²¹⁴ fər³⁵ lə⁰ mə⁰? A: tɛ^hi²¹⁴ lə⁰ /muai⁵¹ tɛ^hi²¹⁴.
孩子 吃儿 饭 了 么 吃 了 没 吃
问：孩子吃饭了吗？答：吃了。/没吃。

- (8) Q: wai³⁵pə⁰ tai³⁵nə⁰ xja³⁵ y²¹⁴ mə⁰? A: tai³⁵ nə⁰ xja³⁵ /muai⁵¹ xja³⁵.
外边 在 那 下 雨 么 在 那 下 没 下
问：外边在下雨吗？答：在那下。/没下。

例（7）与例（8）是句末添加语气词“么”对整个事件进行询问的是非问。得到的回答是对于该事件的肯定或否定回复。

- (9) Q: ni²¹⁴ zin²¹⁴tə⁰ tʰə⁰ a⁵¹? A: zin²¹⁴tə⁰ /pu²¹⁴ zin²¹⁴tə⁰.
你 认得 他 啊 认识 不 认识
问：你认得（认识）他啊？答：认得。/不认得。
- (10) Q: ni²¹⁴ tə⁰ kja⁵¹kʰi⁰ a⁵¹? A: ən⁵¹ /pu²¹⁴.
你 的 家 去 啊 嗯 不
问：你要回家啊？答：嗯。/不。

例（9）与例（10）是包含语气词“啊”的是非疑问句，其形式与得到的回答等方面均与包含语气词“么”的是非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问话人对于事件的肯定或断定的程度更深，好似是对既成事实的进一步确认。在多数情况下，句末的音节会与语气词“啊”合音，如例（9）中的“他”与“啊”，会读作 tʰa⁵¹，保留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和语气词“啊”的元音和声调；例（10）的“去”和“啊”合音，读作 kʰja⁵¹。

文荣方言中较少出现通过疑问语调表达是非问的情况。

2.3 选择问

选择问是说话人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并列选项，通过添加连接词等方式表达询问，希望答话人从中作出选择的疑问结构。主要的结构类型有：“是 VP，是 VP”“VP 是 VP”

“是 VP, 还是 VP” “VP 还是 VP” “VP, VP” 等。

- (11) Q: ni²¹⁴ ʃ³⁵⁻⁰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 ʃ³⁵⁻⁰te^hi²¹⁴mi²¹⁴? A: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te^hi²¹⁴mi²¹⁴.

你 是 吃 馒头 是 吃 米 吃 馒头 吃 米

问: 你是吃馒头, 是吃米? 答: 吃馒头。/吃米。

- (12) Q: ni²¹⁴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ʃ³⁵⁻⁰te^hi²¹⁴mi²¹⁴? A: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te^hi²¹⁴mi²¹⁴.

你 吃 馒头 是 吃 米 吃 馒头 吃 米

问: 你吃馒头, 是吃米? 答: 吃馒头。/吃米。

- (13) Q: ni²¹⁴ ʃ³⁵⁻⁰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 xai³⁵ʃ³⁵te^hi²¹⁴mi²¹⁴? A: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te^hi²¹⁴mi²¹⁴.

你 是 吃 馒头 还是 吃 米 吃 馒头 吃 米

问: 你是吃馒头还是吃米? 答: 吃馒头。/吃米。

- (14) Q: ni²¹⁴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 xai³⁵ʃ³⁵te^hi²¹⁴mi²¹⁴? A: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te^hi²¹⁴mi²¹⁴.

你 吃 馒头 还是 吃 米 吃 馒头 吃 米

问: 你吃馒头还是吃米? 答: 吃馒头。/吃米。

- (15) Q: ni²¹⁴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 te^hi²¹⁴mi²¹⁴? A: te^hi²¹⁴man³⁵thə⁰./te^hi²¹⁴mi²¹⁴.

你 吃 馒头 吃 米 吃 馒头 吃 米

问: 你吃馒头吃米? 答: 吃馒头。/吃米。

上述例(11)—例(15)是文荣方言中的选择问结构, 例(11)、例(12)更为常见, 其中包含选择连接词“是”。例(13)与例(14)中包含选择连接词“还是”, 也较为常见。例(15)是省略连接词“是”等的情况, 在文荣方言中也可以说得通。

2.4 正反问

正反问与选择问一脉相承, 所表达的语义和得到的回答内容上相似。文荣方言的正反问结构主要形式为“(是) negVP”。在以往的研究中, 该结构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将其称为“是不/是没 VP”问句, 罗福腾(1992)将其归为朱德熙(1985)概括的“可 VP”类型, 张甜甜(2018)将其概括为“VP 不 VP”类型。但实际上此类型的正反问句在胶辽官话文荣方言中的表现远比前人所调查的情况要复杂, “是不/没”的分布与功能也随着地域和代际呈现出差异性的特点, 关于此类正反问结构的来源, 我们认为既不属于“可 VP”类型也不属于“VP 不 VP”类型, 而是由选择疑问结构发展而来的, 省略肯定项, 保留否定项的一种特殊正反问结构。主要形式包括: “是不 VP”“不 VP”“是没 VP”“没 VP”等。

- (16) Q: ni²¹⁴ ʃ³□-□ pu²¹□/□ te^hi²¹⁴ fan³⁵? A: te^hi²¹⁴./pu²¹⁴ te^hi²¹⁴.

你 是 不 吃 饭 吃 不 吃

问: 你是不吃饭(你吃不吃饭)? 答: 吃。/不吃。

- (17) Q: ni²¹⁴ pu²¹⁴-□ te^hi²¹⁴ fan³⁵? A: te^hi²¹⁴./pu²¹⁴ te^hi²¹⁴.

你 不 吃 饭 吃 不 吃

问: 你不吃饭(你吃不吃饭)? 答: 吃。/不吃。

(18) Q:ni²¹⁴ ʃ³⁵-□ muai⁵¹/□ tɛ^{hi}²¹⁴ fan³⁵? A:tɛ^{hi}²¹⁴ lə□./muai⁵¹tɛ^{hi}²¹⁴.

你 是 没 吃 饭 吃 了 没 吃

问：你是没吃饭（你吃没吃饭）？答：吃了。/没吃。

(19) Q:ni²¹⁴ muai⁵¹-□ tɛ^{hi}²¹⁴ fan³□? A:tɛ^{hi}²¹⁴./pu²¹⁴ tɛ^{hi}²¹⁴.

你 没 吃 饭 吃 不 吃

问：你没吃饭（你吃没吃饭）？答：吃了。/没吃。

文荣方言的正反问结构中，“是”及“不”或“没”充当疑问表达的标记，声调会发生变化。当“是”与“不”或“没”同时出现时，“是”由35调读作轻声，否定词仍读作本调，但否定意义已经消失，当说话人语速较快时，否定词也可读作轻声；当“是”省略时，否定词“不”和“没”的声调由214调和51调读作了轻声，否定意义已消失，只作疑问标记用。

此外，在文荣方言中，也存在“V不/没VP”形式的正反问结构，如“你吃不吃饭？”“他喝没喝水？”，但比较少见，在年轻一代中使用较多。

三、文荣方言正反问结构“（是）negVP”的来源

“（是）negVP”是胶辽官话中只存在于文荣方言中的一种特殊的疑问结构，在牟平、文登等部分地区还存在“可negVP”的用法，“是”与“可”相互替换，不影响语义。“（是）negVP”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与文荣方言中疑问结构内部的分化和分化相关，也受周围其他迁入语言的影响。下文，我们将从“（是）negVP”结构的产生、疑问标记或疑问连接词的发展等方面对“（是）negVP”结构进行讨论。

3.1 前人观点的不足之处

罗福腾（1981）认为“是negVP”“可negVP”是牟平方言表示反复问的固定用法，提出胶辽官话牟平方言“老王是不是牟平人？”的疑问结构看似与普通话相同，实际上是不同的。牟平方言中的“是不”结合更为紧密；普通话正反问结构“老王是不是牟平人？”是“老王是牟平人”“老王不是牟平人”的紧缩，“是不是”里的“不是”结合紧密。因此，罗福腾（1981、1992、1996）结合朱德熙（1985）提出的汉语方言正反问的两种类型（“可VP”与“VP-neg-VP”），认为文荣方言的“是negVP”“可negVP”结构从形式上看属于“F-VP”类型（即“可VP”型），“是不”“是没”“可不”“可没”为其中的F，功能相当于苏州话反复问句的发问词“啊”（游汝杰，1993）、合肥话的“克”、昆明话的“格”（朱德熙，1985）。罗福腾先生在文章中并未对文荣方言该正反问结构的来源做出讨论。

张甜甜（2018）对于乳山方言“是不VP”和“VP不VP”两种句式进行讨论，认为二者作为正反问结构在乳山方言中是共存的，并不像胶莱河以东的其他地区（如牟平、威海、文登、荣成）那样排斥“VP不VP”句式，两种句式在形式和语义表达上趋于一致，

由此推断“是不 VP”是由“VP 不 VP”演变而来。

上述两种观点是学者们关于文荣方言“(是) negVP”结构分类及来源的不同讨论,都具有一定的思考和前瞻性,但对该类型正反问的梳理仍有不足,来源及归属也未能深入展开讨论。

朱德熙(1985)认为“可 VP”源自古汉语的反复问句“VP 否”,江蓝生(1990)也表达了认同,认为“可”是由助动词发展为疑问副词的。我们认为文荣方言的“(是) negVP”虽与“可 VP”形式上相似,但来源却是不同的。

首先,“可 VP”是疑问标记“可”与动词性短语的组合,动词性短语是肯定性的,其中并无否定词,也无法添加否定词;而文荣方言中的“(是) negVP”形式上与之相似,但其中包含的否定词“不”或“没”是不可省略的,也是其他方言中不存在的,即使在胶辽官话内部也只存在于胶莱河以东的地区,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其次,前人研究中“是不”“是没”“可不”“可没”是必须紧密结合出现的,但根据调查发现并不如此。“(是) negVP”结构包括“是不 VP”“不 VP”“是没 VP”“没 VP”几种形式,即“(是) negVP”中的“是”是可以省略的,并且在大多数时候都可省略,语义上并无影响,语气上包含“是”的“(是) negVP”更具强调意味。

再者,在 VP 短语为动补结构时,“是/可”与“不”是间隔开的,但此时的“是”不可省略,如下:

(20) Q: nje⁵⁵ kə⁰ sjaŋ⁵¹ tsɿ⁰ ni²¹⁴ ʃŋ⁰ tɕ⁵¹ pu⁰ tɕ³⁵? A: tɕ⁵¹ tɕ⁰ tɕ³⁵ / tɕ⁵¹ pu²¹⁴ tɕ³⁵.

那个箱子你是拖不动 拖得动 拖不动

问: 那个箱子你是拖不动? 答: 拖得动。/拖不动。

(21) Q: ni²¹⁴ ʃŋ⁰ ʃui⁵¹ pu⁰ tɕ³⁵? A: ʃui⁵¹ tɕ⁰ tɕ³⁵ / ʃui⁵¹ pu²¹⁴ tɕ³⁵.

你是睡不着 睡得着 睡不着

问: 你是睡不着? 答: 睡得着。/睡不着。

在例(20)与例(21)中,“是”不可省略,省略后如要表达疑问,则需添加疑问语气词“么”或“啊”,属于是非问的范畴。

总结如下,当谓语是动宾结构或单独的动词、形容词时,“是/可”与“不/没”是紧密相连的,此时“是/可”可省略,“不/没”可单独使用;当谓语是动补结构时,因“是/可”与“不”在位置上相邻较远,“是”不可省略。由此我们判断,“(是) negVP”结构中的“是/可”与“不/没”并不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并且,动补结构中“不”的位置就是动补结构中否定标记的位置,“拖不动”“睡不着”就是动补结构的否定表达。当例(21)中的“是”强行省略时,如要表达疑问语义,句末可添加疑问语气词“么”,就变成了是非问句“你睡不着么?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是) negVP”中的否定词“不”和“没”是疑问结构中谓语的一部分,或者说来源于疑问结构的谓语,在动词性短语之前或之中,这与“可 VP”结构中的“可”的助动词来源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罗福腾先生早年将“是 negVP”“可 negVP”归为“可 VP”类型是不够准确的。

3.2 “(是) negVP” 结构源自选择问的省略

那“(是) negVP”是如何产生, 又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回头看一下文荣方言的选择疑问结构, 其类型主要有“是 VP, 是 VP”“VP 是 VP”“是 VP, 还是 VP”“VP 还是 VP”

“VP, VP”几种类型, 当选择疑问结构的并列项是同一事件的正反两方面时, 选择问的情况如下:

(22) Q: ni²¹⁴ ʃ³⁵⁻⁰ te^{hi}214 fan³⁵, ʃ³⁵⁻⁰ pu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A: te^{hi}214 ./pu²¹⁴ te^{hi}214.

你 是 吃 饭 是 不 吃 饭 吃 不 吃

问: 你是吃饭是不吃饭? 答: 吃。/不吃。

(23) Q: ni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ʃ³⁵⁻⁰ pu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A: te^{hi}214 ./pu²¹⁴ te^{hi}214.

你 吃 饭 是 不 吃 饭 吃 不 吃

问: 你吃饭是不吃饭? 答: 吃。/不吃。

(24) Q: ni²¹⁴ ʃ³⁵⁻⁰ te^{hi}214 fan³⁵, xai³⁵ ʃ³⁵ pu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A: te^{hi}214 ./pu²¹⁴ te^{hi}214.

你 是 吃 饭 还 是 不 吃 饭 吃 不 吃

问: 你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答: 吃。/不吃。

(25) Q: ni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xai³⁵ ʃ³⁵ pu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A: te^{hi}214 ./pu²¹⁴ te^{hi}214.

你 吃 饭 还 是 不 吃 饭 吃 不 吃

问: 你吃饭还是不吃饭? 答: 吃。/不吃。

(26) Q: ni²¹⁴ te^{hi}214 fan³⁵, ʃ³⁵⁻⁰ pu²¹⁴ te^{hi}214? A: te^{hi}214 ./pu²¹⁴ te^{hi}214.

你 吃 饭 是 不 吃 吃 不 吃

问: 你吃饭是不吃饭? 答: 吃。/不吃。

例(22)—例(26)在文荣方言中均可如是表达, 其中例(22)、例(23)较为常见, 例(24)~例(26)使用频率较低。例(22)、例(23)作为选择问结构, 两个并列项是有重合的, 此时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发挥作用, 用最简单的符号表达同样的效果, 省略现象在此发生。

与其他方言相比, 文荣方言中的“是”在疑问结构中, 尤其是选择问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如上例(11)~例(14), 这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略有不同, 在选择问结构中, “是”作为选择问标记出现, 这是最常见的选择问结构类型。但在部分例句中可以以“还是”的形式出现, 如例(14); 也可以省略, 如例(15)。

“是”的使用使并列项为同一事物正反两方面的选择疑问结构在省略时产生了困难。当省略否定项时, 如“你是吃饭?”与文荣方言是非问“你吃饭么?”“你是的吃饭么?”

“你吃饭了么?”形式上过于相似, 语义表达也较为趋同, 有明显肯定性询问的倾向, 不符合正反问完全中立的语义表达。因此, 在文荣方言中两个并列项为同一事物正反两方面的选择问结构中, 只能是省略肯定项, 保留否定项, 否定项之前的选择连接词“是”也一同保留下来。

“是”与“不”“没”的声调变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在选择问结构中保留下来的“是”在“(是) negVP”结构中, 变成了疑问标记的一部分, 读作轻声。但从上文可知, “是”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省略, 当“是”不省略时, “是”读轻声, “不”与“没”读

本调 214 及 51 调；当“是”省略时，“不”或“没”则读轻声，本调消失。“不”与“没”在“(是) negVP”结构中读音的变化，也进一步证明，其原就是作为动词性短语的否定词出现的，词语的功能和读音随结构而发生变化。在正反问结构中，“不”或“没”所在谓语中的否定意义消失，疑问小句已不表达否定意义，“是”与“不”或“没”的紧密并现，容易造成信息的冗余，文荣方言的使用者们会省略与并列项距离较远的“是”，而保留相邻近的否定词，并弱化否定词的声调使之成为新的疑问标记，这也与语言使用的经济性原则相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文荣方言的“(是) negVP”是由选择疑问结构省略肯定并列项，保留否定并列项发展而来，而“可 negVP”的结构很可能是语言接触或语言杂糅的产物。

在类型学上是否存在省略肯定项而保留否定项的疑问结构呢？祝敏彻（1995）中提到了近代汉语正反问句有八种表现方法，其中第六种为“省略正的（肯定的）一面的正反问式”。祝先生文中只列举了两个例证：

- A.那小孩子道：“在舱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过来，我们看看。”（儒 9）
- B.先道“我的话再不错不是？”（儿 37）

上述例（A）与（B）都是正反问“是不是”结构的省略，省略肯定项“是”，保留否定项“不是”作为正反问结构。文荣方言中的正反问结构与该形式相似，但并列项内容不受限制，并保留了连接词“是”。因此，从类型上来看，“(是) negVP”结构是从选择问发展而来，省略正向并列项、保留否定并列项的正反问结构，其也为祝敏彻先生的类型分类提供了佐证。

四、文荣方言疑问结构的语义倾向及焦点的表现形式

通过上文可看出，文荣方言的正反问直接来源于选择问，形式上却与是非问相似，得到的回答也相同，在文荣方言中又确实存在是非问和正反问两种疑问结构类型，那二者的差异在何处？下文我们将从文荣方言疑问结构的语义倾向及焦点表现形式来探讨疑问结构之间的差异，主要关注是非问与正反问。

表 1：文荣方言疑问结构的焦点类型、语义倾向与相关的时间意义表达

疑问结构类型	疑问句的焦点类型	语义倾向	事件的已然、未然与正在进行		
特指问	窄焦点	无	无		
是非问	谓语焦点或窄焦点	对提出的命题有认定的倾向	+	+	+
选择问	双谓语焦点	无	无		
正反问	谓语焦点	无	+	+	-

4.1 疑问与焦点

疑问句的焦点是疑问结构中研究的热点问题, 汤廷池(1984), 林裕文(1985), 徐杰、李英哲(1993), 刘顺(2003), 唐燕玲、石毓智(2009), 石毓智、徐杰(2001), 祁峰(2017、2020)等。

关于焦点的类型, Lambrecht(1986、1987、1994、2000)通过对世界多种语言的结构分析, 认为焦点结构可分为 broad focus 和 narrow focus 两种, 罗仁地、潘露莉(2005)将其翻译为宽焦点和窄焦点, 其中, 宽焦点又可分为谓语焦点(predicate focus)和句子焦点(sentence focus)两大类。窄焦点的焦点域一般只限于一个单一的成分; 句子焦点的焦点域为整个句子; 谓语焦点的焦点域为话题-述题结构中的述题, 即谓语。

文荣方言的问句焦点, 在句首话题作为已知旧信息时, 特指问为窄焦点, 焦点域为疑问代词; 选择问为宽焦点的谓语焦点, 焦点域为两个谓语并列项; 是非问也为宽焦点中的谓语焦点, 但当需要进一步对述题中的具体信息进行询问时, 则需要添加焦点标记“是”, 变为窄焦点; 正反问也为谓语焦点, 但正反问不能添加焦点标记改变焦点的性质。但如果问句的句首成分也为新信息时, 则整个问句为宽焦点中的句子焦点。下文, 我们将下列问句均视作在对话环境中出现的, 说话人对于句首话题所指已经了然的语境中发出的问句。

(27) Q: tʰə⁰ tsən²¹⁴ mə⁰ lə⁰? A: tʰə⁵¹⁻⁰ kan²¹⁴ mau³⁵ lə⁰.

他 怎么 了 他 感冒 了

问: 他怎么了? 答: 他感冒了。

(28) Q: tʰə⁰ kan²¹⁴ mau³⁵ lə⁰ mə⁰? A: ɛ³⁵ /muai⁵¹.

他 感冒 了 么 嗯 没有

问: 他感冒了么? 答: 嗯。/没有。

(29) Q: tʰə⁵¹⁻⁰ fʰ⁰ kan²¹⁴ mau³⁵ lə⁰, fʰ⁰ kʰa⁵⁵ fu⁰ lə⁰?

他 是 感冒 了 是 瞌睡 了

A: kan²¹⁴ mau³⁵ lə⁰ / kʰa⁵⁵ fu⁰ lə⁰.

感冒 了 瞌睡 了

问: 他是感冒了, 是瞌睡了? 答: 感冒了。/瞌睡了。

(30) Q: tʰə⁵¹⁻⁰ fʰ⁰ muai⁵¹ kan²¹⁴ mau³⁵? A: kan²¹⁴ mau³⁵ lə⁰ / muai⁵¹.

他 是 没 感冒 感冒 了 没

问: 他是没感冒? 答: 感冒了。/没感冒。

例(27)特指问为窄焦点, 问句焦点为“怎么”, 答句的焦点为新信息“感冒”; 例(28)是非问为谓语焦点, 问句的焦点域为“感冒了么”, 答句的焦点为肯定或否定的回复; 例(29)选择问为谓语焦点, 准确地讲是双谓语, 焦点域为句首话题之后的两个谓语成分“是感冒了”“是瞌睡了”, 答句的焦点为谓语并列项之一; 例(30)正反问也为谓语焦点, 焦点域为“是没感冒”, 其中“是没”为焦点标记, 答句的焦点为肯定或否定的回复, 与是非问不同的是, 正反问的肯定性回复一般不能直接回复“嗯”或其他肯定性语气词, 需要对问句中的话题进行肯定性重复。

通过对上述疑问结构焦点的考察，可发现，特指问的窄焦点与选择问的双谓语焦点均比较典型，易于分辨，而非问与正反问均为谓语焦点，在讨论疑问句的焦点问题时，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何处？上文我们提到，当是非问结构中需要进一步对述题中的具体信息进行询问时，则需要添加焦点标记“是”，变为窄焦点。是非问中的“是”与正反问中的焦点标记“是”是否相同？

(31) a. Q: h³⁵ nə⁰ pa³⁵ thian⁵¹ thian⁰ wan²¹⁴ ʃə⁰ tɕhyɛ³⁵ kʰə⁰ ta²¹⁴ ma²¹⁴ tsjan³⁵ mə⁰?

是 僚 爸 天 天 晚 上 出 去 打 麻 将 么

问：是僚爸天天晚上出去打麻将么？

答：是啊。/不是，是俺妈。

b. Q: nə⁰ pa³⁵ h³⁵ thian⁵¹ thian⁰ wan²¹⁴ ʃə⁰ tɕhyɛ³⁵ kʰə⁰ ta²¹⁴ ma²¹⁴ tsjan³⁵ mə⁰?

僚 爸 是 天 天 晚 上 出 去 打 麻 将 么

问：僚爸是天天晚上出去打麻将么？

答：是啊。/不是，偶尔去一次。

c. Q: nə⁰ pa³⁵ thian⁵¹ thian⁰ h³⁵ wan²¹⁴ ʃə⁰ tɕhyɛ³⁵ kʰə⁰ ta²¹⁴ ma²¹⁴ tsjan³⁵ mə⁰?

僚 爸 天 天 是 晚 上 出 去 打 麻 将 么

问：僚爸天天是晚上出去打麻将么？

答：是啊。/不是，白天去。

d. Q: nə⁰ pa³⁵ thian⁵¹ thian⁰ wan²¹⁴ ʃə⁰ h³⁵ tɕhyɛ³⁵ kʰə⁰ ta²¹⁴ ma²¹⁴ tsjan³⁵ mə⁰?

僚 爸 天 天 晚 上 是 出 去 打 麻 将 么

问：僚爸天天晚上是出去打麻将么？

答：是啊。/不是，在家打。

e. Q: nə⁰ pa³⁵ thian⁵¹ thian⁰ wan²¹⁴ ʃə⁰ tɕhyɛ³⁵ kʰə⁰ h³⁵ ta²¹⁴ ma²¹⁴ tsjan³⁵ mə⁰?

僚 爸 天 天 晚 上 出 去 是 打 麻 将 么

问：僚爸天天晚上出去是打麻将么？

答：是啊。/不是，去干活。

例(31)中，焦点标记“是”可应用于问句中除了疑问语气词以外的任何成分，旨在对于句中单个成分的询问，属于窄焦点的范畴。例(31a)意在询问是否是“僚爸(你爸)”天天晚上出去打麻将，还是其他人；例(31b)意在询问你爸是否是“天天”晚上出去打麻将，还是偶尔一次等；例(31c)意在询问你爸天天是否是“晚上”出去打麻将，或者是其他时间；例(31d)意在询问你爸是否是天天晚上“出去”打麻将，还是在别的场所，如在家；例(31e)意在询问你爸天天晚上出去是否是“打麻将”，还是干别的事情。焦点的不同，询问的内容就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是非问和正反问均可为谓语焦点，但是非问可以添加焦点标记“是”，由谓语焦点变为窄焦点，在句子内容较为丰富时，窄焦点也较为灵活，此时“是”虽作为焦点标记，但仍保留着判断词的用法，声调读为本调35调；正反问中，“是”是较为固定的焦点标记，无判断义，声调读为轻声调，在正反问中除了固定的焦点标记“是”与“无”或“没”，不能再添加其他焦点标记。

4.2 疑问的语义倾向及时间意义表达

4.2.1 疑问的语义倾向

汤延池(1984)认为是非问句提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命题来表示问话者的认定或假设,并要求对方同意,而正反问句是提出正反两反面的可能性要求对方选择。邵敬敏、朱彦(2002)认为正反问的语义倾向是中性的,而“是不是VP”问句则有明显的肯定性语义倾向。文荣方言的是非问如上例(7)“孩子吃饭了吗?”例(8)“外边在下雨吗?”例(28)“他感冒了么?”都是问话人提出了一个事件的肯定命题,寻求答话人的肯定或否定回复,命题也可以是否定性的,如“孩子没吃饭吗?”“外面不下雨么?”,也是说话人先根据自己的预判提出的命题假设,寻求答话人的回复。与这三例所搭配语气词不同的例(9)“你认识他啊?”与例(10)“你要回家啊?”的差异在于,说话人对于自己提出的命题更为确信,仿佛是既定事实,而寻求答话人的认可。

在有标记的是非问问中,语义倾向也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对已知事件的怀疑,询问答话人是否如此。如:

(32) Q: tʰə⁰ fɿ³⁵ kan²¹⁴ mau³⁵ lə⁰ mǎ⁰? A: ɛ³⁵ /muai⁵¹.

他 是 感冒 了 么 嗯 没有

问:他是感冒了么?答:嗯。/没有。

例(32)中,说话人对于话题“他”发生的事件“感冒了”这件事是已知的,信息获取的渠道是听说或者看到的,但秉持怀疑态度想向答话人进一步询问。

正反问则无语义倾向。在上例(21)—例(24)中,虽否定词“不”“没”赫然在列,但并无任何否定意义,“是不”“是没”作为疑问标记,也作为焦点标记,句中无语气词,就是问话人提出正反两反面的可能性寻求答话人选择。是非问与正反问在语义的倾向性上存在较大差异。

文荣方言的正反问和是非问形式上相近,但语义上的差异使得二者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当是非问的形式中包含否定标记时,正反问与是非问的对立更能显现各自的特点。正反问“你是嚼不动?”与是非问“你是嚼不动么?”中的是读音不同(轻声与本调35调)、功能不同(疑问标记与判断词),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同:正反问表达的是问话人问答话人能不能嚼得动(食物);是非问表达的是问话人问答话人是不是嚼不动(食物)。二者有明显的语义差异。

选择问也无语义倾向,尤其是包含连接词“是…是…”“…是…”或无连接词的选择问。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实,在正反问与选择问的语义倾向中立,更为接近,从形式和语义上来看,正反问就是从选择问发展而来的,与朱德熙先生所归纳的“可VP”的结构有本质上的不同。

4.2.2 疑问结构的时间意义表达

当问话人所询问的事件属于已然事件或未然事件时,是非问与正反问的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

- (33) tʰə⁰ kʰai⁵¹ tɕʰɛ⁵¹ mə⁰? 他开车么?
 他 开 车 么
- (34) tʰə⁰ tə⁰ kʰai⁵¹ tɕʰɛ⁵¹ mə⁰? 他的开车么?
 他 的 开 车 么
- (35) tʰə⁰ kʰai⁵¹ tɕʰɛ⁵¹ lə⁰ mə⁰? 他开车了么?
 他 开 车 了 么
- (36) tʰə⁰ tai³⁵ nə⁰ kʰai⁵¹ tɕʰɛ⁵¹ mə⁰? 他在那开车么?
 他 在 那 开 车 么

通过上述例句可发现，是非问对于事件的时间意义的表达形式更为广泛，相较于陈述句只添加了表示疑问的意义。例(33)中时间的表达并不明显，事件可能是未发生的，也可能是正在发生的，只寻求事件真伪；例(34)是对未然事件真伪的询问，其中“的”有将要某事的意义；例(35)是对已然事件真伪的询问，句中“了”表示事件已发生；例(36)是对正在进行的事件的询问，句中“在那”表示事件正在进行。

- (37) tʰə□ ʃɿ³□-□ pu²¹□ kʰai□¹ tɕʰɛ□¹? 他是不开车?
 他 是 不 开 车
- (38) tʰə□ ʃɿ³□-□ muai□¹ kʰai□¹ tɕʰɛ□¹? 他是没开车?
 他 是 没 开 车

正反问对于事件的时间意义表达也较为明显，但没有是非问丰富，形式也不同。只可对未然和已然事件进行询问。例(37)是对未然事件的询问，“(是)不”的存在表明在问话人的眼中，事件尚未发生；例(38)是对已然事件的询问，“(是)没”的存在表明在问话人看来，事件已经发生了。正反问中对于事件的已然性与未然性的表达与否定标记“不”与“没”的本义相关，否定词“不”本来就有描述未然事件的用法，否定词“没”本来就有描述已然事件的用法。

五、结 语

胶辽官话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可分为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正反问四种。除了特指问，其他三种疑问结构之间都存在这一定的关联，尤其是选择问和正反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语义上看，正反问都是来源于选择问，由选择问关于一个事件的肯定与否定两个并列项的结构中，省略肯定项，保留否定项及其相邻的连接词“是”发展而来。正反问因此而与是非问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1.形式上，是非问通过添加语气词“么”和“啊”表示疑问，正反问通过疑问标记“(是) negVP”，而无语气词；2.语义倾向上，是非问中间话人根据自己的认知提出假设，寻求答复，正反问只提供肯定与否定的选项供答话人选择，无个人倾向；3.焦点的分布上，是非问主要为谓语焦点，也可以通过添加焦点标记“是”而成为窄焦点，正反问多为谓语焦点。而通过上述是非问的各项特征来看，其也有

可能与选择问相关,当两个问句同时出现,话题相同,并符合语言表达逻辑时,语言的经济型原则会使得两个小句组合成一个复杂句,选择问可能就由此而来。

在文荣方言的疑问结构中,特指问用于对特定某一事件、人物、地点、时间、数量、重量等确切目标的询问;选择问只能用于两个选项的选择,是非问只能用于对一个事件正反两方面的选择;是非问是适用范围较之选择问和正反问而言就广泛得多,可用于对已然、未然、正在进行等事件的询问,基本上所有的陈述句均可以添加疑问语气词“么”来表示疑问,可见其基础功能是强大的。文荣方言疑问结构之间的派生关系也正好验证了吕叔湘(1985)认为的疑问可分为特指问和是非问两大类,是非问中又派生出选择问和正反问的思路。但由于选择问与正反问已在文荣方言中有其独有的形式、语义和焦点特征,咱们将其列为单独的两类。

胶辽官话内部语音和语法现象复杂,从正反问的表现上也能看出一二。招远方言中存在AA式与AAB式正反问,如“那件衣服大大?”“大家今天高高兴?”³⁸,省略否定词“不”。龙口方言的正反问形式为“jī+谓语动词的肯定式”,如“你jī去上街?”“这本书jī是你的?”³⁹,存在一个正反标记jī。普兰店方言中存在VVP式正反问,具体形式较为复杂,有“V不VP”形式,如“炕热没热乎?”;有“好好VP”形式,如“下回买好好?”,有“能能VP”,如“现在去能能让进?”,有“是是VP”,如“他是是忘了?”,以上是个别词汇“V不V”结构的紧缩;还包含“是VP”与“是不VP”结构,如“菜是变味了?”“你是不吃香菜?”等⁴⁰。从发展轨迹上来看,正反问相较其他类型疑问结构是最后发展出来的,所以其在胶辽官话中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甚至有杂糅现象,这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地区的地理分布和明清时期大量的人口流动相关。

关于文登西部、牟平一带的“可negVP”结构,我们认为可能受到明朝初期,江淮官话地区的驻军和人口流动产生的语言接触的影响⁴¹。历史上,明清时期胶东半岛倭寇横行,明朝初期朝廷加强海防,一直往文登、牟平所属的宁海州地区派遣官员与驻军,官兵大多来源于明南直隶地区即江淮官话区,而江淮官话区是“可VP”结构广泛使用的地区,官吏和驻军的迁入可能使得该地区的语言受到一定的影响,“(是)不VP”与“可VP”结构形式上相近,表达的疑问内涵相同,可能就此产生了“可不VP”“可没VP”等结构,而

³⁸ 许卫东 2005 山东招远话中的AA式和AAB式正反问句,《中国语文》第5期

³⁹ 马志红 2007 《龙口方言的疑问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⁴⁰ 张明辉、佟瑶 2023 大连普兰店方言正反问研究,《河西学院学报》第1期

⁴¹ 牟平与文登所在区域为胶东半岛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该区域的行政中心,二县相邻齐,一直为同一个行政区划。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改宁海军为宁海州(直隶州),治所在牟平县,辖牟平、文登二县,属山东东路;元朝中书省宁海州行政区划,仍治于牟平县城,辖牟平、文登二县;明洪武元年(1368),以牟平县省入宁海州,仅辖文登县,州治不变,为散州,隶莱州府,洪武九年属登州府;清代沿袭不变。(史料来源:《金史》《元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在胶东村落当中,与明代军户有关者众多,牟平城区有个“胡家楼”村,根据《牟平县地名志》的记载“明末,骠骑将军胡来贡镇守鹤止寨(陈家疃西北),曾在此建一别墅小楼,后延续子孙,人口增多,得名胡家楼。”村名由此而来。民国版《牟平县志》中记载“由宁海卫指挥任监军道中军,英毅绝伦,每当御侮,辄以身先。”胡氏家族原籍瓜州(所指应该是江苏的瓜洲,不过民间也有安徽定远之说),明朝之初,胡姓先祖胡海从龙有功,被封为宁海卫指挥使,就此落户当地。

当时较为偏远的乳山、环翠等地区受影响较小，则未产生此用法。

附记：本文是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多民族多语言交流背景下的彝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24VJXG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黄伯荣 1958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 林裕文 1985 谈疑问句，《中国语文》第2期
- 刘顺 2003 现代汉语的否定焦点和疑问焦点，《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罗福腾 1981 牟平方言的比较句和反复问句，《方言》第4期
- 罗福腾 1992 牟平方言的几种常见句式，《方言》第2期
- 罗福腾 1996 山东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方言》第3期
- 罗仁地、潘露莉 2005 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徐烈炯、潘海华主编，《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吕叔湘 1985 疑问·肯定·否定，《中国语文》第4期
- 祁峰 2017 从汉语及吴方言的正反问句看疑问和焦点的互动，《语言科学》第5期
- 祁峰 2020 疑问与焦点的互动——以吴方言特指问句为例，《汉语学报》第2期
- 邵敬敏、朱彦 2002 “是不是VP”问句的肯定性倾向及其类型学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石毓智、徐杰 2001 汉语史上疑问形式的类型学转变及其机制——焦点标记“是”的产生及其影响，《中国语文》第5期
- 汤廷池 1981 国语疑问句研究，《师大学报》（台湾）第20期
- 汤廷池 1984 国语疑问句研究绪论，《师大学报》（台湾）第29期
- 唐燕玲、石毓智 2009 疑问和焦点之关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第1期
- 徐杰 1999 疑问范畴与疑问句式，《语言研究》第2期
- 徐杰、李英哲 1993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第2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1期
- 朱德熙 1991 “V-neg-VO”与“VO-neg-VO”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

语文》第 5 期

祝敏彻 1995 汉语选择问、正反问的历史发展,《语言研究》第 2 期

Lambrecht K.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Question Structures of the Wenrong Dialect in the Jiao-Liao Mandarin

Jiang Jing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n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Jiao-Liao Mandarin. The dialects of Rongcheng City, Wendeng District, Rushan City in Weihai City,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easternmost tip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are more similar to the dialect of Muping District in Yantai City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Wenrong dialect for short). In the Wenrong dialect, there exists a positive-negative question structure, "(是) negVP", which has not been found in other dialects so fa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ur types of question structures in the Wenrong dialect,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types of question structures, especially the origin of the "(是) negVP" structure, and discuss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es-no questions and positive-negative questions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types of focus and semantic tendencies.

13 维西县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

李翔

贵州财经大学

内容摘要：塔城傈僳语作为一种以动词结尾（APV）的分析型语言，在表示施受关系时通常会有规律地出现格标记来表示施受义。文章主要从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类型、生命度差异的制约、句法结构的制约以及施受标记的多功能性几方面对其进行描写，以揭示塔城傈僳语施受结构的特点。

一、前言

大多数藏缅语族语言都有表示动词与其论元关系的后置词，类型学上称之为格标记。关于施受结构的研究，目前查到的文献主要有黄成龙（2010a,2010b），蒋颖（2010），杨将领（2015），胡素华、周廷升（2018），李翔、黄成龙（2020），彭茹、唐贤清（202）和菊（2024），姜静、沐华（2025），柳俊（2025）等，他们分别对羌语、普米语、独龙语、彝语、福贡傈僳语、独龙语、纳西语的施事格和非施事格的形式、分布特征等内容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在塔城傈僳语中，当表示施受关系时，表示语义角色的施受标记会有其出现规律，它的出现主要受生命度差异、句法结构以及信息结构的制约。本文将以笔者在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大村上组调查所得的自然语料为基础，对其出现规律进行一一梳理。

二、施受结构类型

通过对 7 个长篇自然语料（5 个传说故事、2 个风俗陈述）整理统计，在 1200 个句子共出现了 157 个施事标记、190 个受事标记，并从中归纳所得以下六种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类型。

2.1 A+ ni³³+P+te⁵⁵+V 及

在塔城傈僳语中，当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同时出现在句中时，施受标记的出现受施受事生命度差异的制约，听话者可以根据施受标记的出现明确地分辨出谁为施事论元，

李翔. 2025. 维西县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214–225.

谁为受事论元。在此类型中，受事标记必须要出现，而施事标记则可根据施事者是否充当句中的焦点而出现，若施事者作为焦点（新消息）时，则必须出现。如⁴²：

(1) a⁵⁵ŋi³³ tʰa³³ e⁵⁵ ni³³ ŋa³³ tɛ⁵⁵ tɕi⁵⁵za³³ gu³¹.
 昨天 时 3sg AGT 1sg DAT 钱 给

昨天他给了我钱。

(2) nu³³ ŋa³³ tɛ⁵⁵ lo³³ŋɛ⁵⁵ xa³¹, ŋa³³ la³³ ni³³.
 2sg 1sg DAT 等 IMP 1sg 来 IRR

你等我，我要来。

(3) ŋa³³ dza³³ zɛ³³ ni³³.
 1sg 饭 做 IRR

我做饭吧。

(4) a⁵⁵na³¹ ni³³ ŋa³³ tɛ⁵⁵ kʰo⁵⁵ lo³³.
 狗 AGT 1sg DAT 咬 PRT

狗咬我了。

在例(1)中，e⁵⁵“他”和ŋa³³“我”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因为生命度相当，所以在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之后分别出现了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此时句中的施事者作为句中的焦点。在例(2)中，nu³³“你”和ŋa³³“我”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由于施事者作为旧信息出现，所以只在ŋa³³“我”之后出现了受事标记；在例(3)中，ŋa³³“我”为施事论元，dza³³“饭”为受事论元，由于dza³³“饭”的生命度明显低于ŋa³³“我”，所以它们之后都未出现标记；在例(4)中，a⁵⁵na³¹“狗”为句中的施事论元，ŋa³³“我”为受事论元，虽然a⁵⁵na³¹“狗”的生命度明显低于ŋa³³“我”，但由于标记了ŋa³³“我”为受事论元之后，a⁵⁵na³¹“狗”就被默认为是句中的施事论元，所以此时只在“我”之后出现了受事标记。

⁴² 文中的语法标注为：1sg (1st 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称单数)；2sg (2nd person singular 第二人称单数)；3sg (3rd 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称单数)；1pl (1st person plural 第一人称复数)；2pl (1st person plural 第二人称复数)；3pl (3rd person plural 第三人称复数)；A (actor/agent 施事者)；ABL (ablative (marker) 由格/从格 (标志))；AGT (agentive (marker) 施事者 (标志))；CAUS (causative (marker) 使动 (标志))；COM (comitative (marker) 随同格 (标志))；COMP (complementizer 补语引导词)；COMPR (comparative (marker) 比较级 (标志))；CONJ (conjunctive (marker) 并列连接标志)；CONT (continuative aspect (marker) 连续体 (标志))；COP (copula 系词)；CSM (change of state (marker) 状态变化 (标志))；DAT (dative (marker) 与格 (标志))；DEF (definite (marker) 定指 (标志))；DIR (directional marking 方向标志)；DUR (durative aspect 持续体)；EGOPH (egophoricity 自指标记)；GEN (genitive (marker) 领属格 (标志))；HRS (hearsay evidential marker 传闻 (示证) 标志)；IUP (intonation unit partical 语调单位)；IMP (imperative (marker) 命令式 (标志))；INST (instrumental (marker) 工具格 (标志))；IRR (irrealis (marker) 未然 (标志))；NEG (negative 否定)；NMLZ (nominalizer 名物化 (标志))；P (patient 受事者)；PFT (perfect 完成体 (标志))；PFV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完整体 (标志))；PROH (prohibitive (marker) 禁止式 (标志))；PROG (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 进行体 (标志))；PROS (prospective aspect (marker) 将行体 (标志))；PRT (clause/sentence final particle 句尾语气/助词)；REA (realis (marker) 实然 (标志))；REP (repetitive 反复体)；SQ (sequential (marker) 动作连续 (标志))；TOP (topic (marker) 话题 (标志))；VIS (visual witness 亲见 (示证范畴))。

2.2 P+ tɛ⁵⁵+A+ ni³³ + V ɤ

在塔城傈僳语中，没有类似于汉语中的被字句，所以在表示被动义时，通常也要借助施受结构来表示，即强调受事型施动句。此时句中受事标记的出现受施事论元与受事论元的生命度差异的限制，施事标记则必须出现。如：

- (5) e⁵⁵ ɲi³³za³¹ tɛ⁵⁵ a⁵⁵tei⁵⁵ ni³³ tɛ⁵⁵ do³³.
哥哥 DAT 弟弟 AGT 打 PFV

弟弟被哥哥给打了。

- (6) tʰu³¹ɣu³¹ tʰi³³ tɕi³¹ pu³³ tʰu³¹ɣu³¹so³³gu³¹so³³ ni³³ ɲi³³ da³³.
书 这 一 本 老师 AGT 看 CSM

这本书被老师看了。

在例(5)中，a⁵⁵tei⁵⁵“哥哥”和e⁵⁵ɲi³³za³¹“弟弟”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因为句中a⁵⁵tei⁵⁵“哥哥”（施事论元）的生命度与e⁵⁵ɲi³³za³¹“弟弟”（受事论元）的生命度相当，所以在a⁵⁵tei⁵⁵“哥哥”和e⁵⁵ɲi³³za³¹“弟弟”之后分别出现了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在例(6)中，tʰu³¹ɣu³¹so³³gu³¹so³³“老师”和tʰu³¹ɣu³¹“书”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当受事论元被提到句首，并且受事论元的生命度明显低于施事论元，此时只在句中的施事论元tʰu³¹ɣu³¹so³³gu³¹so³³“老师”之后出现施事标记。

2.3 A+ (ni³³) +与事者+tɛ⁵⁵+客体(+V)+gu³¹

当句中出现三个论元时，句中的动词可由双及物动词 gu³¹“给”或者普通动词与 gu³¹“给”连用后充当。此时句中的施事论元和与事论元都是指人所指，与事论元之后的标记通常都要保留，而施事论元之后的标记同样要根据焦点信息来决定是否出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塔城傈僳语中，与事标记和受事标记同形，都为“tɛ⁵⁵”。如：

- (7) za⁵⁵zo³³ ni³³ mi³¹zɛ³³so³³ tɛ⁵⁵ e⁵⁵ʃi⁵⁵ gu³¹ ɲɛ³⁵.
3pl AGT 农民 DAT 种子 给 PROG

他们在给农民种子。

- (8) e⁵⁵ za⁵⁵ni³³ tɛ⁵⁵ kʰo³³kʰo³³ tɕa³³ gu³¹ do³³.
3sg 孩子 DAT 故事 讲 给 PFV

他给孩子讲故事了。

在例(7)中，za⁵⁵zo³³“他们”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同时作为句中的焦点（新信息），mi³¹zɛ³³so³³“农民”为与事者，e⁵⁵ʃi⁵⁵“种子”为客体，双及物动词 gu³¹“给”出现在句末，所以句中的施事标记和与事标记都要出现；在例(8)中，e⁵⁵“他”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za⁵⁵ni³³“孩子”为与事者，kʰo³³kʰo³³“故事”为客体，及物动词“讲”和双及物动词“给”相连出现在句末，句中的施事论元为旧信息，所以只出现了与事标记-tɛ⁵⁵。

2.4 A+ ni³³+P+tɛ⁵⁵+V+tsi³³

在带有致使标记“tsi³³”的施受结构中，无论句中的谓语动词为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或是双及物动词，句中的施受关系都成立，致使义会使句中的论元数增加。而且在带有

致使标记的施受结构中，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都是指人所指，通常受事论元之后的受事标记都会出现，施事论元之后的施事标记则会跟根据是否充当句中的焦点而出现。如：

(9) e⁵⁵ ηa³³ tɛ⁵⁵ gi³³ tsi³³ ni³fi³³.

3sg 1sg DAT 走 CAUS 想

他想让我走。

(10) e⁵⁵ ni³³ za⁵⁵ni³³ tɛ⁵⁵ na³³ts^hi³¹ dza³¹ tsi³³ do³³ ma⁵⁵.

3sg AGT 孩子 DAT 药 吃 CAUS PFV VIS

他让孩子吃药了。

(11) e⁵⁵ ni³³ ηa³³ tɛ⁵⁵ bɔ³³ts^hɔ³¹ t^hi³³ tɛ^hi³¹ k^hɔ⁵⁵

3sg AGT 1sg DAT 衣服 这 一 件

nu³³ tɛ⁵⁵ li⁵⁵ gu³¹ tsi³³.

2sg DAT 还 给 CAUS

他让我还给你这件衣服。

在例(9)中，e⁵⁵“他”为施事论元(旧信息)，ηa³³“我”为受事论元，“tsi³³”为致使标记，gi³³“走”为不及物动词，句中的论元数由一个变为了两个，所以在 ηa³³“我”之后出现了受事标记。在例(10)中，e⁵⁵“他”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焦点)，za⁵⁵ni³³“孩子”为受事论元，“tsi³³”为致使标记，dza³¹“吃”为及物动词，句中的论元数由两个变为了三个，此时在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之后都出现了标记。在例(11)中，动词 li⁵⁵“还”和双及物动词 gu³¹“给”连用，当致使标记出现时，论元数由原本的三个变为了四个，此时句中的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都要出现。

2.5 A+ ni³³+V 及

当在句中只出现施事论元时，其实存在隐含的受事论元，只是此时说话者更想强调施事论元(动作发出者)所发出的动作，所以施事论元之后的施事标记-ni³³必须出现。如：

(12) mi³¹ti³³ ni³³ a³³ ta³³ do³³.

云 AGT PFT 挡 PFV

云挡住了(太阳)。

(13) ηa³³ ni³³ dza³¹ do³³ la³¹.

1sg AGT 吃 PFV REA

我吃掉了(某物)。

在例(12)中，mi³¹ti³³“云”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在句中被省略的受事论元原本应该在施事标记后出现，但由于句中的受事论元被省略，所以句中的施事论元之后必须加施事标记-ni³³。在例(13)中，ηa³³“我”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由于句中的受事论元被省略，所以在“我”之后出现了施事标记-ni³³。

2.6 P+te⁵⁵+V 及

当句中的施事论元被省略只出现受事论元时，受事论元之后的受事标记- te⁵⁵ 必须出现。如：

(14) a⁵⁵ma⁵⁵ te⁵⁵ na³³ŋi³³ do³³.

妈妈 DAT 问 PFV

问了妈妈了。

(15) o⁵⁵dø³¹ ŋe⁵⁵ te³³ŋe⁵⁵ a³¹k^hu⁵⁵te³³xua³¹, na⁵⁵ t^ho⁵⁵la³³

狐狸 TOP 狡 IUP 很 狡猾 但是 兔子

te⁵⁵ ma³¹ xua⁵⁵ ma³³ mi⁵⁵ t^hi³¹ ma³³ d³ua³⁵.

DAT NEG 赢 NMLZ 都 一 个 有

狐狸虽狡猾，但是也有赢不了兔子的时候。

在例(14)中，a⁵⁵ma⁵⁵“妈妈”为句中的受事论元，此时句中的施事论元被省略，所以在 a⁵⁵ma⁵⁵“妈妈”之后出现了受事标记-te⁵⁵。在例(15)中，t^ho⁵⁵la³³“兔子”为句中的受事论元，从复句的前一分句中，我们可得知后半句中省略的施事论元是 o⁵⁵dø³¹“狐狸”，但由于后一分句中没出现，所以在 t^ho⁵⁵la³³“兔子”之后出现了受事标记-te⁵⁵。

三、生命度差异的制约

Comrie (1989) 认为：生命度是名词固有的特性，作为对生命度的最初描写，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等级，其主要成分按生命度由高到低的次序是：人类>动物>无生命物。在上文中描述施事标记的分布时，也简单地提到了关于生命度的差异对施事标记出现的影响。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明显高于受事论元时，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通常会被省略；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与受事论元的生命度相当时，为了区分施事论元与受事论元，此时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的出现情况各有不同；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明显低于受事论元时，为了让听者弄清谁为受事论元，此时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都会同时出现。

3.1 A 生命度>P 生命度

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明显高于受事论元时，句中的施受标记都会省略，此时根据傀儡语的基本语序(SOV)可以判断谁为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如：

(16) ŋa³³ ŋi⁵⁵ŋi³³ ŋe⁵⁵ ŋua⁵⁵ a³³li³³wu⁵⁵ t^hi³¹ ma³³ ŋa³⁵ wa³³

1sg 今天 TOP 鱼 大的 一 条 抓 到

tsi³³ na³³.

CAUS PROS

我今天一定要抓条大鱼。

(17) e⁵⁵ t^hu³¹ɣu³¹ ŋi³³ŋi³fi³³ d³o³¹.

3sg 书 看 想 HRS

他想看书。

在例(16)中, $\eta\alpha^{33}$ “我”为句中的施事论元, $\eta\alpha^{55}$ “鱼”为受事论元, 此时施事论元的生命度明显高于受事论元, 所以并无语义上的歧义, 此时施受标记都不出现; 在例(17)中, $\eta\alpha^{33}$ “我”为施事论元, $t^h\alpha^{31}\gamma u^{31}$ “书”为受事论元, $\eta\alpha^{33}$ “我”的生命度明显高于 $t^h\alpha^{31}\gamma u^{31}$ “书”, 所以施受标记也都不出现。

3.2 A 生命度=P 生命度

当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都指人所指时, 它们的生命度相当, 此时受事论元之后的受事标记必须出现, 施事标记可根据是否充当焦点信息来添加; 而当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都为动物时, 施事标记必须出现, 受事标记则可省略。如:

(18) $\eta\alpha^{33}$ e^{55} $t\epsilon^{55}$ $\alpha^{31}k^h\alpha^{55}$ $di^{31}dz\alpha^{31}$.

1sg 3sg DAT 很 想

我很想他。

(19) e^{55} ni^{33} $\eta\alpha^{33}$ $t\epsilon^{55}$ te^{55} la^{33} .

3sg AGT 1sg DAT 打 来

他打我。

(20) $\alpha^{55}\gamma u^{55}p^h\tilde{u}^{33}$ ni^{33} $\alpha^{55}\gamma u^{55}ma^{33}$ $hu^{31}dzi^{33}$ da^{33} .

公鸡 AGT 母鸡 领 走 CSM

公鸡把母鸡带走了。

(21) $\alpha^{55}na^{31}$ ni^{33} $\alpha^{33}zo^{33}$ ($t\epsilon^{55}$) k^ho^{55} $\eta\epsilon^{35}$.

狗 AGT 绵羊 DAT 咬 PROG

狗在咬绵羊。

在例(18)中, $\eta\alpha^{33}$ “我”为施事论元(旧信息), e^{55} “他”为受事论元, $\eta\alpha^{33}$ “我”和 e^{55} “他”的生命度相当, 所以此时句中的受事标记必须要出现, 施事标记则不出现; 在例(19)中, e^{55} “他”(焦点)和 $\eta\alpha^{33}$ “我”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 此时句中的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都同时出现; 在例(20)中, $\alpha^{55}\gamma u^{55}p^h\tilde{u}^{33}$ “公鸡”和 $\alpha^{55}\gamma u^{55}ma^{33}$ “母鸡”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 由于 $\alpha^{55}\gamma u^{55}p^h\tilde{u}^{33}$ “公鸡”和 $\alpha^{55}\gamma u^{55}ma^{33}$ “母鸡”都为动物, 所以在表示施受义时句中的施事标记必须出现, 受事标记则可省略; 在例(21)中, $\alpha^{55}na^{31}$ “狗”和 $\alpha^{33}zo^{33}$ “绵羊”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 所以此时施事标记必须出现, 受事标记则可出现或可省略。

3.3 A 生命度<P 生命度

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小于受事论元的生命度时, 句中的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都必须出现。如:

(21) γu^{55} ni^{33} $\eta\alpha^{33}$ $t\epsilon^{55}$ ηo^3 la^{33} .

针 AGT 1sg DAT 扎 来

针扎到我了。

(22) $\alpha^{55}\eta^{31}$ ni^{33} $\eta\alpha^{33}$ te^{55} $dzy^{33}do^{33}$.
 牛 AGT 1sg DAT 顶 PFV

牛顶到我了。

在例(21)中, yw^{55} “针”为无生命物, 它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 而 $\eta\alpha^{33}$ “我”为有生命物, 它作为句中的受事论元, 此时它们之后分别要出现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 在例(22)中, $\alpha^{55}\eta^{31}$ “牛”和 $\eta\alpha^{33}$ “我”分别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 由于“牛”的生命度明显低于“人”, 所以在它们之后分别出现了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

四、句法结构的制约

在塔城傈僳语中, 施受标记的出现除了受生命度差异的影响之外, 它们还会出现受句法结构和信息结构的制约。

4.1 直接引语句

在塔城傈僳语中, 当说话者(转述者)要引用一句话或转述一句话时, 在引语外的原叙述者之后通常要加施事标记; 若句中也出现了原听话者, 则在原听话者之后也要出现受事标记。如:

(23) $mi^{31}ti^{33}$ ni^{33} $b\epsilon^{33}$ $\eta\epsilon^{55}$: “ o^{33} $\eta\alpha^{33}$ $d\epsilon^{31}mi^{55}$ $mi^{31}he^{33}$ wu^{31} se^{33} ,
 云 AGT 说 IUP 哦 1sg COMPR 风 大 CONT
 $mi^{31}he^{33}$ ni^{33} $ʒua^{55}$ se^{33} . ”
 风 AGT 厉害 CONT

云说: “哦, 风比我大, 风还比我厉害。”

(24) $o^{33}pa^{55}$ ni^{33} $ma^{33}la^{31}$ $ne^{31}ga^{33}$ $za^{55}ba^{31}$ η^{55} zo^{33} te^{55} $b\epsilon^{33}$
 青蛙 AGT 媳妇 CONJ 他爸爸 两 人 DAT 说
 $\eta\epsilon^{55}$: “ $a^{55}ba^{31}$ $na^{31}\eta^{55}zo^{33}$ $e^{31}mi^{55}$ dzi^{33} si^{55} $te^{h_y}y^{33}$ zi^{33} xa^{31} ,
 IUP 爸爸 你俩 先 去 SQ 烧 去 IMP
 $\eta\alpha^{33}$ $ke^{55}ne^{55}$ $ku^{55}-la^{33}$ ni^{33} . ” $b\epsilon^{33}$ te^{31} $b\epsilon^{33}$
 1sg 后面 DIR-来 IRR 说 那样 HRS

青蛙对媳妇和爸爸说: “爸爸, 你俩先去烧吧, 我随后就来。”

在例(23)中, $mi^{31}ti^{33}$ “云”为句中的原叙述者, 所以在 $mi^{31}ti^{33}$ “云”之后出现了施事标记; 在例(24)中, $o^{33}pa^{55}$ “青蛙”为原叙述者, $ma^{33}la^{31}ne^{31}ga^{33}za^{55}ba^{31}$ “媳妇和爸爸”为原听话者, 所以在它们之后分别出现了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

4.2 假分裂结构

假分裂结构通常是由话题、焦点和系词三部分组成, 出现在句首的名词短语通常作

为句中的话题，系词出现在句末，系词之前的部分则作为句子的焦点。在塔城傈僳语中也存在假分裂结构，通常出现在句首的名词短语作为句中的话题，在系词“ $\eta\alpha^{33}$ ”之前的部分作为句子的焦点，句中施事论元之后的施事标记必须要出现。如：

(25) $\alpha^{55}li^{55}za^{31}$ thi^{33} te^{h31} ma^{33} $\eta\epsilon^{55}$ $za^{55}zo^{33}$ ni^{33} gu^{31} ji^{31} $\eta\alpha^{33}$.
 小猪 这 一 头 TOP 3pl AGT 给 NMLZ COP
 这头小猪是他们给的。

(26) $b\theta^{33}ts^{h31}$ $thi^{33}zo^{33}$ $\eta\epsilon^{55}$ e^{55} ni^{33} ts^{h31} ji^{31} $\eta\alpha^{33}$.
 衣服 这些 TOP 3sg AGT 洗 NMLZ COP
 这些衣服是他洗的。

在例(25)中， $\alpha^{55}li^{55}za^{31} thi^{33} te^{h31} ma^{33}$ “这头小猪”为句中的话题，句末的“ $\eta\alpha^{33}$ ”为句中的系词，所以在句中焦点部分的施事论元之后出现了施事标记- ni^{33} ；在例(26)中， $b\theta^{33}ts^{h31} thi^{33} zo^{33}$ “这些衣服”为句中的话题，“ $\eta\alpha^{33}$ ”为系词，所以在 e^{55} “他”之后出现了施事标记。

4.3 焦点结构

在施事既作为句子的话题，又作为句子的施事论元，并且作为句子的窄焦点出现在句首时，在施事论元之后会出现施事标记。如：

(27) $\eta\alpha^{33}$ ni^{33} ko^{35} - $do^{33}lo^{33}ho^{33}$ gu^{31} ni^{33} .
 1sg AGT DIR-吊 给 IRR
 我给你往上吊。

(28) $\alpha^{31}ma^{33}$ ni^{33} $\alpha^{31}ku^{33}$ p^{hie35} gie^{33} si^{31} ?
 谁 AGT 锄头 坏 掉 PRT
 是谁把锄头弄坏了的？

在例(27)中， $\eta\alpha^{33}$ “我”既作为句子的话题，又作为句子的施事。因为在塔城傈僳语中，当句中的施事成分与话题成分重合时，施事论元的语义特征要大于话题的语义特征，此时在施事论元（话题成分）之后要加施事标记。在例(28)中， $\alpha^{31}ma^{33}$ “谁”既作为句中的施事论元，又作为句中的话题，所以在 $\alpha^{31}ma^{33}$ “谁”之后也要加上施事标记。

4.4 特殊的双话题结构

在塔城傈僳语中，存在特殊的双话题结构。通常是以“NP, NP1+NP2+V, NP2+NP1+V”的形式出现，此时因为NP1和NP2在前后两句中充当了不同的语法成分，有着不同的语义功能，所以为了区分谁为主动（施事论元），谁为被动（受事论元），就要分别在前后两句中的NP1和NP2之后出现相应的标记。如：

(29) $za^{55}zo^{33}$, nu^{33} ni^{33} $\eta\alpha^{33}$ te^{55} li^{55} $na^{33}\eta i^{33}$, $\eta\alpha^{33}$ ni^{33}
 3pl 2sg AGT 1sg DAT REP 问 1sg AGT
 nu^{33} te^{55} li^{55} $na^{33}\eta i^{33}$.
 2sg DAT REP 问

他们，你问我，我问你。

- (30) t^ho³³za³¹ o³³ t^hi³¹xua⁵⁵, nu³³ ni³³ ŋa³³ tɛ⁵⁵ li⁵⁵ pɛ⁵⁵,
 人 那 一 群 2sg AGT 1sg DAT REP 骂
 ŋa³³ ni³³ nu³³ tɛ⁵⁵ li⁵⁵ pɛ⁵⁵ mu³³ ŋɛ³⁵.
 1sg AGT 2sg DATREP 骂 那样 PROG

那群人，你骂我，我骂你。

在例(29)中，在前一句中，nu³³“你”为施事论元，ŋa³³“我”为受事论元；而在后一句中，ŋa³³“我”是施事论元；nu³³“你”是受事论元。此时为了避免混淆它们在句中担任的角色，所以在它们之后要加上它们所担任的语义角色的标记（即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在例(30)中，同样为了区分前后句中的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也同样要加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来加以区分。

五、施受标记的多功能性

LaPolla (1994、1995a-b) 对 140 多种藏缅语及其方言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有 72 种语言施事格与工具格标记相同，有 45 种语言工具格和从由格标记相同，有 23 种语言的从由格和施事格标记相同。在塔城傈僳语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ni³³”在塔城傈僳语中除了可以作为施事标记之外，还可在句中作为工具格标记、由格标记、补语标记和未然标记出现在句中；而“tɛ⁵⁵”则还可作为属格标记。如：

- (31) ŋɛ³⁵fɛ³¹la³¹ t^hi³³ma³³ ŋɛ⁵⁵ lo³³di³³ ni³³ a³³ kɔ⁵⁵
 麻雀 这个 TOP 石头 INST PFT 雕刻
 ta⁵⁵ fɛ³¹ ŋa³³.
 DUR NMLZ COP

麻雀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

- (32) bɛ³¹ka³³ ni³³ t^ha⁵⁵fɛ³¹ tɛ^hi³³ ŋɛ⁵⁵ t^hi³³ŋua³¹ ko³³li³³ dʒua³□.
 大村 ABL 塔城 到 IUP 十五 公里 有

从大村到塔城有 15 公里。

- (33) ŋa³³ lu³³di³³ t^hi³¹ ni³³ p^hu³³fɛ³³ li³³ bo³¹ do³³ la³¹.
 1sg 石头 洗 COMP 珠宝 一样 亮 PFV REA

我把石头洗得像珠宝一样亮。

- (34) ŋa³³ nu³³ tɛ⁵⁵ bu³¹ŋø³³ fɛ³¹ tɛ^hi³¹fɛ³¹ gu³¹ ni³³.
 1sg 2sg DAT 另外 NMLZ 一样 给 IRR

我给你另一样东西。

- (35) nu³³ ga³³ hɛ³³ ŋɛ⁵⁵ e⁵⁵ tɛ⁵⁵ ma³³ dʒɛ³¹ wu³¹.
 2sg GEN 房子 TOP 3sg GEN DEF COMPR 大

你的房子比他的大。

在例(31)中, lo³³di³³“石头”是 ɲɛ³⁵ʃa³¹la³¹“麻雀”的原材料, 所以在 lo³³di³³“石头”之后出现了工具格标记-ni³³; 在例(32)中, be³¹ka³³“大村”为起始地, tʰa⁵⁵ʃi³¹“塔城”为目的地, 所以在 be³¹ka³³“大村”之后出现了由格标记-ni³³来表示起始地; 在例(33)中, 在 ʈɕi³¹“洗”之后出现了补语标记-ni³³来表示洗的效果像珠宝一般; 在例(34)中, 在句末出现了未然标记-ni³³表示句中 gu³¹“给”的动作还未发生; 在例(35)中, 在 e⁵⁵“他”之后出现了属格标记-te⁵⁵, 其中“te⁵⁵”与“ga³³”不同, “te⁵⁵”之后不能加领属物, 而“ga³³”之后可以加领属物。

六、结语

在塔城傈僳语中共有六种施受结构类型, 其中四种类型出现在及物动词句中, 施受标记的出现会受施事者和受事者的出现位置或省略与否的影响。此外, 还会出现在带有双及物动词 gu³¹“给”或者带有致使标记“ʈɕi³³”的施受结构中。

从生命度差异的制约上看, 只有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等于或小于受事论元的生命度时, 句中的施事标记或受事标记会出现; 当施事论元的生命度大于受事论元的生命度时, 句中的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通常会省略。

从句法结构的制约上看, 在塔城傈僳语中直接引语句、假分裂结构、焦点结构和特殊的双话题结构中的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之后通常都会出现施事标记和受事标记。

从施受标记的多功能性上看, 塔城傈僳语的施事标记除了和大多数语言一样, 其形式和工具格标记、由格标记同形, 还与补语标记和未然标记同形; 而受事标记则与属格标记同形。

综上所述, 在塔城傈僳语的施受结构中, 施受标记的出现会受语序、生命度差异、句法结构的共同制约, 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强制性的, 施受标记在句中主要起到消除歧义的功能。

附记: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维西县塔城傈僳语形态句法研究》(23FYYB01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
- LaPolla, Randy J. 1992.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1-9.
- LaPolla, Randy J. 1994.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evidence of

- Sapir's 'drif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7.1:61-80.
- LaPolla, Randy J. 1995a.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ed. by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1995b.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6.4:1149-1185.
- 戴庆厦、李洁 2005 藏缅语的强调或施动句-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语言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
- 和菊 2024 鲁甸纳西语的可选性施受标记及其多功能性,《常熟理工学院学报》第 38 卷第 1 期
- 黄成龙 2013 羌语中的生命度等级序列,《汉藏语学报》第 7 期
- 黄成龙 2010 羌语的施事及其相关标记,《语言暨语言学》第 2 期
- 黄成龙 2010 羌语的非施事及其相关标记,《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素华、周廷升 2018 彝语方言受事格标记及基本语序类型比较,《语言科学》第 17 卷第 2 期
- 姜静、沐华 2025 彝语的施受标记,《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 蒋颖 2010 普米语施受标记系统的关联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7 卷第 4 期
- 蒋颖 2010 普米语施受助词的分工互补关系,《民族语文》第 4 期
- 李翔、黄成龙 2020 福贡傈僳语的施受标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7 卷第 2 期
- 柳俊 2025 纳西语施受语标及其配置模式的演化《民族语文》第 2 期
- 彭茹、唐贤清 2022 独龙语迪政当话强调施事句的句法特点及其成因,《语言科学》第 21 卷第 4 期
- 杨将领 2015 独龙语的施事和工具格标记,《民族语文》第 1 期
- 张军 1990 藏缅语表施动和受动的结构助词,《语言研究》第 2 期

The Agent-Patient Structure in Tacheng Lisu of Weixi County

Li Xiang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s an analytical language with a verb-final (APV) structure, Tacheng Lisu language typically employs regular case markers to denote agent-patient relations. This paper primarily describes the agent-patient structure of Tacheng Lisu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typology, constraints

of animacy hierarchy, syntactic constraints, and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ent-patient markers, aiming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nt-patient structure in Tacheng Lisu language.

14 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及其特征

麻秀芝

西安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摘要: 本文以浸入式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自然语料为基础,结合功能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等比结构的构成方式及语义特征的不同,我们把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划分为3种不同的结构类型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描写,据此探讨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在类型学上的共性及个性特征,为比较结构的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前言

人类语言都有表达“比较”概念的手段,等比也是比较结构中的主要类型之一。不过,目前国内外运用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写分析等比结构的研究成果较少。国外等比结构的类型学研究主要有 Ultan (1972) 分析了 123 种欧洲语言的等比、差比和极比的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并分析了比较结构的语法和语义特征,被视为现代比较结构类型学研究的开拓性论文,但是论文没有提供等比结构的分类。Haspelmath & Buchholz (1998: 277-334) 以 47 种语言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等比结构的划分标准并把等比结构划分为 3 种主要类型,文中还指出了等比结构与相似结构的异同, Bisang (1998: 707-730) 参照 Haspelmath & Buchholz 的术语及框架描写分析了东亚和东南亚 5 种语言的等比结构及相似句,文中根据不同的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把汉语普通话的等比结构分为 3 种主要的结构类型,同时介绍了其他等比结构形式。Henkelman (2006) 通过描写分析了 25 种语言等比结构的形态句法结构,认为不同的形态句法结构隐含不同的语义结构,并根据语义结构的特征把等比结构分为 5 种主要的结构类型。Haspelmath (2017) 以 119 种语言为样本,根据等比结构不同的构成方式,把等比结构分为 6 种主要的结构类型,并提出了等比结构所具有 3 条共性特征。国内等比结构的类型学专题研究成果仅有吕珊珊 (2019) 的《蔡家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学考察》,文章参照 Haspelmath (2017) 的框架对蔡家话 3 种等比结构的结构类型进行了描写分析。

苗语比较结构的专题研究成果非常少,目前仅有余金枝 (2012) 的《矮寨苗语的差比

麻秀芝. 2025. 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及其特征. 黄成龙、杨旭 (主编)《意义创造论: 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 pp. 226-238.

句》和冀芳（2013）的《黔东苗语差比范畴研究》，但文章重点分析和描写差比句，而没有对等比结构进行描写分析，目前也尚未有苗语等比结构的专题研究成果。

本文将选取贵州省铜仁市松桃县境内的苗语（简称苗语松桃话）作为研究对象，以自然对话和长篇故事为语料，结合功能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等比结构的构成方式及语义特征的不同，我们把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划分为 4 种类型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描写，据此探讨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在类型学上的共性或个性特征，为比较结构的类型学研究提供参考⁴³。

二、等比结构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比较结构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句法结构。莱昂斯（Lyons 1968:465）把比较结构分为四个不同程度的比较，形容词均可出现在四个不同程度的比较结构中，主要用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称对象所具有的特征，只是第一个程度的比较含义实际上并不明显：

- (a) 正比（Positive）：A is tall.
- (b) 等比（Equative）：A is as tall as B.
- (c) 差比（Comparative）：A is taller than B.
- (d) 极比（Superlative）：A is the tallest of the children. (KLEIN 1991:674)

第二个是 A、B 这两个指称对象程度相同的比较结构，Haspelmath（2017）把这样的比较结构称之为等比结构，并指出等比结构有五个构成要素：比较主体（comparee），程度标记（degree-marker），比较参项（parameter），基准标记（standard-marker）和比较基准（standard），如：

1	2	3	4	5
comparee	degree-marker	parameter	standard-marker	standard
Kim is	[as	tall]	[as	Pat]
Kim 和 Pat 一样高。				

本文将引用 Haspelmath 的术语描写分析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及特征。

⁴³ 本文的语料均来源于笔者在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芭茅村进行浸入式田野调查所得，我们把当地人所操的苗话简称为苗语松桃话，系属苗语湘西方言西部土语。

三、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及其特征

不同语言构成等比结构的手段不同。Haspelmath (2017) 从跨语言的视角考察了 119 种语言等比结构的类型学特征并归纳出等比结构 6 种主要的类型, 见表 1。

表 1 等比结构的类型 (Haspelmath, 2017)

等比类型	例句
only equative standard-marker 只有基准标记	Kim is tall like +Pat.
equative degree and standard-marker 有程度标记和基准标记	Kim is equally +tall as +Pat.
equative degree-marker unified 有程度标记之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型	[Kim and Pat]are equally tall.
primary reach equative 核心等比谓词	Kim reaches/equals +Pat in height.
primary reach equative unified 有核心等比谓词之比较主体与比较基准联合型	[Kim and Pat] are equal in height.
secondary reach equative 次要等比谓词	Kim is tall reaching/equaling +Pat.

从表 1 可以看出, 这 6 种类型从结构来看实际上可以分为有等比标记和等比谓词两大类。不过, Peter Henklemann (2006) 通过考察 25 种语言等比结构的结构特征, 认为等比结构的结构类型除了有等比标记、有一个等比谓词这两大类以外, 还有领有谓词结构 (possessive construction)、Be-of 结构、并列结构 (paratactic constructions), 然后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

本文从类型学的视角并结合苗语松桃话构成等比结构的不同手段及语义特征, 认为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结构类型可以分为三类: I. 有等比标记; II. 核心等比谓词; III. 并列结构, 本节将逐一探讨这三种等比结构的特征。

3.1 类型 I 有等比标记

在苗语松桃话有等比标记的等比结构中, 主要有两种形式类型: 一种是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的等比结构, 一种是只有程度标记的等比结构。

3.1.1 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

在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中, 较为常见的等比结构同时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 根据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的不同, 等比结构有三种常见的语义类型:

- (1) A. xɑŋ⁴²qɿ²² ɲɑŋ⁴⁴ pæ⁵³mi⁴⁴noŋ⁵³ ɑ⁴²ʂɿ³⁵ noŋ³⁵.
 盘石 跟 芭茅 一样 冷
 盘石镇跟芭茅村一样冷。
- B. xɑŋ⁴²qɿ²² naŋ⁴² pæ⁵³mi⁴⁴noŋ⁵³ naŋ⁴²naŋ³⁵ noŋ³⁵.
 盘石 像 芭茅 这么/那么 冷
 盘石镇像芭茅村那么冷。
- C. xɑŋ⁴²qɿ²² me⁴² pæ⁵³mi⁴⁴noŋ⁵³ naŋ⁴²naŋ³⁵ noŋ³⁵.
 盘石 有 芭茅 这么/那么 冷
 盘石镇有芭茅村那么冷。

语义类型 A 是由基准标记 ɲɑŋ⁴⁴ 与程度标记 ɑ⁴²ʂɿ³⁵ “一样” 结合构成；类型 B 是由基准标记 naŋ⁴² “像” 和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那么” 构成；类型 C 是由基准标记 me⁴² “有” 与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那么” 结合构成。下面逐一分析苗语松桃话这类等比结构中基准标记、程度标记、比较参项所具有的特征。

1. 基准标记

苗语松桃话中有 3 个常见的基准标记。在类型 A 这种等比结构中，基准标记 ɲɑŋ⁴⁴ 既可以看作表示伴随的介词，主要用来介引比较基准；也可以看作表并列的连词。它可以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词类，这可以用否定词 tce⁴² 的句法位置来进行验证：如果否定词位于基准标记之前，是介词，否定词只是对比较主体这部分论元进行否定，如例（A1）；如果否定词位于程度标记之前，是连词，否定词对作为整个句子主语论元的两个并列名词短语进行否定，如例（A2）：

- (A1) ve²² tce⁴² ɲɑŋ⁴⁴ moŋ⁴² ɑ⁴²ʂɿ³⁵ ʂæ³⁵.
 我 不 跟 你 一样 高
 我不跟你一样高。
- (A2) ve²² ɲɑŋ⁴⁴ moŋ⁴² tce⁴² ɑ⁴²ʂɿ³⁵ ʂæ³⁵.
 我 跟 你 不 一样 高
 我跟你不一样高。

ɲɑŋ⁴⁴ 作为介词时，比较基准只是句子的次要论元，比较主体才是句子的主语论元，比较基准只是一个表示伴随的次要论元；ɲɑŋ⁴⁴ 作为连词时，把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并列连接起来构成并列名词短语，共同作为句子的主语论元，比较基准只是主语论元的一部分，具体的句法结构如下：

[ve²²]s [ɲɑŋ⁴⁴moŋ⁴²]PERIPHRA [ɑ⁴²ʂɿ³⁵ ʂæ³⁵]PREDICATE
 [ve²² ɲɑŋ⁴⁴moŋ⁴²]s [ɑ⁴²ʂɿ³⁵ ʂæ³⁵]PREDICATE

由于等比结构中的基准标记 ɲɑŋ⁴⁴ 可以看作两种词类，因此等比结构语义类型 A 的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a. 介词，即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开的 A1 型；b. 连词，即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unified）的 A2 型。

值得注意的是，当它作为连词时，由于等比结构 A2 型的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往往表达复数的概念，因此往往可以用表示复数的代词或代词短语来代替，此时等比结构也就没有基准标记，而只有程度标记 $\alpha^{42}\eta^{35}$ “一样”，如：

- (2) $pu^{42} \quad \alpha^{42}\eta^{35} \quad \eta^{35}$.
 我们 一样 高
 我们一样高。

此外，在具体的语境中，可以没有基准标记和比较基准，而只有程度标记，如：

- (3) $\eta\alpha^{53} \quad q\alpha^{42} \quad \alpha^{42}\eta^{35} \quad kui^{42}$.
 肉 鸡 一样 贵
 鸡肉一样贵。

结合类型 A 的上述情况，即当基准标记 $\eta\alpha^{44}$ 是介词时，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开型等比结构 A1 型，而基准标记是连词时，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型等比结构 A2 型，两者均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但是如果 A2 的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是表示复数的代词，其句法结构就只有程度标记，同时，在具体的语境中，类型 A 也可以只有程度标记。

在语义类型 B 这种等比结构中，基准标记是介词 $\eta\alpha^{42}$ “仿佛、像、相似”，它与程度标记 $\eta\alpha^{42}\eta\alpha^{35}$ 连用构成等比的含义，表达比较主体的性质或状态达到比较基准的同等程度，如：

- (4) $vu^{22}k\alpha^{42} \quad to^{35} \alpha^{42} \quad \eta\alpha^{42} \quad mju^{22}l\alpha^{42} \quad \eta\alpha^{42} \quad ku^{22} \quad p\alpha^{42}tu^{22} \quad \eta\alpha^{42}\eta\alpha^{35} \quad lo^{53}$.
 他/她们 得 一条 鲤鱼 像 只 手掌 这么/那么 大
 他/她们得一条鲤鱼像手掌那么大。

这种等比结构中，由于基准标记 $\eta\alpha^{42}$ “像”本身在具体的语境中也能表示比较主体与比较基准的性质或状态程度等同或接近，因此，这种等比结构的比较主体与比较基准有时候可以互换位置但不影响基本语义，如：

- (5) $\eta\alpha^{22}q\alpha^{22} \quad \eta\alpha^{42} \quad tei^{42}wei^{35} \quad \eta\alpha^{42}\eta\alpha^{35} \quad lo^{53}$.
 盘石 像 吉卫 这么/那么 大
 盘石镇像吉卫镇那么大。
- (5') $tei^{42}wei^{35} \quad \eta\alpha^{42} \quad \eta\alpha^{22}q\alpha^{22} \quad \eta\alpha^{42}\eta\alpha^{35} \quad lo^{53}$.
 吉卫 像 盘石 这么/那么 大
 吉卫镇像盘石镇那么大。

由基准标记 “ $\eta\alpha^{42}$ ” 构成的等比结构，它的比较参项不能省略，这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如果省去比较参项，则不能表示等比的含义，它只能构成相似句，主要是强调事物或人之间在方式、性质特征等某个方面存在类似或相似的关系，如：

- (6) $ts\alpha\eta^{42} \quad w\alpha^{44}\eta\alpha^{42} \quad ne^{42} \quad ts\alpha\eta^{42} \quad ntu^3 \square t\alpha^{22} \quad \eta\alpha^{42}\eta\alpha^{35}$.
 装 瓦 像 人家 装 树 柴 这样/那样
 装瓦就像人家装木头柴火那样。[强调方式相似]
- (7) $\alpha^{42} \quad t\alpha\eta^{35}q\alpha^{42} \quad zu^{42} \quad \eta\alpha^{42} \quad q\alpha^{42}l\alpha^{44} \quad \eta\alpha^{42}\eta\alpha^{35}$.
 一 种 前缀 石头 像 田螺 这样/那样

这种石头像田螺。[强调形状相似]

naŋ⁴²如果不与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一起连用则不能构成等比结构，句法上通常是作为副词，语义上表示“仿佛、好像、似乎”，如：

- (8) naŋ⁴² me⁴² ne⁴² ɲhæ³⁵ moŋ⁴² zɔ⁴²?
像 有 人 喊 你 语气词
好像有人喊你？

有时候只是引导一个句子，用于举例，语义上相当于“比如、比方说”，如：

- (9) naŋ⁴² mæ⁴² nen⁴² tha⁴² ɲhan³⁵ [o³⁵ tæ³⁵ m²² ʂaŋ⁴² pæ⁴², tæ⁴² ei⁴² ta³⁵
像 现在 今晚 六 点 去 上 班 到 明早
[o³⁵ tæ³⁵ ne⁴² lo²² tæ⁵³ pæ⁴², moŋ²² ʂɔ⁴² tchi³⁵ ʂɔ⁴² to³⁵ m²².
六 点 人家 来 接 班 你 才 开始 离开 得 语气词

比如今晚这会儿你六点钟去上班，到明早六点人家来接班，你才能够离开呢。

在语义类型 C 这种结构中，是 me⁴² “有”与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这么/那么”连用才构成等比结构，比较主体位于动词 me⁴² “有”之前，比较基准位于动词 me⁴² “有”之后，表示比较主体的性质或状态达到比较基准的同等程度，由于 me⁴² “有”强调比较主体是由较低的程度才达到与比较基准等同的程度，因此，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的位置不能互换，如：

- (10) vu²² me⁴² moŋ⁴² naŋ⁴²naŋ³⁵ ʂæ³⁵.
他/她 有 你 这么/那么 高
他/她有你那么高。

由 me⁴² “有”与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这么/那么”连用所构成等比结构，其具体的句法结构如下：

[vu²²]_S [me⁴² moŋ⁴²naŋ⁴²naŋ³⁵]_{PERIPHIRAL} [ʂæ³⁵]_{PREDICATE}

由此可以看出，这类等比结构的比较基准出现在比较参项之前，语序变成了 SOV 型，这跟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的等比结构的基本语序一致：比较主体+基准标记+比较基准+程度标记+比较参项（这样的语序与苗语松桃话的基本语序不同，苗语松桃话的基本语序为 SVO 型）。

在具体语境中，当比较基准可以用具体实物进行比划时，比较基准在句子中也可以不出现但不能省略，而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这么/那么”必须出现，如：

- (11) ɲaŋ⁴⁴ pju⁴² ei⁴² [p²² me⁴² naŋ⁴²naŋ³⁵ ntɯ²² le³⁵ m²².
里面 屋子 辣椒 有 这么/那么 长 个 语气词
屋里的辣椒有这么/那么长个呢。

需要强调的是，这类等比结构必须是由动词 me⁴² “有”与程度标记 naŋ⁴²naŋ³⁵ “这么/那么”连用才能表达等比的含义。如果 me⁴² “有”不与程度标记连用，而是作为句子的核心谓词时，则没有等比的含义，其表达的主要含义“数量达到某种程度”，如：

- (12) a⁴² ɲoŋ²² nu⁴⁴ ʂo⁴⁴ nen⁴² me⁴² [o³⁵ kaŋ⁴² u⁴² tɛi⁴².
一 只 水鸭子 这 有 六 斤 二 两

这只水鸭子有六斤二两。

在非等比结构中，它表示“领有、具有”，如：

(13) ve²² me⁴² pu³⁵ le⁴² te⁴² te⁴².

我 有 三 个 小称标记 孩子

我有三个孩子。

也可以表示存在，如：

(14) ŋaŋ⁴⁴ pju⁴² me⁴² ɬho⁴² ɕi⁴² p²² zin⁴².

里面 房子有 多 辣椒 很

屋里有很多辣椒。

因此，这类等比结构不能划归等比谓词中，因为动词 me⁴² “有”作谓词时，其本身并不含有等比的意义，它只有与程度标记 naŋ⁴² naŋ³⁵ “这么/那么”连用才有等比的含义。同时，也不宜将这类等比结构划归到只有程度标记的类型中，因为程度标记 naŋ⁴² naŋ³⁵ “这么/那么”只表示程度深而无法表达等比的含义，它只有与 me⁴² “有”连用才能表达等比的含义。同时，鉴于其所呈现的句法和语序特征，我们将这种等比结构划分为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的类别。

2. 程度标记

苗语松桃话中有两个程度标记：第一个程度标记 a⁴² ɣl³⁵，它在语义上表示“一样、等同”的含义，它在等比结构中作为副词来修饰比较参项，主要强调比较主体与比较基准在程度上存在等同关系，如：

(15) u⁴² pen³⁵ pen³⁵ ntɿ⁴² nen⁴² a⁴² ɣl³⁵ ɕæ⁴².

二 本 书 这 一样 新

这两本书一样新。

大多数情况下，它与基准标记 ŋaŋ⁴⁴ “跟”连用构成等比结构，如：

(16) a⁴² ŋoŋ²² zoŋ⁵³ nen⁴² ŋaŋ⁴⁴ a⁴² ŋoŋ²² kwu⁴² zi⁴² a⁴² ɣl³⁵ xen²².

一 头 羊 这 和 一 条 狗 那 一样 重

这只羊和那条狗一样重。

它有时候也与基准标记 naŋ⁴² “像”连用构成等比结构，如：

(17) vu²² qhu⁴² me²² naŋ⁴² the³⁵ a⁴² ɣl³⁵ kwe⁴².

他/她 脸 像 炭 一样 黑

他/她的脸像炭一样黑。

a⁴² ɣl³⁵ “一样”如果做句子核心谓词，主要表示两种或几种事物在的外形或方式等性质特征上存在相似或类似的关系，如：

(15') u⁴² pen³⁵ pen³⁵ ntɿ⁴² nen⁴² a⁴² ɣl³⁵.

二 本 书 这 一样

这两本书一样。

(16') a⁴² ŋoŋ²² zoŋ⁵³ nen⁴² ŋaŋ⁴² a⁴² ŋoŋ²² kwu⁴² noŋ⁴² a⁴² ɣl³⁵ □.

一 头 羊 这 跟 一 条 狗 那 一样

这只羊和那条狗一样。

第二个程度标记 $\text{naŋ}^{42}\text{naŋ}^{35}$ ，它在松桃话中含有两种不同的语义即“这样/那样”和“这么/那么”，但只有与基准标记 naŋ^{42} “像”连用构成等比结构时，它才能有“程度等同”的含义。如：

(18) vu^{22} ŋhæ^{42} ɿ^{42} naŋ^{42} the^{35} $\text{naŋ}^{42}\text{naŋ}^{35}$ $\text{kwe}^{35}?$

他/她 件 衣服 像 炭 这么/那么 黑

他/她那件衣服像炭这么/那么黑？

在具体语境中，当比较基准可以用具体实物进行比划时，比较基准也可以省略，但程度标记 $\text{naŋ}^{42}\text{naŋ}^{35}$ 不能省略，如：

(19) vu^{22} ŋo^{42} to^{35} ŋoŋ^{22} mjw^{22} $\text{naŋ}^{42}\text{naŋ}^{35}$ ntu^{22} ŋoŋ^{22} m^{22} .

他/她 钓 得 条 鱼 这么/那么 长 条 语气词

他钓到了一条有这么/那么长的（鱼）呢。

$\text{naŋ}^{42}\text{naŋ}^{35}$ 如果不与基准标记 naŋ^{42} “像”连用构成等比结构，而是位于动词前后修饰动词，语义为“这样/那样”，表示动作的方式，如：

(20) $\text{tɔ}^{42}\text{xo}^{35}$ moŋ^{42} li^{42} kɿ^{42} $\text{naŋ}^{42}\text{naŋ}^{35}$ tʰu^{44} .

豆腐 你 要 拿 那样/这样 做

豆腐你要这样/那样做。

(21) phɿ^{42} le^{42} zæ^{42} zæ^{42} $\text{khæ}^{42}\text{khæ}^{42}$ $\text{naŋ}^{42}\text{naŋ}^{35}$, phɿ^{42} tæ^{42} tɿ^{42}

挖 个 圆 圆 圈 圈 那样/这样 挖 完 就

kɿ^{42} tɔ^{42} zu^{22} lian^{42} .

拿 前缀 牛 踩踏

挖个圆圆圈圈这样/那样的，挖完就让牛踩踏。

如果位于形容词、述宾短语之前，语义为“这么/那么”，表示程度，如：

(22) vu^{22} ŋhæ^{42} ɿ^{42} $\text{tʰu}^{44}\text{tei}^{42}$ $\text{naŋ}^{42}\text{naŋ}^{35}$ kwe^{42} $\text{la}^{22}?$

他/她 件 衣服 为什么 这么/那么 黑 语气词

他/她那件衣服为什么这么/那么脏了？

(23) moŋ^{42} $\text{naŋ}^{42}\text{naŋ}^{35}$ me^{42} $\text{zi}^{42}\text{taŋ}^{35}$ ti^{35} ŋaŋ^{44} ve^{22} phu^{44} xε^{35} nen^{42} .

你 这么/那么 有 钱 还 跟 我 说 些 这

你这么/那么有钱还跟我说这些。

3. 比较参项

在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中，比较参项是用来表示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所具有的性质特征，一般是形容词来充当等比结构的比较参项，如：

(24) ʃhi^{35} ŋaŋ^{44} $\text{ci}^{22}\text{se}^{42}$ $\text{a}^{42}\text{ɕi}^{35}$ nei^{44} .

米饭 跟 粥 一样 软

米饭跟粥一样稀。

可以是述补结构，如：

- (25) pjw⁴² ɛæ⁴² ɲaŋ⁴⁴ pjw⁴² qo³⁵ α⁴²ʂɿ³⁵ tu⁴⁴ ɛoŋ⁵³.
房子 新 跟 房子 旧 一样 做 漂亮
新房跟旧房一样好看。

也可以述宾结构，如：

- (26) mɸhɔ⁴⁴ ɛæ⁴² ɲaŋ⁴⁴ mɸhɔ⁴⁴ qo³⁵ α⁴²ʂɿ³⁵ qhu⁴² te⁴² te⁴².
媳妇 新 跟 媳妇 旧 一样 关爱 小称标记 孩子
新媳妇跟原配一样疼爱小孩。

需要注意的是，苗语松桃话的比较参项也可以编码为它的名物化形式，常常位于句首。比较参项名物化是等比结构的核心论元，从语义上看，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是比较参项名物化的领有者，比较参项名物化与比较参项在一个句子中共现，如：

- (27) mɔ⁴² [aŋ⁴⁴ vu²² ɲaŋ⁴⁴ ve²² α⁴²ʂɿ³⁵ [aŋ⁴⁴, mɔ⁴² ntsei³⁵ ɲtɕha³⁵
名物化标记 胖 他/她 跟 我 一样 胖 名物化标记 瘦 恐怕
vu²² qɔ⁴² ntsei³⁵.
他/她 比较标引 瘦
胖他/她跟我一样胖，瘦可能他/她更瘦。

比较参项可以是形容词、述补短语和述宾短语，适用于其他等比类型，比较参项可以以名物化的形式与比较参项在一个句子中共现，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类型。

3.1.2 类型 II 仅有程度标记

这种句法结构类型由程度标记 α⁴²ʂɿ³⁵ “一样”构成的，由于它在语义上就表示等同或程度相同，因此，在具体的语境中可以单独表达等比的含义，如：

- (28) mɔ⁴² lo⁵³ mɔ⁴² ɛu³⁵ α⁴²ʂɿ³⁵ [aŋ⁴⁴.
名物化标记 大 名物化标记 小 一样 肥
大的、小的一样胖。

- (29) mɸhɔ⁴⁴ tɔ²² α⁴²ʂɿ³⁵ ɛoŋ⁵³.
姑娘 汉族 一样 漂亮
汉族姑娘一样漂亮。

这种等比结构首先是必须有比较参项，它的比较参项不能省略，程度标记 α⁴²ʂɿ³⁵ “一样”只有出现在比较参项前才能表示程度等同的含义；如果省去比较参项，α⁴²ʂɿ³⁵“一样”作为句子的核心谓词或是位于系词之后，则主要强调没有差别。如：

- (30) u³⁵ men²² mɔ³⁵ ku⁴² he³⁵ qɔ⁴² mɔ²² α⁴²ʂɿ³⁵, xɔ⁴⁴ lu²² ti³⁵ α⁴²ʂɿ³⁵.
两 个 兄弟 些 样貌 一样 脾气 还 一样
弟兄俩长得一样，脾气也一样。

- (31) u³⁵ ɲtɕha⁴² pæ⁴² ti³⁵ ɛu³⁵ mɸhei³⁵ nen⁴² α⁴²ʂɿ³⁵.
两 只 底儿 鞋子 这 一样
这两只鞋底相同。

其次，比较基准可以不出现，特别是在较为明确的具体语境中，比较基准可以不出现，这是这类等比结构较为突出的特点，如：

(32) α^{42} $\eta\hbar\ae^{42}$ γ^{42} nen^{42} $\alpha^{42}\gamma^{35}$ $min^{53}\epsilon a\eta^{42}$.

一 件 衣服 这 一样 脏

这件衣服一样脏。

比较基准也可以出现，只是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形式上是分开的，但由于缺乏基准标记，因此较难分辨出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这种等比结构的表达形式在口语中极为常见，如：

(33) pi^{42} li^{42} , $pi^{42}lu^{22}$ $\alpha^{42}\gamma^{35}$ ϵo^{35} .

李子 橘子 一样 酸

李子、橘子一样酸。

另一种主要是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结合为一体，形式和语义上也无法分割，这种形式主要是以等比结构 A2 型的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表示复数的形式出现，它往往可以用表示复数的代词或代词短语、数量短语来表示，这类等比结构往往也就没有基准标记，而只有程度标记，如：

(34) min^{42} $\alpha^{42}\gamma^{35}$ $z\phi^{44}$.

他/她们 一样 聪明

他们一样聪明。

有时候也可以用表示复数的数量词短语来表示，如：

(35) u^{42} $\eta\hbar\ae^{42}$ γ^{42} nen^{42} $\alpha^{42}\gamma^{35}$ ta^{42} .

二 件 衣服 这 一样 厚

这两件衣服一样厚。

3.2 类型 II 核心等比谓词

类型 II 是由核心等比谓词 $te\phi^{44}$ 和 no^{44} 构成，两者都是及物动词，表示“赶得上、比得上、及”的意义。作为句子的核心谓词，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别位于等比谓词 $te\phi^{44}/no^{44}$ 的前后做句子的主语论元和宾语论元，表明比较主体达到与比较基准相同的程度。如：

(36) α^{42} tu^{42} pen^{53} nen^{42} $te\phi^{44}/no^{44}$ α^{42} tu^{42} pen^{53} $no\eta^{42}$ zu^{35} $za\eta^{44}$.

一 朵 花 这 比得上 一 朵 花 那 好 样

这朵花有那朵花好看。

(37) $l\ho^{42}$ ko^{42} $te\phi^{44}/no^{44}$ ti^{42} $t\epsilon^{42}$ $\epsilon o\eta^{42}$.

松桃 比得上 凤凰 漂亮

松桃跟凤凰一样漂亮。

等比谓词 $te\phi^{44}/no^{44}$ “赶得上、比得上、及”构成的等比结构，主要表达“比较主体由较低的程度达到与比较基准等同的程度”，着重强调程度由低到高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位置互相不能替换，更不能合为一体，比较基准也不能省略。

如果说话人着重强调比较主体的某个特性，比较参项则可以前置，但往往需要用两个子句来表达：第一个子句含有比较参项和程度标记 $naŋ^{42}naŋ^{35}$ ，程度标记修饰比较参项，而比较主体、核心等比谓词和比较基准位于第二个子句中，如：

- (38) $naŋ^{42}naŋ^{35}$ $ŋe^{22}m^{22}$, $moŋ^{42}$ $teɔ^{44}/no^{44}$ $mæ^{42}$ phu^{42} o^{22} .
 这么/那么 懒 语气词 你 比得上 你们 爷爷 语气词
 这么/那么懒，你跟你爷爷一样哦。

3.3 类型 III 并列结构

这种等比结构是通过两个独立且结构相同的并列子句来构成：第一个子句含有比较主体，第二个子句含有比较基准，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别作为两个子句的主语论元；比较参项是两个子句的核心谓词，同时出现在两个并列子句中，只是在第二个子句的比较参项之前常带有副词 $zɔ^{42}$ “也”，用来强调程度相同。如：

- (39) vu^{22} zu^{35} te^{42} $mpho^{44}$, ne^{42} te^{42} $ku^{42}me^{22}$ $zɔ^{42}$ zu^{35} zin^{42} .
 他/她 好 小称标记 姑娘/媳妇 人家 小称标记 妹妹 也 好 很
 他/她长得好看，人家妹妹也很好看。

如果第一个子句的主语与第二个子句的主语相同，第二子句的主语往往省略，如：

- (40) vu^{22} fu^{44} teu^{42} ta^{42} zin^{42} , fu^{42} $zæ^{42}$ $zɔ^{44}$ ta^{42} .
 他/她 喝 酒 厉害 很 喝 烟 也 厉害
 他/她喝酒很厉害，抽烟也厉害。

程度标记除了用 $zɔ^{44}$ “也”，有时候也会用另一个副词 $næ^{42}$ “也”来表示，如：

- (39') vu^{22} zu^{35} $te^{42}mpho^{44}$, ne^{42} te^{42} $ku^{42}me^{22}$ $næ^{42}$ zu^{35} zin^{42} .
 他/她 好 姑娘 人家 小称标记 妹妹 也 好 很
 他/她长得好看，人家妹妹也很好看。

- (40') vu^{22} fu^{44} teu^{42} ta^{42} zin^{42} , fu^{42} $zæ^{42}$ $næ^{42}$ ta^{42} .
 他/她 喝 酒 厉害 很 喝 烟 也 厉害
 他/她喝酒很厉害，抽烟也厉害。

四、结语

结合等比结构的构成手段及其语义特征的描写和分析，我们认为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结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I) 有等比标记，这可以细分为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和只有程度标记两种类型，其中，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的等比结构，按照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的不同可以有 3 种不同的语义类型，其中基准标记 $ŋaŋ^{44}$ “跟”的词性进一步细分，因此等比结构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当基准标记是介词时，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开型等比结构；当基准标记是连词时，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型等比结构；只有程度标记，根

据程度标记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程度标记 $\alpha^{42}\text{ŋ}^{35}$ “一样” 有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分开形式，也有比较主体和比较基准联合形式；（II）有核心等比谓词，是核心等比谓词 $\text{tɕp}^{44}/\text{np}^{44}$ “比得上、赶得上、及” 构成；（III）并列结构，由两个并列子句构成的。具体如表 2：

表 2 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

结构类型		例句
有等比标记	有基准标记和程度标记	A $\eta\alpha\eta^{44}$ B $\alpha^{42}\text{ŋ}^{35}\text{ɕæ}^{35}$. A 跟 B 一样高。
		A $\eta\alpha\eta^{44}$ B $\alpha^{42}\text{ŋ}^{35}\text{ɕæ}^{35}$. A 和 B 一样高。
		A $\text{na}\eta^{42}$ B $\text{na}\eta^{42}\text{na}\eta^{35}\text{ɕæ}^{35}$. A 像 B 那么高。
		A me^{42} B $\text{na}\eta^{42}\text{na}\eta^{35}\text{ɕæ}^{35}$. A 有 B 那么高。
	只有程度标记	A, B $\alpha^{42}\text{ŋ}^{35}\text{ɕæ}^{35}$. 大的、小的一样高。
		$\text{pɯ}^{35}\alpha^{42}\text{ŋ}^{35}\text{ɕæ}^{35}$. 我们一样高。
		B $\text{na}\eta^{42}\text{na}\eta^{35}\text{ɕæ}^{35}$. B 那么高。
核心等比谓词		A $\text{tɕp}^{44}/\text{np}^{44}$ B ɕæ^{35} . A 及 B 高。
并列结构		A ɕæ^{35} , B $\text{zɔ}^{42}\text{ɕæ}^{35}$. A 高，B 也高。

由此可以看到，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与 Henkelmann（2006）的等比结构类型分类基本一致，其类型及其表现形式与 Haspelmath（2017）归纳出 6 种主要类型也基本吻合。由此可以看出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类型符合语言类型学的共性特征。

不过，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的特征并不符合 Haspelmath（2017）提出了的三条共性特征即等比结构中不存在仅使用程度标记而比较基准无标记的语言；如果比较参项在比较基准之后，那么该语言的主要语序为 OV；如果比较基准位于比较参项前，那么基准标记通常在比较基准后，如果基准位于比较参项后，基准标记则通常在基准前。苗语松桃话的等比结构并不符合这三条共性：（1）它存在仅用程度标记的等比结构类型；（2）比较参项虽然在比较基准之后，但苗语松桃话的主要语序是 VO 型，而不是 OV 型；（3）比较基准虽然位于比较参项前，但基准标记位于比较基准之前，而不是位于比较基准之后，这是苗语松桃话等比结构所具有的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冀 芳. 2013. 黔东苗语差比范畴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 2:210-214.
 吕珊珊. 2019. 蔡家话等比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语言科学 2: 160-175.
 王辅世. 1985. 苗语简志. 北京：民族出版社.
 余金枝. 2012. 矮寨苗语的差比句.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30-136.
 Bisang, Walter. 1998. Adverbiality: The view from the Far East. Adverb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ed. by Johan van der Auwera,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707-730.

- Haspelmath, Martin & Oda Buchholz. 1998. Equative and similat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In Johan van der Auwera with Don     P. O Baoill (eds). *Adverb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77-334.
- Haspelmath, Martin. 2017. Equative constructions in world-wide perspective. *Similative and Equative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ed. by Yvonne Treis & Martine Van hove, Berlin: de Gruyter: 9-32.
- Henkelmann, Peter. 2006. Constructions of equative comparison.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59. 4: 370-398.
- Klein, Ewan.1991. Comparatives, in: von Stechow, Arnim & Wunderlich, Dieter (eds.), *Handb         zur Sprach-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6: Semantics*.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673  691.
- Lyons, John.1968.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lan , Russell.1972. Some features of basic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Stanford) 9 : 117-162.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quative Constructures in Songtao Miao

MA Xiuzhi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colloquial corpora obtaining from immersion fieldwork, equative constructures in Songtao Miao are described, analyzed from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typology, and structures of equative comparison are classified into 3 typ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equative constructures. We hope what we are reporting here will help language describers come up with some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of equative constructions, and provide valuable points of reference o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15 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王保锋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内容摘要：在类型学视野下，本文着眼于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类型。本文首先对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论元编码方式与策略进行描写，并归纳出“给”字结构的配置类型，进而讨论不同类型的“给”结构 T 和 R 的语序，及其跟名词性论元标记的互动。

关键词：羌语“给”字结构 类型学 形态句法

一、引言

“给予”的行为是人类重要的交际行为，在很多语言中表示“给”的动词从形式和功能上都具有较强的共性。纽曼(Newman1996)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分析了动词 GIVE 的语义复杂性、语法多样性，同时还分析了 GIVE 的基本意义与比喻用法。他(Newman1997)还主编了一本《“给”的语言学研究》论文集，对 10 多种语言和手语中动词 Give 语义和语法特点进行分析。纽曼(Newman 1993)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了汉语的“给”，之后从跨语言的角度详细讨论了“给予”类动词的语义类型、论元编码类型和给予结构的语义拓展等方面(Newman 1996)。

语言类型学把一个动词带有三个必有论元，即施事论元A、接受者论元R以及客体论元T，语义上涉及物品转移的结构称为双及物结构。(陆丙甫、罗天华2009) Haspelmath (2015) 指出能够支配三个核心论元的动词被称为双及物动词，如“给”“借”，也包括意义抽象的“提供”以及表示认知转移的动词，如“展示”“教”等也是双及物动词。汉语的“给”被认为是双及物结构最典型的语义。(刘丹青 2001)从跨语言的视角来看，“给予类”动词也是最典型的双及物动词。Newman (1998)认为比较典型的双及物动词是“给”，但其在语法结构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相对于汉语而言，中国境内民族语“给”字结构的类型学研究由于语料的限制相对滞后。陆丙甫、罗天华(2009)基于我国境内128种语言及方言首次将民族语言纳入“给”字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对中国境内语言的双及物结构语序进行了分析。柳俊(2019)在区域类型学框架下，着眼于东南亚语言区域的双及物结构类型及其成因，并指出“双及物结

王保锋. 2025. 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239–251.

构的东南亚语言区域异于跨语言共性”。羌语方言土语内部差别较大,“给”字结构南北方言差别明显,但已有研究仅涉及羌语北部方言雅都土语。

羌族主要生活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县、理县、松潘县和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目前,大约有6万多羌族和黑水县5万多藏族还在使用羌语。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孙宏开 1981;刘光坤 1998;黄布凡、周发成 2006)。羌语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孙宏开 1981;刘光坤 1998)。北部方言内部差异较小,多数土语之间可以互相通话。南部方言内部差别较大,土语之间一般不能通话,但土语内部可以通话(黄成龙 2007)。萝卜寨羌语属于羌语南部方言雁门土语(黄布凡、周发成 2006)。LaPolla with Huang (2003)、黄布凡和周发成(2006)、黄成龙(2007)、郑武曦(Zheng 2016)、王保锋(2017)等著作对羌语动词“给”的结构及相关构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目前还没有羌语“给”字结构的系统研究。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在一手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进行系统的描写。⁴⁴此外,在陆丙甫、罗天华(2009)、Heine & König (2010)、柳俊(2019)的基础上对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编码方式及策略、基本配置及表现特征进行类型学上的分析。

二、萝卜寨羌语句子的基本结构

萝卜寨羌语是一个以SV/APV为主要语序、具有一定分析性的黏着型语言,使用格标记/后置词和一致关系编码语法关系,有以语义为基础的施事者标记-sə³¹和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施事者标记-sə³¹和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使用与否跟动词的及物性有很大的关系,其功能主要是为了有效区分施事者与非施事者以消除歧义。(这两种标记在特定情况下强制使用,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具体使用规则见第四节)根据动词的性质,萝卜寨羌语不及物动词的单一论元S一律不带格标记,如例句(1);及物动词的施事者A会选择性地添加施事者标记-sə³¹,受事者P会选择性地添加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如例句(2)。

- (1) ku³¹piɑ⁵⁵ ɦa³¹-da⁵⁵ku⁵⁵-ŋɑ³¹ ɦa³¹-lui³¹.
石头 向下-滚-副动 向下-来:实然:3
石头滚下来。
- (2) ku³¹piɑ⁵⁵-sə³¹ qa³¹-to⁵⁵ ɦa³¹-tsa⁵⁵.
石头-施事 我-非施事 向下-砸
石头砸到我了。

例句(1)中的ku³¹piɑ⁵⁵“石头”是动作动词da⁵⁵ku⁵⁵“滚”的单一论元S,具有一定的施事性,未带格标记。例句(2)中的ku³¹piɑ⁵⁵“石头”是动作ɦa³¹-tsa⁵⁵“砸”的施事

⁴⁴ 本文的材料是笔者在黄成龙研究员的指导下对萝卜寨羌语进行的专题调查,调查时间为2015-2023年。王明杰先生(1941年生)、王金龙先生(1956年生)、王绘红先生(1972年生)和马成芳女士(1998年生)为我们的发音人,马成芳校对了所有例句,他们均为萝卜寨羌语母语人。

论元 A，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 qa³¹ “我”是动作 fia³¹-tsa⁵⁵ “砸”的承受者，即该句的受事论元 P：他们均带有相应的格标记。

使役化是通过在动词后添加致使标记-ʂə³¹表示的。一般而言，在动词后添加使动后缀-ʂə³¹会改变动词的论元。如例句（3）通过添加后缀-ʂə³¹将不及物动词变成了不及物动词，同时增加一个致使者论元；例句（4）通过添加后缀-ʂə³¹将及物动词变成了使役及物动词，同时增加一个致使者论元。

- (3) qa³¹-sə³¹ ku³¹piə⁵⁵-to⁵⁵ fia³¹-da⁵⁵ku⁵⁵-ʂə³¹-ŋa³¹ fia³¹-da⁵⁵-sa³¹.
 我-施事 石头-非施事 向下-滚-致使-状语 向下-去-实然:1 单
 我让石头滚下去了。
- (4) nə³¹-sə³¹ ku³¹piə⁵⁵-to⁵⁵ qa³¹-to⁵⁵ fia³¹-tsa⁵⁵-sə³¹.
 你-施事 石头-非施事 我-非施事 向下-砸-实然:2 单
 你让石头砸到我了。

例句（3）中的动作动词 da⁵⁵ku⁵⁵ “滚”在添加致使标记-ʂə³¹后变成使役动词 da⁵⁵ku⁵⁵-ʂə³¹ “使滚”，qa³¹ “我”为使役动词的致使者，不及物动词的单一论元 ku³¹piə⁵⁵ “石头”变为使役不及物动词的被致使者，它们均带有相应的格标记。例句（4）中的动作动词 tsa⁵⁵ “砸”在添加致使标记-ʂə³¹后变成使役动词 tsa⁵⁵-ʂə³¹ “使砸”，qa³¹ “我”为使役动词的致使者，带有施事者标记-sə³¹，在句中充当施事论元 A；而原及物动词的施事论元 ku³¹piə⁵⁵ “石头”为使役及物动词的被致使者，原及物动词的受事论元 qa³¹ “我”依然为使役动词的受事者，它们均带有非施事标记-to⁵⁵。

三、“给”字结构的论元编码方式与策略

3.1 编码方式

在萝卜寨羌语中，动词“给”是典型的双及物动词，“给”字结构是一种表示三个参与者的语义事件结构。跨语言的研究发现，双及物结构的论元（主要针对非施事者论元）的编码主要有三种方式（Malchukov, Haspelmath and Comrie 2010）：①格/介词标记（case/adpositional marking = flagging）；②一致关系（agreement = indexing）；③语序（word order）。萝卜寨羌语的语义角色主要通过语序和语义格标记进行区分，其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始终跟施事论元保持一致，并不反映接受者的人称和数。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还未发展出双宾构式，主要表现为格标记结构、致使结构及其灵活的语序。

3.1.1 格标记结构

格标记结构是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最常用、最典型的编码方式，具体表现为接受者带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如例句（5a-b）：

- (5a) qa³¹-sə³¹ nə³¹-to⁵⁵ phu³¹ a³¹-le³¹ fia³¹-zda⁵⁵.
 我-施事 你-非施事 衣服 一-件 向下-给
 我给你一件衣服。

- (5b) qa³¹-sə³¹ phu³¹ tsə³¹-le³¹-to⁵⁵ nə³¹-to⁵⁵ ɦa³¹-zda⁵⁵.
 我-施事 衣服 这-件-非施事 你-非施事 向下-给
 我把这件衣服给你了。

除了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 外，萝卜寨羌语还有三个表示动词与其论元（动词和名词）或论元（名词和名词）之间关系的附置词：-ge³¹/je³¹、-sə³¹和-mi⁵⁵ɛa³¹。“给”字结构表达带有明确方向的“给予”类事件，故其只能跟-ge³¹/je³¹和-mi⁵⁵ɛa³¹组合使用。它们在功能上呈现互补分布，但又有交叉的状况，经常配合使用。

附置词-ge³¹/je³¹ 45 是位格标记，可以出现在目标论元后用来标记处所，倾向于表达含目标 G 的“移动”事件。如例句（6）-（7）：

- (6) thə³¹-(sə³¹) qa³¹-ge³¹/-to⁵⁵ ku⁵⁵ a³¹-gu⁵⁵ tɕua⁵⁵-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施事 我-位格/非施事 碗 一-个 拿-状语 向下-给-实然:3
 他拿给我了一个碗。（直译：他拿到我这里一个碗。）
- (7) thə³¹ qa³¹-ge³¹/-to⁵⁵ ku⁵⁵ a³¹-gu⁵⁵ tə³¹-ŋe³¹sa⁵⁵-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 我-位格/非施事 碗 一-个 向上-借-状语 向下-给-实然:3
 他借给我了一个碗。

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 也可以标记处所。例句（6）-（7）目标论元 qa³¹“我”的标记-ge³¹/je³¹ 也可以替换成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

附置词 mi⁵⁵ɛa³¹ 是属格/受益者标记，经常用来表达致使受益事件和致使拥有事件。如果领有者是人称代词单数，它经常跟人称代词的属格连用。在以 TR 语序出现的“给”字结构里，T 论元须接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R 论元经常由附置词-mi⁵⁵ɛa³¹或-ge³¹标记。如例句（8a-c）：

- (8a) thə³¹-(sə³¹) qa³⁵-mi⁵⁵ɛa³¹ pã³¹la³¹ tɕua⁵⁵-ŋa³¹ sə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施事 我:属格-受益 东西 带-状语 向外-给-实然:3
 他带给我东西了。
- (8b) thə³¹-(sə³¹) pã³¹la³¹-to⁵⁵ qa³⁵-mi⁵⁵ɛa³¹ tɕua⁵⁵-ŋa³¹ sə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施事 东西-非施事 我:属格-受益 带-状语 向外-给-实然:3
 他把东西带给我了。
- (8c) thə³¹-(sə³¹) pã³¹la³¹-to⁵⁵ qa³¹-ge³¹ tɕua⁵⁵-ŋa³¹ sə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施事 东西-非施事 我-位格 带-状语 向外-给-实然:3
 他把东西带到我这里。

例句（8a）的语序为 RT，T 论元 pã³¹la³¹ 往往不带任何标记，R 论元由附置词 mi⁵⁵ɛa³¹ 标记，第一人称代词用属格形式 qa³⁵；例句（8b）的语序为 TR，T 论元和 R 论元均带有相应的标记；而例句（8c）跟（8b）不同的是 R 论元由-ge³¹标记，第一人称代词用一般形式 qa³¹。例句（8a）在结构上更像带了两个论元的及物动词句，而例句（8c）和（8b）为双及物结构。例句（8b）强调的是所有权的转移，而例句（8c）表达的是物理位置的转移。

45 附置词 ge³¹/je³¹ 功能相同，可以互换，老年人经常读作 ge³¹，年轻人经常读作 je³¹。

这两个例句 R 论元上标记均可替换为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

3.1.2 致使结构

在动词“给”后添加致使标记-ʂə³¹可以使原来的双及物动词变为使役双及物动词，同时增加一个致使者论元。双及物动词“给”的施事者变为使役双及物动词“给”的被致使者，同时被致使者论元也是原来双及物动词的施事者，如例句（9a-b）：

- (9a) qa³¹(-sə³¹) phu³¹ tsə³¹-le³¹-to⁵⁵ nə³¹-to⁵⁵ ɦa³¹-zda⁵⁵.
 我-施事 衣服 这件-非施事 你-非施事 向下-给
 我把这件衣服给你了。

- (9b) thə³¹(-sə³¹) qa³¹-to⁵⁵ phu³¹ tsə³¹-le³¹-to⁵⁵ nə³¹-to⁵⁵ ɦa³¹-zda⁵⁵-ʂə³¹.
 他-施事 我-非施事 衣服 这件-非施事 你-非施事 向下-给-致使
 他让我把这件衣服给你。

例句（9a）中的qa³¹“我”是双及物动词zda⁵⁵“给”的施事论元A，其后的施事者标记-sə³¹是非强制的；phu³¹ tsə³¹-le³¹“这件衣服”是客体论元T，其后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nə³¹“你”是接受者R论元，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要强制出现。例句（9b）的致使者（施事者）第三人称单数thə³¹“他”在句首作话题，其后的施事者标记-sə³¹是非强制的；被致使者第一人称单数qa³¹“我”也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但在语义上其仍然是致使者的受事，同时也是双及物动词ɦa³¹-zda⁵⁵“给”的施事者；第二人称代词nə³¹“你”是接受者，因此也用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phu³¹ tsə³¹-le³¹“这件衣服”为客体论元，经常出现在被致使者和接受者之间，并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⁵⁵。

3.1.3 语序

萝卜寨羌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是话题-评述结构，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的典型语序为NP₁+NP₂+NP₃+VP。一般来说，NP₁为施事论元A，比其他论元更具有话题性，在句首作话题，其后的施事者标记是非强制使用的；NP₂为接受者论元R，其后要强制带相应的格标记；NP₃作客体论元T，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也是非强制使用的，如例句（10a）。其它语义角色（如接受者、受益者、目标等）均可以出现在句首充当话题，此时这些出现在句首的非施事者论元需要强制带上相应的格标记或话题标记，而施事者也要强制带施事者标记，如例句（10b-c）。

- (10a) thə³¹(-sə³¹)_[话题] [qa³¹-to⁵⁵ zi³¹dzə³¹ a³¹-pəi³¹(-to⁵⁵)
 他-施事 我-非施事 书 一本-非施事
 tə³¹-pu³¹-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_[评述].
 向上-卖-状语 向下-给-实然:3
 他卖给我一本书。

- (10b) qa³¹-to⁵⁵/-mu⁵⁵_[话题] [thə³¹-sə³¹zi³¹dzə³¹ a³¹-pəi³¹
 我-非施事/-话题 他-施事 书 一本
 tə³¹-pu³¹-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_[评述].
 向上-卖-状语 向下-给-实然:3
 至于我嘛，他卖给我了一本书。

- (10c) $zi^{31}dz\alpha^{31}$ $th\alpha^{31}-p\alpha i^{31}-to^{55}$ _[话题] $[th\alpha^{31}-s\alpha^{31}$ $qa^{31}-to^{55}/-je^{55}$
 书 那-本-非施事 他-施事 我-非施事/-位格
 $t\alpha^{31}-pu^{31}-\eta\alpha^{31}$ $fa^{31}-zda^{55}-ji^{55}$ _[评述].
 向上-卖-状语 向下-给-实然:3
 那本书是他卖给我的。

例句(10a)中的 $th\alpha^{31}$ “他”是双及物动词 $t\alpha^{31}-pu^{31}$ “卖”的施事论元 A，其后的施事者标记 $-s\alpha^{31}$ 是非强制的； qa^{31} “我”是接受者 R 论元，带有非施事者标记 $-to^{55}$ ；而 $zi^{31}dz\alpha^{31}\alpha^{31}-p\alpha i^{31}$ “一本书”是客体论元 T，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 $-to^{55}$ 也是非强制的。例句(10b)中的 R 论元出现在句首作话题，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 $-to^{55}$ 或话题标记 $-mu^{55}$ 要强制出现，A 论元处于 R 论元和 T 论元之间，其后的施事者标记 $-s\alpha^{31}$ 要强制出现。例句(10c)中的 T 论元出现在句首作话题，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 $-to^{55}$ 要强制出现，A 论元仍处于 R 论元和 T 论元之间，其后的施事者标记 $-s\alpha^{31}$ 也要强制出现，而 R 论元也要强制使用非施事者标记 $-to^{55}$ 或位格标记 $-je^{55}$ 。

双及物动词“给”通过添加致使标记 $-\xi\alpha^{31}$ 而构成双及物动词的致使结构，其典型语序为 $NP_1+NP_2+NP_3+NP_4+VP$ 。双及物动词“给”的施事者变为使役双及物动词的被致使者，同时被致使者论元也是原来双及物动词的施事者，一般来说， NP_1 为使役双及物动词的致使者，在句中充当施事论元 A，它比其他论元更具有话题性，在句首作话题； NP_2 为使役双及物动词的被致使者，在语义上其仍然是致使者的受事 P，同时也是双及物动词 $fa^{31}-zda^{55}$ “给”的施事者，其后要强制带相应的格标记； NP_3 作客体论元 T，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也是非强制使用的； NP_4 为接受者 R 论元，带有非施事者标记 $-to^{55}$ ；如例句(11a)。其它语义角色（如接受者、受益者、目标等）均可以出现在句首充当话题，此时这些出现在句首的非施事者论元需要强制带上相应的格标记或话题标记，而施事者也要强制带施事者标记，如例句(11b-d)。

- (11a) $th\alpha^{31}(-s\alpha^{31})$ _[话题] $[qa^{31}-to^{55}$ phu^{31} $ts\alpha^{31}-le^{31}-to^{55}$ $n\alpha^{31}-to^{55}$
 他-施事 我-非施事 衣服 这件-非施事 你-非施事
 $fa^{31}-zda^{55}-\xi\alpha i^{31}$ _[评述].
 向下-给-致使:实然:3
 他让我把这件衣服给你。
- (11b) $qa^{31}-to^{55}$ _[话题] $[th\alpha^{31}-s\alpha^{31}phu^{31}$ $ts\alpha^{31}-le^{31}-to^{55}$ $n\alpha^{31}-to^{55}$
 我-非施事 他-施事 衣服 这件-非施事 你-非施事
 $fa^{31}-zda^{55}-\xi\alpha i^{31}$ _[评述].
 向下-给-致使:实然:3
 至于我，他让我把这件衣服给你。
- (11c) $n\alpha^{31}-to^{55}$ _[话题] $[th\alpha^{31}-s\alpha^{31}qa^{31}-to^{55}$ phu^{31} $ts\alpha^{31}-le^{31}-to^{55}$
 你-非施事 他-施事 我-非施事 衣服 这件-非施事
 $fa^{31}-zda^{55}-\xi\alpha i^{31}$ _[评述].
 向下-给-致使:实然:3

至于你，他让我把这件衣服给你。

- (11d) [phu³¹ tsə³¹-le³¹-to⁵⁵]_[话题] [thə³¹-sə³¹ qa³¹-to⁵⁵ nə³¹-to⁵⁵
衣服 这件-非施事 他-施事 我-非施事 你-非施事
fiə³¹-zda⁵⁵-səi³¹]_[评述].
向下-给-致使:实然:3
这件衣服，他让我给你。

例句(11a)的致使者(施事者)第三人称单数 thə³¹“他”在句首作话题，其后的施事者标记-sə³¹是非强制的；被致使者第一人称单数 qa³¹“我”也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但在语义上其仍然是致使者的受事，同时也是双及物动词 fiə³¹-zda⁵⁵“给”的施事者；第二人称代词 nə³¹“你”是接受者，因此也用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phu³¹ tsə³¹-le³¹“这件衣服”为客体论元，经常出现在被致使者和接受者之间，并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而例句(11b)的被致使者 qa³¹“我”出现在句首作话题要带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致使者 thə³¹“他”带施事者标记-sə³¹。例句(11c)的接受者 nə³¹“你”在句首作话题，并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例句(11d)客体论元 zi³¹dzə³¹ ə³¹-pəi³¹“一本书”在句首作话题，并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此时致使者 thə³¹“他”和被致使者 qa³¹“我”出现在非话题位置，并强制带有相应的格标记。

这两种结构都存在 RT 和 TR 语序，其中 RT 语序为优势语序，凸显 R 论元；而 TR 语序则表达强烈的处置义，R、T 都要凸显。在附属语标记结构中，例句(10a)和(11a)均为施事者居首作话题的典型结构，不论是 RT 语序，还是 TR 语序，施事者标记均可以不出现。因为格标记有效区分不同的语义角色，R 论元和 T 论元均可以出现在句首充当话题，所以萝卜寨羌语双及物结构的语序相对多样且灵活。

另外，萝卜寨羌语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始终跟施事论元保持一致，但其使用也是非强制的。如例句(1)(3)(4)(6)(7)(8)(10)(11)动词上所带的人称标记是跟句子的施事论元保持一致的，而例句(2)(5)(9)的动词均未带人称标记。

3.2. 编码策略

Margetts & Austin (2007) 讨论的三个参与者事件提出了更细致的编码策略类型：三价谓语策略(Three-place predicate strategy)、间接和附加语策略(Oblique and adjunct strategies)、连动策略(Serial verb strategy)、合并策略(Incorporation strategy)、名词化策略(Adnominal strategy)、方向策略(Directional strategy)、吸收策略(Absorption strategy)。萝卜寨羌语中还存在名词化策略和连动策略等非典型的“给”字结构。

3.2.1 名词化策略

名词化策略(adnominal strategy)：动词带两个论元，第三个参与者被表达为一个论元的名词性从属成分，受益者论元被编码为领有者。

萝卜寨羌语人称代词单数存在通过元音或声调屈折来表达属格/受益格的形态变化。第一人称单数的属格/受益格是由第一人称单数一般式低降调变调为中升调构成，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的属格/受益格分别由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一般式的元音

变为双元音 ai、声调变为中升调构成。以 RT 为语序的受益者论元被编码为客体论元的领有者，如例句（8a），又如例句（12）：

- （12） tu⁵⁵ba⁵⁵ (-sə³¹) qa³⁵ ʂu⁵⁵ a³¹-pen⁵⁵ zə³¹-pu⁵⁵-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哥哥-施事 我：属格 书 一-本 向心-买-状语 向下-给-实然：3
 哥哥买给我了一本书。

例句（12）的 R 论元为第一人称单数的属格/受益格形式，从结构上看，它可以是 T 论元 ʂu⁵⁵a³¹pen⁵⁵ “一本书”的领有者，也可以是双及物动词“给”支配的受益者论元。

3.2.2 连动策略

在萝卜寨羌语里，“寄”“扔”“送”“分”“借”“买”“卖”等实义动词跟动词“给”构成多动词结构，以结构“ATV-ŋa³¹-Rr-给”为主，也有客体 T 在句首充当话题的结构“TAV-ŋa³¹-Rr-给”，如例句（13a-b）：

- （13a） tʰə³¹ (-sə³¹) ein³¹ a³¹-fəŋ³¹ ɦa³¹-tei³¹-tʰa³¹-ŋa³¹ qa³¹-to⁵⁵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施事 信 一-封 DIR-寄-汉借-状语 我-非施事 DIR-给-CSM:3
 他寄了一封信给我。
- （13b） ein³¹ tsə³¹-fəŋ³¹ tʰə³¹-sə³¹ ɦa³¹-tei³¹-tʰa³¹-ŋa³¹ qa³¹-to⁵⁵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信 这-封 他-施事 DIR-寄-汉借-状语 我-非施事 DIR-给-CSM:3
 这封信是他寄给我的。

例句（13a）中的 tʰə³¹ “他”是动词 ɦa³¹tei³¹tʰa³¹ “寄”和 zda⁵⁵ “给”的施事论元 A，其后的施事者标记-sə³¹是非强制的；qa³¹ “我”是接受者 R 论元，带有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而 ein³¹ a³¹-fəŋ³¹ “一封信”是客体论元 T。例句（13b）中的 T 论元 ein³¹ tsə³¹-fəŋ³¹ “这封信”出现在句首作话题，A 论元处于动词 ɦa³¹tei³¹tʰa³¹ “寄”之前，其后的施事者标记-sə³¹要强制出现。在这两个例句中，状语标记-ŋa³¹要强制出现在第一个动词 ɦa³¹tei³¹tʰa³¹ “寄”之后，以说明给予的方式为“寄”。

接受者附置词短语可经焦点化置换到动词短语外，即由结构“ATV-ŋa³¹-Rr-给”变为结构“ATrRv-ŋa³¹-给”，如例句（13c）；或提至句首充当话题，即由结构“ATV-ŋa³¹-Rr-给”变为结构“RrATV-ŋa³¹-给”，如例句（13d）：

- （13c） tʰə³¹ ein³¹ a³¹-fəŋ³¹ qa³¹-to⁵⁵ ɦa³¹-tei³¹-tʰa³¹-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 信 一-封 我-非施事 DIR-寄-汉借-状语 DIR-给-CSM:3
 他寄给我了一封信。
- （13d） qa³¹-to⁵⁵ tʰə³¹ ein³¹ a³¹-fəŋ³¹ ɦa³¹-tei³¹-tʰa³¹-ŋ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我-非施事 他 信 一-封 DIR-寄-汉借-状语 DIR-给-CSM:3
 我嘛，他寄给我了一封信。

客体论元 T 在句首充当话题一般不会改变多动词结构类型，如例句（13a-b）；而接受者短语作焦点或在句首充当话题时，尤其是多动词结构中 Rr 处于句首充当话题却能引起句子结构类型的改变，如多动词结构“ATV-ŋa³¹-Rr-给”（例 13a）> “RrATV-ŋa³¹-给”（例 13d）> 连动结构“RrATV-给”（例 14a）的类型扩张。

- （14a） qa³¹-to⁵⁵ tʰə³¹ ein³¹ a³¹-fəŋ³¹ ɦa³¹-tei³¹-tʰa³¹ ɦa³¹-zda⁵⁵-ji⁵⁵.

我-非施事 他 信 一-封 DIR-寄-汉借 DIR-给-CSM:3

我嘛，他寄给我了一封信。

在萝卜寨羌语里，接受者短语作焦点时多动词结构“ATV-ŋa³¹-Rr-给”（例 13a）>“ATRrV-ŋa³¹-给”（例 13c）>连动结构“ATRrV-给”（例 14b）的类型扩张。

(14b) tʰə³¹ ein³¹ a³¹-fəŋ³¹ qa³¹-to⁵⁵ fɛa³¹-tɛi³¹-tʰa³¹ fɛa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 信 一-封 我-非施事 DIR-寄-汉借 DIR-给-CSM:3

他寄给我一封信。

在萝卜寨羌语里，连动式“给”字结构的语序也相对自由，如例句（13c-d）：

(14c) tʰə³¹ qa³¹-to⁵⁵ ein³¹ a³¹-fəŋ³¹ fɛa³¹-tɛi³¹-tʰa³¹ fɛa³¹-zda⁵⁵-ji⁵⁵.

他 我-非施事 信 一-封 DIR-寄-汉借 DIR-给-CSM:3

他寄给我一封信。

(14d) ein³¹ tsə³¹-fəŋ³¹ tʰə³¹-sə³¹ qa³¹-to⁵⁵ fɛa³¹-tɛi³¹-tʰa³¹ fɛa³¹-zda⁵⁵-ji⁵⁵.

信 这-封 他-施事 我-非施事 DIR-寄-汉借 DIR-给-CSM:3

这封信是他寄给我了。

四、“给”字结构的配置类型

罗仁地（LaPolla 1992, 2004）将藏缅语中既标记及物动词受事，又标记双及物动词接受者的这类标记称为非施事者标记，他们是以语义为基础的标记，其使用是为了辨别所指不是施事论元，在句子中的功能是将其所标记的论元跟施事论元作区分，从而消除语义上的歧义。在萝卜寨羌语里，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可以标记使役动词的被致使者，如例句（3）的被致使者 ku³¹ pia⁵⁵“石头”；双及物动词“给”的接受者，如例句（5a）的 nə³¹“你”所有权的转移时的接受者；双及物动词的客体论元，如例句（5b）的客体论元 phu³¹ tsə³¹-le³¹“这件衣服”；双及物动词的目标论元，如例句（6）和（7）的 qa³¹“我”是物理位置的转移目标；还可以标记及物动词受事，如例句（2）的 qa³¹“我”由-to⁵⁵标记，可以解读为及物动词 fɛa³¹-tsa⁵⁵“砸”的受事。由此可见，萝卜寨羌语及物动词的受事、目标论元、使役动词的被致使者和双及物动词的接受者、客体论元及目标论元都用同一个标记-to⁵⁵。在萝卜寨羌语单及物动词句中，两个核心论元有可能产生歧义时，受事才需要被标记。是否产生歧义主要跟施受事的生命度有关。

4.1 受事格标记-to⁵⁵的出现条件

Silverstein（1976）指出某些语言格标记与生命度等级有很大的关系。其所谓的生命度等级为：第一、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专有名词>人类普通名词>非人类有生命普通名词>无生命普通名词。（Silverstein 1976）萝卜寨羌语受事格标记-to⁵⁵的出现是有条件，

在如下这些情况才会强制出现:

4.1.1 受事的生命度高于或等于施事的生命度

当受事的生命度高于或等于施事的生命度时, 萝卜寨羌语须在受事之后加标记-to⁵⁵以区别施事和受事。例句(15)受事 qa³¹“我”的生命度比施事 khu³¹“狗”的生命度高; 例句(16)受事 nə³¹“你”的生命度和施事 qa³¹“我”的生命度相同: 它们的受事均须加受事标记-to⁵⁵。

- (15) khu³¹-sə³¹ qa³¹-to⁵⁵ zɛ³¹-dʒɛ³¹ ja³¹.
狗-施事 我-非施事 向里-咬 语气
狗咬了我。

- (16) qa³¹ (-sə³¹) nə³¹-to⁵⁵ me⁵⁵liɑ⁵⁵ lo³¹ ma³¹-ɛou⁵⁵-sau³¹.
我(-施事) 你-非施事 找 来 否定-敢-实然:1单:亲见
我不敢来找你。

4.2.2 突显受事

在萝卜寨话里, 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除了具有区分施事者与非施事者以消除歧义的功能, 还具有语用上的对比或突显的功能, 如例句(17)和(18)的受事 ɤu⁵⁵“碗”是句子的焦点, 其后加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起到突显受事的功能。

- (17) sɑ⁵⁵-sə³¹ ɤu⁵⁵-to⁵⁵ sɑ³¹-khʒɛ³¹ nə³¹?
谁-施事 碗-非施事 向外-打碎 疑问
谁把碗打碎了?
- (18) thə³¹-sə³¹ ɤu⁵⁵-to⁵⁵ sɑ³¹-dʒɛi³⁵.
他-施事 碗-非施事 向外-打碎
他打碎了碗。

4.2 配置类型

从跨语言角度来看, 一种语言可以有不止一种双及物结构, 不同语言双及物结构在表达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 Malchukov, Haspelmath & Comrie (2010) 指出, 世界语言双及物结构式有三种配置类型: (T-P) -R 式、(R-P) -T 式和 T-P-R 式。在不同的配置类型中, 与事和客体的语序及其跟基本语序的关系又是双及物结构关注的焦点。(陆丙甫、罗天华 2009; Heine & König 2010)

萝卜寨羌语跟彝语西部方言腊罗话(胡素华、周廷升 2018)一样, 受事格标记-to⁵⁵的使用是有条件的, 受施受事生命度的制约。在单及物动词句中, 受事 P 的生命度高于或等于施事者的生命度并有施事能力时, 要用受事格标记以区别于施事者, 而当受事 P 的生命度低于施事者的生命度或没有施事能力时不用标记, 只是信息结构上受事成分为焦点时, 受事格标记-to⁵⁵兼做焦点标记才强制使用。在萝卜寨羌语“给”字结构中, T 和 R 的顺序相对灵活, 主要受两个名词性论元是否带标记的影响。在格标记结构中, “给”字结构以 R-T 优势语序, 接受者 R 论元由-to⁵⁵标记, 客体 T 论元无标记; 当“给”字结构以 T-R 出现时, 接受者 R 论元和客体 T 论元均须带标记-to⁵⁵。因此萝卜寨羌语根据单及物句受事论元 P 的特点和 RT 语序分裂为四种组合类型。(1)在以 R-T 为语序的“给”字

结构中, ①当 P 为非生命体时, 其编码同双及物句中的 T, 即 (T-P)-R 式, 属于双及物类型中的间接宾语组配型; ②当 P 为生命体时用-to⁵⁵ 标记, 其编码同双及物句中的 R, 即 (R-P)-T 式, 属于次要宾语组配型。(2) 在以 T-R 为语序的“给”字结构中, ①当 P 为非生命体时, 其编码有别于双及物句中的 R 和 T, 即 (R-T)-P 式; ②当 P 为生命体时用-to⁵⁵ 标记, 其编码同双及物句中的 R 和 T, 即 T-P-R 式, 属于双及物类型中的中和配置型。而连动策略“给”字结构的配置有所不同, 不论其语序为 R-T 还是 T-R, 连动策略“给”字结构的接受者 R 论元要带标记-to⁵⁵, 客体 T 论元不带标记。故连动策略“给”字结构的配置跟以 R-T 为语序的“给”字结构相同, 根据单及物句受事论元 P 的特点分类为 (T-P)-R 式和 (R-P)-T 式。

五、结语

Machukov et al. (2007) 的统计结果显示, 在不同类型语言的双及物结构中, T 和 R 的顺序主要受两个名词性论元是否带标记的影响。萝卜寨羌语是一个以 SV/APV 为基本语序的语言, 其双及物结构(不论是无标记的双宾构式, 还是附属语标记结构)以 R-T 为优势语序, 这跟陆丙甫、罗天华(2009)和柳俊(2019)的关于东南亚语言区域优势语序的统计结果一致, 即动词居尾的语言以 R-T 为优势语序。

在萝卜寨羌语中, 格标记结构是“给”字结构最重要的编码形式。这符合 Greenberg (1966: 96) 的 U41, 即 SOV 语言倾向于有格系统。萝卜寨羌语的格标记是语义基础上的标记, 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辨别其宿主的语义关系。在单及物句中, 受事者标记-to⁵⁵ 常用来标记有生命的受事论元, 一般不标记无生命的受事论元。因为格标记的存在, 萝卜寨“给”字结构 R 和 T 的语序相对灵活。在“给”字结构中, 以 R-T 为优势语序的格标记结构经常用-to⁵⁵ 标记 R 论元, T 论元无标记。因此萝卜寨羌语根据单及物句受事论元 P 的特点分裂为两种类型: 当 P 为非生命体时, 其编码同双及物句中的 T, 即 (T-P)-R 式, 属于双及物类型中的间接宾语组配型; 当 P 为生命体时用-to⁵⁵, 其编码同双及物句中的 R, 即 (R-P)-T 式, 属于次要宾语组配型。在“给”字结构中, T 论元也可以出现在 R 论元之前, 此时以 T-R 为语序的格标记结构中的 T 论元和 R 论元均须带受事者标记-to⁵⁵。格标记结构以凸显 R 论元的 hR-TV 为优势结构, 而 R、T 均凸显的 hT-hRV 结构则表达强烈的处置义。

双及物动词“给”通过添加致使标记-ʂə³¹而构成双及物动词的致使结构, 其典型语序为 NP₁+NP₂+NP₃+NP₄+VP, 其中 NP₁ 为使役双及物动词的致使者, 在句中充当施事论元 A, 可带施事者标记; NP₂ 为使役双及物动词的被致使者, 在语义上其仍然是致使者的受事 P, 同时也是双及物动词 ɦa³¹-zda⁵⁵ “给”的施事者, 其后要强制带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 NP₃ 作客体论元 T, 其后的非施事者标记是非强制使用的; NP₄ 为接受者 R 论元, 其后要强制带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萝卜寨羌语双及物动词“给”已经发展出连动式双及物结构,

其语序以 T-R 为主, R 论元后要强制带非施事者标记-to⁵⁵, 而 T 论元后的非施事者标记是非强制使用的。

参考文献

- 胡素华、赵镜:《彝语诺苏话双及物及其他三个论元结构》,《语言暨语言学》,2019年第3期。
- 胡素华、周廷升:《彝语方言受事格标记及基本语序类型比较》,《语言科学》,2018年第2期。
- 黄布凡、周发成:《羌语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黄成龙:《蒲溪羌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
- 黄成龙:《羌语的非施事者及其相关标记》,《语言学论丛》第41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
- 黄成龙:《羌语的施事者及其相关标记》,《语言暨语言学》,2010年第2期。
- 刘丹青:《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2001年第5期。
-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 柳俊:《东南亚语言区域的双及物结构类型及其成因》,《外国语》,2019年第4期。
- 陆丙甫、罗天华:《中国境内语言的双及物结构语序》,《汉藏语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9年。
- 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
- 王保锋:《萝卜寨羌语语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Haspelmath, M. 2015.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cademia.edu/10652772/The_serial_verb_construction_Comparative_concept_a
- Heine, Bernd & Christa König. 2010. On the linear order of ditransitive objects. *Language Sciences* 32:87-131.
- LaPolla, Randy J. 1992.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 1-9.
- LaPolla, Randy J. 2004.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林英津等编《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43-74. 台北:中研院语言所。
- LaPolla, Randy J. with Huang Chenglo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alchukov, Andrej, Haspelmath, Martin, & Comrie, Bernard. 2010.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a typological overview. In Andrej Malchukov, Martin Haspelmath & Bernard Comrie (eds.) *Studies in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A Comparative Handbook*, 1-64.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Margetts A , Austin P K 2007. Three-participant event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oward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Linguistics*.
- Newman, J. 1993. The semantics of giving in Mandarin :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Conceptualizations &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 Newman, J. 1996. *Give: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Newman, J. 1997. *The linguistics of Giv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Newman, J. 1998. Recipients and 'give' constructions. In van Langendonck W, van Belle W(eds.). *Dative : Volume 2: Theoretical and contrastive studies*. London: John Benjamins.
- Silverstein, Michael. 1976.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in Dixon, R. M. W. eds.,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C],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1976.
- Zheng Wuxi (郑武曦) 2016. *A Grammar of Longxi Qiang* , PhD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 ty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give" character structure in Luobozhai variety of the Qiang Language

Wang Baofeng

*School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ypes of the “give” character structure in Luobozhai variety of the Qiang Language.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the argument encoding method and strategy of the “give” character structure in Luobozhai variety of the Qiang Language, and summarizes the configuration types of the “give” character structure. Then, it discusses the word ord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give” structures T and R,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 with nominal argument markers.

[Keywords] Qiang language “give” character, structural typology, morphological syntax

16 南部羌语名词组特征的比较

高 韬

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描写比较了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名词组的特征。单音节普通名词所占据的比例其内部一致性比较高，但由于元音高化等因素，导致了三个方言点普通名词的形式有所差异，如 u 对应 ue。专有名词中地名的表达一致性较高，人名中姓氏的表达手段比较有特点，如，用羌语的动物“獐”对应姓氏“张”，用羌语的性状形容词“高”对应姓氏“高”。亲属称谓名词一部分用本民族语表示，一部分则用汉语借词来表示，内部一致性比较高。时间名词的表达方式基本相同，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部分读音发生了变化，也能看出具有共同的来源。数词与量词的表达内部一致性也比较高，差异主要表现在序数词上，龙溪两河口“第一”、“第二”的表示方法已经消失，而是借用汉语的表达方式。方位词的表达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最典型的差异体现在“左边”和“右边”的表达形式上。

关键词：南部羌语 名词组 比较

一、引言

1990 年代以来，以罗仁地（Randy J. LaPolla）、孙宏开、刘光坤、黄成龙、Jonathan Evans、潘露莉、郑武曦等学者为代表，对羌语进行了深入的描写研究，已有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孙宏开（1981：177-178）把羌语分为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南部方言分为五个土语：大歧山土语、龙溪土语、绵池土语、黑虎土语。当地人对内主要使用本族语羌语交流，对外则多使用四川方言进行交流。Randy J. LaPolla & Huang Chenglong（2003：5）指出当地羌族人与非羌族人主要用汉语交流，口语方面主要采用西南官话的川西方言，书面语则采用现代汉语形式。由于南部羌语与汉语长期接触，这就导致了南部羌语中出现了很多借用汉语的现象。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对南部羌语名词词组的特征进行描写和比较，选取的方言点为阿坝州汶川县萝卜寨、龙溪两河口、绵虬⁴⁶。在南部羌语中没有与汉语所描述的“词”完全对应的“词”。黄成龙（2007：46）把蒲溪羌语的词定义为“新成分的一个最小的自由形式，包括停顿、重音；在正常的语言里词的内部不能插

高韬 2025. 南部羌语名词组特征的比较. 黄成龙、杨旭（主编）《意义创造论：罗仁地先生七秩寿庆文集》，pp. 252-268.

⁴⁶ 本文语料来源为田野调查所得，其它引用语料均会注明出处。

入任何东西。”

孙宏开（1981：59）指出：“羌语的词大部分是单音词和由单音词组成的合成词，多音节的单纯词比较少。”南部羌语中的词可以是一个音节，如“水”^{tsu³¹}萝卜寨 ^{tsu³¹}龙溪两河口 ^{tsue³¹}绵鹿，“雨”^{me³¹}萝卜寨 ^{mei³¹}龙溪两河口 ^{me³¹}龙溪两河口；也可以是两个音节，如：“太阳”^{mu³¹ni³¹}萝卜寨 ^{mu³¹ni³¹}龙溪两河口 ^{me³¹se⁵⁵}绵鹿，“鞋”^{be³¹tsu³¹}萝卜寨 ^{tsua³¹ɣa³¹}龙溪两河口 ^{be³¹tsə³¹}绵鹿。

除此之外，南部羌语还有一些后粘附词（enclitics），它们主要附着在名词短语后。包括：格标记、性标记、比较标记、话题标记。它们不能单独出现，必须与名词短语或小句一起出现，例如：^{te³¹-kə³¹}朝上走萝卜寨 ^{i³¹-təyəu⁵⁵-pu³¹}戳龙溪两河口 ^{i³¹-qa³¹}煮绵鹿；“母猪”^{pia³¹-mia⁵⁵}萝卜寨 ^{pie⁵⁵-mia³¹}龙溪两河口 ^{pia³¹-mia⁵⁵}绵鹿。本文所描写比较的名词组主要有以下几类：名词、数词与量词以及方位词，下面分别描写其特征。

二、名词

2.1 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是名词中最常见的一个次类。在所调查的 1051 个名词中，萝卜寨的单音节名词总共 126 个，占 11.99%，龙溪两河口的单音节名词总共 115 个，占 10.94%，绵鹿的单音节名词总共 120 个，占 11.41%。可以看出，相互间的比例一致性比较高。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普通名词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狗	k ^h u ³¹	k ^h u ³¹	k ^h ue ³¹
水	tsu ³¹	tsu ³¹	tsue ³¹
鸡	y ³¹	y ³¹	i ³¹
树	p ^h u ³¹	p ^h u ⁵⁵	p ^h o ³¹

从表 2-1 可见，这些普通名词具有很高的 consistency，因为普通名词属于基本词汇，基本词通常很稳定，不易发生变化。

当然，即使是基本词，也会发生变化，如龙溪两河口的“天”^{mu³¹to⁵⁵}就与萝卜寨和绵鹿存在差别。但如果是语言内部的变化，一般是可以解释的。如“水”这一词，在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读为 ^{tsu³¹}，但在绵鹿读为 ^{tsue³¹}，单元音发生了双元音化，而且还能找到更多 u→ue 发生裂化的例证，具体对比如下：

表 2-2 南部羌语 u→ue 裂化情况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水	tsu ³¹	tsu ³¹	tsue ³¹
狗	k ^h u ³¹	k ^h u ³¹	k ^h ue ³¹
烟子 _{煤~}	mu ⁵⁵ k ^h u ⁵⁵	mu ⁵⁵ k ^h u ⁵⁵	mu ³¹ k ^h ue ⁵⁵
铁锈	ɕi ³¹ gu ³¹	—— ⁴⁷	ɕe ³¹ gue ³¹
斑鸠	ku ³¹ ku ³¹	——	kue ³¹ kue ³¹
真~假	ku ³¹	——	ku ³¹

单元音变为复元音的过程被称为元音的裂化。根据朱晓农⁴⁸ (2004) 裂化分为：前显高化裂化和后显低化裂化。南部羌语中 $u \rightarrow ue$ 属于后显低化裂化，这一变化是由“低化”造成的。在汉语方言中存在类似的变化， $y > y\epsilon/y\alpha/y\epsilon$ (朱晓农 2004: 447)。元音 u 是一个高元音，高元音在变化中会走上一条“高顶出位”的道路，也就是说 u 作为最高的一个元音，还在继续发生高化。从下面的图我们可以看出， u 首先是走上继续高化的道路，继而发生了高顶出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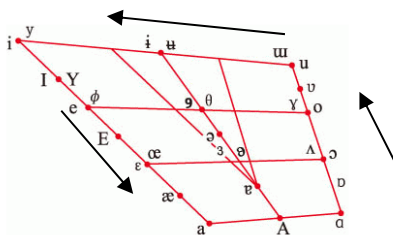


图 2.1 元音 u 的高化

2.2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主要分为两类：地名和人名。在专有名词部分，本文主要比较一些常见的词，侧重描写三个方言点之间的差异性。

2.2.1 地名

南部羌语中用羌语表达的地名,大多是附近地区的地名,如果是近期影响进入的地名,则直接借用汉语来表达,如“上海” $\text{ɕaŋ}^{213}\text{xai}^{53}$ 等不属于当地或邻近当地的地名。表 2-3 是常用地名读音的对照。

47 “——”这一符号表示没有本族语羌语的说法，或者只能说汉语，如有需要会标出汉语的说法，否则不标。后文同。

⁴⁸ 朱晓农. 2004 (5).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J]. 中国语文.

表 2-3 南部羌语常用地名读音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威州	k ^h ua ⁵⁵ tsa ⁵⁵	k ^h o ⁵⁵ tsɔ ³¹	ts ^h u ⁵⁵ ts ^h a ³¹
成都	i ³¹ to ⁵⁵ ko ⁵⁵	i ³¹ to ³¹	tie ³¹ da ⁵⁵
都江堰	do ³¹ ko ⁵⁵ to ⁵⁵	lo ³¹ ko ⁵⁵ to ³¹	ta ³¹ ku ³¹
茂县	moŋ ²¹³ ɕiã ²¹³ (借汉)	ke ³¹ niəu ⁵⁵	ke ³¹ nio ⁵⁵
松潘	soŋ ⁵⁵ p ^h ã ⁵⁵ (借汉)	zɕ ³¹ tsə ⁵⁵	soŋ ⁵⁵ p ^h an ⁵⁵ (借汉)
理县	li ⁵³ ɕiã ²¹³ (借汉)	po ³¹ tsu ⁵⁵	li ⁵³ ɕian ²¹³ (借汉)
龙溪	loŋ ³¹ te ^h i ⁵⁵ (借汉)	ŋe ³¹ mo ³¹ te ⁵⁵	loŋ ³¹ te ^h i ⁵⁵ (借汉)
绵虬	miã ³¹ so ⁵⁵ (借汉)	k ^h a ³¹ su ⁵⁵	mian ³¹ so ⁵⁵ (借汉)
索桥村	so ³¹ te ^h iau ³¹ (借汉)	k ^h a ³¹ pia ³¹ ɣe ⁵⁵	so ³¹ te ^h iau ³¹ (借汉)

2.2.2 人名

南部羌语中人名表达的手段比较特殊，主要体现在姓氏的表达。有一部分姓氏的表达是直接借用汉语，例如“王”直接用汉语的读音来表示；还有一部分姓氏的表达是采用与汉语中的姓氏词义相同的羌语词汇来表达。其中的对应关系是汉语的某一姓氏等同于羌语中的某一类表达，这一类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无生命的事物等，甚至可以是描述性状的词。如：

表 2-4 南部羌语常用姓氏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姓张	ts ^h ə ³¹ li ³¹ mo ³¹ uei ³¹	——	——
姓杨	te ^h e ³¹ mo ³¹ uei ³¹	——	——
姓高	——	bo ⁵⁵ mo ³¹ ua ³¹	bu ⁵⁵ mu ³¹ ue ³¹ mu ⁵⁵
姓何	——	tsu ³¹ k ^h ua ³¹ mo ³¹ ua ³¹	tsue ³¹ ue ³¹ mu ⁵⁵

萝卜寨方言中，“姓张”一词中的“ts^hə³¹li³¹”是“獐子”的意思，因为“獐子”的“獐”和汉语的“张”是同音词；“姓杨”中的 te^he³¹是“羊”的意思，与汉语中的“杨”同音。龙溪两河口“姓高”的 bo⁵⁵是羌语中的性状形容词“高”，借用来表示姓氏的“高”；“姓何”中的“tsu³¹”在羌语中是“河水”的意思，借用来表示姓氏的“何”。绵虬羌语“姓高”中的“bu⁵⁵”在当地羌语中是“高”的意思，与汉语姓氏的“高”对应，“姓何”中的“tsu³¹”是“河水”的意义，与汉语表姓氏的“何”对应。

2.3 亲属称谓名词

亲属称谓名词有一部分用本民族词表示，有一部分则用汉语借词来表示，例如：

表 2-5 南部羌语常用称谓词对照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父亲	pa ³¹ pa ⁵⁵	bi ⁵⁵	ɤue ³¹ ia ⁵⁵
母亲	a ⁵⁵ ma ⁵⁵	mia ³¹	ɤue ³¹ mia ⁵⁵
父母	pa ³¹ pa ³¹ a ³¹ ma ⁵⁵	bi ⁵⁵ mia ³¹	ɤue ³¹ ia ⁵⁵ ɤue ³¹ mia ⁵⁵
儿子	tei ³¹	tei ³¹ /ŋa ²¹³ (少说)	tsə ³¹
女儿	tce ³¹	tce ⁵⁵	tce ³¹
儿女	tei ³¹ nia ³¹ tce ³¹	tei ³¹ na ³¹ tce ⁵⁵	tsə ³¹ nia ⁵⁵ tce ³¹
哥哥	tu ³¹ ba ⁵⁵	tu ⁵⁵ pu ³¹	ɤue ³¹ po ⁵⁵
弟弟	tu ³¹ tsu ⁵⁵	tu ³¹ tsu ⁵⁵	təu ³¹ tsu ⁵⁵
弟兄	tu ³¹ tsu ⁵⁵ tu ³¹ pa ³¹	tu ³¹ ni ³¹	a ³¹ tu ³¹ nə ⁵⁵
姐姐	io ³¹ pa ⁵⁵	sa ⁵⁵ pa ³¹ /kua ³¹ tsi ⁵⁵ a ⁵⁵ tce ³¹ (面称)	ɤue ³¹ tce ⁵⁵
妹妹	io ³¹ tɕa ³¹	io ⁵⁵ /sa ⁵⁵ tsu ³¹ a ⁵⁵ me ³¹ (面称)	liəu ³¹
姊妹	mu ³¹ nia ³¹ io ³¹	sa ³¹ ni ³¹	a ³¹ sa ³¹ nə ⁵⁵

我们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亲属称谓名词，并且根据属性分为了四组，第一组“父亲、母亲、父母”，第二组“儿子、女儿、儿女”，第三组“哥哥、弟弟、弟兄”，第四组“姐姐、妹妹、姊妹”。

第一组：三个方言点的“父亲”和“母亲”的表达形式都不相同，萝卜寨羌语的“父亲”和“母亲”是借用汉语的形式来表达，即“爸爸”和“阿妈”，其中“阿妈 a⁵⁵ma⁵⁵”可能比“爸爸 pa³¹pa⁵⁵”借入的时间更早，因为“阿妈 a⁵⁵ma⁵⁵”中的词头“阿”是属于比较早的现象。龙溪两河口羌语的“父亲”和“母亲”分别用“bi⁵⁵”和“mia³¹”表示，“mia³¹”除了具有“母亲”的意思以为，还具有[+女性、雌性]的语义特征，在构词中经常使用。绵虬和龙溪两河口羌语的表达不一样，其中“父亲”用“ɤue³¹ia⁵⁵”表示，“母亲”用“ɤue³¹mia⁵⁵”表示，“ɤue³¹”有可能是词头的一类，而“mia⁵⁵”也是具有[+女性、雌性]的语义特征，表明了南部羌语在这一特征上的一致性。“父母”一词的构词方式三个点基本一致，都是把“父亲”和“母亲”采用联合的形式构成，中间没有使用连词。

第二组：从发音来看，本组中三个方言点的“儿子”读音基本一致，除了绵虬发生了变化，读为 tsə³¹，其余两个方言点都读为 tei³¹，只是发音部位发生了变化，从发音方法上来看都是塞擦音。根据 Evans 对南部羌语“儿子”的构拟 *tei L (2001: 301) 可知，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保留了原始的读法，而绵虬发生了变化。龙溪两河口羌语的“儿子”有两种说法，第二种说法 ŋa²¹³ 很少使用。三个方言点的“女儿”除了声调有差异以外，元音、辅音都一致。“儿女”的表达则都是采用联合的构词方式，“儿子”加上“女儿”来表达，

并且中间都用了连词，这一点和前面“父母”的构词方式有所不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父母”一词本来也是具有连词的，由于受到汉语的影响使得原本的连词消失了，变成了现在看到的形式。而“儿女”一词尚未受到汉语更深入的影响，所以连词仍然存在。根据“类推”原则，我们猜想，“儿女”一词中的连词 *nia/na* 最终可能也会消失。

第三组：“哥哥”的表达在三个方言点都不相同，根据构词理据，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的“*tu*”应该是“弟兄”的意思，而“*ba*、*pu*”都表示“大”的意思。Evans 对原始南部羌语“哥哥”的构拟为 **tu H bra L*，其中 **bra L* 是“大”的构拟，而绵虬为什么读为“*ɰue³¹po⁵⁵*”暂时没有找到变化的内在联系。“弟弟”的表达，萝卜寨羌语和龙溪两河口羌语都是“*tu³¹tsu⁵⁵*”，而绵虬羌语是“*təu³¹tsu⁵⁵*”，其原始构拟形式为 **tu H tsuə L* (Evans 2001: 232)，很明显“*təu³¹tsu⁵⁵*”中的“*təu*”是由于“*u*”高化之后再双元音化而来的。“弟兄”的构词方式三个点有所不同，萝卜寨羌语采用联合法的构词方式，没有使用连词。而龙溪两河口和绵虬羌语则采用另外的构词方式，并且都采用了同样的手段，“*tu³¹ni³¹*”和“*tu³¹nə⁵⁵*”中后一个成分可能是“二”的意思，而“*tu*”则有可能是表示“兄弟”意义的词头，组合在一起之后就表示“两兄弟”的意思。

第四组：三个方言点的“姐姐”的表达都不一样，萝卜寨羌语是“*io³¹pa⁵⁵*”，绵虬是“*ɰue³¹tce⁵⁵*”，这一形式有可能是一个合璧词，“*ɰue³¹*”是一个本族语的前缀，“*tce⁵⁵*”则是借自汉语“姐”的读音。龙溪两河口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羌语的说法，*sa⁵⁵pa³¹*和 *ɰua³¹tsi⁵⁵*，而用于面称的 *a⁵⁵tce³¹*，可能是借用的汉语“阿姐”⁴⁹。“妹妹”的表达三个方言点都不相同，萝卜寨是“*io³¹tɕa³¹*”，其中“*io³¹*”是表示“妹妹”的词根义，而“*tɕa³¹*”是表示“小”的意思。龙溪两河口是“*io⁵⁵*”和“*sa⁵⁵tsu³¹*”两种说法，和萝卜寨方言一样，其中“*io³¹*”是表示“妹妹”的词根义，而“*sa⁵⁵tsu³¹*”这一形式中，“*sa³¹*”可能是表示“姊妹”的词头，“*tsu³¹*”表示“小”的意思，面称则是借用汉语的“阿妹 *a⁵⁵me³¹*”。绵虬是“*liəu³¹*”，目前尚不知其来源。“姊妹”的构词方式和“兄弟”类似，萝卜寨用的是联合法构词“*mu³¹nia³¹io³¹*”，龙溪两河口和绵虬采用相同的构词方式，表示“姊妹”义的“*sa³¹*”，后面加上表示“二 (*ni* 和 *nə*)”的数词，构成了“姊妹”一词。其中，绵虬的“姊妹”还多了一个词头“*a³¹*”。

2.4 时间名词

时间名词是指时间的各种形式，或者指相对于目前的时间点（黄成龙，2007：50）。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时间名词的表达方式基本相同，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读音有所差异。

2.4.1 四季的表示

三个方言点中都没有像汉语那样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词，而只有“热天”和“冷天”两种表达方式，分别对应于汉语的“春夏”和“秋冬”。这可能与当地非

⁴⁹ Evans (2001: 299) 认为“*tce*”不是借词。他的理据是雅都方言读为 *ɛ tce*，其对应的汉语意义是“兄长的妻子”，所以不是来自汉语的“姐”。

四季分明的气候环境有关。如：

表 2-6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表示季节的词汇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热天	tɕe ³¹ qə ³¹	tɕe ³¹ qe ⁵⁵	tɕe ³¹ qe ³¹
冷天	su ³¹ qə ⁵⁵	so ³¹ qe ⁵⁵	so ³¹ qe ⁵⁵

从表 2-6 可以看出，三个方言点中表示季节的词尽管发音不完全相同，但是明显存在同源关系。Evans 对南部羌语的‘spring, summer’的原始构拟形式为*tsie(L)qe(H)(2001: 303)，‘autumn, winter’的原始构拟形式为*s(i)o(L)qe(L)(2001: 224)。首先，根据 Evans 的构拟可以看出，南部羌语“春”和“夏”用的同一个词，“秋”和“冬”用的同一个词，分别对应我们所调查的“热天”和“冷天”。其次，可以看出构拟形式*tsie(L)qe(H)和*s(i)o(L)qe(L)与萝卜寨、龙溪两河口以及绵虬三个方言点读音之间的内在联系。

2.4.2 年份的表示

萝卜寨、龙溪两河口和绵虬方言中关于“年”的表示方法，是采用“时间”+“年”(pu)，这和汉语的构词方式一样，如：

表 2-7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表示“年份”的词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今年	tsə ⁵⁵ pu ⁵⁵	tsə ³³ pu ³¹	tɕe ⁵⁵ pu ⁵⁵
去年	nə ⁵⁵ pu ⁵⁵	nə ³¹ pu ³¹	ne ⁵⁵ pu ⁵⁵
后年	tʰo ³¹ pu ⁵⁵	qʰe ⁵⁵ pu ⁵⁵	χəu ⁵⁵ pu ³¹
明年	die ³¹ teə ⁵⁵	χu ⁵⁵ pu ⁵⁵	dia ⁵⁵ tɕi ³¹

从表 2-7 可以看出，三个方言点中大多数表示“年份”的词存在同源关系。但是“明年”的表示方法，在三地羌语中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或者表现出具有同源关系。

2.4.3 天日的表示

与“年份”的构成方法一样，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方言中“天日”的构成方法都是用“时间”+“天”(ei)表示，绵虬用“时间”+“天”(se)表示。如：

表 2-8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表示“天日”的词汇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今天	pei ⁵⁵ ei ⁵⁵	pu ⁵⁵ ei ⁵⁵	pe ³¹ se ⁵⁵
昨天	ne ⁵⁵ ei ⁵⁵	nə ³¹ ei ⁵⁵	nə ⁵⁵ se ⁵⁵
前天	dzə ⁵⁵ ei ⁵⁵	zə ³¹ ei ⁵⁵	tɕe ⁵⁵ se ⁵⁵

从表 2-8 可以看出，三个方言点中表示“天日”的词尽管发音不完全相同，但是明显存在同源关系。

三、数词与量词

3.1 数词

3.1.1 基数词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的计数系统都是采用简单的十进制体系(decimal system)。固有的数词可以到“万”(黄成龙, 2007: 67)。表 3-1 是三个方言点“1~10”的表达。

表 3-1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数词“1~10”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1	a ³¹	a ³¹	a ³¹
2	ni ³¹	nə ³¹	nə ³¹
3	ce ³¹	te ^h e ⁵⁵	sə ⁵⁵
4	dzə ³¹	zə ³¹	zə ³¹
5	ɤue ³¹	ɤue ³¹	ɤua ³¹
6	tsu ³¹	tsu ⁵⁵	tɕəu ⁵⁵
7	ei ³¹	ei ⁵⁵	ne ³¹
8	tɕhe ³¹	tɕha ⁵⁵	tɕhe ³¹
9	gu ³¹	gu ⁵⁵	gu ⁵⁵
10	a ³¹ teo ⁵⁵	a ³¹ tio ⁵⁵	a ³¹ tiəu ⁵⁵

这些基数词都是采用独立的形式计数,“百、千、万”也是如此,如萝卜寨的“百”khe³¹、“千”du³¹、“万”ɤua⁵⁵。

从表 3-1 可以看出,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的数词大致相同,具有同源演变关系。但绵虬的“7”与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存在较大的差别,和蒲溪方言“ɣən”也存在差异(黄成龙, 2007: 67),这种差异可能是受嘉绒语的影响造成的。嘉绒语的西北方言二岗里话的“7”是sne(林向荣, 1993: 644),嘉绒语理县薛城镇小沟话“7”是kə-ɣŋi(严木初, 2014: 217),与绵虬具有同源演变关系。

南部羌语还存在词根和词缀构成的合成基数词,可以分成三类情况:

①前缀加词根构成的合成基数词。“11-19”这几个数词中,除“11、15、16”外,其它数词都是在单纯基数词“1-9”的前面加上前缀a³¹。数词“11、15、16”具有独立的构词方式。如:

表 3-2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不规则数词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11	a ³¹ tei ⁵⁵	a ³¹ ti ⁵⁵	a ³¹ tsi ⁵⁵
15	a ³¹ ŋo ⁵⁵	a ³¹ ŋo ³¹	a ³¹ ŋa ³¹
16	a ³¹ tɕhu ³¹	a ⁵⁵ tɕhu ⁵⁵	a ³¹ tɕəu ³¹

从表 3-2 可见,尽管三个方言点的这三个数词存在不规则的构形,但三个方言点的语音具有对应关系。因此,不管是从语音,还是从合成数词的构词方式看,都明显能看出这

三个不规则数词在三个点中的保存是一致的。从数词“16”的构词方式更能看出这种一致性，三个方言点的基数词“6”都是不送气的塞擦音，而构成数词“16”时，则都变为了相对应的送气塞擦音，萝卜寨的 tsu^{31} 变为了 $\text{tʂ}^{\text{h}}\text{u}^{31}$ ，龙溪两河口的 tsu^{55} 变为了 $\text{tʂ}^{\text{h}}\text{u}^{55}$ ，绵鹿的 $\text{tʂ}\text{əu}^{55}$ 变为了 $\text{tʂ}^{\text{h}}\text{əu}^{31}$ 。

②词根加上后缀成分构成的合成基数词。这种构成形式，体现在“20~90”的整数词中，在三个方言点中大致相同，都是在单纯基数词“2~9”的后面加上一个后缀。这个后缀的形式存在差异，萝卜寨是 eye^{55} ，龙溪两河口和绵鹿都是 sa^{55} 。如：

表 3-3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20~90”部分数词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20	$\text{nə}^{31}\text{eye}^{55}$	$\text{nə}^{31}\text{sa}^{55}$	$\text{nə}^{31}\text{sa}^{55}$
50	$\text{kue}^{31}\text{eye}^{55}$	$\text{kue}^{31}\text{sa}^{55}$	$\text{kua}^{31}\text{sa}^{55}$
60	$\text{tsu}^{31}\text{eye}^{55}$	$\text{tsu}^{55}\text{sa}^{55}$	$\text{tʂ}\text{əu}^{55}\text{sa}^{31}$
80	$\text{tʂ}^{\text{h}}\text{e}^{31}\text{eye}^{55}$	$\text{tʂ}^{\text{h}}\text{a}^{31}\text{sa}^{55}$	$\text{tʂ}^{\text{h}}\text{e}^{31}\text{sa}^{55}$

③词根和词根构成的合成基数词。南部羌语中的“百”、“千”、“万”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数词结合在一起使用，表达的方式都是由基数词加上“百”、“千”、“万”。如：

表 3-4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合成数词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一百	$\text{a}^{31}\text{k}^{\text{h}}\text{e}^{31}$	$\text{a}^{55}\text{tʂ}^{\text{h}}\text{e}^{55}$	$\text{a}^{31}\text{tʂ}^{\text{h}}\text{i}^{31}$
两百	$\text{nə}^{31}\text{k}^{\text{h}}\text{e}^{31}$	$\text{nə}^{31}\text{tʂ}^{\text{h}}\text{e}^{55}$	$\text{nə}^{31}\text{tʂ}^{\text{h}}\text{i}^{31}$
一千	$\text{a}^{31}\text{du}^{31}$	$\text{a}^{31}\text{du}^{55}$	$\text{a}^{31}\text{tʂ}^{\text{h}}\text{e}^{31}$
两千	$\text{nə}^{31}\text{du}^{31}$	$\text{nə}^{31}\text{du}^{55}$	$\text{nə}^{31}\text{tʂ}^{\text{h}}\text{e}^{31}$
一万	$\text{a}^{31}\text{kua}^{55}$	$\text{a}^{31}\text{kua}^{33}$	$\text{a}^{31}\text{kua}^{55}$
两万	$\text{nə}^{31}\text{kua}^{55}$	$\text{nə}^{31}\text{kua}^{55}$	$\text{nə}^{31}\text{kua}^{55}$

根据表 3-4 可知，绵鹿羌语“千”的表达和萝卜寨、龙溪两河口有所不同，绵鹿用 $\text{tʂ}^{\text{h}}\text{e}$ 表示，而其余两个方言点则用 du 来表示。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的语音形式与蒲溪方言的 sto （黄成龙，2007：69）可以建立起联系，但绵鹿的语音形式来源还有待考证。

3.1.2 其它多位合成数词

在多位数的合成表达上，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方言表现出一致，而绵鹿方言出现差异。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在表达多位数时，都需要与量词结合，同时加上连接词才能使用。其基本构成形式为“基数词+后缀+连接词+基数词+量词”。萝卜寨与量词 ku 结合，连接词为 nia^{55} ；龙溪两河口与量词 o^{31} 结合，连接词为 na^{55} 。如：

表 3-5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多位数合成数词对照表

数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21	$\text{nə}^{31}\text{eye}^{55}\text{nia}^{55}\text{a}^{31}\text{ku}^{55}$	$\text{nə}^{31}\text{sa}^{55}\text{na}^{31}\text{a}^{31}\text{o}^{31}$	$\text{nə}^{31}\text{se}^{31}\text{tsi}^{55}$
25	$\text{nə}^{31}\text{eye}^{55}\text{nia}^{55}\text{kue}^{31}\text{ku}^{55}$	$\text{nə}^{31}\text{sa}^{55}\text{na}^{31}\text{kue}^{31}\text{o}^{31}$	$\text{nə}^{31}\text{se}^{31}\text{kua}^{31}$

13578	a ³¹ kua ³¹ nia ⁵⁵ ee ³¹ du ⁵⁵ kue ¹³ - tʰe ³¹ ci ³¹ eye ⁵⁵ nia ⁵⁵ tʰe ³¹ ku ⁵⁵	——	——
-------	--	----	----

由表 3-5 可知，绵鹿羌语在表达多位数的方式和萝卜寨、龙溪两河口羌语有所不同。首先，出现了音变，单独说数词“20”时是基数词加上后缀 sa，即“nə³¹sa⁵⁵”。而在表达多位数时 sa 变为了 se。其次，绵鹿羌语在构词时不需要使用量词和连接词。但是我们目前还无法求证哪一种构词法是后起的表达形式。

3.1.3 “零”的用法

萝卜寨、龙溪两河口和绵鹿三个方言点中都没有单独的“零”的表示法，如果用在合成数词中，通常不会像汉语一样表达出“零”，而是用连接词 nia/na 直接连接“零”前后的数词，后面再加上量词，例如，萝卜寨的“102”构词方式是“a³¹ke³¹100”+“nia⁵⁵连接词”+“ni³¹二”+“ku⁵⁵量词”。龙溪两河口的发音人，没有表达出“1003”这一形式，而是用汉语表达的，可能是较复杂的数字形式在本族语羌语的表达中已经逐渐消失，受到汉语的影响后，转而使用汉语表达。如：

表 3-6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零”的表达方式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102	a ³¹ ke ³¹ nia ⁵⁵ ni ³¹ ku ⁵⁵	a ⁵⁵ tʰe ⁵⁵ na ³¹ nə ³¹ o ³¹	a ³¹ tʰi ³¹ nia ⁵⁵ nə ³¹ ko ³¹
1003	a ³¹ du ⁵⁵ nia ⁵⁵ ni ³¹ ku ⁵⁵	——	a ³¹ tʰe ³¹ nia ⁵⁵ sə ³¹ ko ³¹

3.1.4 序数词

萝卜寨、龙溪两河口和绵鹿羌语都没有专门的表达序数词的方式。根据语料，可以概括为“基数词+计量词”的格式。根据语义表达，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表示一般的序数，一类是表示时间的序数。

(1) 一般的序数。南部羌语在表达一般的序数时存在差异，萝卜寨羌语用“基数词+个体量词 ku⁵⁵”构成，表示“第一”、“第二”等，后面的量词的具体语义内涵需要随文补充。如：

ã³¹ku⁵⁵ 第一 ni³¹ku⁵⁵ 第二
kue³¹ku⁵⁵ 第五 tʰe³¹ku⁵⁵ 第八

但是，“最后”采用的是羌语前缀“a”加四川方言“ʂa³¹ko³¹”（结束）而形成合璧词“a³¹-ʂa³¹ko³¹”的形式。

绵鹿羌语序数词的表达与萝卜寨不同，除了“第一”、“第二”和“最后”不是按照“基数词+个体量词”的构成方式外，其他的序数词形式前面似乎存在 te³¹ke³¹ke⁵⁵等语素，这个形式有些类似于汉语的“第”，如：

te³¹ke³¹ke⁵⁵ko⁵⁵ 第一 ne³¹tʰə⁵⁵ke³¹mu³¹to⁵⁵ 第二
te³¹ke³¹ke⁵⁵kua³¹ko⁵⁵ 第五 te³¹ke³¹ke⁵⁵tʰe³¹ko⁵⁵ 第八
de⁵⁵me³¹tʰə³¹ke³¹ko⁵⁵ 最后

⁵⁰ 本来是 a³¹ku⁵⁵，由于语音同化的原因，变为了“ã³¹ku⁵⁵”。

龙溪两河口羌语已经没有本族语的“第一”，“第二”的序数词的表示方法，都是借用汉语的表达方式。Zheng Wuxi（郑武曦）（2016：100）调查龙溪马灯话的情况也是如此。说明龙溪方言中部分序数词本族语的表达方式已经消失。

（二）表示时间的序数。由“基数词+时间计量词”组成。这个形式，在南部羌语中比较一致。如萝卜寨羌语在表月份的序数时，用“基数词+lə（月）”构成，龙溪两河口用“基数词+ʂə（月）”构成，绵虬用“基数词+lə ta（月）”构成。如：

表 3-7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月份序数词对照表

数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月	tei ³¹ teo ⁵⁵ lə ⁵⁵	a ³¹ ʂə ⁵⁵	pe ³¹ lə ³¹ ta ⁵⁵
二月	ni ³¹ lə ³¹	nə ³¹ ʂə ⁵⁵	ne ³¹ lə ³¹ ta ⁵⁵
三月	ɛe ⁵⁵ lə ⁵⁵	te ^h e ³¹ ʂə ⁵⁵	si ⁵⁵ lə ³¹ ta ³¹
四月	ɬə ³¹ lə ³¹	zə ³¹ ʂə ⁵⁵	zə ³¹ lə ³¹ ta ³¹
五月	kuə ³¹ lə ³¹	ku ³¹ ʂə ⁵⁵	kuə ³¹ lə ³¹ ta ³¹
六月	tsu ³¹ lə ⁵⁵	tsu ⁵⁵ ʂə ⁵⁵	tʂəu ³¹ lə ³¹ ta ³¹
七月	ɛi ³¹ lə ⁵⁵	ɛi ⁵⁵ ʂə ⁵⁵	nə ³¹ lə ⁵⁵ ta ³¹
八月	tʂ ^h e ³¹ lə ³¹	tʂ ^h a ³¹ ʂə ⁵⁵	tʂ ^h e ³¹ lə ⁵⁵ ta ³¹
九月	gu ³¹ lə ⁵⁵	gu ⁵⁵ ʂə ⁵⁵	gu ³¹ lə ⁵⁵ ta ³¹
十月	a ³¹ teo ³¹ lə ³¹	a ³¹ tiəu ⁵⁵ ʂə ³¹	a ³¹ tiəu ⁵⁵ lə ⁵⁵ ta ³¹
十一月	a ³¹ tei ⁵⁵ lə ⁵⁵	a ³¹ ti ³¹ ʂə ³¹	a ³¹ tsə ⁵⁵ lə ⁵⁵ ta ³¹
十二月	a ³¹ nə ⁵⁵ lə ⁵⁵	a ³¹ nə ⁵⁵ ʂə ³¹	a ³¹ nə ⁵⁵ lə ³¹ ta ³¹

由表 3-7 可见，在“一月”的表示上，萝卜寨和绵虬没有按照“基数词+计量词”的方法，而是另有所据，如萝卜寨的 tei³¹teo⁵⁵lə⁵⁵ 是“初月”的意思。绵虬的 pe³¹lə³¹ta⁵⁵ 确切含义还不明，而龙溪两河口羌语在表达“正月”时也采用“基数词+时间计量词 ʂə”的构词方式。

3.1.5 概数词

南部羌语概数词的表达存在差异。其中，萝卜寨和绵虬的概数词表示方式为：数词+形容词 ɬəu⁵⁵ 或 dio³¹。而龙溪两河口则是：数词+连词 na+几个+助词 la。这一表达方式在孙宏开（1981：90）调查的桃坪羌语中也使用。如：

- 1) pei³¹ɛi⁵⁵ nə³¹ɛye³¹-tsə⁵⁵ ɬəu⁵⁵ ke⁵⁵pu⁵⁵ luei²¹³（萝卜寨）
今天 二十-CL 多 客人 来：CSM
（今天来了二十几个客人。）
- 2) pe³¹se⁵⁵ te³¹p^{hi}³¹ nə³¹sa⁵⁵ dio³¹ lə²¹³（绵虬）
今天 客人 二十 多 来：AUX
（今天来了二十几个客人。）

- 3) pu⁵⁵ei⁵⁵ mu³¹zi⁵⁵ nə³¹sa³¹ na³¹ an⁵⁵tie³¹ la³¹ i³¹-lye^{55 51} (龙溪两河口)
今天 客人 二十 LNK 几个 AUX DIR-来: 3sg
(今天来了二十几个客人。)

3.2 量词

量词是名词范畴化(categorization)中的一类,它们的使用范围与汉语的量词几乎没有差别。量词可以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名量词表示事物的类别或度量,动量词表示事物动作的频率或持续的时间。

3.2.1 名量词

(1) 通用量词。南部羌语中存在一些适用面比较广的量词,可以称之为通用量词。南部羌语最常见的通用量词一般区分“人”、“动物”、“事物”等。如:

表 3-8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通用量词对照表

生命度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人	tsə ³¹	o ³¹	ko ³¹
动物	ia ³¹	za ³¹	ia ³¹
无生命	ku ³¹	o ³¹	ko ⁵⁵

由表 3-8 可知,萝卜寨羌语的通用量词三分,严格区分人、动物和无生命物。量词 tsə 只用于“人”,计量动物用 ia,其余无生命的计量使用 ku。如:

一个(人): a³¹tsə³¹ 一头(牛): a³¹ia³¹ 一颗(星星、豆子): ā³¹ku⁵⁵

而龙溪两河口与绵鹿的通用量词目前只存在两分,但是,它们都严格区分“人”与“动物”,体现在龙溪两河口方言计量“人”和无生命物都用 o³¹,计量动物则用 za³¹。如:

一个(人): a³¹o³¹ 一头(牛): a³¹za³¹ 一颗(星星、豆子、米): a³¹o³¹

绵鹿羌语计量“人”和无生命物都用 ko³¹,计量动物则用 ia³¹。如:

一个(人): a³¹ko⁵⁵ 一头(牛): ia³¹ 一颗(星星、豆子): a³¹ko⁵⁵

(2) 表示形状的量词。南部羌语三个点都存在一些表示形状的量词,这在蒲溪羌语中也存在(黄成龙,2007: 69)。如:

表 3-9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形状量词对照表

量词形状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鹿
条状	a ³¹ ə ²¹³	a ³¹ ke ³¹	a ³¹ tɕi ⁵⁵
片状	a ³¹ ts ^h e ⁵⁵	a ³¹ ts ^h e ⁵⁵	a ³¹ ts ^h i ⁵⁵
块状	ā ³¹ ku ³¹	a ³¹ o ³¹	a ³¹ ko ³¹

这些量词都是放在名词之后,既可以用于羌语本身的词汇后,也可以用在汉语借词后,如:

⁵¹ lye⁵⁵ 是 lio⁵⁵+ie⁵⁵ 的合音。

表 3-10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形状量词对照表

例证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条裤子	soŋ ³¹ to ⁵⁵ a ³¹ ə ²¹³	k ^h u ³³ tsə ³¹ a ³¹ ə ³¹	ze ³¹ tie ⁵⁵ a ³¹ ə ³¹
一张纸	i ³¹ dʒə ³¹ a ³¹ ts ^h e ⁵⁵	zi ³¹ te ⁵⁵ a ³¹ ts ^h e ³¹	ze ³¹ dʒə ³¹ a ³¹ ts ^h i ⁵⁵
一块石头	ku ³¹ pia ⁵⁵ ã ³¹ ku ³¹	ko ³¹ pie ³¹ a ³¹ o ³¹	ko ³¹ pa ³¹ a ³¹ ko ³¹

3.2.2 度量词

度量衡单位量词包括长度单位、时间单位、重量单位和容量单位。根据黄成龙（2005:18），度量词作为度量的单位，羌语中的度量词可以分为个体度量词（individuated measures words）和群体度量词（group measures words）。

（1）个体度量词。个体度量词主要包括时间单位度量词、尺寸单位度量词、重量单位度量词等。

①时间单位度量词

表 3-11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时间单位度量词对照表

例证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天	a ³¹ ei ³¹	a ³¹ ei ³¹	a ³¹ se ⁵⁵
一个月	a ³¹ lə ³¹	a ³¹ le ³¹	a ³¹ lə ³¹
一年	a ³¹ pu ³¹	a ³¹ pu□□	a ³¹ pu ³¹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三个方言点的时间度量词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其中绵虬的“一天”a³¹se⁵⁵和萝卜寨、龙溪两河口羌语的“a³¹ei³¹”语音上存在对应关系。

②尺寸度量词

表 3-12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尺寸度量词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寸	a ⁵⁵ te ^h y ⁵⁵	a ³¹ ts ^h uən ²¹³	a ³¹ ts ^h uei ⁵⁵
一尺	a ⁵⁵ ts ^h i ³¹	a ³¹ ts ^h ə ³¹	a ³¹ ts ^h e ³¹
一丈	a ³¹ dʒa ⁵⁵	a ³¹ ʒa ⁵⁵	a ³¹ tsa ⁵⁵
一庹	a ³¹ p ^h e ³¹	a ³¹ ie ⁵⁵	——
一拃	ʔue ³¹ te ^h y ⁵⁵	a ³¹ ka ³¹	——

③重量单位度量词

表 3-13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重量单位度量词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斤	a ³¹ tei ⁵⁵	a ³¹ tei ⁵⁵	a ³¹ ke ⁵⁵
一两	a ³¹ dʒo ³¹	a ³¹ zo ⁵⁵	a ³¹ tsəu ³¹
一钱	a ³¹ te ^e ³¹	a ³¹ zi ⁵⁵	a ³¹ tsə ⁵⁵
一石	a ³¹ ta ³¹	a ³¹ ta ³¹	a ³¹ tiəu ⁵⁵ pu ³¹
一升	a ³¹ ʕi ⁵⁵	a ³¹ tu ³¹	a ³¹ ʕe ⁵⁵

三个方言点的尺寸度量词大都是借用汉语。例如“庋”，萝卜寨羌语中的“庋”的本义是指成人两臂左右伸直的长度，“一庋”中的“p^{he}ai⁵³”是借四川方言的“p^hai⁵³”，借入之后发生了音变，即，ai>e。根据黄成龙（2005），尺寸度量词和重量度量词有标准度量词和非标准度量词的区分，“丈”、“尺”、“寸”、“斤”、“两”都是标准度量词，其中“丈、尺、寸、斤”绝大部分都是汉语借词，只是在借入之后发生了音变。“两”则还保持羌语的读音。

（2）群体度量词。常见的群体度量词主要包括“家、群、堆、行、排、组、套”等，是由多个个体单位共同构成的度量词。

表 3-14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群体度量词对照表

例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家	a ³¹ tei ³¹ pie ⁵⁵	a ⁵⁵ ko ⁵⁵ pie ⁵⁵	a ³¹ ka ³¹
一窝	a ³¹ pu ³¹	a ³¹ pu ³¹	a ³¹ pu ³¹
一群	a ³¹ k ^h ue ⁵⁵	a ³¹ bo ⁵⁵	a ³¹ p ^h e ³¹
一排	a ³¹ p ^h ai ³¹	a ³¹ p ^h e ³¹ p ^h e ³¹	a ³¹ p ^h ai ³¹
一套	a ³¹ t ^h au ³¹	a ³¹ t ^h au ²¹³	a ³¹ t ^h au ²¹³
一盒	a ³¹ xo ³¹	a ³¹ xo ⁵⁵	a ³¹ xo ³¹

群体度量词也分为了固有词和借词两类，“家、窝、群”都是当地羌语本身的表达，而“排、套、盒”则是借用四川方言来表达。

3.2.3 动量词

动量词是表示动作行为数量和延续时间长短的量词。南部羌语中的动量词不多，但是使用的范围却很广，有自身专门的动量词，比如“一次”、“一趟”、“一下”、“一觉”等。例如：

表 3-15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动量词对照表

例证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一次	a ³¹ ei ⁵⁵	a ³¹ tu ³¹	a ³¹ təu ⁵⁵
一回	——	a ³¹ tu ³¹	a ³¹ təu ⁵⁵
一趟	t ^h ā ¹³	——	a ³¹ təu ⁵⁵
一遍	a ³¹ p ^h a ⁵⁵	a ³¹ tu ³¹ /a ³¹ tau ¹³	a ³¹ təu ⁵⁵
一觉	a ³¹ tye ³¹	a ³¹ zuei ³¹	a ³¹ tua ³¹
一顿	a ³¹ dua ⁵⁵	a ³¹ tua ⁵⁵	a ³¹ tua ⁵⁵
一步	a ³¹ ua ⁵⁵	a ³¹ ua ⁵⁵	a ³¹ tɕ ^h a ³¹ tɕ ^h e ³¹
一脚	a ³¹ təyo ³¹ t ^h əu ³¹	a ³¹ tɕ ^h u ³¹	a ³¹ tɕ ^h u ³¹

三个方言点的动量词中的“一次”、“一回”、“一趟”的表达基本是一致的，在当地羌民族的感知中，“次、回、趟”没有区别，这与汉语的感知（perception）是有差异的，所以出现了在表达上一致的情况。萝卜寨羌语的“趟”是借自四川方言，说明其感知（perception）受到汉语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龙溪两河口羌语中“一遍”有两种表示方

法，固有词和汉语借词，其中固有词的使用频率更高，而绵虬“一遍”的表达仍然和“一次（回、趟）”一样。“一顿”则都是用动词词根“打”来表示。萝卜寨羌语的“一脚”是借用四川方言的“一脚头”来表示，而龙溪两河口和绵虬羌语则是用动词“踢”来表示。这也可以看出，羌族和汉族认知方式的差异。“一步”这一形式中，萝卜寨和龙溪两河口的表达是一致的，而绵虬羌语是另外的表达形式。三个方言点的“一觉”互不相同，其中绵虬羌语的“一觉”和“一顿”相同，萝卜寨的 a³¹tye³¹和龙溪两河口的 a³¹zuei³¹尚不清楚其构词理据。

四、方位词

方位词是用来表示方向和位置的词，羌语中除了有方向格之外，还有多种方位词。羌语中并没有固定的表示“东”、“南”、“西”、“北”的词，但是有表示“上”、“下”、“前”、“后”这样的词。南部羌语表示方位的词比北部羌语的数量少了很多，三个羌语方言点中表示方位的词已经没有了根据水流方向、靠山方向而进行区别的方位词。三个方言点的方位词见下表：

表 4-1 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方位词对照表

方位词	萝卜寨	龙溪两河口	绵虬
上面	qa ⁵⁵ ea ⁵⁵	ke ⁵⁵ ti ³¹	ke ⁵⁵ te ³¹
下面	q ^h e ³¹ ea ⁵⁵	qa ⁵⁵ to ⁵⁵	k ^h ei ⁵⁵ təu ³¹
前面	qə ³¹ ie ⁵⁵	ko ³¹ la ⁵⁵ kə ³¹	te ³¹ ke ³¹
后面	ta ³¹ qa ⁵⁵ to ⁵⁵	ta ⁵⁵ to ⁵⁵	ko ³¹ ko ⁵⁵
里面	do ³¹ qə ⁵⁵	ŋo ⁵⁵ to ⁵⁵	ke ³¹ zei ⁵⁵
外面	ka ³¹ ea ⁵⁵	bia ²¹³	ka ¹³¹
左边	tʂe ³¹ ʂə ³¹	ʂo ⁵³ k ^h ua ⁵³ ʂə ³¹	gue ⁵⁵ a ³¹ ea ³¹ k ^h ua ³¹
右边	t ^h ə ³¹ ʂə ³¹	iəu ⁵³ k ^h ua ⁵³ ʂə ³¹	da ⁵⁵ a ⁵⁵ ea ³¹ k ^h ua ³¹

从表 4-1 中可以看出，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中“左边”和“右边”的表示方法差异较大。萝卜寨分别用“这边”和“那边”来表示“左边”和“右边”，龙溪两河口羌语则是借用汉语的“左膀子”和“右膀子”来表示，绵虬的表达比较复杂，其中的 k^hua³¹与龙溪两河口的汉语借词中的一个语素形式相同，但前面的 gue⁵⁵a³¹ea³¹和 da⁵⁵a⁵⁵ea³¹似乎又是羌语的表达方式。

五、小结

本文描写比较了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名词组的特征，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内部差异性。在最常见的普通名词方面，单音节结构的比例一致性比较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读音方面，这些差异的形成，不少是元音系统的自身演变造成的，如元音高化、双元音化等。专有名词方面，附近地区的地名中大多用羌语表达，如果是近期影响进入的地名，则直接借用汉语来表达。南部羌语中人名的表达手段比较特殊，主要体现在姓氏的表达上。有一部分姓氏的表达是直接借用汉语，例如“王”；还有一部分姓氏的表达是采用与汉语中的姓氏词义相同的羌语词汇来表达。如用“獐”对应汉语的姓氏“张”，用性状形容词“高”对应汉语的姓氏“高”。亲属称谓名词有一部分用本民族词表示，有一部分则用汉语借词来表示，内部一致性比较高。南部羌语三个点的时间名词的表达方式基本相同，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部分读音发生了变化。南部羌语数词与量词的表达内部一致性也比较高，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序数词的表达上，龙溪两河口羌语中序数词“第一”、“第二”的表示方法已经消失，而是借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南部羌语三个方言点中方位词的表达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最典型的差异体现在“左边”和“右边”的表达形式上。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受到成都大学校基金重点项目（2023XJJ01）的资助。

参考文献

- [1] 黄成龙. 2005. 《羌语的名量词》，《民族语文》第5期.
- [2] 黄成龙. 2007. 《蒲溪羌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林向荣. 1993. 《嘉绒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4] 孙宏开. 1981. 《羌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5] 孙宏开. 1988. 《论羌族双语制：兼谈汉语对羌语的影响》，《民族语文》第4期.
- [6] 严木初. 2014. 《嘉绒语词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7] 朱晓农. 2004.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中国语文》第5期.
- [8] Jonathan P. Evans. Introduction to Qiang Lexicon and Phonology Synchrony and Diachrony[M], Tokyo, 2001.
- [9] Randy J. Lapolla.& Huang Chenglong. A Grammar of Qiang[M]. Mouton de Gruyter, 2003.
- [10] Zheng Wu-xi. A Grammar of Longxi Qiang [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6.

The Comparison of Noun Phrase Characteristics in Southern Qiang Language

Gao T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Chengd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primarily describes and compa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un phrases in three dialects of Southern Qiang language. The proportion of monosyllabic common nouns shows a high degree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vowel raising,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orms of common nouns across the three dialects, such a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u' and 'ue'. The expression of place names in proper nouns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whi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rnames in personal names has distinct features, for example, using the Qiang word for the animal 'muntjac' to correspond to the surname 'Zhang', and using the Qiang adjective for 'tall' to correspond to the surname 'Gao'. Kinship terms are partly expressed in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partly through Chinese loanwords,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The expression of time nouns is largely the same, with differences mainly appearing in some pronunciation changes, indicating a common origin. The expression of numerals and measure words also shows a high degree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differences primarily found in ordinal numbers; the expressions for 'first' and 'second' in Longxi Lianghekou have disappeared, adopting instead the Chinese way of expression.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 directional terms, most notably in the forms used for 'left' and 'right'.

[Keywords] Southern Qiang language noun phrase comparison